



RIBENDIGUO DE XINGWANG RIBEN

要不要
从一段可怖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能不能
从一段可怖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主编 汤重南 汪 淼
强 国 韩文娟

日本帝国的兴亡

上

世界知识出版社

导言

“大日本帝国”，其兴速，其亡也速，存在不足百年。其兴，以 1868 年的日本明治维新为起点，犹如“彗星那样登上舞台”，骤然于 19 世纪末叶出现在东方，划破了屡受欧美列强殖民侵略而笼罩着东亚的沉沉黑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给沉沦中的东方各国、各民族带来希望。东亚各国、各民族的志士仁人，在惊叹日本的迅速崛起之余，更纷纷全方位地效法日本，欲使本国、本民族能像日本一样振兴、腾飞。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东方各国人士学习日本的迷梦。成为“世界一等国”、“世界五大强国、三大强国之一”的新兴日本帝国，不仅与西方列强为伍，欺凌压迫东方弱小邻邦，且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跃登“东洋霸主”地位后，竟炮制和抛出建立囊括亚洲、澳洲及太平洋诸岛的殖民大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计划，其侵略铁蹄践踏了东亚、东南亚各国，更妄图与德、意法西斯分霸全世界，曾几何时，骄横一世、不断膨胀的“大日本帝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终于在 1945 年 8 月迅速崩溃败亡；又像彗星那样消失了”。

《日本帝国的兴亡》一书正文共 10 编 50 章约 110 万字，已写明了“大日本帝国”是怎样兴起，又是怎样败亡的这一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尚能如此，亦可欣然自慰了。但本书出版编辑者及主编未满足于只达到这一最基本的要求，而是力求对“大日本帝国”的兴亡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即不仅要知其兴亡，而且要知其所以兴亡。本书对其兴之因、亡之源亦应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本书作为中国学者撰写的融通俗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史学著作，理应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如果能与当时的中国进行某些对照和比较，概括总结日本帝国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则会更增强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书出版编辑者及主编特辟专章，即在“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中，力图在这方面作一总体的考察、概括，提出一些看法。

为突出重点，使历史线索清晰、明了，在详尽描述“大日本帝国”兴亡的历史过程之前，有必要对这一过程予以简要概述，作为导言。

一幕府的崩溃与日本帝国的兴起

1. 幕末日本与世界

18 世纪中叶后，随着商业性农业不断发展和商业资本渗入农村，日本 1000 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破坏，农村手工业亦开始发展并逐渐脱离农业，日本国内市场扩大，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进入 19 世纪后，日本资本主义因素更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先进地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已逐渐占了统治地位。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日本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深刻的危机。尤其在 1854 年实行开国，1858 年签订《安政 5 国通商条约》后，外贸的飞速发展更刺激和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从而遭到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幕府和各藩大名的抵制。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反动措施，打击了工场

主和商人，也沉重地打击了广大的农民。由于严禁出口商品的生产，造成了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的局面。物价的昂贵也促使大批下级武士破产，从而引起他们对幕府的强烈不满。

开港后物价的与年俱增，贡赋和租税的猛增，加之农业歉收与饥荒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陷入贫困破产的深渊，促使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不断高涨，反幕府的起义在日本各地迅猛发展。特别是在 1860 年后，起义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是历史上空前的。这些农民起义的矛头直接指向日本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将军，称他是一切灾祸的“罪魁祸首”。在幕府征伐长州藩时，不少起义队伍提出了反对德川将军、反对“征长战争”的口号。有的农民起义更提出了村政民主化口号，并用武力捣毁了地方政府、监狱，释放囚犯，焚毁文书档案等。反对政府及其地方政权，要求政治民主、社会平等及种植和经营自由，甚至提出建立世界“第一等国家”的思想等等，是 19 世纪 60 年代农民起义的显著特征。

要求身分等级平等、生产和经营自由的豪农豪商阶层也积极参加了农民、市民的起义，并往往掌握了起义的领导权。他们在倒幕维新过程中起着在倒幕派和下层人民运动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作用。他们往往自己就是倒幕派志士，或者与倒幕派有着密切联系。在农民与市民反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同时，日本社会上亦出现一股强烈批判封建主义的进步思潮，涌现出一批先进的思想家。他们无情抨击和深刻揭露封建的幕府体制，批判封建主义思想。

另有一批有胆略有见识的改革家。他们反对幕藩体制，直接投身于改革斗争。总之，到 19 世纪中叶幕府末期，幕藩体制在政治上腐朽已极，经济上千疮百孔，日本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之中。

在日本长达两个多世纪（17 世纪中叶—19 世纪中叶）的“锁国”期间，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9 世纪 40—50 年代，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了积极开拓世界市场，寻求原料产地，在向东方殖民扩张时，纷纷将触角伸向日本。后起的美国其锋更锐，更讲究策略。经过充分准备后，1853 年 7 月 8 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佩里率 4 艘涂黑漆的军舰组成的特遣舰队开进江户湾浦贺海面，要求日本“开国”，并以诉诸武力相威胁，史称“黑船”事件。对此，日本朝野上下惊慌失措。“一朝船舶炮声来”，“四只蒸汽船，惊醒太平梦，从此夜不能寐”。幕府被迫屈服，只好在浦贺附近久里滨接受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亲笔国书，并约定翌年春回答其要求。佩里于 7 月 17 日率舰队离浦贺去琉球那霸。俄国闻知美国叩关消息，立即派海军中将普提亚廷为特使，于 8 月 22 日率 4 艘军舰开进日本长崎，要求通商和划定两国边界。

美国佩里的黑船叩关，使日本政局一片混乱，幕府一反独断专行之惯例，不仅向一直无权过问国事的天皇朝廷报告，而且将美国国书传示各大名诸侯，甚至允许各级武士自由上书，献计献策。

1854 年 2 月 13 日，佩里又率 7 艘军舰开至江户（现东京）小柴冲，后又增加 2 艘军舰，以武力威胁，要求日本开国。3 月 8 日，双方在神奈川开始谈判。明知开国将危及其统治的幕府，迫于美方压力，于 3 月 3 日与美国缔结了《日美辛丑条约》，亦称《日美神奈川条约》。该条约规定：开放下田、箱馆，搭救美国漂流民，在开放港口圈定外国人“居留地”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此后，英、俄、荷等各国纷纷仿效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内容相同的条约。日本被迫开国，锁国体制崩溃。

1858年6月，幕府由井伊直弼（1815—1860年）出任大老。他未经天皇“敕许”，即于7月29日派代表至停泊在江户湾小柴冲的美国军舰“波瓦坦”号上，与美方代表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14条，另附贸易章程7则，接着又与荷、俄、英、法签订相同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后来，葡萄牙等国依法炮制。依此条约，日本增开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庫4港及大阪、江户2市通商，外国人可与日本人自由贸易，并享有治外法权。1863年，幕府又被迫承认外国有权在横滨驻军，横滨成了列强统治的“国中之国”，日本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民族危机空前加剧。

2. 日本帝国成立

日本开国开港后，面临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在内外危机中，日本封建营垒内部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他们的思想主要来自儒学和“国学”，有些人也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下级武士的革新势力和出身于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在“尊王攘夷”口号下，展开了要求改革幕政、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

1867年1月，孝明天皇（1831—1867年）死，太子睦仁亲王即位，此即明治天皇（1852—1912年）。倒幕势力积极结盟并举兵。11月8、9日，明后天皇分别向萨、长藩主下达《讨幕密敕》。同月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年）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以图反扑。

萨长倒幕派，深知幕府“奉还大政”乃韬晦之计，遂提出坚决倒幕主张。1868年1月1日夜，天皇朝廷向萨摩、土佐、艺州、尾张和越前藩主下达命令，由5藩兵力守护禁阙。1月3日，三条实美、中山忠能、岩仓具视等公卿，以及炽仁亲王、晃亲王、纯仁亲王和德川庆胜、山内丰信等藩主，以及上述5藩藩士代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聚集皇宫，拟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同日夜又在宫中小御所召开会议，商讨新政。在会上，岩仓具视罗列幕府的失败之举，表示德川庆喜必须辞官纳地。萨摩、艺州藩主亦支持岩仓。西乡率兵在会场周围严阵以待，以施加巨大压力。于是，会议作出令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和宣布“王政复古”、实行新政的“大号令”。通过这次宫廷政变，取代德川幕府的明治天皇政权宣告成立，换言之，日本帝国于1868年开始建立了。

同月8日及13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868年1月27日，以萨长两藩兵力为主力的明治政府军5000人与前来反扑的幕府军1.5万人，在京都南部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幕府军败走，庆喜逃至江户，戊辰战争（1868—1869年）由此开始。政府军大举东征，迫使庆喜于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上旬，政府军平定东北地区诸藩叛乱。1869年春，政府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军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函馆五稜郭，戊辰战争结束。1868年4月6日，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约》，在6月11日，公布“政体书”，宣称“天下之权力皆归大政官”，并将“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按此原则，天皇政权实行第一次“太政官制”。9月3日，天皇下诏改江户为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取中国《易经》

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中的“向明而治”，并规定从此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翌年4月，天皇赴东京，事实上迁都东京。

在此前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新政府，开始实行“维新”。“维新”即变革之意，实际上是实行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

1869年7月25日，明治天皇下诏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版指领地，籍指户籍），任命藩主为藩知事，取消藩王、公卿等旧称，统称“华族”，一般武士则称为“士族、卒”。1871年8月29日，实行“废藩置县”，解除旧藩主藩知事职务，建立了近代府县制度，最后取消了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全国行政区重新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此举建立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治体制。

天皇政权在1868—1878年间，镇压了20多起士族刺杀政府高级官员和暴乱事件，如1874年以江藤新平（1834—1874年）为首的佐贺之乱和1877年以西乡隆盛为首的鹿儿岛士族叛乱。同时，更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农民起义和暴动。

天皇政府在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极力利用日本的封建遗制。在政治上神化天皇，树立其绝对权威；为培植特权阶层，将维新功臣及财阀亦列入“华族”；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皇道、神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逐渐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中央集权制建立和巩固后，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开设帝国议会，从而确立了近代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3. 帝国崛起

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帝国新政府，在实行资本主义改革时期，贯彻执行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资本主义化。

1871年11月20日，帝国新政府任命外务卿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兼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为全权副使，组成48人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另有留学生59人同行。12月23日，岩仓使节团一行由横滨启航赴美欧访问、考察，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奥和瑞士等12个国家，认真考察了各国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经济、文教、风俗习尚等方面的情况。在长达20个月的考察、访问中，使团实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眼界大开，认识到发展经济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必须改革日本的政治体制，健全法制；移风易俗、改革教育；并决定从本国国情出发，效法西方，认为“尤可取者，以普鲁士为第一”。1873年9月，使团成员回国后，重新改组了政府，使团主要成员更牢牢掌握政权实权，亦使大批具有改革思想及专长的人才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基本上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及领导骨干，决定了日本今后发展的大方向。

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中，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在1873年宣布地税改革前，帝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些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措施，如废除以往对种植作物品种的限制，废除关于土地买卖的禁令及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等。1873年7月28日，政府发布《地税改革条例》规定：以耕地的法定价格作为全国统一的课税标准；地税的税率定为法定地价的3%，另征1%的附

加税；地税一律用货币交纳；法定纳税人是从国家领取土地执照而拥有土地所有者，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最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地税改革废除了种种封建限制，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使政府得到稳定的财政来源。

为在日本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帝国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这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殖产兴业”的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殖产兴业，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为此，帝国政府除进行地税改革而获取必要的巨额土地税收入之外，还实行货币金融政策，始而大量发行纸币，继而又提高税率、增收新税，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对人民进行双重的盘剥，还用发行公债的办法，筹集大量资金；对外则通过向亚洲近邻国家实行侵略掠夺，获取资金。

帝国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在 1868—1880 年期间，主要是采取大力创办官营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以 1880 年 11 月《处理官营企业条例》的颁布为标志，开始殖产兴业第二阶段（1880—1885 年），这期间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帝国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 7 个方面：（1）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注意创办民品工业。（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土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从 1880 年 11 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帝国政府自 80 年代起，立足本国实际，指示引进必须结合国情，西方经验不能照搬。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广为延聘外国各行各业专家，很注意人才的引进，并随着本国人才的培育成长，逐步减少以致停止这种人才引进。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很注意实用实惠，摒弃了盲目性。

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1886—1890 年间，在日本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异常迅猛。到甲午战争（1894—1895 年）前后，日本初步实行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革命开始后，外贸亦急剧发展，外贸额在 10 年间几乎翻两番，且以出超为主。

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又一重要政策是“文明开化”。这一政策主要涉及教育改革及一系列社会改革。

帝国政府成立伊始，首先整顿旧教育机构，1871 年设文部省，掌握全国教育改革事务。1872 年 9 月 5 日发布《学制》，正式开始有纲领、有计划的改革。在《公布学制布告》中指出：“学问可称为立身之资本。”制订公布《学制》之目标是：“以期今后一般人民（华土族、农工商以及妇女），必使邑无下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全国根据《学制》划分学区，设立大、中、小学及各类专业学校，教学内容焕然一新。另外，制定了有关留学生规则、学位制度，并允许私人办学等。1879年又迈出教育改革第二步，即制定47条《教育令》，废除学区制，将小学设置、管理权下放地方，学制缩短，教学内容简化。翌年又修改《教育令》，加强对教育的监管权，使就学率迅速提高，1883年达51%。1885年实行内阁制，森有礼（1847—1889年）首任文部大臣，他先后主持制定、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和《师范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使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三阶段。上述教育法令的推行，基本上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普及率及中学、大学都有极迅速的发展，成果极为显著。但教育改革的同时，日本帝国政府亦注意加强为巩固近代天皇制统治的思想教育，特别是1879年8月明治天皇在侍讲元田永孚（1818—1891年）的帮助下，以元田名义拟就并发表《教育大旨》，开始干预教育改革。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更进而将忠于天皇、“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为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对普通人民亦进行军事教育，并规定“神道”为国教，强制人民信仰，宣传天皇就是“人间活神”。凡此种种，对近代教育发展造成种种恶果。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

帝国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对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关注。19世纪70—80年代，发布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实行各项社会改革，一方面废除一些封建时代遗留的旧风俗习惯，一方面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搞“欧化”运动，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建立适应世界潮流和适合日本国情的近代文明体系。发布《断发脱刀令》，发布采用阳历布告（改阴历1872年12月3日为阳历1873年元旦，并将一昼夜12时辰改为24小时）及开展以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这些措施在城市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政府中有人认为，日本同西方相比是劣等国，不如搞“全盘西化”。社会上亦有人主张，日本应废日语而以英语为国语，甚至组织“人种改良会”，提倡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等等肤浅庸俗的“文明开化观”。

“文明开化”更重要的方面是开展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幕末时期成长起来的西学知识分子，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它即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也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在文明开化运动中起了先导作用。它的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出版43期、发表论文百余篇，处处闪烁着“理性之光”，很受社会欢迎。此外，其社员在明六社活动期间，共出版著译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思想，其贡献颇大。但在帝国政府公布《新闻条例》和《谗谤律》（1875年）、实行《取缔演说令》（1878年）和《集会条例》（1879年）期间，《明六杂志》停刊，明六社亦同时宣告解散（1875年）。日本知识界向右转，一大批启蒙先驱者和被誉为“理性之光”的传播者，纷纷沦为思想界的保守分子、倒退转向分子。但是，群众性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淘汰了老一辈民主主义者的同时，锻炼培育出了新一代民主主义者。

在日本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中，“富国强兵”是其三大政策之一。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的封建军制，于1873年颁布《征兵令》，建立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

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天皇。1878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1838—1922年）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人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封建的“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随着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推进，以及西方列强带给日本的半殖民地危机的克服，日本的“富国强兵”很快演变为一条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对内实行专政和镇压，对外进行侵略扩张。

明治政府在对内谋求迅速富国强兵的同时，对外采取了“远交近攻”、“失之西方，求之东方”的策略。同时，对西方列强则力争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但是，从岩仓使节团出使美欧、修改条约谈判受挫后，外务卿寺岛宗则（1833—1893年）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努力亦一无实效。1879年继任的井上馨（1835—1915年）外务卿的修改条约方案也遭到反对，遂实施“鹿鸣馆”外交这一媚外政策，但后来还是以失败告终。直到英俄关系紧张、英俄均希望拉拢日本之时，日本才采取利用英俄矛盾发展自己的外交方针，终于在1894年7月16日同英国签订了《日英新约》，即《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提高部分海关税率，大致除掉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日英新约》的签订，在日本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既标志着日本基本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又表明它完成了发动对外侵略的甲午战争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日英新约》签订后的第9天，日本就鸣放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以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和确立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史称“自由民权运动”。这一运动在专制政府分化瓦解和镇压下失败了。但政府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于1881年亦被迫作出让步，许诺将以1890年为期开设国会，公布帝国宪法，同时着手立宪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派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于1882年3月赴欧洲考察。伊藤一直主张以普鲁士和奥地利宪法为样板，故他直赴柏林和维也纳，向柏林大学法学家格拉斯特和维也纳大学法学家施泰因求教，历时一年多，学得了如何在立宪形式下保持君主统治大权的经验。他决心以“君权主义”色彩浓厚的普鲁士宪法为制定日本帝国宪法的楷模和蓝本。1883年8月，“宪法考察团”回国。

其次，是设立华族制度，即日本的近代贵族制度。1884年颁布《华族令》，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并定为世袭，原来的藩主以及旧公卿及明治维新的功臣被授予爵位，成为“皇室的辅翼”，日后成为牵制、抗衡众议院的贵族院基础。

第三，是确定“皇室的财产”。1882年2月，岩仓具视建议为制定宪法，必先巩固皇室基础。他主张“使皇室财产之殷实达到和全部国民财产没有多大差别的程度”，以便将来一旦政府预算案被国会否决时，可由皇室财产支付官吏的薪俸和陆海军经费。于是，不断用划拨、移交、接管、编入等手段和名义扩大皇室土地、工矿企业及财产。在1889年宪法颁布时，天皇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

第四，是实行内阁制。1885年12月废除原来太政官制，效仿西方资产

阶级内阁制，建立了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和外务、内务、大藏、陆军、海军、司法、文部、农商务、递信等 9 省大臣以及书记长官、法制长官组成，直接隶属于天皇。第一届内阁由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在实行内阁制时，1887 年政府制定《文官任用令》，1888 年还制定了新的市制和町村制，实行所谓市、町、村的地方自治制度。

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帝国政府开始起草宪法草案。1886 年秋，以伊藤博文为首，井上毅（1844—1895 年）、伊东已代治（1857—1934 年）、金子坚太郎（1853—1942 年）等 4 人开始秘密起草宪法，并听取法律顾问、德国法律学家雷斯莱尔和莫塞的意见。1887 年 5 月完成第一稿，又进一步加工修改完成第二、三、四稿，1888 年 4 月最后修改定稿，送交天皇审阅，同时由枢密院审议、通过。枢密院是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设立于 1888 年 4 月，也是为审议宪法草案而产生的机构。伊藤博文辞去总理大臣职务，就任枢密院院长，召集顾问官和内阁大臣，从 6 月 18 日起，在天皇亲临之下，秘密审议宪法草案，到 1889 年 1 月 31 日审议完毕。其间经过若干字句上修改变动后，定名为《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 年 2 月 11 日，明治天皇将《大日本帝国宪法》作为钦定宪法予以颁布。2 月 11 日，是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即位纪念日（称纪元节）。该日，天皇在新落成的宫殿大会群臣，宣读颁布宪法的《告文》和《敕语》，然后将宪法文本“御赐”给第二届内阁总理大臣黑田清隆（1840—1900 年）。帝国政府同时公布《皇室典范》、《贵族院令》、《议院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仪式结束后，举行阅兵式，召开盛大宴会，并宣布大赦政治犯，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等。

帝国宪法的颁行，是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帝国宪法共 7 章 76 条。第 1 章关于天皇的规定共 17 条，是宪法的中心，其核心是“天皇主权论”。其中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等，集一切国家大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就其权限和实际的政治作用看，天皇又毕竟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一是宪法规定天皇必须“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统治权，而宪法各有关规定又限制了天皇在政治生活中独立地发挥作用。二是根据明治初年以来形成的惯例及实施宪法后的历史过程中的实际情况，除极个别例外，天皇从不直接干预国政。宪法关于天皇权力的规定在实施时成了“无答责制”，天皇对臣属的国务汇报只听不答，后果与责任由臣属承担。第 2 章关于臣民之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共 15 条。第 3 章关于帝国议会的规定共 22 条。第 4 章关于国务大臣和枢密顾问的规定共 2 条。第 5 章关于司法的规定共 5 条，规定依天皇之名义施行法律。第 6 章关于财会规定共 11 条，规定国家预算需经议会同意等。第 7 章为 4 条补则，规定宪法修改程序及办法。

帝国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的继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寡头专制。这种政治体制当然很少民主成分，但毕竟是东亚第一部近代宪法，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有其深远的意义。

除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外，1882 年日本曾实施《刑法》和《治罪法》，1890 年废止《治罪法》，代之以《法院组织法》、《行政审判法》、《刑事诉讼法》，1891 年颁布《民事诉讼法》。19 世纪 70 年代初曾着手制定民法，后因发生“民法论争”，新的民法制定后拖至 1898 年才全部实施。《商法》实施于 1899 年。至 19 世纪末，帝国政府基本建立起近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

1890年11月29日是日本第一届议会开幕之日。自此日起，钦定的帝国宪法正式实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近代天皇制从此确立。

二 争霸东亚与成为强国

1. 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

日本帝国政府三大政策总目标是“富国强兵”，其实是“强兵富国”。岩仓使节团的欧美之行，使他们认识到在“强权即公理”的环境中建立近代军队的重要性、紧迫性。在国内各项重要改革基本展开之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1880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的《进邻邦兵备略表》奏文，确立了把强兵和对外扩张作为国家首要政策的军国主义路线。从此，日本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1882年，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企图失败后，加紧为以中朝两国为目标的侵略战争做准备。1890年11月29日首届帝国议会开幕，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提出臭名昭著的所谓“主权线”及“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露骨地说：“要维持一国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决然不够的，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所谓“利益线”，即指朝鲜。中国的东北和台湾。所谓“保卫利益线”，就是要用武力侵犯邻国领土主权。他还具体指出，当时“利益线的焦点”就是朝鲜。至此，从明治帝国初期开始形成的入侵朝鲜、进而占有中国东北。以至霸占整个中国、最后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正式出笼且形成系统。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正是“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

日本的“大陆政策”决定了它迟早要发动侵略战争，但在1894年其国力、兵力尚不够强盛之时就决心挑起战争，还是有其国内外具体历史背景的。国内主要是1890年发生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之1889、1890两年农业歉收，在工人中出现分散的同盟罢工和早期工人团体。1892年日本劳动协会成立，在富山、新潟、鸟取、石川、福岛、福井等许多地方出现了抢米风潮，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愈加尖锐。福泽谕吉主编的《时事新报》1894年1月26日警告帝国政府说，“如果优柔不决”，“必将出现不寻常之内变”，并出主意说，“大力进行东洋战略，使国内之人心转而向外”。帝国政府亦深感“非有惊人之举，则无以定此骚动人心”。国际上主要是英俄、日俄在东亚矛盾加剧。1891年3月，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引起日本和英国的强烈震动，日本决心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前发动战争。但发动战争需要寻求西方国家支持。1893年俄、法、德三国结成的东亚同盟生效，英国亦想利用日本阻止俄国势力南下，成为对抗三国联合势力的防波堤。日英双方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各自利益需要出发，一拍即合，于1894年7月16日签订了《日英新约》。这表明英国公开支持日本。次日，日本即召开御前大本营会议，决定了挑起战争的部署。25日，即发动了侵朝侵华的甲午战争。

从1894年8月至1895年4月，战争历时8个月，经历了平壤战役（1894年9月13—15日）、黄海大战（1894年9月16—17日）、辽东战役（1894年10月）、威海卫战役（1895年1—2月）、山海关外战役（1895年3月）等5次战役。清军惨败，清政府决意求和。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偕美国顾问科士达一行到达日本马关（即下

关)。翌日,开始与伊藤博文等先后举行5次正式谈判。李鸿章在日本高压讹诈政策下,只能在“允”、“不允”之间选择而无讨价还价余地。他不得已只好于4月17日在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库平银2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而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而免交一切内地税等。为保证条约实施,日军仍继续留驻威海卫,且要中国每年提供50万两库平银为“驻军费”。

《马关条约》签订后,英、美以“利益均沾”而获益匪浅,但英国并不想让日本在大陆过分发展。俄国在东亚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不能容忍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遂在德、法支持下采取干涉政策。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交三国要求日本文还辽东半岛给中国的照会。5月10日,日本被迫宣布接受三国“劝告”,同意清政府交付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

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台湾基隆登陆,强行占领台湾,遭到当地军民奋勇抵抗。台南守将刘永福率黑旗军与以徐骧、吴汤兴为首的抗日义军并肩作战,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等地与日军激战,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直到11月下旬,日军才占领台湾全岛。在这6个月中,日军死亡人数达1万余人,相当于《马关条约》前9个月内即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在华作战死亡人数(2647人)的4倍。此后,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直到1945年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战败投降后,台湾回归祖国。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2.3亿两白银的赔款,当时折合3.5亿日元,加上利息等共3.6亿日元。而90年代日本帝国全年财政收支仅0.8—1亿日元,这笔巨额赔款,为日本疯狂扩军备战、急速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和保证。从此,日本以军工为中心高速发展经济,开始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

2. 日俄战争与吞并朝鲜

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进入新的全面发展时期。各工业部门均出现急速发展势头,尤其是纺织业成倍增长,并且很快走向垄断。至20世纪初开始,以“政商”资本为中心实行资本集中,出现了托拉斯组织,对纺织、铁路、银行等部门的企业实行大合并,逐渐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还有古河、涩泽、大仓、浅野、鸿池等一批中小财阀。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具有以下基本特点:(1)日本产业革命与垄断资本的发展同步,日本产业革命完成阶段,也是垄断资本迅速发展时期。(2)日本资本主义几乎没有经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在国家政权大力扶植和保护下形成垄断资本的。(3)官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始终占极大比重,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占重要地位。(4)垄断资本的发展不够充分,往往借助掠夺手段来补充其财政金融之不足。因而,日本垄断资本的确立和发展建立在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基础之上。

日本帝国对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怀恨在心,提出“卧薪尝胆”口号,并积极准备对俄开战。1895年4月,山县有朋在《扩充军备意见书》中认为,东亚已经成为列强争夺目标,日俄之战不可避免,日本欲成“东洋盟主”,必须立即增强兵力。为此,军部制定了扩军计划。

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争斗更加激烈和表面化。1904年2月10日,终于爆发了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

经过一年半陆海战,俄惨败,日军亦消耗殆尽。1905年8月9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下,日俄在美国朴茨茅斯开始和谈。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和约》规定: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优越地位;沙俄从中国攫取的辽东半岛及附属的一切权益,一并转让给日本;“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特权转让给日本;以北纬50度为界,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此外,日俄两国合谋,以保护“满洲铁路”为名,在附约中规定日本可以在铁路沿线、以每公里15名的数额派驻守备队员。从此,中国辽东半岛陷于日本侵占之下。同时,日本侵略触角并可沿南满铁路向东北腹地延伸。

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是中国东北的旅顺、大连、辽阳、海城、沈阳等地,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和巨大损失,日俄战争后,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1906年建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为日本侵华的派出机关和重要工具。日本由于从战争中获取巨额利润和大片殖民地,战后迅速掀起投资热潮,整个重工业部门飞跃发展。到20世纪10年代,日本产业革命完成,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和完成,日本资本主义加速向垄断阶段过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

在日俄战争期间的1904年2月,日军就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军事占领性质的《日韩认定书》。8月,日本又迫使朝鲜签订《日韩协约》,规定朝鲜的内政外交均须经日本顾问同意。1905年11月,伊藤博文又威逼朝鲜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使朝鲜沦为日本保护国。1907年7月,日本又强迫朝鲜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又称《丁未七约》),日本人公开把持了朝鲜的内政。1909年12月,日本指使朝鲜卖国贼李容九“上书”,以“一进会”会长及“百万会员”名义,要求日韩合并。1910年6月3日,日本桂太郎内阁决定吞并朝鲜。8月22日,日军包围朝鲜王宫,逼迫朝鲜国王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了朝鲜。日本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任朝鲜第一任总督。从此,朝鲜陷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起包括中国台湾、朝鲜的庞大殖民帝国。但是,日本殖民统治是不巩固的,被它奴役的中国东北、台湾和朝鲜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

3.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出兵西伯利亚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经济迅速发展,到1914年左右,完成了产业革命。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和完成,特别是1907—1908年经济危机,更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日本资本主义加速向帝国主义转变。日本除具有一般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即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逝世,皇太子嘉仁继位,改元“大正”(取自中国《易经》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是为大正天皇(1879—1926年)。日本军部鼓吹“军备扩张至上”,扩大“统帅权”的范围,其专横擅权日益引起人民和民主势力的不满。第三届桂太郎(1847—1913年)军阀内阁任期内,在资产阶级政党提出“脏除阀族,拥护宪政”口号的推动下,各地掀起

护宪运动。1913年2月，东京市民群众包围议会，声讨桂太郎内阁，并捣毁市内警署和亲政府的报社，斗争波及京都、大阪、神户和广岛等地。桂内阁仅存在50天即告垮台。史称这次政治变动为“大正政变”，亦是大正时期民主运动中第一次护宪运动。此后，又曾迫使以海军军阀山本权兵卫（1852—1933年）为首的内阁于1914年3月24日总辞职。

日俄战争后，日本与各列强的关系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俄国受挫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迅速扩张，使美国开始转变为日本的敌国。1905年8月底，美国铁路大王哈利曼到日本要求共同经营“南满铁路”，并于10月12日签订草约。不料日方变卦，于1906年1月15日正式通知对方取消草约，此事成为日美关系的转折点。长期作为日本外文政策基调的日英同盟也从此进入尾声，日英矛盾不断发展。在欧洲，英德矛盾代替英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英、俄、法形成了对德的“三国协约”。为对付德国，英日仍于1911年7月签订《第三次军事同盟条约》，但限制了范围。日俄之间的关系更发生根本性变化。从1907年7月到1916年7月，日俄之间签订了4次协约，原头号强敌俄国变成了盟邦。日法两国于1907年6月签订协约，相互承认各自殖民侵略的成果，法国承认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则保证不支持越南民族革命运动。正是在日本国内不断出现政治、经济危机，国际关系亦发生巨大变化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28日爆发。已成为世界强国的日本，为摆脱和转移国内矛盾和视线，为巩固其在东亚的地位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重新瓜分东南亚及太平洋殖民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元老井上馨在写给讨论决定日本是否参战的元老和内阁联席会议的信中，赤裸裸地说道，“这次欧洲大祸乱，对于日本发展国运，乃大正时代之天佑良机”，必须抓住时机，以“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日本帝国自然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坚持参战。当英国向德国开战不久，日本便于8月15日向德国提出要其撤出中国胶州湾和青岛租界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便于8月23日站在协约国一边对德宣战。

日本是在中国领上对德宣战的。9月2日，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9月17日，占领胶州车站；25日，占领潍县车站；10月7日，占领济南车站；10月29日，对青岛德军要塞发起总攻；10月中旬，又南下太平洋，占领德属马绍尔、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仅用两个月，日军就占领了山东半岛及德属太平洋诸岛。日本统治集团对此欣喜若狂，要求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以至独霸中国。11月11日，日本政府以黑龙会提出的秘密“备忘录”为蓝本，制定了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5项21条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正式提出这些要求。除其中的第5项（即中国政府在军事、财政上设日本顾问）缓议外，袁世凯政府屈从日本压力，于5月25日签订了有关山东、福建、南满、东蒙、汉冶萍、胶州湾、旅大租借地、安奉铁路等权益的条约及多件换文。“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均被化整为零地强加于中国。1916年7月，日本与俄国签订第4次《日俄密约》，策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10月寺内正毅（1852—1919年）内阁上台后，又向段祺瑞政府贷款，因西原龟三（1873—1953年）经办而称为“西原借款”。以1917年1月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为开端，两年半间，共对华贷款3.86亿日元，绝大部分是作为扶植段祺瑞政权的军事政治贷款。段祺瑞则对日俯首听命，签订了《中日双方陆海共同防敌协定》，两国军事代表又分别签订陆军、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中国在军事上亦从属于日本。实际上等于“二十一条”中第5项内容

的实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野心不断膨胀。1917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于1918年1月派两艘军舰驶入海参崴。在帝国主义列强出兵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时期，日本亦于1918年8月2日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后不断增兵，最高时达7.3万人，贝加尔湖以东所有的村庄均驻有日军。从海参崴到赤塔，不论是西伯利亚铁路，还是中东铁路，各个车站都挂上了日本国旗。日本还公开支持霍尔瓦特、谢苗诺夫等白俄匪军，妄图在东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受其控制的反苏傀儡政权，以与满蒙地区连成一片。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另一图谋，是乘机侵入北满和外蒙古。日本政府将大批日军开进中国吉林、黑龙江两省，妄图乘机扩展其“大陆政策”。但是，苏俄军民粉碎了列强武装干涉。在苏俄红军和人民的坚决打击下，日军处境狼狈不堪，日本政府不得不于1922年6月声明撤军。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历时4年多，耗资9亿日元，更换司令官3次，死亡3000人，受伤2万人，终于一无所获，成为日本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三日本帝国转向何方

1.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

日本经济在1920—1921年危机之后，又经历了两年的萧条，1924年才开始摆脱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困境中缓慢地增长。在经济危机及长期萧条期间，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垄断资本则乘机大肆吞并；在相对稳定时期，又大力推行“产业合理化”，加强了工业的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垄断资本的统治大大加强。在完成产业革命和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后，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寄生地主制更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障碍，其本身亦逐渐发生动摇，“佃农争议”次数与日俱增。1926年5月21日，农林省又公布《创设、维持自耕农补充规则》，使自耕农有所发展，50町步以上的大地主逐年减少，地主制遂走向衰落。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由1921年11月25日就任摄政的裕仁继位，改元昭和（取自中国《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为昭和天皇（1901—1989年）。翌年3月，昭和天皇继位伊始就发生了“昭和金融危机”，结束了相对稳定时期。自3月15日起，银行歇业、提存、倒闭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歇业银行达30家，金融混乱达到极点，导致了与之有关的中小企业、地方工业生产的停滞和企业大量倒闭。在金融危机高峰期间，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1864—1929年）接替若槻礼次郎（1866—1949年）组阁。田中内阁4月20日上台后，首先采取通货膨胀措施，将负担转嫁给人民，以保护大资产阶级。政府拨款给日本银行5亿日元作为补助，加速银行资本集中，帮助垄断资产阶级度过危机；其次是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侵华战略方针，对华推行“积极干预政策”，妄图将中国东北、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由日本帝国侵占。（对与东方会议关系密切的“田中奏折”文件的真伪问题，中日学界聚讼纷纭。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与此文件合拍）。再就是加快侵华步骤，宣布将华北驻屯军扩大1倍，并3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1928年5月3日）。与此同时，在国内实行血

腥的恐怖统治。1928 年制造“三·一五事件”，1929 年又制造“四·一六事件”，镇压共产党和进步人士。1928 年 6 月 4 日，关东军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张学良不顾日本威压，断然于 1928 年 12 月 29 日通电宣布东北“易帜”，使“田中外交”处心积虑妄图把东北从中国肢解出去的阴谋破产。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1929 年 7 月 2 日，田中义一内阁垮台。继田中之后上台的是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1870—1931 年）。滨口内阁把恢复金本位制、健全经济放在首位，以紧缩财政和协调外交为两大施政方针。

从 1929 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爆发了一场破坏性空前的经济危机。当滨口内阁推行其内外调整政策时，从 1930 年春起，日本帝国遭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陷入困境。外贸急剧缩减，国内物价、股票行情随之纷纷下跌，解雇工人和企业倒闭现象不断发生，农村更是凋敝破败，苦不堪言，有些村子穷到整村都找不出 1 元现金。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日本垄断资本家力图把损失转嫁到工农大众身上，从而拼命地强化管理，大量裁减工人，压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

日本社会动荡加剧，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对内阁不满，尤其是最力反动的势力更加不满，急于寻找“出路”。

2. 走向法西斯

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日本统治集团中以军部为代表的军国主义极右势力，企图以建立法西斯专政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来摆脱危机。日本是法西斯势力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开始制造法西斯舆论。1919 年 8 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理论家北一辉（1883—1937 年），在中国上海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鼓吹动用天皇大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改造”和“积极对外开战”，夺取殖民地，称霸亚洲和世界，成为颇受帝国主义赞扬的法西斯纲领。同年北一辉与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1886—1957 年）等在日本组织起早期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此后，大量形形色色的军队和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诸如“行地社”，“天剑党”、“王师会”、“一夕会”、“樱会”、“国本社”等，尤其以陆军的“一夕会”和“樱会”的活动最为猖狂。后来的不少大战犯东条英机（1884—1948 年）、冈村宁次（1884—1966 年）、山下奉文（1885—1946 年）、板垣征四郎（1885—1948 年）等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1930 年 9 月，“樱会”炮制政治纲领，公开鼓吹在日本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的“强有力的政府”。进入 30 年代后，各种法西斯势力都一齐活跃起来，法西斯分子活动十分嚣张，制造各种事件，加速法西斯化的进程，推动反动政府对内残酷镇压进步力量，对外迫不及待地发动侵略战争。1930 年春，滨口内阁在人民斗争日益高涨和日本与美英等国家矛盾加剧的背景下，4 月签订《伦敦海军条约》，日本收回了大型巡洋舰保持对美 7：10 的主张，同意 6：10 及其他与英美妥协的方案。对此，日本法西斯分子大肆攻击内阁对外软弱无能和“侵犯统帅大权”，企图倒阁。11 月 14 日，右翼团体“爱国社”法西斯分子在东京车站行刺滨口总理大臣，使之身负重伤，翌年 8 月 26 日因伤重死去。“樱会”与大川周明等人勾结，准备在 1931 年 3 月 20 日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内阁辞职并成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1868—1956 年）为首的军政府。史称“三月事件”。后因内江，宇垣本人动摇，“三月政变”

以流产告终。但他们准备再次发动政变，吸收了东京驻军中的青年尉官参加，计划在10月21日前后，出动陆、海军航空队袭击内阁会议，杀害阁僚，成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人内阁，后日走漏消息，政变再次流产。“樱会”的桥本欣五郎（1890—1957年）等人被拘留。史称“十月事件”。

“十月事件”后，法西斯青年军官走上激进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第一线。1932年二三月间，又有“血盟团”事件发生，青年军官枪杀了原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1869—1932年）和三井总公司理事长团琢磨（1858—1932年）。5月15日，法西斯军人袭击首相官邸、打死首相犬养毅，又向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等多处投掷手榴弹，并散发《告国民书》，提出“打倒政党和财阀”等口号，史称“五·一五事件”。“五·一五事件”后，成立了由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1858—1936年）组建的“举国一致政府”，从而结束了政党政治。从此，军部地位进一步牢固，社会经济沿着加强军备和统制的方向实行改组。“五·一五事件”、政党政治的结束和亲军部的“举国一致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加紧走向国家法西斯化。

四发动侵略战争与日本帝国的败亡

1. 发动侵华战争与强化法西斯统治

为摆脱日益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急剧增长。日本军部对内推行国家的法西斯化改造，加紧镇压进步力量，强化高压统治；对外把武力侵华提上日程，挺而走险，悍然走上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首先选择了中国东北作为侵华的突破口。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足4个月，日军即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部。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人民坚决予以谴责和抗击，但中国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主义，强令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回关内。美英列强亦采取纵容政策，使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政策最终得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为打开中国东南大门，于1932年1月28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即“一·二八事件”。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的19路军奋起抵抗，挫败了日军侵占上海的计划。美英也担心自身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派军舰到上海向日军施加压力。日军被迫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为进一步巩固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及全面控制，日本帝国主义于1932年3月1日在长春成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让清朝废帝溥仪担任“执政”。1934年3月改为“满洲帝国”，“执政”亦改称“皇帝”，建立起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长期法西斯殖民统治。接着，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触角伸向中国山海关内。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和热河，后又通过《塘沽协定》染指河北省东部，进而于1935年春调集大批关东军侵入中国华北，6月签订《何梅协定》，攫取河北省多项主权，更贪得无厌地策划华北5省“自治”。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成为第二十“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这次事变，也是日本实现国家法西斯化的新起点。为把日本拖向侵略战争轨道，日本统治集团和各种反动势力极力煽动排外情绪，同时对新闻出版物的检查和取缔空前严厉。

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亦不断加剧，到30年代中期，

形成了“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对立集团。两派在对外侵略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侵略步骤和时机上有所不同。1934年统制派在构成军部核心的陆军中占据支配地位，并在此前后实现了军部、新官僚和财阀的紧密结合。与此同时，他们与皇道派的斗争亦日趋激烈。

1936年2月26日，以荒木贞夫为首领的一批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1874—1936年）等人，重伤侍从长官铃木贯太郎（1868—1948年），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等处。他们向陆相川岛义之提出所谓“昭和维新”的“兵谏”，要求重用皇道派，惩处统制派。天皇得知叛乱和大臣被杀的消息后，立即严令予以平定。统制派和一些上层军官亦主张镇压。29日，叛军俯首投降。“二·二六”法西斯武装政变失败后，3月5日，广田弘毅（1878—1948年）组阁，按军部要求和意愿，推行一系列旨在使国家法西斯化的政策。在“全面革新政治”的口号下，血腥镇压工农运动，进一步扩大警察职权，限制国会权力，确立了军部对政治的支配地位。从广田内阁开始，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财抱合”（军阀与财阀的紧密勾结）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基本上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

日本法西斯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扬“忠君爱国”、“天皇至上”，大肆煽动侵略战争的狂热，并且在外交上也紧张地进行活动，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创造条件。早在1933年3月，日本就悍然宣布退出国联。当德国、意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统治、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之时，日本法西斯统治业已确立，并成为东方战争的策源地。于是，日本、德国、意大利3个法西斯伙伴，在反共产国际的烟幕、幌子下勾结起来。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3国相互勾结、互相利用，走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制造事端，终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河北省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8日晨，日军炮轰宛平县城，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突然进攻，是为“七·七”卢沟桥事变。通过这次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英勇抵抗，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后，在1年3个月的时间内，日本侵占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片土地和几十座大中城市，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沉重的民族灾难。日军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特别是侵占南京后，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仅12月18日夜，就集体屠杀中国军民5.7万余人。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中国受害者在20万人以上。据中国军事法庭查证，被害人共达34万人以上。日军的暴行暴露出其凶残、野蛮和虚弱的本质，亦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打击下，日军“速战速决”计划破产，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后即转为战略“防守”，将主力撤到后方保其占领区，把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1938年12月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向日本。1940年3月底，在南京建立起汪记傀儡政权。而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2月实现了和国民党的再次

合作，与之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迅即深入敌后，开展以运动战、游击战等为主的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怒潮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于自拔，直至战败投降。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力强化国内统治，动员和集中人力物力以支撑战争，先后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日本国家生活全面转向战时轨道，逐步建立起国防国家体制——法西斯体制。1937年8月，近卫文■内阁决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国民实行半强制性的管制。1938年4月1日，公布《国家总动员法》，5月5日生效，逐步对物力、人力实行全面管制。在此前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均被逐渐纳入战时体制。到1940年，近卫第二次组阁后，又开始加紧推行“近卫新体制”运动。其中的“政治新体制”，就是进一步强化法西斯统治。各党各派先后于6月19日—8月15日宣布自行解散。10月21日，成立法西斯的组织机构“大政翼赞会”，通过这一法西斯组织把人民紧紧地束缚起来，以强化战时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统治体制，而“经济新体制”，就是由垄断资本对全国财政、金融、生产劳动等一切经济领域实行综合的战时管制。当时，日本的十大财阀（三井、三菱、安田、住友、鲇川、中岛、野村、浅野、大仓、古河）控制着经济命脉，“经济新体制”使垄断资本更加急剧地膨胀起来。以“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为开端，日本形成了政治、经济的“近卫新体制”，实现了所谓“一亿人总体组织化”。“大政翼赞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国防国家体制，即法西斯体制的最终形成。

“新体制”不仅加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人民的控制、镇压和榨取，而且造成了日本国家财政收入的日益枯竭。在“新体制”下，人民越发困苦，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增长，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农村，工农大众的反抗斗争从未间断，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投降。

2. 日、德、意三国同盟

日本帝国主义狂妄的侵略计划所追求的目标是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 and 世界，其第一步就是侵略中国东北和全中国。但日本在侵华战争伊始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正当日本进退两难时，1940年4月，欧洲战局发生急剧变化，德军横扫西欧，大败英法等国的军队。日本统治集团喜出望外，认为法、英、荷或降或败，美国亦将受到德国牵制，这为日本向东南亚扩张提供了绝好的时机。于是，日本政府决定与德国东西呼应，实现双方分霸世界的计划。1940年7月下旬，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8月1日，他抛出了《基本国策纲要》，提出“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决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接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武力南进的部署。同日，狂热军国主义分子、外务大臣松冈洋右（1880—1946年），在鼓吹政府这一侵略目标时，首次将之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公开抛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口号。1940年9月，日本政府划定了“大东亚共荣圈”，其范围是以“日、满、华为骨干，包括委任统治地之原德属（太平洋）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附属岛屿、泰国、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内阁直属的总体战研究所在1942年1月秘密印发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方案》中，还

将东西伯利亚囊括在内。为实现这一庞大的扩张计划，从 1940 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在东南亚进行一系列殖民侵略活动，并开始考虑和进行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问题的谈判。

德意曾于 1938 年提议将《反对共产国际协定》转化为以苏、英、法为敌对国的军事同盟。对此，日本陆军及法西斯官僚表示赞同与支持，而不少政界人士犹豫不决，海军因燃料油几乎全由美国提供亦表现出为难情绪。1939 年 1 月，平沼骐一郎（1867—1952 年）继近卫上台组阁。在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陆军与海军、外务省发生严重分歧，海军、外务省只同意把条约对象国限于苏联，反对把美、英包括在内。双方争论不休，内阁 40 多次阁议均议而不决。1939 年 5 月，日军挑起“诺门坎事件”；8 月，苏军发起总攻，日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得乞和。也正是 8 月，德国背着日本与苏联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对日本是个巨大打击，平沼内阁因而垮台。日本军部中长期存在北进、南进之争，这时，北进的主张遭到沉重打击。日美矛盾亦在变化发展。1939 年 6 月，美国政府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在 1940 年 1 月到期后不再延长，这预示着美国将限制对日贸易。1939 年 9 月 1 日，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刚成立的阿部信行（1875—1953 年）内阁宣布不参与欧洲战事，继任的米内光政（1880—1948 年）内阁亦采取避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对与德国结为军事同盟抱消极态度。

1940 年 9 月初，刚刚于 7 月下旬成立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在组阁伊始，即同德国重开缔结《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的谈判。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其主要内容为：日本承认德意对欧洲的统治权，德意同意日本对东亚的统治权；三国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条约不涉及缔约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些内容表明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美国的。日本签订这一条约旨在为南进做准备，同时要德国出面斡旋以调整日苏关系。三国结成了柏林—东京—罗马轴心，该条约亦称《三国轴心协定》。1941 年 4 月，日苏之间亦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日苏关系得到缓和，而日美矛盾却日益尖锐起来。

3. 挑起太平洋战争

美国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华行动，虽有时亦装装样子，公开表示反对日本侵华以对日施加点压力，但基本上采取了怂恿和支持的政策。目的是希望利用日本法西斯来镇压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将日本作为削弱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在亚洲的势力，直至成为进攻苏联的走卒。所以，美国伙同英国不断进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活动，想以牺牲中国的办法保住他们在华的殖民利益，并企望日本能为美国在亚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世界霸权助一臂之力。但美国一厢情愿的美梦破灭了。日本法西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决不甘心为美国建立霸权卖力，而是要与美国争霸，要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西方殖民势力从亚洲排挤出去，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殖民大帝国。因而，日美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9 日，美英对日宣战；12 日，德意对美宣战。以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而形成亚洲战场、以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波兰而形成欧洲战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才真正扩展为世界规模。

日军接着又全歼英国远东舰队主力，夺取英美在远东的三大根据地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占领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

缅甸并侵入印度。到 1942 年 5 月上旬，日本所侵占和统治的亚大地区，总共有大约 5 亿人口和 700 万平方公里土地。

4. 日本帝国崩溃

东条英机上台后，在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在国内采取了加强法西斯专制的各项措施，大搞“东条独裁”和“东条宪兵政治”。在法西斯文化专制的高压之下，思想文化被全面纳入侵略战争的轨道，正当的文化活动遭到摧残、窒息，法西斯主义文化四处泛滥，人们的良知和才能受到压制、扭曲和淹没。在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同时，东条首相亦身兼陆相、外相、内务相、文相、军需相、商工相等数职，还以现役大将身分兼任日军参谋总长，使日本法西斯专政在东条内阁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东条内阁扩大战争和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倒行逆施，只是日本帝国陷入绝境后困兽犹斗、垂死挣扎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终于一步步走向彻底灭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过了 5 个月，日军初战取得的势如破竹般暂时优势即很快丧失。到 1942 年 6 月以后，日军在太平洋的攻势便被迫停止，战局每况愈下，开始经节节败退走向最后的败降。

1942 年 4 月 16 日，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沉浸在欢庆胜利之中时，美国 B-29 型轰炸机 16 架首次轰炸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整个日本为之惊恐不安。为防止再次遭空袭，日本军部决定攻占中途岛，扩大制海权。美军因破译了日本海军密电，严阵以待，使日本在 6 月 5 日的中途岛海战中损失惨重，参战的 4 艘航空母舰全被击沉，损失飞机 330 多架，参战飞行员几乎全部葬身大海。这次海战充分显示了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使日本海军丧失了进攻作战能力。紧接着，美国在所罗门群岛南端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开始反攻。美军以压倒的火力优势使日军伤亡惨重。美日双方还在瓜岛周围进行了 6 次海战，日军最终丧失了制空权、制海权。1943 年 2 月 7 日，日军被迫放弃瓜岛。从此，太平洋战争发生战略性转折，日本帝国军队开始节节败退。美军继攻克瓜岛后，采取蛙跳战术，不断攻占日占岛屿。1944 年 6—7 月，美军进攻马里亚纳群岛，战斗十分惨烈，守岛日军 7 万多人全部战死，日军 3 艘航空母舰被击沉，4 艘受伤，损失飞机 480 架。日军这次惨败后，它的“绝对国防圈”被打破，美空军从此可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起飞，直接轰炸日本本土。从 1945 年 3 月起，美军对日本进行频繁的大规模空袭，平均每月 3000 多架次，7 月达 2 万架次。日本全国 119 座城市被炸，东京共受到 102 次空袭，几乎化为焦土。1944 年 10 月，美军在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军配合下，重创日军，解放大片菲律宾国土。在激烈的日美莱特湾海战中，日军损失了最后的 4 艘航空母舰，其联合舰队溃不成军，已基本丧失作战能力。

在中国战场，日军的巩固占领区、打通纵贯南北大陆交通线的计划，亦收效不大。直到战败，大陆交通线亦未全线通车。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治安战”、“扫荡”、“清乡”更是被迫逐渐减少，最后不得不承认“已告失败”。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帝国企图“以战养战”的计划，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从 1944 年起，八路军、新四军在各解放区战场展开了局部反攻，使敌占区陷于动摇和瓦解之中。包括正面战场在内的

整个战场走向大反攻。

在缅甸战场，1943年10月，中国军队向缅北日军发动反攻。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在云南中缅边境反攻得手；翌年1月，与缅北中国军队会师，控制了缅北地区。1944年11月，英印军队开始从缅西反攻，12月攻占英多，与缅北盟军会师，遂控制缅甸中部地区，日军仅在缅甸南部孤守。

在日军在前线相继失败的同时，日本本土经济恶化，财政枯竭，国内人民逐渐滋长了厌战情绪，对军部、政治的不满日益高涨，直至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战斗争。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重，使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1944年7月22日，东条内阁被迫下台，小矶国昭（1880—1950年）上台，不久，又由铃木贯太郎取代，但仍无法挽救日本帝国最后失败的命运。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更陷入孤立境地，美军于6月25日攻占冲绳岛，打进了日本大门，7月26日，中、美、英三大盟国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给日本统治阶级以巨大打击，但也使日本几十万平民死于非命。8月11日，中国军民对日军发动总攻，使在华日军面临灭顶之灾。在此之前，苏联于8月8日下午5时（东京时间为23时）宣布，从8月9日起，苏日处于战争状态。苏联的参战使日本统治集团彻底绝望。苏联红军、苏蒙联军出兵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攻势。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也配合苏军，向日军发起反攻。此时的日本已走投无路。

8月9日，日本帝国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主和派和主战派双方互不相让。9日午夜近12时，在皇宫地下防空洞举行的御前会议上，战和两方仍是3人对3人的僵持局面，最后只好由天皇裕仁进行裁决。他说，本上决战“没有胜利的希望”，故赞同主和派方案，即在保存天皇制的前提下接受《公告》。御前会议后，日本通过中立国向中、美、英、苏4国发出乞降照会。8月14日上午，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投降。8月15日中午，广播了天皇裕仁的《终战诏书》。8月28日，美军进驻日本，9月2日（东京时间9月3日），日本帝国政府代表重光葵（1887—1957年）及军部代表梅津美治郎（1882—1949年）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

曾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张侵略的大日本帝国，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彻底覆灭。其建立大日本殖民帝国的迷梦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企图，也最后被彻底粉碎。

日本帝国的兴亡

第一编

乱世惊醒 (1868 年以前)

第 1 章

大厦将倾

家康创业

1598 年 8 月 18 日，统一日本有功、侵略朝鲜惨败的丰臣秀吉病故于伏见城中。觊觎霸主地位已久的关东大名德川家康以首席大老的身分来往于伏见城与大坂城之间，颐指气使，傲视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等四大老及前田玄以、石田三成等五奉行，双方矛盾迅速激化。与此同时，通过联姻等笼络手段，家康暗结加藤清正、福島正則、伊达政宗等武将集团和东国大名，伺机歼灭石田、毛利等政敌。

1600 年 7 月，家康下令兵发会津，讨伐与石田声气相通的上杉景胜。待石田、毛利等在大坂调集军队欲兵戎相见，家康立即停止讨伐会津，挥兵西进，与之决战。9 月 15 日以家康为总大将的 7.5 万东军与毛利辉元为总大将的 12.8 万西军在美浓国（今岐阜县）不破郡的关原会战。西军兵将虽众，但肯出力死战者不多，加之指挥混乱，关键时刻小早川秀秋临阵倒戈，以至全线崩溃，东军大胜。家康捕杀石田三成、小西行长等，将毛利辉元等西军大名的领地削减大半，用来封赏东军诸将。生杀予夺之权悉归家康，从此奠定了德川氏称霸天下的基础。

1603 年 2 月，家康出任征夷大将军，开德川幕府于江户。为使子孙世袭将军职位并使三子秀忠积累从政经验、早日接班，1605 年 4 月，家康授意朝廷任命秀忠为第二代将军，自己改称前将军“大御所”，隐居骏府城（今静冈市），总揽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密切注视大坂城里丰臣家族及旧部的动向。1611 年立后水尾天皇，借皇威巩固将军家的地位。

1614 年 8 月，京都方广寺佛殿落成。家康借口寺内铸钟铭文的“国家安康，君臣丰乐，子孙殷昌”等句，将“家”“康”两字断开，而称“丰臣”为“君”且子孙繁昌，蓄意挑起击灭丰臣氏的大坂之战。同年 10 月家康发布大坂征讨令，11 月亲率 20 万大军围攻大坂城。丰臣秀吉遗孤秀赖时年 22 岁，遂招集真田幸村、长宗我部盛亲等丰臣旧部 10 万余众，凭借大坂城城池高大、内外护城河沟深水急和城内军火粮草储备充足等有利条件，拼死抵抗。家康见久攻不下，便以填平外城护城河为条件讲和罢兵，并乘机填平了内城护城河。在这场史称“大坂冬之阵”的战斗中，家康军虽未拔城，却为再攻大坂城铺平了道路。1615 年 3 月家康借口丰臣旧部试图修复大坂城，4 月下达讨伐令，重率 30 万大军发起攻击。失去掩护的大坂城守军难以阻挡家康军的猛攻，5 月城陷。秀赖与其母淀君自杀，其幼子国松被押往京都六条河原

斩首，丰臣氏一门俱灭，残部四散。在这场史称“大坂夏之阵”的血战中，家康将敌对势力扫荡殆尽，诸藩大名俯首称臣。

“大坂夏之阵”战罢，已是垂暮之年的德川家康接连颁布法令，约束诸侯、朝廷和寺社势力，为强化德川氏的统治安全系数而竭尽全力。1615年7月，家康在伏见城召集诸藩大名，颁布《武家诸法度》，强调大名效忠将军，限制修城造船，禁止筑新城、结党和自行联姻，规定大名将妻子儿女入质江户，每隔一年须长住江户一载，谒见将军，听从调遣，实施“参勤交代”。同月在京都二条城召见传奏官与公卿，规定天皇的权力仅为改元、叙位和任命官职，应与公卿以提高学问、诗画才能为要，不得过问政治；规定公卿与高级僧侣的席次、职分与任免必须经幕府认可。在1601年颁发《诸本山法度》，1603年颁布《伊势法度》的基础上，1616年颁布《诸宗寺院法度》，规定僧侣修行的礼仪、总寺与分寺的关系和内部的等级序列，禁止庇护恶僧或党徒。其后，1665年幕府又制定《诸社弥宜神主法度》，将佛教、神道教势力全部控制在寺社奉行的手中。

1616年4月，75岁的德川家康病故。这位6岁即充当人质、在战国大名混战拼杀中养成韬光隐晦、坐待时机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家兼军事家，笃信“人生如负重远行，欲速则不达”的信条，耗费18年的时光，终于取代了丰臣秀吉，平定天下，创立幕府，颁布法律，开德川氏260余年的霸业。继家康之后，其子秀忠、孙家光先后出任将军，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采取措施，构筑了武家政权最严密的统治制度，即幕藩体制。

在经济方面，确立了将军拥有最终支配权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江户时代的日本是农业社会，耕地是当时最基本的生产手段，统归以将军为首的封建领主所有。由于德川氏继续奉行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武士脱离农业生产，因而农民承担的年贡、杂役量与武士的俸禄知行量、军役负担量均以单位面积稻谷的产量、即“石高”来计数，称石高制。一石约合160公斤或180.5公升，当时日本全国的稻米产量在2500—3000万石之间波动。其中，幕府占有700万石，将军家直接占有400万石，称“天领”；其余300万石分封给直属家臣旗本和御家人。260—270家大名占有将军家之外的其他领地，一般自留1/2上下的领地，余额分授家臣，但多不给土地，而发放禄米。这样，就形成从将军面大名而武士的金字塔式的等级领有关系。

在上述领有关系中，将军拥有的最终支配权表现为：第一，将军持有对大名领地的赐赏权，即大名效忠将军，作为回报，将军向大名颁发领地的领有证明书“领知朱印状”，持有此状的大名方为合法的领主，将军的恩赐成为大名领地的源头；第二，将军把持着大名领地的继承权，即每逢将军或大名更换时，大名必须向将军履行效忠手续，双方重新确认主从关系，从而取得标志将军承认大名领有权的证明书“领知朱印状”；第三，将军握有对大名领地的绝对支配权，可视大名的表现，或增加其领地份额、即“加封”，或削减之、即“减封”，或调换之、即“转封”，或没收之、即“改易”。将军对大名领地的增减予夺贯穿整个江户时代，造成大名与领地的附着关系并不紧密。如同当时俗语所说：“把武士变成盆栽花草”，意即武士如花草，农民如盆土，倒土换盆者唯将军而已。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正常情况下，各等级武士均享有固定份额内的食禄。上级并不分取下级的年贡地租，如将军不分取于大名，大名也不分取于家臣。与此同时，下级的土地领有权受到上级的限制，不得任意自行处理，

另外，将军、大名和家臣武士等土地领有者住在城里，并不直接经营农业生产，耕地由自耕农“本百姓”耕种，由代官或村吏按比例收缴年贡地租，供武士阶级享用。在武士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不存在分享农民劳动成果的中间分肥者。由于将军拥有对领地的最终支配权，但大名亦对其领地具有相对独立性，整个武士阶级的耕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决定了江户时代政治制度的多元化与多重性质。

概言之，这种政治制度是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将军至强与天皇至尊等双重二元政治的奇妙结合。将军的集权表现为：其一，把持全国经济命脉，构成将军集权的物质基础。将军不仅占有数额最高、质量最好的稻田，而且直辖江户、京都和大坂等三大都市以及惟一的外贸港口城市长崎；拥有佐渡金矿、生野银矿和阿仁铜矿等矿山，从而垄断了金银铜三货的铸币权；控制五大陆路交通干线，即东海、中山、甲州、日光、奥州等五街道，专供幕藩领主使用。其二，组建庞大的官僚警察机构，严密统治全国。将军之下，中央机构设大老1名，辅佐将军。常设老中4名，直属将军，总管政务。其下设寺社、勘定奉行各4名，分管僧侣，神官和江户周围8国——“关八州”以外的法律诉讼，或掌管将军领地“天领”的财政和“关八州”以内的法律诉讼；老中还指挥2名负责江户市政、治安、审判事务的町奉行，以及负责监察大名的4—5名大目付。地位略低于老中的4名若年寄，则统领16名目付，监察旗本、御家人。此外，近侍将军的侧用人可随时向老中传达将军的命令，防止老中独裁。地方机构的主要官职，有京都所司代，负责监视京都朝廷和西国大名；派驻在各主要城市的奉行、城代或地方中下级官吏郡代、代官，逐级掌管地方财政、治安和法律诉讼。其三，将军拥有最高军事统帅权。其嫡系部队由2万余名旗本、御家人组成，加上旗本的陪臣，号称“旗本八万骑”。另外，一旦有变，诸藩大名均按石高提供藩军任幕府指挥，从而形成将军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其四，在外交场合，将军以“大君”的身分垄断对外交涉，天皇朝廷和诸藩大名无权过问。以上诸方面是幕藩二元政治结构中将军集权的一极。

其另一极是分权的诸藩。江户时代的260—270个藩国，若按领地占有方式及大小来划分，可分为“国持”、“准国持”、“城主”等数种；若按照大名与将军的亲疏关系划分，则分为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等3种。亲藩大名均为家康子孙，其中尾张、纪伊、水户3藩称“御三家”，一桥、田安、清水3家主称“御三卿”，皆享有出任将军的特权；谱代大名为关原之战以前即追随家康的亲信武将，其领地分布在“天领”周围或险要之地，拱卫将军，幕府的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要职则由谱代大名垄断；外样大名多为关原之战以后方臣服家康的丰臣氏旧部，领地在远离江户的僻野之乡，不得参与国政，为幕府的防范对象。

作为地方封建领主，大名具有两重性。其一，他们是幕府统一政权的地方政权，因而受制于幕府，效忠将军。其二，大名又是所在藩的主君，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在遵守幕府法度、完成将军差遣的前提下，可在本藩自行检地、开发新田，把持国产品的专卖、发行藩内货币“藩札”，享有经济自主权；各大名均设本藩的政权机构，置家老、中老、奉行、目付等官职，任免权由大名自行决定，将军不予过问；各大名还拥有自己的家臣武士团和藩内的立法、司法权等。这样，大名就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享有相对独立性，构成大名分权的另一极。

由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等两极搭配而成的领主之间二元政治结构，在幕府实力强大、强本（将军）弱末（大名）方针奏效时，相互制衡，缔造了江户时代 200 余年的国内和平。然而，待幕府衰落，雄藩崛起，尤其是西南外样大名所在诸藩实力暴涨时，两极均衡结构被破坏，西南雄藩往往推行独立于幕府的割据政策，自强自立，而后相互联合，形成倒幕的雄藩阵营，敲响幕府灭亡的丧钟。

江户时代的另一重二元政治结构，表现为天皇至尊与将军至强。所谓天皇至尊，即在君臣名分论上，将军为天皇委以统治天下权力的征夷大将军，其统治权至少需经天皇派往江户的敕使举行宣读认证诏书的仪式，方称合乎正统，即至少在形式上，皇权是将军执政的源泉；在职官序列上，大小领主一身二任，既有大老、国主、老中、所司代等幕府序列的职务职阶，也有与此相对应的中将、少将、待从等朝廷律令制官职及官位，兼有朝臣的头衔，从职官序列上反映天皇之尊；在思想上，失去政权却握有神权的天皇，凭借所谓神造日本、神治日本等神国观念或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等国体论的支撑。始终维持着现人神和神道教最高祭祀者的神圣地位，即使将军君临全国，也不得不在天皇的神格、神威之下匍匐称臣；在等级身分制方面，天皇、皇族和公卿等不在其列，保持着超然的尊贵身分。天皇的至尊构成朝廷与幕府二元政治结构的一极。

将军的至强构成另一极。主要表现为：直至幕末德川庆喜还政朝廷，可以说将军牢固地控制着统治实权，内政外交概以将军命令是从，天皇朝廷不过是将军执政的陪衬；即使如此，幕府仍颁布约束天皇朝廷的法律《禁中并公家看法度》，规定宫中大臣、亲王以下的座次和官位升进的原则，特别强调天皇远离政治，关起门来研读《贞观政要》，诵习《群书治要》等经史，专心学问即可，甚至连天皇的废立，也掌握在将军的手里；皇室的经济来源悉由将军操纵，其领地石高完全依赖将军的赠予，总份额约为 3 万石上下，皇室相当于一个小大名。

在江户时代，当幕府统治稳定时，至尊与至强，换言之，将军的权力与天皇的权威相辅相成，达成两极从精神到政治上的均衡，有利于幕府统治；当幕府衰落时，朝幕两极失衡，天皇至尊的一极上升，发挥凸显的政权转换机制作用，朝廷统治取代幕府。这时，身披神权外衣的天皇成为兼有权力与权威的新元首，有利于尽速结束内乱并使改革顺利推行，从而使日本及时捕捉住发展的时机。

以兵农分离、重农抑商方针为基础，幕府人为地将社会分工、阶级关系加以法规化，从而形成士农工商序列的社会身分等级制。其中，武士高踞四民之首。作为统治阶级，武士是脱离生产劳动的世袭职业军人，聚居在主君居城四周，内部存在着逐级隶属效忠关系，分为 20 来个等级，均不得退壮或自行脱藩，各等级在进退礼仪、家禄待遇、装备服色等方面区别明显，但皆拥有称姓佩刀、即“苗字带刀”或杀人而官不问其罪的“切舍御免”等特权。

江户时代的农民称百姓，其主体是自耕农“本百姓”，享有居屋和耕地使用权而被登入检地帐，持有百姓株而具有水渠利用权和林野用益权，又被载入名寄帐而承担年贡和杂役。“本百姓”内部分为家产殷实、把持村政的上层本百姓，由原依附农民上升而来的新本百姓，前者垄断村方三役，即村长“名主”（关西地区称“庄屋”）、副村长“组头”和负责监督的“百姓代”；其下为称作“名子”、“被官”的佃耕农民和赤贫佃耕农“水吞百姓”，

他们无权参与村政，生活上亦无保障。整个农民阶级虽位居武士之后，但不得称姓佩刀，不得经商做工，也不许买卖耕地或自由种植商品作物，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为领主生产实物地租年贡米，出扶役。

居住在领主居城附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统称“町人”。町人按行业分工居住：商人居住区称商人町，为领主贩卖年贡米或土产品，并以缴纳营业税“运上金”或临时收费“冥加金”为交换，取得商卖自由，按营业分类，分住京町、青物町、金町或银町等市街；工匠按制造行当分别居住在大工（木工）、蜡烛、锻冶、铁炮（火绳枪）町等市街，各自在商人司或职人头管理下，实行内部自治。町人身分固定！不得佩刀称姓、骑马乘轿或越制穿着锦缎衣服等，备受歧视。町人内部等级繁多：有地产、店铺者称“本町人”，主要为称作“家持”、“大屋”的上层町人，拥有大店铺和地产，皆为垄断某一行业专卖权的御用商人，其中如三井、鸿池家族地位更高，称“扶持町人”，即拥有象征性的家禄“扶持”，还可骑马、佩刀、称姓，享受武士待遇；无地产、店铺者只能借地盖店，称“借家人”无町政参与权，受不到法律保护；地位更低者，为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或奴仆，均由上层町人支配。工匠中，也有御职人或平职人的身分区别。

被划归士农工商四民身分之外的贱民，实际上构成一个等级。其中，从事屠宰、制革或清扫街道等被佛教视为不洁行业的贱民被称为“秽多”，住在城下町特别划定的区域内，与外界隔绝，由秽多头管理；以行乞、带犯人游街、收尸为业的贱民，称“非人”，身分较“秽多”更低，其有定居处者称“抱非人”，无处栖身者称“野非人”，非人不得束发，由非人头管理。

等级身分制一方面将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各不相同的阶层编入一个等级内，使之相互牵制、排斥，从而抵消、内耗了阶级斗争的能量，有利于幕府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世袭且固定不变的门阀制迫使武士因向上流动的渠道彼阻塞，而对职位升迁或对机遇降临怀有无为态度，转而对新鲜事物如兰学、国学、经世学抱有极大的兴趣，认真研读，无形中造就了一批革新人才；与此同时，也令他们容易对只认门第血缘的身分制产生强烈不满，变成现存体制的反对派。因此，等级身分制既存在分而治之的机能，也蕴育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和向近代化跃进的集团爆炸力。

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以朱子学为正统官学和以武士道为道德规范的思想统治。朱子学即宋儒朱高集大成的理学体系，用理与气来解释宇宙运行和人伦道德之所据，强调存天理、灭人欲，通过个人的自省自察、格物致知，以内明君臣大义，外辩华夷之别，提高个人修养水平，自觉遵循君臣大义名分论，服从主君，维系封建统治。朱子学的基本观念十分有利于巩固以将军为顶点的金字塔式的幕藩体制，因而被江户幕府选作正统官学。自德川家康启用硕儒林罗山研讲朱子学以来，历代将军中尊尚朱子学者不乏其人，而林家也世代垄断了朱子学的解释权。幕府不惜巨资，先后在上野忍冈和神田汤岛筑成宏伟的孔庙，供奉孔子与朱熹等儒学圣贤，称其为“圣堂”或昌平黉，使之成为研讨、宣扬儒学的官办最高学府、传播朱子学的大本营。在林家主持下，朱子学独贵独尊，影响深远。

经朱子学的理论升华，日本武士所独有的道德规范“武者之习”或“兵之道”等粗陋的行动准则，演化为精致的武士道，并首先为武士提供了处世立命的思想准绳。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学伦理，即如《德川成宪百条》所谓“以不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物为

人之大伦”，同时强调以忠孝为本，即如《武家诸法度》所谓“奖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或如武士道集大成者山鹿素行在《士道》所强调的“详忠孝之实，乃士之所勤也”，山本常朝在《叶隐》中所说“忠臣出孝门”、“孝为忠之所据”等。其二，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突出尚武精神。如《武家诸法度》规定“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身为武士必须“精熟文武弓马之道”，但“弓马者乃武家要枢”；山鹿则强调武士乃“不耕不造不沽之士”，当以武为职份。其三，克己奉公。即如《德川成宪百条》所谓家臣对主君奉公是“天理”，“士之道”和“将之法”；山鹿的《士道》宣扬家臣“得主君，尽奉公之忠”是武士的本份，告诫武家弟子每天应先“思念主君养育之恩，然后再顾及当天家业”。其四，轻生重死，讲究死得其所。如山本所著《叶隐》开宗明义道，“武士道者，乃发现如何死得其所之道”，要求武士“每朝每夕，死而复死。待常住死身之时，方得武道真谛，方可挑剔地终生恪尽职守”，从而避免毫无意义的“犬死”。因此，战死王君马前或为主君殉死、复仇而剖腹自杀，竟成为武士们追求的人生归宿。

奉公效忠意识是江户武士道的核心，其他道德规范均以此为中心展开：孝乃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升华；精熟弓马之道或提倡尚武，是让武士掌握侍奉主君的技能 and 手段；最忌“犬死”的杀身成仁，是以个人生命的最后归属最终体现奉公效忠意识。当然，奉公效忠意识取决于经济利益的制约。家臣对主君奉公，是以后者对前者的“御恩”，即授以封地或禄米为前提条件的。换言之，土地或年贡米的等级占有，才是维系武士封建主从关系的物质基础。在朱子学熏陶和武士道的规范下，强烈的奉公效忠、自我克制、尽职尽责等意识铸成武士坚强的性格。随着武士道精神向农民、町人的扩散渗透，武士的道德规范与思想意识逐渐内化为日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对日本近现代史产生强烈影响。

作为构筑幕藩统治体制极为重要的一环，对外实行锁国。家康执政之初，日本对外开放。远道而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传教士、商人纷纷进出日本内地与港口，中国、朝鲜、琉球等近邻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频繁进行。大批的日本贸易商、工匠、天主教徒乃至失去主君的浪人漂洋过海，前往泰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台湾等东南亚国家或地区，从事幕府发证允许的朱印船贸易或定居当地的日本町，内外交流颇为活跃。

1612 年德川家康发觉身边的亲信武士冈村大八等信奉天主教，震怒之余，发布第一道禁教令，严命在幕府直辖领地禁止天主教。1613 年再将禁教范围扩大到全国，拆毁教堂，逮捕传教士并强迫教徒改变信仰，把拒不放弃信仰的天主教大名高山右近等驱逐到吕宋。家康之子秀忠、孙家光出任将军后，更变本加厉地禁绝天主教，肃清武士中的教徒。幕府之所以禁教，是由于 1549 年天主教传入日本以后，传教士以西洋军火和贸易利润为诱饵，劝说西南大名入教，再由领主率领民集体入教，竭力扩大教会势力，对幕府统一政权和朱子学的思想控制形成严重威胁。

在推行以禁教为先导的排外政策的同时，幕府逐步强化对贸易的统制，加快禁教与限制贸易、即锁国的步伐。1616 年幕府命令除中国商船外，所有欧洲国家的商船只许在平户、长崎两港停泊，禁止欧洲商人在内地自由经商和居住。1623 年幕府下令禁止日本船前往吕宋。同年，英国因对日贸易无巨利可图并竞争不过荷兰，遂退出日本，专心经营东印度公司。1624 年，

幕府宣布禁止西班牙船只与人员来日本。1631年，幕府规定日本出海贸易船除携有证书朱印状以外，还须持有老中签发的奉书，将对外贸易牢固地控制在幕府当局手中，1633—1639年，幕府接连发布5道锁国令，强调禁教、断绝日本人与海外的往来和统制贸易。1639年与葡萄牙断交，1641年将荷兰商馆迁往长崎的人工岛“出岛”，使之成为日本与欧洲联系的惟一窗口，锁国体制最终完成。1688年，幕府将原先自由旅居长崎市街的中国商人，集中到与出岛毗邻的人工岛“唐人屋敷”居住，给锁国体系加上最后一道紧箍。

总之，在德川家康及其子孙的苦心经营下，将军拥有最终支配权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以强本弱末为原则的双重二元政治体制与等级森严的身分制、朱子学和武士道的思想统制以及对外锁国的政策相辅相成，密切配合，巩固了幕府统治。然而，随着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新生力量出现后，由上述5种因素搭配的幕藩体制则难以避免裂变，危机时代宣布到来。

危机与改革

在江户幕府260余年的统治中，自家康1603年开创幕府的百余年间，国内和平稳定，以石高制为核心的领主土地所有制基本上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农业进步显著。由于挖掘省力的备中锹、脱粒便当的干齿扱、唐箕、千石筛以及抽水器、踏车等先进农具的推广和豆饼、干燥鱼肥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人口的增加，则导致粮食消费量的暴涨，新田开发遍及各地，地处三角洲、湖泊沼泽地带的备前国儿岛湾、摄津国川口、河内国大和川川床、越后蒲原郡紫云寺潟等地区，营造出大片新田。1598—1716年，全国耕地面积由200万町步（每町步约合1公顷）增至297万町步，稻米产量也由1850万石增至2600万石。随着城市郊区蔬菜种植面积的扩大，茶、桔、漆、桑等四木与麻、蓝、红花等三草的种植日益发展，商品经济作物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以捕捞金枪鱼、沙丁鱼和鲸鱼以及生产海带、干海参为主的水产业，制丝、棉纺、绢织、造纸、陶瓷、蜡烛等手工业日益发达，“西阵织”、“和泉棉”、“美浓纸”、“有田烧”、“伊丹酒”等地方名产日孚人望，各呈异彩。

交通网络贯通各地。以江户日本桥为起点的东海道、中山道、甲州、日光和奥州街道等5条陆路交通干线伸展到本州岛的各藩国，路上奔跑着定期参觐交代的大名行列和传达幕府命令或运送财货的传马、飞脚；各干线又分别修筑了供商人使用的支线间道，连接着城乡居民点。海路则有环太平洋海岸的东回海运线和环日本海、濑户内海的西回海运线，以及环绕北九州的西岸海路等。陆海路交通网络将日本列岛联成一体，亦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城下町、港町、宿场町、在乡町等大城小镇星罗棋布于陆海路交通线上。其中，江户、京都、大坂等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号称三都，有“天下厨房”之誉的大坂是全国各类物资的最大聚散地、头号商业性都市。各藩在大坂均设有货场“藏屋敷”，委托特权豪商充当库藏物资的出纳入“藏元”或管理、运送货款的“挂屋”，将年贡米、藩内特产品转卖为货币，供其挥霍消费。特权豪商则通过承包大名的库藏物资贩卖，取得组成同业行会“株仲間”、垄断某种商品流通的权利，如大坂的大批发商“问屋”组成的“24组问屋”或江户

的“10组问屋”等，均属此类组织。

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创造有利的物质基础。1688—1703年的元禄年间，出现盛极一时的文化热潮，史称“元禄文化”。以三弦伴奏的演唱曲艺“净琉璃”、配以木偶“人形”表演的“人形净琉璃”、日本式戏剧“歌舞伎”等文艺演出场场爆满；描绘现世浮世”风情、世态和人物的绘画“浮世绘”，形象生动、色泽艳丽，引人喜爱；文学界的三大作家，即俳谐高手松尾芭蕉、小说家井原西鹤、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等如煌煌巨星，异彩纷呈，留下许多传世之作。至元禄时代，日本封建社会进入最高发展阶段和最后的盛世。

盛极必衰。由于幕藩领主奢侈无度，整个武士阶级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寄生于年贡米等封建租赋，承平日久，坐吃山空；加之大名、旗本、御家人纷纷将库藏物资或禄米抵押给“藏元”、“挂屋”、“札差”等豪商或高利贷商人，换取贷款而沦为借债人，寅食卯粮，陷入窘境。出不敷入，财政赤字激增，成为幕藩领主普遍面临的危机。当然，从根本上讲，造成幕藩体制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以石高制为核心的年贡制度已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石高制与自给自足的米谷农业相适应，在商品经济作物、用以赢利的手工艺品日见活跃并多样化乃至年贡米亦商品化的过程中，年贡米逐渐丧失作为衡量社会财富主流指标的地位并大都成了豪商的抵押品；生丝、棉布、四木三草等年贡制之外的手工产品和经济作物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增大，且掌握在豪农豪商手中。因此，上述多样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财富从领主向町人、豪农豪商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抗议领主提高年贡征收率的“直诉”、“越诉”等百姓请愿运动在各地发生，并时常采取激烈的捣毁行动；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作物的种植与贩卖日益活跃，少数财力殷实、善于经营的上层本百姓发家致富，广置田产，多数农民则因借贷丧失土地，沦为佃农“水吞”、长工“日雇”；聚敛了巨大社会财富的町人势力抬头，作为大名和旗本的债权人，町人对抗武士阶级的自信心增强，对位居身分制末位的社会地位不满，越来越不驯服；领主财政困顿，缓发乃至停发家臣武士禄米成为解脱燃眉之急的常用手段，失去家禄稳定保障的家臣武士被迫另谋生路，人心涣散，士风日下。

商品经济大潮之下，本百姓体制瓦解，石高制变貌，身分制紊乱，幕藩体制发生龟裂，领主财政亏空，债台高筑。为应付日甚一日的综合性危机，从18世纪初期幕臣新井白石推行改革以来，至江户时代后期，幕府多次实施改革。其中，尤其以享保（1716—1736年）、宽政（1789—1801年），天保（1830—1844年）年间分别进行的改革影响最大，史称“三大改革”。

享保改革的主持者是8代将军德川吉宗。吉宗原为纪伊藩藩主，推行藩政改革卓有成绩，有名君之称。1716年凭借“御三家”的特权地位，入主江户，出任将军。至1745年（延享2年），任职30年，厉行各项改革。在政治方面，刷新吏治，整顿士风纲纪，增强将军统治权威。吉宗就职伊始，一改6代、7代将军不理政事的作风，亲理政务，又通过罢免前代将军重臣新井白石、间部诠房，面试诸老中以决去留等措施，恩威并用，树立将军的绝对权威。1723年颁行新的职务俸禄制度“足高制”，启用从诸藩选拔的能吏（有能力的官吏）至幕府任职，任职期间补足原家禄与职禄的差额，称“足高”，去职后则恢复原家禄。在这项制度下，涌现出江户町奉行大冈忠相等一批能吏，构成顺利推行改革的官僚集团。1721年在幕府办事机构评定所外

设置“目安箱”，鼓励庶民投书其中，揭发贪官污吏或提出建议，以广开言路，威慑高官大名，在庶民中树立将军的威信。1724年发布命令禁止奢侈、崇尚俭朴，亲自参加游猎形式下的军事演习，责成大名、旗本督促家臣习武，增进骑射击技术，重振尚武之风。1742年公布法律《公事方御家书》，厉行将军亲裁的法治。

在财政方面，贯彻广开财源、充实府库的方针，力求填平财政亏空。为此，首先采取聚敛年贡米的各项措施：1721年命令诸藩调查登记人口、田亩，1722年废止收取年贡米旧法检见取法，改行新法定免法，即以5—10年的平均收成为基准，确定年贡率“免”的高低，无论丰歉，照此征收年贡米，以求稳定财政收入；同年发布《上米令》，以大名缩短旅居江户的时间为交换条件，命诸藩大名上缴1%的年贡米；又下达奖励町人投资承包开发新田的告示，允许承包者分取投资价值15%的地租，利用城市商业资本，扩大年贡米的新来源。由于吉宗千方百计地增加幕府的年贡米收入，世间谑称其为“米将军”。其次，针对元禄以来米价降低、其他商品物价升高而抵消了年贡米增收的财政效果等问题，采取以提高米价、重建米价为基准的物价体系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各地贮米、限制向江户和大阪运米，竭力控制大米的流通量，将大阪汤堂大米市场所确定的最低米价作为掌握全国大米市场行情的杠杆，确保米价稳中求升；1724年进而发布《降低物价令》，要求酒、酱油、柴薪、盐油、纺织品等诸藩制造的产品降低销售价格；同年为防止商人哄抬物价，召集贩卖棉花、棉布、大米、食油、大酱、蜡烛、清酒等22种商品的商人组成株仲間（同业行会，垄断专利组织），令其互相监督，执行降价法令，将商品流通纳入幕府控制的轨道，并通过向商人征收营业税而扩大财政收入；1736年（元文元年）改铸货币，发行元文金、银币，其中大幅度降低银币币值，从而提高金币对银币的比价，使以金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江户经济圈得以从以银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京阪经济圈买进更多、更便宜的商品，此举既有助于控制江户经济圈的物价，也使幕府在金银币比价的调整中增加府库收入。

在思想文化方面，一方面提倡儒学，继续维持朱子学的官学正统地位，一方面推崇实学，积极引进欧洲的科学技术。吉宗本人好学，尤其对海外的新奇事物抱有浓厚兴趣。出任将军后，特意撤走将军座前的帘子，与前来拜见的荷兰商馆馆长亲切面谈，了解国外形势、欧洲人的衣食习俗和军械装备诸种情形。1720年下令放宽对汉译西洋图书的禁令，进口有关天文、地理、医学、武器、博物、化学等方面自然科学书籍，对专门宣讲天主教的图书仍加禁止。吉宗开明的“洋书解禁令”，为西洋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因此洞开借助荷兰语、研究欧洲自然科学的新学派“兰学”的源头。与此同时，望远镜、钟表、手枪等新奇物件和大象、鹦鹉、孔雀等观赏动物，以及甘薯、甘蔗、朝鲜人参、中国药材等食用医用植物被引进日本，中国式的榨糖法被推广。西洋式的天文观测纠正了历法中的若干错误，经多年努力，1754年（宝历4年）制定了新历法“宝历历”。

上述改革措施基本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成效颇大。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多年积累的财政亏空被填平，幕府年收入有盈余。然而，财政扭亏为盈的基础是对农民的沉重剥削，农民的贫困化降低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1732年西日本蝗灾肆虐，酿成灾民200余万、饿死1万余人的“享保大饥馑”，次年江户爆发米骚动。另外，吉宗为使其子孙世代继任将军，在御

三家之外，另设同样享有将军继承权的田安、一桥家，分别由次子宗武、四子宗尹任家督，至9代将军家重复设清水家，三家合称“御三卿”，成为垄断将军之职的新特权家族。至幕末，御三家与御三卿的将军继嗣之争，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导火线并加剧了其内部矛盾。对此，创设御三卿门阀制度的吉宗亦始料不及。

吉宗之后的8代、9代将军家治、家重执政时期幕府政治重又出现危机。1759年（宝历9年）竹内式部游说公卿、试图重建天皇一统天下的“宝历事件”与1767年（明和4年）山县大貳鼓吹尊王论、批判幕政的“明和事件”接连发生，预示着将军的集权统治将面临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1764年关东地区武藏国20余万农民反抗幕府横征暴敛的“天狗骚动”与三河国农民要求减免贡租、陆奥国农民的抗税斗争遥相呼应，对幕藩领主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在国外，不断向远东扩张的俄国屡次迫近日本：1739年施潘伯格船队驶入房总半岛近海，1769年俄国武装探险队占领千岛中部的得抚岛，1778年侵入择捉岛，北方边警频传。1792年俄国的拉克斯曼使节团以护送幸大夫等漂流民回国为由，抵达北海道根室，要求开国通商，向锁国体制发起最初的冲击。

内忧外患一时俱来，要求强有力的人物主持幕政，应付危局。然而，1767—1786年间执掌幕府实权的老中田沼意次与其子若年寄意知在推行扶植株仲间、利用商业资本围湖造田、扩大长崎贸易、着手开发北海道、开展对俄贸易等积极的重商政策的同时，公然收受贿赂，败坏政界风纪，士民怨声载道；他们又大兴土木，讲究奢华排场，将享保改革积攒的家底折腾殆尽，幕府再次陷入财政窘境，以致无法支付旗本、御家人的禄米。武士被迫借债或典当家产，挣扎于困顿之中，日益强烈不满。人祸伴随天灾。1773年瘟疫流行，1778年京都、日向国洪水大作，1779年樱岛火山大喷发，1782—1787（天明2—7年）霜冻、洪涝、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形成全国人口锐减92万的“天明大饥谨”；在东北地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大批饥民涌入城市，社会动荡不安。1784年田沼意知被旗本佐野善左卫门政言刺杀，1786年田沼意次被罢免软禁。1787年全国性的抢米暴动和捣毁运动自大阪开始，迅速波及京都、广岛、长崎、江户。愤怒的市民、饥民将米店和幕府统治的基层机构抢砸得一片狼藉。在幕藩体制再度危机四伏的乱局中，幕府被迫在宽政年间实施第二次大改革。

宽政改革的主持者是德川吉宗之孙、前白河藩藩主松平定信。1787年定信被提升为首席老中，至1793年被免罢的6年间，辅佐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提拔朋党本多忠筹、根岸镇卫、松平信用等出任老中，推行以重农抑商政策为中心的各项改革。

改革以扫除田沼时代纸醉金迷的靡烂风气、整肃武士纲纪为出发点，宣布幕府政治以重建享保之制为准绳。为此，1787年发布《节俭令》，率先压缩削减幕府行政开支，厉行节约，规定诸藩大名与旗本、御家人等3年内不得恣意宴饮馈赠，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禁止江户豪商出售奢侈品，阻挡都市花花世界对武士的诱惑，重振士风。为使武士摆脱高利贷的盘剥煎熬以安心学文习武，1789年（宽政元年）下达《弃捐令》，强行规定5年前旗本、御家人举借的高利贷本息一概废除，将5年内的借贷月息骤降为0.5%，当年借贷年息降为12%，本息逐年还清。此举使高利贷者札差损失借金118.7万两，虽一时缓解了武士的债务重压，却使此后的借贷难上加难。

重农方针的施政重点在于稳定农民劳动人口，阻止弃农经商做工的浪潮。1788 年下令禁止因“天明大饥馑”造成人口锐减的陆奥、常陆、下野等国农民外出做工，1790 年发布《旧里归农奖励令》，劝导流入江户等大城市的农民回归故乡旧里务农，发给路费并答应保证提供耕地。与此同时，拨款植树、治水、兴修农业工程，鼓励农民种植水稻，限制烟草、蓝、红花等商品作物的种植，重建以生产年贡米为中心的本百姓体制。

抑商政策的矛头指向城市的豪商势力。定信认为，株仲間、组合、座等田沼时代大量涌现的豪商垄断性同业行会造成物价暴涨，1787 年下令解散田沼时代新设的人参、铁、真鍮（黄铜）座；接着，又撤销大阪和江户垄断薪、炭、菜籽、棉籽买卖的株仲間，命令皮棉、石灰和八丈岛仓运会所停业；对待有特权、为富不仁的绸缎商茶屋四郎次郎、后藤缝殿助以及糕点商大久保主水、金座商后藤庄三郎等严加惩处；自 1789 年起，多次下令豪商降低物价，将江户新兴豪商统编起来，归勘定所节制、管理，竭力扭转士农衰而商工兴的局面。

为稳定城市统治秩序，控制物价，1788 年下令禁止囤集米谷，1789 年在京都、大阪设义仓，1790 年命诸藩大名和拥有领地的旗本在 5 年内按每万石储存 50 石的比例设立义仓，诸国代官则筹办乡藏，广集稻谷以备荒年赈灾；1791 年修改江户城町法，命令节约町经费并将其蓄存起来，买米谷备荒；1790 年在江户铁炮洲开办收容所“人足寄场”，收容失业者和流民，令其学习木工、榨油、捣米、制煤球的技艺，以自谋生路，还多次下令禁止赌博和男女混浴。

在思想钳制方面，大兴昌平黉（亦称昌平学问所），聘请硕儒柴野栗山、冈田寒泉、尾藤二洲等担任儒官，宣讲正学朱子学，1790 年查禁阳明学等其他儒学分派，推行所谓禁异学方针。这一年还发布《出版统制令》，严禁出版讽刺现实的书籍。对文艺小说、甚至绘画浮世绘也严加审查，处罚议论时政的小说家山东京传和经世家林子平等。一时搞得人心惶惶，万马齐喑。

为严守锁国体制，定信拒绝了拉克斯曼使节团的通商要求，下令沿海诸藩防备外国船只驶近海岸，并亲自掌管海防警备事务。1792 年在武藏国德丸原设置炮术演练场，巡察房总半岛和江户湾周围的边塞防务。为巩固海防、增强军备，定信还下令搜集欧洲兵学图书资料，筹划铸炮造舰之法。

执政期间，松平定信曾在吉祥院向神佛宣誓，不惜身家性命，务求改革成功，以改善国计民生，强化将军家的统治。作为政治家，其私德无可挑剔。但由于定信主持的宽政改革举措基本上逆历史潮流而动，生硬而保守，从而注定改革以失败而告终。1793 年定信被解除老中之职，息影政坛。在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的形势下，被商品经济腐蚀得千疮百孔的幕藩体制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 19 世纪初期，日本封建社会愈加陷入无力自拔的危机之中。在纺织、酿酒、制油、陶瓷和水产加工业等部门破土而出的资本主义萌芽，预示着封建社会的终结。在上述部门的数百个手工工场中，出现商业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的手工雇佣劳动者，形成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尽管是雏形，尽管三四百家手工工场不过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的数点偏舟而力量单薄，但新兴生产关系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封建的幕藩体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了。

反映社会进入转型期的一个明显标志，是 19 世纪初期阶级斗争日趋尖

锐，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由于宽政改革的失败，幕府完全丧失驾驭局面的灵活性与能力，商品经济愈加猛烈地冲击自然经济的本百姓体制，农民两极分化加快，大批农民破产。自1830年天保元年以来，各类自然灾害接踵而至。农民因穷困不堪而无力抵御灾害肆虐；连年的歉收，终于酿成1833-1836年（天保4—7年）的第三次全国性大饥荒“天保饥馑”，全国灾民70余万，仅东北地区即饿死10万余人。城市饥民的抢米暴动、各地农民的暴动，尤其是1836年发生在“天领”的甲州郡内和三河加茂暴动震惊幕府。1837年在大阪爆发的大盐平八郎起义，则揭开了下级武士领导民众向幕藩领主恶政宣战的序幕。

大盐平八郎本名政高，字子起，号中斋，通称平八郎。1793年生于大阪城东町奉行所下级警官的“与力”之家。少年时继承祖父“与力”之职，在惩办违法官吏和恶僧、捕拿不逞之徒的办案过程中，增长了沉稳果断、行动敏捷的才干。后潜心研修阳明学，愈加增强知行合一的自觉性。1830年不满官场的倾轧与腐败，愤而辞职，在自办的私塾洗心洞招徒授业，著述《洗心洞札记》等，在京阪一带颇孚人望。1836年“天保饥馑”进入严重关头，大阪城内饿殍遍地，惨不忍睹，官商勾结、哄抬米价，庶民无以为生。为解民饥荒之苦，大盐上书呼吁大阪地方当局和城内豪商救济灾民，被置之不理。大盐遂卖掉自家藏书5万卷，将卖得的千两黄金分发给万户穷民；又研制枪炮，并密召门徒80余人，准备在1837年2月19日夜举义，抗暴惩贪。同时亲书檄文，散发大阪周围农村，号召农民响应起义，对贪官污吏、富豪奸商实行“天罚”。起义前夕，因门徒叛变告密，被迫提前行动。19日清晨，大盐率门徒高举“救民”大旗，鸣炮前进，攻打町奉行所。沿途不断有市民、贱民和农民加入起义行列，人数达数百人。起义者放火烧毁三井、鸿他等豪商的住宅店铺，与前来镇压的幕府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大阪城西町奉行掘利坚和东町奉行迹部良弼临阵慌乱，跌落马下，1/5的大阪市街毁于战火。但起义者势力单薄，孤军奋战，当天即被镇压。一个月后，大盐父子被捕吏发现并被包围，遂引火自焚身亡。大盐起义使幕府当局又惊又惧，起义消息传到江户，老中水野忠邦不敢按平日时间退城归宅，急召其他老中开会，策划调集近畿诸藩军队镇压起义，同时被迫酝酿进行幕政改革。大盐牺牲后，幕府将包括大盐父子在内的17名起义者的遗体处以磔刑，以此来泄恨壮胆，威胁民众。

天保年间的社会动荡，对诸藩领主形成强大压力，促使其先于幕府推行藩政改革。尤其在西南诸藩，一时出现竞相改革的活跃局面，地处本州岛西端的长州藩，扼守濑户内海出海口，为交通发达、商品生产活跃的地区。藩厅早在17世纪前半期对纸、18世纪后半期对蜡、蓝实行专卖制，1830年设立藩内产品统制机构“国产取立”，派藩吏强制收购农民的产品，运至大阪贩卖，更加全面地贯彻专卖制，严格控制农民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上述措施引起农民不满，1831年领内6万农民暴动，反对专卖制，要求降低年贡率、商品生产流通自由化。暴动持续3个月。藩当局受到巨大压力，被迫启用能吏村田清风，于1837年开始实施长州藩的天保改革。

村田清风原本为家禄仅50石的下级武士，以其多年侍奉藩主的才干和忠诚深得藩主毛利敬亲的器重，被晋升为中级武士，主持藩政改革。1840年清风向藩主上书《流弊改正意见》，提出5点施政纲领，即“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和“振兴产业”，举全藩之

力,实现富国强兵。为还清高达 8.5 万余贯的藩债,清风大搞富国之术, 1841 年在下关设置商品流通管理机构“越荷方”和物产总会所,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参与经营,借地利之便,开展贸易以从中赢利。5 年后显现成效,藩债还清过半。为安抚民心,救济武士,清风放宽了对米、盐、蜡、纸等“长州四白”及蓝等商品的专卖制,允许棉花、棉布的自由流通,免除垦荒地的年贡,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宣布领内武士的借债一律由藩厅分 37 年代还,要求武士安心习武,并向商人、工匠发放允许其商买的“免札”,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为防外患,研制洋式枪炮, 1843 年在藩主毛利敬亲亲临之下,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兵员 1.4 万余名、战马 500 余匹,采用高岛式西洋炮战阵法,显示强兵姿态。在启用人才方面,不问门第、唯贤是举,着力培养了周布政之助等革新人才,其后又形成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乃至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呈梯队层次的人才集团。上述改革使长州藩率先在西南日本作为雄藩崛起,影响极为深远。

在此前后,萨摩藩为解决高达 500 万两的藩债问题,也启用下级武士调所广乡出任大目付,从文政 10 年(1827 年)开始藩政改革。至天保年间,改革力度加大,基本措施围绕削减藩债展开。通过加强对砂糖的专卖制、发展与琉球的秘密贸易,广开财源。至天保 11 年,财政状况大为好转,从而为推行军制改革,装备洋式武器奠定财政基础。萨摩藩作为雄藩在九州西南崛起。九州西北的肥前藩、濑户内海南部的土佐藩,也涌现出一批改革派,他们大都采用垄断藩内特产品的生产与流通、稳定农业生产、改行洋式军制等措施,在于保改革中扩充藩的力量。西南诸藩的崛起,打破了幕府强本弱末的传统政策,幕府与雄藩实力对比发生逆转,这是促成幕府不得不在诸藩天保改革之后亦思改革的内在因素。

外压的逐步增强,是幕府推行天保改革的外在因素。继 1792 年拉克斯曼使节团之后, 1804 年俄国第二次派遣列扎诺夫使节团来长崎要求开国通商。幕府以锁国乃祖宗之法为理由,拒绝其要求。列扎诺夫恼羞成怒,归国途中袭击驻守在库页岛南部和择捉岛的日本哨所和渔船,以示报复。1808 年与拿破仑法国交战的英国派军舰“费顿”号突袭长崎,捕捉法国盟国荷兰的驻日商馆人员,并劫掠淡水、煤炭和粮食。“费顿”号事件对日本冲击颇大。此后,英俄船舰经常出没日本沿海,迫使幕府在 1825 年发布《异国船驱逐令》,命令沿海诸藩加强守备,对前来袭扰的外国船舰一律开炮轰走。1837 年美国也加入叩击锁国大门的行列,远洋轮“摩里逊”号以送交漂流民为理由,驶入浦贺,要求通商,被浦贺奉行下令开炮驱逐。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 1842 年清廷战败,被迫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消息传到江户,幕府深受震动,遂于同年改发《薪水令》,指示诸藩对前来的外国船舰供应其所要求的水、煤、粮并劝其驶离日本,而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开炮驱逐。主持幕府的老中水野忠邦认为,鸦片战争不只是中英两国之事,日本也应认真对待。迫于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 1841—1843 年(天保 12—14 年),幕府推行了江户时代的第三次大改革——天保改革。

改革的主持者水野忠邦不顾时势变化,一味模仿享保、宽政改革的陈旧模式,于 1841 年 5 月告偷各有司刷新政治,凡事以享保、宽政之制为准则,开始了禁令迭出的改革。同年 12 月下令禁止问屋株仲间的商品批发业务,禁止农民弃农经商;1842 年 3 月禁止使用问屋的称号,4 月禁止町人食用新上市的鲜鱼,5 月下令降低物价,6 月禁上米商买空卖空,8 月禁止制造高价石

器、瓷器，9月禁止百姓奢侈或从事他业，10月禁止诸藩大名对本藩或他藩物产品的专卖；1843年3月禁止走私贸易，7月向大阪和兵库西官的豪商征税，等等。3年之间，从各个方面打击商业资本，厉行抑商政策。其中，尤其是禁绝商业活动、解散旧流通机构问屋株仲间却未建立新的流通机构的笨拙举措，反而造成流通混乱，物价飞涨，朝野怨声载道。

在稳定和增征年贡方面，1843年3月下达《人返令》，强迫进城农民一律回乡务农；6月着手开发印幡沼，以扩大耕地，增加稻米产量。上述举措因招致农民的抵制而收效甚微。在增强幕府权威、抑制诸藩大名方面，1841年7月表彰水户藩德川齐昭的治绩，特许5年内在国、无须赴江户参觐交代，使诸藩大名效尤；同月奖励旗本学文习武，以为诸藩武士的榜样：1843年4月簇拥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参拜日光神宫，大肆宣扬德川家康的丰功伟绩，借以增强将军家的威力；9月发布《上知令》，收缴江户方圆10日里、大阪方圆5日里内的大名飞地或旗本的知行地，统归幕府直辖，而另拨其他领地作为交换。此举意在增强幕府的财力和防卫，却招致大名和旗本的反対，行不及一个月即告废止。在外压骤增而防患于未然方面，1841年12月派员巡察伊豆、相模、安房、上总等江户湾周边诸国：1842年7月另颁《薪水令》取代《异国船驱逐令》，避免与外国发生武装冲突，8月命川越藩，今治藩加强在相模国、房总半岛的守备，12月增设伊豆国下田和武藏国羽田两奉行，增强防备指导力量；1843年8月在江户四谷角筈设置大炮射击场，演练洋式炮队。

以上诸改革措施，除海防一项有积极意义外，其他各项皆为逆潮流而动的举措，推行方式生硬、霸道，触犯了将军以下各阶层的利益，水野忠邦成了众矢之的，1843年9月被罢免。消息一经公布，江户城内欢声四起，水野宅院被数千庶民包围并受到石块的猛烈袭击。幕府的天保改革遂告失败。

享保、宽政，天保等三次大改革，因时代的变迁、改革措施差异而效果迥然不同，享保改革时期，幕府尚有余力控制商品经济的势头，改革举措又大体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取得明显成效；宽政、天保改革时期，幕府已丧失驾驭局面的能力，措施日趋僵化、生硬，不顾时势、逆历史潮流而动，改革连遭失败。尽管改革家个人极欲有所建树，但已无力解决商品货币经济与封建自然经济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本人则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冲突的牺牲品。在这一过程中，由德川家康创立的幕藩统治不可逆转地由盛而衰，幕府权威一落千丈，处于总崩溃的边缘。

百家争鸣

江户时代国内长期和平、经济的繁荣以及身分关系的变动和内外矛盾的激化，为诸学派的兴起与争鸣，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的活动舞台。与此同时，思想领域的诸家兴起与争鸣，又为民族的觉醒预作铺垫，使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化带有鲜明的特点——思想先行。

概括起来说，江户时代的思想流派主要有以下几种：

同属于儒学圈的学派，除官学朱子学外，尚有阳明学派。其创始人为室町末期的临济宗僧人并与王阳明有过来往的了庵桂悟（1425—1514年）。江户时代力倡阳明学的学者为中江藤树（1608—1648年）和熊泽蕃山（1619—1691年）师徒，分别著有《孝经启蒙》、《论语解》、《集义和解》，《大

学或问》等著作，在研讨“心即理”、“致良知”的明代理学课题的过程中，与朱子学对抗，强调个人的精神自主和主观能动作用，对武士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至幕末，阳明学的代表人物为佐藤一斋（1772—1859年），著《吉志四录》等，强调实践价值的永恒性，对西洋科学表示理解并倡导研读。其弟子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以儒学道德为本，也热心学习西方文化，提出著名主张，即“东洋道德、西洋技艺”，主张以务实态度学西方，对吉田松阴（1830—1859年）、胜海舟（1823—1899年）等影响颇大，为幕末尊王攘夷或推广洋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山鹿素行（1622—1685年）所提倡的圣学、伊藤仁斋（1627—1705年）倡导的古义学、荻生徂徕（1666—1728年）宣扬的古文辞学。他们主张舍弃朱子学或阳明学的说教，直接从孔孟的《论语》或《孟子》等原著中精密考证，探明古代孔孟儒学的真谛，以圣人之道、礼乐政刑为基准，评论幕府政治的得失，故通称古学派。古学派的兴起，从儒学复古的角度，向官学朱子学发起挑战。片山兼山（1751—1771年）则从折中的立场出发，主张不偏颇朱子学、阳明学或古学派的任何一方，从汉唐儒学训诂和宋明理学中寻求孔孟的真意，故被称为折衷学派。该学派所标榜的不偏不倚态度，实际上是将官学朱子学的地位降低到与其他儒学分派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上，在客观上否认了朱子学的一学独尊。

由德川家康之孙、水户藩第2代藩主德川光圀（音国），1657年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以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等史观形成江户儒学的另一大分派，史称水户学。前期水户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安积澹泊斋、栗山潜峰，三宅观澜等力倡尊崇天皇、敬儒礼佛、君臣名分和华夷之辩等观念，奠定尊王论的思想基础。后期水户学以第9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年）主持的藩校弘道馆为核心展开，主要代表人物藤田幽谷、东湖父子以及会泽安、栗田宽等，在继承尊王论的基础上，针对外患加剧而疾呼攘夷论，从而为幕末尊王攘夷思潮的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来源。

相对传承已久的儒学或传统的日本思想而言，新兴学说层出不穷。其中，自江户中期发达起来的国学，以《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等古典为研究对象，贯彻复古主义、排佛斥儒、弘扬神道民族精神和国体本意等治学方针，在町人、农民中赢得大批信徒，掀起回归本民族文化的浪潮。国学的先驱者契冲（1640—1701年）通过对《万叶集》等日本古典的深入研究，大力宣扬日本神国观，主张用神道来取代佛法儒学。继其后，神官荷田春满（1669—1736年）着力从《万叶集》中发掘日本“国乃神国，道乃神道”的民族精神，并竭力说明“天壤无穷”的皇统是神道的核心。神官贺茂真渊（1697—1769年）师承荷田学说，著《万叶考》、《国意考》等，公开提出“回归远古”的口号，肃清附会追随儒佛等外国之道的学风，发扬日本古道中尊皇的“神皇之道”精髓。贺茂的弟子、间屋商人出身的本居宣长（1730—1801年）集国学研究之大成，著有44卷的巨作《古事记传》及其他作品，认为贯穿在《源氏物语》中的“悯物”意识反映了人对客观世界和大自然的纤细感触，并为日本人所独有，值得自夸自豪；对儒学的易姓革命观大加靴挾，鼓吹对皇室祖神天照大神的绝对信仰。本居的学说对武士出身的平田笃胤（1776—1843年）影响强烈，通过讲授古道或著述《古史成文》、《古道大义》、《古史传》等著作，平田将神道的宣扬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概言之，用神和神道解释人间诸象，即人的“敬义仁智勇”等德目均为神意的体

现，人性由神赋予，现世人的行为受神的审视并判定善恶；去掉人的私智，即可实现神皇之道。该道的宗旨是清静为本、厌恶污秽，事忠孝、惠妻子、多子孙，宗族和睦，光耀祖宗；痛斥无君父、弃妻子的佛祖释迦牟尼是神敌等。

荷田、贺茂，本居和平田号称“国学四大人”。其排佛斥儒的矛头指向幕府思想统治的两大工具，即朱子学和佛教；其复古的口号反映町人、农民对幕府统治的强烈不满，希望恢复无武士专制的古代世界。在幕末的政治斗争中，国学为尊王攘夷、王政复古思潮的涌动提供了深厚的思想上壤，发挥了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明治维新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国学的积极作用迅速减退并日益走向反动，其极端、偏颇的一面被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所利用和扩充，演化为种族优越论和侵略扩张思想。

与国学几乎同时兴起的新学派，当称兰学。1774年前野良泽（1723—1803年）、杉田玄白（1733—1817年）等8人历尽千辛万苦，耗费4年时间，终于将荷兰文的《解剖学》译出，命名为《解体新书》。以此书的问世为标志，由杉田命名的新学派——兰学学派形成。通过师承纽带，官方系统的兰学先行发展。1783年杉田、前野的弟子大槻玄泽（1757—1827年）著“兰学阶梯”，1789年开兰学私塾芝兰堂于江户，授徒百余人。1795年元旦，大槻与兰学者聚会庆祝洋历新年，兰学蔚然成风。不少兰学者成绩斐然，杉田的友人平贺源内（1728—1779年）钻研西洋物理、化学、医学，曾研制成功石棉布和蓄电器，缩短了日本与近代欧洲在科技上的差距。与此同时，民间系统的兰学教育日益普及。兰医绪方洪庵（1810—1863年）于1836年在大阪开兰学私塾适斋授业，门徒2000余人，其佼佼者如福泽谕吉、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等日后或成为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宗师，或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功绩卓著。

江户中后期，不断有外国学者到长崎荷兰商馆讲学，兰学进入更加活跃时期。1775年著名的瑞典学者森伯格到长崎，讲授动物学、植物学和医学，开日本近代植物学的先河。旅日期间，他搜集日本植物800余种，回国后著《日本植物志》、《日本植物图谱》，并简单介绍了日本文化，促进了欧洲人对日本的了解。1779年新任荷兰商馆馆长、学者蒂赛夫赴任，在旅居日本的5年期间，传授近代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一时间，长崎的出岛成为日本兰学者的向往之地。

1823年德国拜因州威茨堡大学生理学教授、医生西博尔德以与森伯格相同的身分，即出岛荷兰商馆医师的名义来日本。起初热心研究医学和博物学，了解日本，后来则经常为日本人治病，名声鹊起。1824年幕府特许其登岸，在长崎郊外建鸣沈塾，医病兼讲学。兰学者、如二宫敬作、高野长英、小关三英、伊东玄朴等竞相投其门下，学习欧洲自然科学。1826年，西博尔德随荷兰商馆馆长赴江户拜见将军德川家齐，结识了幕府天文官员高桥景保、医官桂川甫贤和土生玄硕等兰学者，过往甚密。旅居日本期间，西博尔德全面研究日本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搜集了大批资料。1828年任期届满、回国前夕，因其行李中收藏的日本地图和印有将军家葵叶纹家徽的服装等违禁品被发现，遂被拘禁，次年驱逐回国。与其交好的高桥等被逮捕关押，门生也多受处罚，此即为幕府首次镇压兰学者的“西博尔德事件”。

官方系统的兰学者遭受“西博尔德事件”的冲击后稍有挫折，不久又再图恢复。1832年（天保3年），田原藩藩士、兰学者渡边华山邀集高野长英、

小关三英等组成兰学者的沙龙团体尚齿会（俗称蛮社），由高野等主讲兰学和西洋知识，一时颇有生气。民间系统的兰学者较少束缚，并在近代欧洲进步的宇宙观和合理主义的影响下，对身分制、锁国政策、朱子学的明华夷之辨等政治问题率先提出质疑。司马江汉（1738—1818年）不仅最早在日本制作洋式铜版画，引进油画技艺，介绍地动说，印制《凯普勒天文图解》，还著有政论著作《春波楼笔记》，猛烈抨击身分制。司马认为人生天地之间，本来是平等的，后来为私利争斗，形成尊卑等级，但上自天皇、将军，下至士农工商，非人、乞丐，皆为人。山片幡桃（1748—1821年）于1820年著《梦之代》12卷，泛论天文、地理、历史、制度、经济、无鬼论等学说，力倡地动说；并强调西洋科学优越于儒学混沌的自然观，批驳神秘论，宣扬欧洲勇于探索的实证精神，从而否定了传统的夷狄观。

随着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外压日益增强，特别是以1837年“摩里逊”号事件为契机，官学系统的兰学者也开始对政策问题采取批判态度。1838年，尚齿会要员高野长英著《梦物语》、渡边华山著《慎机论》，痛论天下形势和欧美国家的富强，要求停止鲁莽的《异国船驱逐令》，笔锋指向传统的锁国祖法，刺痛了幕府当局。继而昌平黉大学头林述斋的次子、幕吏乌居耀藏等，出于对兰学的憎恶和争名夺利，暗中诬告、中伤尚齿会成员。1839年幕府以尚齿会里通外国、图谋外逃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大肆镇压，迫使渡边、高野、小关等自杀，江川大郎左卫门等与尚齿会有来往的幕吏被牵连。遭此史称“蛮社之狱”的镇压之后，官方系统的兰学者噤若寒蝉，不再热心政治。但民间系统的兰学继续发展，为明治维新颇有成效的向西方学习，准备着人才，开辟着道路。

借助儒学经世之用观念、国学民族意识和兰学自然科学知识的相互浸润、交汇及田沼时代重商政策的推动，江户中后期，主张用纵横五大洲的大眼光跨越岛国局限以经世济民、自强自存并雄飞海外的新兴学派——经世学异军突起。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工藤平助（1734—1800年）、林子平（1738—1793年）、本多利明（1744—1821年）、海保青陵（1755—1817年）、佐藤信渊（1769—1850年）等。经世学派的基本主张是开国论和海防论。1783年工藤平助著《赤虾夷风说考》（又名《俄罗斯略记》），疾呼关注盘踞在“赤虾夷”（堪察加半岛及周围地区）的俄国人南下日本的动向；主张放弃困守待攻的被动政策，转而主动与俄国发展贸易，开发虾夷地，以巩固北门边防，从而最早提出在长崎之外另辟贸易口岸的开国贸易论。继而，林子平在1785年著《三国通览图说》、1786年著《海国兵谈》，提醒人们注意朝鲜、琉球和虾夷地等3国状况；勿忘江户日本桥下的流水直通中国、荷兰；主张作为海国的日本应铸炮造舰，演习水战以防御逼近日本沿海的外寇俄罗斯。1789年，本多利明著《经世秘策》、《西域物语》，认为渡海、运输、贸易是海国日本国家政务的关键，呼吁开国贸易，向世界各国远航。经世学派的开国论和海防论对幕末洋学者产生强烈影响，1842年佐间象山提出《海防八策》，力主铸洋炮、造洋舰，严守海岸关防；1849年吉田松阴著《水陆战略》，强调操练陆海军，认真研究海外动向。

值得注意的是，经世学对近代日本世界战略预作未雨绸缪的先期探索。在主攻方向上，纷纷提出以西侵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为主，兼顾北攻俄国，南进琉球、台湾、南洋和印度。林子平自称著《三国通览图说》，是为将来用兵朝鲜、琉球、虾夷地时预作准备。本多利明在《经世秘策》中，将堪察

加、满洲（即中国东北）、库页岛等地划为进攻方向。1823年佐藤信渊在其《字内混同秘策》中，更加明确主张“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先从吞并中国开始”；而当今最易攻取之地，“莫如中国的满洲”；欲攻取满洲，则应先攻黑龙江地区，再陷松花江、盛京，入山海关，占领江南；一旦“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罗、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100多年后，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被曝光，“折奏”中所谓“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各民族必敬畏我国并降服于我”的侵略方针，与佐藤构想如出一辙，个中微妙，令人深思。在确立世界战略的极终目标上，经世学派均主张日本通过武力征服，“皇化”全球，主宰世界。在安内竟外方面，经世学派提出各种改造国内体制的构想。其中，佐藤信渊的江户迁都论，主张设立教化、太政、神事三台与本事、开发、制造、融通、陆军、海军六府相结合的中央机构，与明治初年的“二官六省”、“一官八省”体制竟然大同小异。经世学派对近代日本国家战略的多方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反映农民利益和要求的思潮也在涌动。安藤昌益（1703—1762年）著《自然真营道》和《统道真传》，颂扬农民是直耕、直织、安食、安衣、无欲、无乱的“自然天子”，批判武士不劳而食；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要求建立不分富贵贫贱、没有剥削压迫、自耕自食的“自然世”。安藤的主张虽说充满乌托邦的空想成分，但其否定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立场极其鲜明。相形之下，农政家二宫尊德（1787—1856年）则以报德思想的说教，即劝导农民以实践之德回报天地人三才之德，勤劳、节俭、安份守己，兴产安民。换言之，是在维护幕藩领主统治体制的前提下，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从而曲折地表达了农民求生存、求安定的要求。

总之，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幕藩体制逐渐陷入危机。各种思潮泛起，并力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得一席之地，整个思想界彼澜起伏，动荡不已。这种思想的震荡与百家争鸣，对一个东方古老民族的猛醒并迈开近代化步伐是不可缺少的前提。与此同时，官学朱子学日益丧失主导地位和吸引力而苍白化，与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生机勃勃成鲜明对比。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是幕藩体制经济基础动摇、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等现实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生动反映。至此，由德川家康创立的基业已是大厦将倾、风雨飘摇。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二元政治结构、等级身分制和朱子学的思想统制等四大支柱已摇摇欲坠，只待锁国体制这一大支柱的崩塌而宣告幕藩体制的彻底完结。随着大洋彼岸对日本锁国体制冲击波的增强和开国的不可避免，幕藩体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日已屈指可数。

第 2 章

无奈开国

佩里叩关

天保改革失败后，欧美列强以军事侦察或武力征服为先导的殖民主义狂潮更加猛烈地扑向东亚，逼近日本。1845 年英国舰队觊觎朝鲜海防，1846—1847 年法国舰队两次进犯朝鲜沿岸，日本海边警频传。在日本以南地区，1844 年法国军舰闯进琉球运天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要求通交、贸易和传播天主教。1846 年 4 月英国船强行驶入那霸港，并不顾琉球当局的拒绝，留下传教士派德尔海姆在当地发展势力。同月，法国舰队在司令官赛修指挥下，再次到琉球。法国要求开国通商，并派官兵登陆或自行测量海岸，向琉球王施加压力，并效仿英国，也留下传教士在那霸活动。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俄国以国际警察自居，将扩张的主要矛头指向黑海和南高加索地区。在远东，俄国采取守势，巩固千岛、库页岛的殖民阵脚，对日本继续维持高压方针。

在北美洲，自 1800 年起，新独立的美国开始了由西向东的领土扩张行动：1803 年购得路易斯安那；1810—1818 年巧取豪夺了东西佛罗里达；1845 年合并墨西哥的得克萨斯；1846 年又挑起美墨战争，抢占格兰得河以北的墨西哥领土，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等新州。至此，美国成为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国家，打开了直航东亚的海上通道。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商船已远航广州，开展赢利颇丰的对华贸易。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1844 年美国趁火打劫，派专使顾盛与两广总督耆英订立《望厦条约》，取得协定关税权，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等五口通商权，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以及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传教、美国军舰巡查沿海各港等殖民特权，从而为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抢占殖民权益向东亚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望厦条约》的签订和加利福尼亚的占领，使美国的棉花种植园主、纺织业的厂家、金融大亨们欣喜若狂地做起直航太平洋、赚取暴利的黄金梦。然而，在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下，尚不能从美国的西海岸直达中国沿海口岸，这就需要选择一个中途停靠站，补充远航所必需的煤炭、粮食和淡水。于是，地处西北太平洋、临近中国的日本，自然成为最理想的中途停靠站。加之 19 世纪初期以来，美国远洋捕鲸船的活动范围也扩大到日本环太平洋一侧的近海。为美国捕鲸船提供避风港和生活用品的补充，以及对日本市场的渴望，也成为美国打开日本国门的推动力。

先于美国频繁出没于日本近海的英、法、俄等国为争夺中近东地区的霸权，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尖锐对立，英法支持土耳其，大战在即。1853 年 10 月，土耳其与俄国在多瑙河地区、黑海沿岸和高加索展开激战。英法等国加入俄土战争，战火迅速波及黑海、波罗的海、白海和堪察加半岛东岸。1854 年 9 月，双方在克里米亚半岛进行决战，英法联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取得决定性胜利。1856 年 3 月，俄国战败，被迫与英、法、土等国订立《巴黎和约》，俄国舰队撤出黑海，俄军拆除黑海沿岸炮台要塞，并将南萨拉比亚割让给土耳其和摩尔达维亚。在历时 3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俄等国

陷入厮杀而暂时放松了对锁国日本的冲击。于是，敲开日本国门的历史角色遂由急欲向东亚扩张的美国来扮演。

1846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比德尔准将远航日本，抵达浦贺，递交了总统波尔克致幕府将军的亲笔信，要求日本开国通商，被幕府婉言拒绝。1848年，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成员巴特勒向国会提交报告，强调要使美国在对华输入棉花及棉纺织品的竞争中挫败英国，必须尽早开辟从旧金山到上海、广州的航线。1851年，美国总统菲尔莫尔再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奥利克为使节，率舰队前往日本。鉴于比德尔舰队和平协商、无功而返的教训，此次特意将蒸汽军舰编入舰队，增加对日施加军事压力的分量。由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普利茅斯”号、“萨拉托加”号组成的奥利克舰队千里迢迢绕过大西洋、印度洋，抵达香港，却因各舰长意气用事、内部争执不和而滞足中国南海，无法继续北上。1852年11月，奥利克被解除职务，改派美国国家邮船总监、海军准将佩里为舰队司令和总统特使，赶往中国。

马修·卡尔伯莱斯·佩里（Perry, Matthew Calbraith），1794年生于美国捕鲸业发达地区罗德岛州的海军世家。捕鲸业所特有的远航外洋、出没波涛的职业特点和海军军官家庭的不避风浪之险、为国建功立业的精神，形成佩里成长的独特环境，使之具备了漂洋过海、在海上施展抱负的气质。与此同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业革命不断推出诸如纺织机、火车、轮船等新锐机械和交通工具。如同任何时代的最新技术总是被军事部门迅速采用一样，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型军舰在欧美各国先后下水，从而为佩里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还是在19世纪30年代，佩里就敏锐地看出蒸汽机军舰的威力，极力倡导用蒸汽机装备军舰，以取代过时的风帆。1837年佩里踌躇满志地出任美国海军第一艘蒸汽机军舰“富尔敦二世”号舰长，赢得“美国蒸汽机军舰之父”的称誉。在历任海军学院院长、海军工厂长官等要职后，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期间，佩里出任墨西哥湾舰队司令，与副司令奥利克指挥舰队，为美国劫夺墨西哥领土立下汗马功劳。一时间，愈加成为军界、商界和产业界一致看好的人物，被选定为撞击日本锁国大门的最佳人选。

1852年3月，佩里出任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同年11月初，代理国务卿孔拉德和海军部长肯尼迪向即将启程赴日的特使佩里下达训令，强调美国对日交涉若无绝对优势的武力为后盾，必然劳师而无益；规定佩里赴日所要达成的3个目标是：在日本取得避风港，取得补充品和维修船舶的场所，取得贸易口岸。身兼东印度舰队司令和赴日特使的佩里对此心领神会，同月24日乘军舰“密西西比”号驶离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港，踏上征程。同年12月，抵达大西洋马德拉岛的佩里致信肯尼迪，谈论东亚形势、迫使日本开国和为此应采取的手段，认为“美国人的荣誉要求与日本建立邦交，为了美国的贸易利益，也必须这样做。看到在东亚的海上强敌英国，看到其军港源源不断地迅速增加，痛感必须推进我国的政策”，强调“英国已在东印度和中国沿海占据险要地点”，“幸运的是，这个‘吞并’政府尚未染指日本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因此合众国应采取积极政策，不失时机地在国运所系的贸易航线上，取得足够的避风港”，应首先占据琉球群岛的主要港口，取得立足点，随即要求日本提供避风港和给水港。如果日本拒绝上述要求，“如果不动武或流血则不能实现这些要求，我国舰队应立即夺取日本南方一两个岛内的良港，在便于取得淡水和粮食之处建立基地”，“为我国军舰提供补

充，并为各国商船提供安全”。在这封信中，佩里明白不过地表明了不惜动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迫使日本开国的决心。

1853年4月7日，经历横渡大西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长达137天的长途跋涉，佩里抵达香港，与停泊在此一年有余的奥利克舰队会合。待舰队指挥权交接完毕，5月26日，佩里率舰北上，驶入上海补充给养。随后直奔琉球国首府首里，会见琉球王，要求建立友好关系，并展示兵威。6月14日，佩里率“萨斯奎汉那”号和“萨拉托加”号前往小笠原群岛，在父岛的二见港设立仓库和贮煤场。7月2日，佩里下达命令，以旗舰“萨斯奎汉那”号为首的美国舰队，离开首里，直趋江户湾。

7月8日，佩里舰队出现在扼守江户湾要冲的浦贺近海。警卫海岸的官兵被突然逼近的黑色巨舰吓得目瞪口呆，一边紧张地注视着浓烟翻滚、炮口骇人的庞大怪物，一边派人向浦贺奉行所报告。奉行所值班人员与力（下级警官）中岛三郎助和荷兰语译员堀达之助带上几名士兵，急忙摇船驶向美国舰队。佩里让中岛和堀等攀上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指派副官廉悌与冒称是“浦贺副总督”的中岛谈判，本人则坐在舰长室中等待交涉结果。次日，疑虑重重的浦贺奉行仍不出面，指派另一个与力香山荣左卫门冒充“浦贺总督”登舰与美方接触，暗中窥测、了解其来意。这一次，佩里派“萨斯奎汉那”号舰长布哈南和参谋官亚当斯出面接待香山，说明舰队来日本的目的是递交总统菲尔莫尔签署的国书，要求确定递交仪式的地点。与此同时，在舰队的武装掩护下，测量人员毫无顾忌地探测江户湾沿岸水深，意在摸清航道，向幕府施加压力。连日来，美国舰队“黑船”的举动搅得幕府惊恐不安，几番踌躇，被迫同意在浦贺附近的久里滨举行接受美国国书的仪式。浦贺奉行急忙开始搭设围帐，静候佩里一行前来。

7月14日，佩里以下300余名美国官兵全副武装，离舰乘划艇登陆。锁国以来，外国军人首次踏上日本本土。在军乐队的伴奏下，美军官兵行列整齐地行进着，59岁的佩里昂首挺胸走在最前面。离登陆地点不远处，4艘军舰一字排开，炮口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寒光。冒称“帝国首席顾问官”的浦贺奉行户田氏荣、井户弘道，率先前登舰交涉过的与力中岛、香山及译员堀达之助等躬身迎接。宾主进入帐内，随即在肃穆的气氛中举行短暂的国书交接仪式。美国总统在国书中建议双方建交并缔结通商条约；答应在5—10年内，若双方贸易无利可图，则可以中止贸易，恢复旧章；要求双方救助遇难的海员，幕府向途经日本港口的美国船只供应煤炭、淡水等。在国书交接仪式上，佩里还向户田等递交了他自己的亲笔信，以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方必须在第二年春天之前对国书作出答复，并警告说，届时前来日本的舰队必定是舰更大、炮更多。面对佩里的恫吓，户田等唯唯诺诺，只剩下恳请佩里舰队尽速驶离日本而已。

日方在“黑船”舰队武力威胁下，被迫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和佩里亲笔信。这一前所未有的进展，令佩里十分得意。为了给日本朝野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国书交接仪式结束后3天里，佩里指挥舰队逼近江户城近海，连续示威。城中的幕吏们张皇失措，不敢回宅休息。江户市内人言汹汹，一片混乱。人们纷纷携带细软，准备逃难。直到7月17日，佩里方下令舰队离开江户湾，向琉球驶去。在琉球，佩里以武力相威胁，迫使琉球王同意为美国船舰设贮煤场，出售物品。至此，佩里方心满意足地率舰队南下香港，伺机而动。

佩里舰队总算驶离了日本，却给幕府留下令其头痛的难题。是恪守祖法、

继续锁国？还是接受美国的要求、转而开国？在两种选择面前，老中阿部正弘等幕府要人焦虑万分，不知计之所出。出于万般无奈，只得变更幕府垄断外交、不许他人涉足的旧例，7月20日派特使赴京都，将佩里来日、要求开国的经纬上奏朝廷。8月5日，又将美国舰队来浦贺的经过通报诸藩大名，并征求如何答复美国总统国书的意见。8月7日，进一步向旗本以上的幕吏，武士征询意见，以广闻众策，作出决断。上述在外压下被迫采取的举动影响深远，将军集权的一面因此而走向衰落，大名分权乃至雄藩干政的一面日趋增强，天皇不得过问政治的规定在无形之中失效，幕府的一言堂被打破。

时隔不久，各方面关于对策的意见纷纷反馈回来，说长道短，莫衷一是。朝廷内部公卿们群情激愤，主张排除夷狄、维护国体的意见占上风。临朝听政的孝明天皇（1846—1867年在位）是位顽固的攘夷主义者，在他的支持下，朝廷愈加成为鼓动攘夷论的大本营。公卿们慷慨朝堂之余，也纷纷前往寺庙神社，乞求神佛显灵，攘除夷类，祷告神佛再降令元朝侵日舟师船毁人亡的“神风”。诸藩大名主战、主和兼而有之：越前藩大名松平庆永认为，与其屈服于外压开国、导致动乱而自招败亡，不如将军出马亲征，以武力驱逐外夷；萨摩藩大名岛津齐彬主张求和避战，在决战并无胜算的情况下，对美国施展拖延开国日期的战术，乘机加强防备；筑前藩大名黑田长传主张“以夷制夷”策，即在一定期限内，给美、俄两国荷兰出岛贸易式的待遇，结好美、俄、荷三国，抵制英、法等国的通商要求，使日本处于主动地位；其他各藩有的主张有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某些要求，而不应全盘接受，以维持半锁国状态；有的则拿不出任何建议，仅表态以幕府决定是从。幕臣们的意见大抵与藩主们的意见相同。面对来自大名和幕臣们的数百种建议和答复，阿部正弘等人无法明确做出判断，优柔寡断于和战之间而徒耗时日。

美国舰队到日本、欲使幕府接受国书的消息，引起沙皇俄国的高度警惕。1852年10月19日，俄国海军中将普提亚廷也率4艘军舰，驶离喀琅施塔得港，经波罗的海、北海，沿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北上印度洋、南中国海，跋涉10多月之后，恰好在佩里舰队离开日本一个月后，于1853年8月22日驶入长崎。普提亚廷带来了俄国首相耐赛鲁德写给老中的亲笔信，顽固地要求幕府接受信件。在佩里舰队冲击下，幕府老中们惊魂未定，加之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新死，内部不稳，遂在9月21日决定接受俄国首相的亲笔信。11月8日，任命大目付级别的西九留守居筒井政宪、勘定奉行川路圣漠等为接待俄使的“俄罗斯应接挂”，就两国通商和划定日俄北方国境问题，举行谈判。筒井、川路等秉承老中阿部正弘“以俄制美”的旨意，在谈判中屡示善意，强调日俄既为国境相接的邻国，日本自然会对俄国的要求另眼相看。普提亚廷则声称：一旦外国对日本动武，俄国将给予援助。

然而，日俄之间彼此拉拢、利用的谈判进行方旬余，11月23日，普提亚廷突然率舰队驶离长崎，直奔上海，幕府“以夷制夷”的策略受挫。普提亚廷之所以中止谈判、远避上海，是因为俄国与土耳其已在黑海开战，英法两国支持土耳其，远东战云变浓，不宜久滞长崎港。同时，还打算与佩里取得联系，俄美联合，共同对日本施加压力。为此，普提亚廷从吴淞口外致信佩里，建议双方在对日交涉中相互合作。佩里历来视俄国为竞争敌手，无意与俄国舰队采取联合行动。因此，普提亚廷的来信不仅得不到佩里的积极回应，反而催促佩里不待春天来临，便提前采取行动。

1854年2月13日，佩里享旗舰“波瓦坦”号、蒸汽动力舰“萨斯奎汉

那”号、“密西西比”号、武装帆船“默赛德尼安”号、“温哥华”号、运输船“南安普顿”号、“列克星敦”号等7艘舰船出现在江户湾小柴冲。随后，武装帆船“萨拉托加”号、运输船“萨布拉依”号也于3月先后赶来会合。9艘船体坚固庞大的舰船首尾相衔，排成炮口齐指海岸的战斗队形。舰队司令佩里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等待着缔约谈判的举行。

佩里舰队的再次到来，令幕府再度陷入慌乱。老中们接连下达命令，责成浦贺奉行所和夫八州的代官保证江户城的粮食等物资供应，并接连发布布告，禁止庶民参观“黑船”，以防不测。2月22日，命浦贺奉行所警卫队长“组头”黑川嘉兵卫与“波哈但”号舰长亚当斯交涉，确定接待地点问题。美方坚持接待地点应设在离江户较远的地方，否则就把舰队开进江户；日方则竭力希望在距江户较远的浦贺、久里滨或镰仓。再三交涉之后，日方迫于美方的军事压力，同意在江户附近的横滨（神奈川）设立接待所，在此举行正式的交涉。3月4日，幕府确立交涉方针，即同意保护遇难船员，向过境美国船只提供煤炭、淡水、粮食等物资，但拒绝订立通商条约。换言之，在《薪水令》的范围内，进行日美交涉。

3月8日，佩里率亚当斯以下约500名官兵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随即带领美方谈判人员步入临时搭成的接待厅。在这里，幕府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昌平黄主持人“大学头”林复斋及江户町奉行井户觉弘、目付鹈殿长锐、浦贺奉行伊泽政义等“美利坚应接挂”（即全权代表）早已守候多时。双方叙礼寒暄毕，停泊在横滨海岸的美国舰队大炮齐鸣。一刹那间，隆隆的炮声回荡在天海之间，震耳欲聋。这是佩里刻意为谈判准备的一手把戏：名义上为庆贺美军登陆、会谈开始，实则向日方炫耀军事力量。在双方谈判之初，佩里向林复斋等递交了用汉文写成的催促幕府缔约的信件、中美《望厦条约》的汉文副件和以该条约为蓝本的日美条约草案。其用意十分明白：幕府应当以《望厦条约》为样板，缔结日美条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佩里动用由9艘舰船、2000余名官兵组成的战斗力量，还特邀汉文翻译威廉斯及其秘书、中国人罗森同行，以便在拟定条约时斟字酌句。

幕府老中与奉行们花费一周的时间来研究美方的条约草案，并制定日方的条约草案。3月15日，将用汉文写成的7条草案送交佩里。草案坚持仍然以长崎为对美国船供应所需物资或移交遇难海员的惟一地点，规定美国人不得随意在长崎登陆，至于其他港口的开放，须待5年之后。幕府对缔约、开放港口的游移态度引起佩里的不满。在双方互提条约草案期间，佩里不断给日方写信，强调仅仅救护遇难船员或提供物资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必须开放长崎以外的港口并立即与美国订立条约。在谈判桌外，荷枪实弹的美军官兵在横滨海岸登陆，恣意闯入民家、商店，活动半径扩大到川崎驿站附近。停泊在海面上的舰队也处于战备状态，漂游不定，使幕府警各部队神经紧张。3月27日，佩里特意盛情邀请日方代表登舰参观，届时又命鸣放礼炮，让日本官员亲身体会美国军事装备的威力。总之，动用了除直接动武以外的各种威胁手段，逼迫幕府接受美方的要求。

佩里施压终于收到效果。1854年3月31日，双方订立用英、日、汉、荷兰4种语言写成的《日美修好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两港；日本保证向途经开放口岸的美国船舰提供煤炭、淡水、粮食及其他所需物资；日本有义务援救遭遇海难的美国船只及人员；同意在18个月内美国外交官进驻下田；日本给美国最惠国待遇等。《日美修好条约》的订立地点

为神奈川，故亦称《神奈川条约》。该条约虽无自由航海通商的条款，但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已为订立日美通商条约预作铺垫；尤其是下田、箱馆两口岸的开放，一举突破了以长崎为惟一对外联系港口的锁国旧体制，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佩里叩关达到了预期目标。

幕府被迫订立的《神奈川条约》，是日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相距悬殊的产物。缔约谈判期间，双方互赠礼品的过程，生动地表明了上述差距：美国向日本不仅赠送了先进的农具和优良的蔬菜、粮食品种，而且赠送了欧美最新的工业制品，如电报机、钟表、望远镜、纺织品、蒸汽火车模型和大炮。蒸汽火车模型相当实物的 2/3 大小，时速达每小时 32 公里。随佩里来日的技术人员专门在神奈川铺设铁轨，升火开动。面对汽笛呜呜、车轮飞滚的蒸汽客车，围观的幕府官吏看得目瞪口呆。而那门从“萨拉托加”号军舰拆下、作为特别礼物赠给日本的大炮，更令幕府官吏们惊叹不已。相形之下，日本回赠的礼品不过是大米、白酒、纸扇、漆器等农产品和传统手工制品。此外，数十名膀大腰圆、肥壮如牛的相扑演员搬运大米包的表演以及相互间的角力搏击，虽赢得美国官兵的惊叹，但毕竟是难敌枪炮子弹的蛮勇竞技。

《神奈川条约》订立后，美国船舰陆续驶出江户湾。4 月 18 日，佩里乘坐旗舰“波瓦坦”号前往下田和箱馆视察，军舰“密西西比”号随行护航。6 月 20 日在下田，由佩里和林复斋签署了《神奈川条约》的附属条约《下田条约》，规定了下田开港的细则，其中包括在下田划出方圆 7 日里、在箱馆划出方圆 5 日里的驻日使馆人员的散步区。双方缔约以英、日两种文字为正式闲语，条约译本则用荷兰语。6 月 28 日，佩里率舰队离开下田，直赴琉球首里，7 月 11 日，订立《琉美协约》，将琉球变为美国横渡太平洋的中转站、避风港和物资供应基地。

《神奈川条约》订立的前 3 天，1854 年 3 月 28 日，英法两国对俄宣战，俄土战争升级为多国卷入的克里米亚战争，远东成为英俄交战的新战区。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斯特林少将率舰队追击普提亚廷舰队，迫使其远遁彼得湾以免被歼。同年 9 月 7 日，斯特林率旗舰“温切斯特”号以下 4 艘军舰，为搜索、攻击逃匿的俄国舰队而闯入长崎港。在与长崎奉行水野忠德的交涉过程中，斯特林要求日本保持中立，不妨同样拒绝向英俄交战双方提供维修船舶的便利或补充给养。但担任翻译的译员乙吉英语水平太低，竟误译为英方要求给予维修军舰并补充给养的权利。水野亦因错就错，以为斯特林提出了与佩里相同的要求，经请示幕府老中阿部正弘，10 月 14 日与斯特林订立《日英修好条约》，同意日本向英国开放长崎、箱馆两港，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承认英国指挥官有处理登陆官兵犯罪者的权利，实际上等于承认了英国在日的领事裁判权。《日英修好条约》使英国轻而易举地获得对日殖民权益，斯特林喜出望外，英国外交部也愉快地迅速批准了因日方人员失误而订立的条约。

斯特林舰队带着意外的收获离日 20 天后，11 月 8 日，普提亚廷舰队驶入大阪湾的天保山近海下锚驻扎，要求立即举行缔约谈判。俄国舰队停泊在京都附近海边的消息，令日本举国震动。幕府急忙派筒井政宪、川路圣漠等“俄罗斯应接挂”前来与普提亚廷谈判。俄国舰队移至下田，12 月 22 日双方举行正式谈判。次日，下田一带忽遭 8.4 级大地震的袭击，大海啸同时发生，普提亚廷乘坐的 2000 吨帆船“黛安娜”号被风浪掀翻击毁。谈判一时中断，不久重新开始。1855 年 2 月 7 日，双方订立《日俄修好条约》。规定

日本向俄国开放箱馆、下田、长崎 3 港；给予俄国最惠国待遇；双方相互承认领事裁判权；在划定北方国界方面，双方同意库页岛维持现状，千岛群岛以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为界，择捉岛归日本，得抚岛以北的千岛群岛归俄国。通过这项条约，俄国取得得抚岛以北的日本固有领土千岛群岛，并首次将领事裁判权载入条约正式文本，日本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作为缔约谈判之外的一个收获，是日本工匠在伊豆西岸君泽郡户田为俄使造新船的过程中，学到制造大型船舶龙骨技术。3 个多月后，仿造出 100 吨的君泽型双桅帆船，迈出了近代造船业的第一步。

日本先后与美、英、俄等国谈判缔约的动向，使得与幕府保持了 200 余年联系的荷兰焦躁不安。早在 1852 年佩里舰队来日本之前，新任驻长崎出岛的商馆馆长裘尔西斯就奉国王之命，预报美国舰队将来日本闯关的消息，建议日荷抢先订立条约，以便对付佩里，被幕府拒绝。美、英、俄与日本缔约后，幕府无法拒绝荷兰，只得在 1856 年 1 月 30 日订立《日荷修好条约》，使荷兰均沾美、英、俄 3 国对日权益，并同时废除了锁国以来幕府对出岛荷兰商馆的各种限制。从此，荷兰人终于迈出了出岛狭窄的小天地，日荷两国建立了近代的邦交关系。

哈里斯赴日

根据日美《神奈川条约》的规定，1856 年 8 月 21 日，首届美国驻日总领事顿赛德·哈里斯（Harris, Townsend, 1804—1878 年）乘军舰“圣加辛特”号驶入下田港。下田奉行忙禀报幕府，幕府出于无奈，只得接受哈里斯来日，并同意其居住在下田郊外柿崎的玉泉寺。9 月 4 日，哈里斯主持了开馆升旗仪式，成为第一个驻日本的外国使节。在当天书写的日记中，哈里斯记述道。

由于兴奋和蚊虫的袭扰，只睡着了一会儿——日本的蚊子个头不小。上午 7 时，水兵们扛着旗杆登陆。艰苦的工作，进展不顺利的作业，圆杆跌落，横梁折断，幸好无人受伤。在舰上人员的协助下，终于把旗杆竖立起来。水兵们围绕旗杆列成圆形队列。当天下午 2 时 30 分，我升起了在日本帝国未曾见过的“第一面领事旗”。严肃的反思——巨变的前兆——新时代毫无疑问地开始了。

哈里斯颇以亲手升起星条旗而自豪，同时也因将亲手开创一个新时代而兴奋。与佩里动用军事威胁手段、以船坚炮利迫使日本开国缔约、取得向日本扩张殖民权益有所不同，哈里斯决心凭三寸不烂之舌，利用东亚紧张的国际形势，背靠美国优于日本的国力，达到缔结日美通商条约、进一步巩固和攫取殖民特权的目的。

哈里斯出身纽约的陶瓷品输入商家家庭，耳闻目染，养成既擅长争利于市、又敢于冒险大洋之外的美利坚商人习性。40 岁时家道中落，陶瓷贸易行倒闭。哈里斯不甘冷落，又到一艘货船上跑起单帮来。数年间来往于远东各地，倒增长了不少对中国、印度、日本的了解。但商海沉浮，终不见飞黄腾达的前景，哈里斯转而从政，1854 年出任美国驻中国宁波的领事。任职不久，难耐这一闲职的寂寞，于是辞职回国，再寻出入头地的其他机会。此时，正值美国政府讨论驻日总领事人选，哈里斯急欲谋得该职，遂在纽约商界中挖门

〔日〕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日本历史》第 19 卷），中央公论社 1966 年版，第 72 页。

子、拉关系，以至求到佩里门下，恳请推荐。多方奔走的哈里斯终于如愿以偿，1855年彼美国政府任命为首届驻日总领事。

哈里斯升旗开领事馆1个多月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决心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取得更多殖民权益的英国和法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和传教士被杀，组成联军进攻中国。战火再次在日本的邻国燃起，幕府当局胆战心惊，十分害怕战祸东移。哈里斯摸清了幕府上下的避战心态，乘机开展外交攻势，对下田奉行软硬兼施，要求订立新条约。1857年6月17日，双方订立《日美协约》（《下田协约》），规定日本向美国开放长崎港，同意向箱馆派驻副领事，允许美国人居住在长崎、箱馆；取消开放口岸美国人员散步区的限制；准许日美金银币可同种同量交换；给美国以片面的领事裁判权等，增加了日美条约关系中的不平等成分。

《下田协约》的订立，为最终订立日美通商条约开辟了道路。哈里斯看透了幕府妥协迟让的虚弱本质，决心抓住时机，扩大外交成果。于是，借口要向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面交美国总统庇亚斯的亲笔信，要求前往江户城。正当幕府为是否破天荒地到江户接待欧美国使节而头痛不已之时，荷兰和俄国不约而同地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继《下田协约》后，另订日荷、日俄新约。幕府穷于应付，焦头烂额，只得于1857年10月16日和10月24日，分别与荷兰、俄国签订《日荷追加条约》和《日俄追加条约》。日本被迫趋向认同自由贸易原则，承认在长崎、箱馆的贸易量不受任何限制，承认旅居日本的外国人信教自由。哈里斯冷眼旁观日荷、日俄之间的谈判与缔约，既为缔结日美通商条约的时机日见成熟而高兴，也为荷、俄两国的竞争而担忧，于是更加起劲地要求前往江户。几经交涉，幕府同意了哈里斯的要求。

1857年11月23日，哈里斯启程前往江户，随同人员有美籍荷兰人译员修斯凯等。下田奉行派属吏菊名仙之丞带持枪武士、轿夫、脚夫，护送哈里斯一行上路。哈里斯乘坐轿子，如同参观交代的大名一样，享尽风光。行至重要关卡箱根时，哈里斯拒绝接受守备人员的检查，招摇过关。一路上，哈里斯还特别留心观察神奈川等良港，盘算着如何以新口岸代替地处偏僻之乡、交通不便的下田港。经过7天的长途跋涉，11月30日，哈里斯一行进入江户，被迎入九段坂下著书调所的宿舍中安歇。在当天的日记中，哈里斯不无得意地写道：

今天是我进入江户的日子。此行乃我的人生旅途中极为重要的阶段，在日本历史上将成为

最重大的新纪元。我——哈里斯，是在江户城受到欢迎的第一位外交代表。

同年12月4日，幕府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会见哈里斯，协商拜会将军事宜。12月7日，哈里斯和修斯凯在幕吏引导下，携带美国总统的亲笔信和礼物，进入将军居城，会见德川家定。在例行的问候致辞、赠送礼物和相互交谈过程中，身染异病的将军家定虽心情很好，言语清楚，但在交谈的短暂沉默时刻，将军好几次莫名其妙地把头扭向左后方，连连蹬踏右脚，姿态奇异，大失风度。相形之下，哈里斯始终保持着尊严，进退有度，并郑重其事地呈交了要求修改《神奈川条约》并另订日美通商条约的总统亲笔信。

次日，哈里斯声称有涉及日本切身利益的“重大情报”需要传达，要求会见堀田正睦。12月12日，哈里斯与修斯凯访问堀田官邸，对堀田等幕府要员发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在演说中，哈里斯危言耸听地大谈英国

即将进攻日本，向堀田等施以战争恫吓。哈里斯历数了英国对印度的武力征服、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的经过，预言征服狂英国人早已对《日英修好条约》不满，不久将派出由 50 艘蒸汽舰围攻日本，形势极其危险。哈里斯继而谈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法与俄国在远东的对立并未缓解。为对抗俄国，英国必占领台湾、库页岛和虾夷地，法国则试图谋取朝鲜。面对虎狼之贪的英法两国，为日本计，幕府应尽快与奉行和平方针的美国订立通商条约，强调缔约的 3 项原则是派驻公使、自由贸易和增开港口。他声称待日美缔约，其他列强自然以此为准、与日本订立条约。这样，以和平谈判方式缔结的日美通商条约将成为日本安全的屏障。为说服幕府同意自由贸易、再辟新港、进驻公使，哈里斯颠倒黑白，硬说印度之所以亡国，是因为它未与欧美国家订立条约；中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拒绝外国向北京派驻使节，日本应引以为戒。

哈里斯的长篇演说，令堀田等如坐针毡。虽说演说内容并无任何重大机密，但日本面临的形势确实严重。待哈里斯落座饮茶时，堀田表示十分感谢美领事的详细报告，但缔结通商条约事关重大，必须容些时日，与有关方面协商，再作答复。12 月 16 日，堀田将美国总统亲笔信和哈里斯演说的要点通报御三家等诸藩大名，征询意见。不久，幕府收到 23 份答复意见书，除 6 份意见书明确表示拒绝缔结通商条约外，其他意见书或持积极立场、或迫于无奈，均主张缔约求和，防止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延烧到日本。堀田等人暗中松了一口气，筹划如何答复哈里斯。

在发表演说后的近 1 个月内，每天在蕃书调所宿舍中等待消息的哈里斯越来越不耐烦。1958 年 1 月 8 日，哈里斯紧急约见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指责幕府如此迟迟不作答复，是对美国总统的侮辱，困坐宿舍不啻软禁。如果幕府不尽快举行缔约谈判，就立即返回下田，让大炮和军舰出来对话！哈里斯终于丢掉彬彬有礼的外交客套，搬出炮舰政策来施加压力。实际上，美国在远东的舰队全部被调往中国沿海，或用来保护侨民，或策援英法对中国的侵略，哈里斯无法调动任何一艘军舰。然而，对海外情报知之不多且过迟的幕府却被哈里斯的虚声恫吓制服。1 月 14 日，堀田会见哈里斯，表示立即开始缔约谈判。随后，幕府任命参加过日荷、日俄追加条约谈判的目付岩濑忠震与井上清直为日美谈判的全权代表，准备与哈里斯展开交涉。

1 月 25 日至 2 月 25 日，双方以哈里斯早已译成荷兰文的通商条约草案和贸易章程草案为基础，先后举行了 13 次争论激烈的谈判。争论围绕承认自由贸易原则、开港地数目、公使进驻江户以及开港地外国侨民的居留地、外交豁免权等问题展开。以缔结通商条约为最大使命的哈里斯，将自由贸易原则视为缔约谈判中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竭尽全力突破幕府掌管外贸的会所贸易限制，终于达到目的。同时，又利用日方谈判代表对国际法的无知，将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制、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构成不平等条约基础的内容塞进条约草案，催促日方认可，轻而易举地在谈判桌上取得英法动用刀兵方在中国劫得的殖民特权。对于日方代表因循古代从中国进口铜币并在国内自由流通的惯例，主张内外货币自由输出入，甚至在日本国内自由流通外国货币等自损国家主权的失误，哈里斯佯装不知，笑纳这些送上门来的意外收获。

谈判结束后，堀田正睦为堵住缔约反对派之口，特请将军出面召集大名，

解释缔约谈判经过，并准备动身赴京都，亲自请求天皇对条约的敕许。为此，堀田请求哈里斯同意两个月后举行签约仪式。对此，哈里斯欣然允诺，动身返回下田，调养操劳过度、染上重病的身體。

同年4月18日，哈里斯再次抵江户，等待签署条约。6月1日，请求条约敕许、却被天皇驳回的堀田正睦回到江户。6月4日，因第13代将军继嗣问题而成为堀田政敌的彦根藩大名并伊直弼出任大老，更使首席老中堀田灰心丧气，再也打不起精神来主动对美交涉。

所谓将军继嗣问题导源于亲藩、谱代乃至外样大名之间的权力之争。1853年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任职后，恰逢佩里叩关、哈里斯来日、列强威逼日本的多事之秋。国难当头，急需一位铁腕将军来掌握全局。然而，家定身体虚弱得坐也坐不稳，又无子嗣，只得从拥有推选继任将军特权的御三家或御三卿等德川家族中选任第14代将军，按照惯例，选任将军本来是德川氏的“家事”，不容外姓大名置喙。然而，随着在开国问题上雄藩逐渐拥有发言权，选往指挥诸路大名的征夷大将军，也成为雄藩大名发表意见的“公事”。在继任将军的具体人选上，彦根藩藩主并伊直弼、纪伊藩新宫城主水野忠央等幕政独裁派坚持血缘首位论，极力推举家定的表兄弟、年方8岁的纪伊藩藩主德川庆福（后改名家茂），被称作南纪派；越前藩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等幕政公论派则拥立年满17岁、聪明而颇罕人望的德川（亦姓一桥）庆喜，被称作一桥派。在对外交涉中涌现出来的开国论幕吏川路圣谟、岩濑忠震、堀田正睦等支持一桥派。刚愎自用的并伊出任大老后，利用职权游说家定并联络亲藩、谱代大名，确定德川庆福为第14代将军，接着便将川路等降级左迁，打击堀田重用的幕吏，削弱了堀田与哈里斯对阵的实力。加之天皇朝廷拒绝敕许缔约，堀田左右为难，一再要求哈里斯体谅幕府当局等待天皇敕许的难处，推迟签署条约。

哈里斯看出堀田一时难脱窘境，无意徒耗时日，在6月上旬的3次会谈中催逼堀田表态。他扬言：幕府当局如此固执地等待敕许，表明日本真正的主权在朝廷；然而，幕府将军冒充日本国家的主权人接受美国总统的亲笔信，简直是对合众国的欺诈行为；因此，若主权在朝廷，本人将前往京都再行交涉；当然，凶暴的英法两国也会直奔京都。哈里斯这番否认幕府外交权的言论，震动了幕府当局，老中们被迫联名画押，提出立即签约的保证书。哈里斯这才同意签约延期至9月4日，并悻悻然地离开江户、重返下田总领事馆，加紧策划新的行动。

同年7月23日，美国军舰“密西西比”号突然驶入下田港。两天后，佩里第二次叩关乘坐过的旗舰“波瓦坦”号也循踪而来。两艘战舰的到来既增加了哈里斯开展外交的军事实力，使其兴奋不已，同时也带来了令其不安的消息，即英法两国已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条约》，极有可能从中国战场腾出手来，派遣舰队前来日本，与美国展开对日缔约的实力竞争。于是，哈里斯自食其言，不等签约延期期满，立即行动起来。7月27日，他乘“波瓦坦”号驶入江户湾小柴冲海面。28日夜，哈里斯约请岩濑忠震登舰面谈。竭力描述日本大难临头的可怕情景，提出以立即签署日美通商条约为条件，美国愿意在英法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出面斡旋。一席话说得岩濑心惊肉跳，下定签约的决心，并说服持签约延期论立场的大老并伊直弼，同意不待天皇敕许，为避免战祸而立即签约。

1858年7月29日，日方代表井上、岩濑登上停泊在小柴冲的“波瓦坦”

号，与哈里斯等共同出席签约仪式，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和《日美贸易章程》。日本同意美国向江户派驻公使、向开港地派驻领事，美国驻日外交使节在履行公务时，可在日本内地旅行；继续开放或增加开放神奈川、长崎、箱馆、新潟、兵庫等 5 港，神奈川开港半年后，封闭下田港，另辟江户、大阪为商埠；在开港、开埠地，设置美国公民自由出入、享有居住权、货屋租赁权和基督教自由信仰权的居留地，形同列强在中国设置的租界；尊重自由贸易的原则，即双方国家的民间贸易不受任何限制，自行交易，日本官员不得干涉；对输出商品实行协定关税率，日本对美国输出品关税率均从价 5%，美国对日本输出品关税率为免税、5%、20—35%不等，日本无权自主确定关税率；外国货币可在日本国内自由流通，内外货币可同种等量交换，铸币和当地金银可免税输出入；美国驻日使节拥有领事裁判权；日本若与欧洲国家发生争端时，美国可应日本请求并作为委托人、居中斡旋调停；条约有效期为 14 年，届时可改订新约等。

列强得知《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纷纷前来分沾利益，与幕府订立条约。1858 年 8 月 18 日，滞足江户的荷兰理事官克尔裘斯与幕府订立《日荷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及《贸易章程》；同月 19 日，率先迫使中国订立《天津条约》的俄使普提亚廷乘舰来日本，与幕府订立《日俄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8 月 13 日，英国舰队司令额尔金率舰队驶入江户湾，8 月 26 日以《中英天津条约》和《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为蓝本，迫使幕府订立《日英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8 月 19 日，法国舰队司令格罗男爵率军舰驶入品川近海炫耀兵威，10 月 9 日与幕府订立《日法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

1858 年 7 月 29 日至 10 月 9 日，70 余天中，美、荷、俄、英、法等 5 国先后与日本订立了通商条约，取得自由贸易权、关税率协议权、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殖民特权，日本则在贸易、关税、司法等方面丧失国家主权，濒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边缘，处于被欧美列强压迫的从属地位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1858 年，时值日本年号的安政 5 年，日本与上述欧美 5 列强订立的条约亦称“安政五国条约”。以这些条约的签订为标志，长达 200 余年的锁国体制基本崩溃，日本进入危机四伏、前途未卜的动荡时期。

日本开国不仅是宣告日本近代史肇始的大事件，而且也是东亚地区的历史进程汇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一环。从此，日本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来说，日本开国另有一番意义。马克思曾就此作过精辟的分析和概括。1858 年 10 月 8 日，即“安政五国条约”陆续订立的重要时刻，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

挑战与机遇

〔德〕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 年 10 月 8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9 月版，第 348 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列强对东亚诸国殖民征服的压力有增无减，西北太平洋从此不再太平，幕府的锁国体制面临巨大挑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佩里舰队叩关于先，哈里斯挟英法战胜中国之余威、迫使幕府订立条约于后，欧美列强接踵而至，将一项项下平等条约套在日本的头上。日本丧失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面临着关乎生死的最严重的挑战。

机遇与挑战俱来。由于地理条件的得天独厚，地处日本西方的中国成为阻挡欧美列强自西而东、从南至北冲击日本的屏障；也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吸引了为开拓世界市场、蜂拥而来的欧美资产阶级的注意力，无形中减缓了对日本施压的严重程度。结果，在西力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成了日本预警装置，使之得以从中国事变中汲取教训，寻求对付外压的相应措施。加之中国的多次武力抵抗、印度的民族大起义，以及列强间的争夺与矛盾或国内改革乃至国内战争的频发，阻滞了列强控制日本的速度和势头，在客观上为日本提供了回旋余地，使之赢得求生存、谋变革的宝贵时机。幕藩领主在 1853 年佩里首次叩关的第二年，先后开始了安政年间（1855—1860 年）的改革。改革以加强军备和了解世界为中心，一时颇有声势。

作为幕府安政改革的先声，1853 年 8 月，幕府命令水户藩前藩主德川齐昭参与有关海防的幕政，齐昭随即提出加强海防的 10 条建议。同月，幕府免除诸藩修建江户城将军居所西丸的工程费，用以充实武备，又在江户汤岛开设铸炮场。9 月，幕府责成长崎奉行与荷兰商馆联系，委托馆长采购军舰、枪炮和军事著作；10 月，幕府取消诸藩建造大船禁令；11 月，幕府在浦贺修建造船所；12 月，幕府采纳德川齐昭的意见，发布《海防大号令》，同时下令规范船舶、枪炮名称及操作用语，禁止使用洋语、洋字。1854 年 1 月，幕府命中滨万次郎翻译外交文书，将隅田川河口的石川岛划为造船所建筑用地，委托水户藩负责工程及运营，同月动工建造洋式木制帆船“旭日”号。3 月，幕府督促负责江户湾警备的熊本藩等 5 藩建造大船。6 月，在浦贺造船所建造的第一艘洋式帆船“凤凰”号下水；同月，幕府命令江户町民捐款，以加强海防，维修皇居。7 月，幕府宣布松前藩领地箱馆及附近地区为幕府直辖地区，增设箱馆奉行，加强管理；同月，马力 150、炮 6 门、吨位为 400 吨的荷兰军舰“逊宾”号驶入长崎港，幕府随即以此舰为教练舰，改名“观光”号，派员学习洋式造船航海技术。8 月，幕府宣布以白地红日的日章旗为日本船舰的标志旗。

1855 年 1 月 14 日，建元安政，幕府以更大的规模，加紧改革。在对外方针上，自 1854 年先后与美、英、俄等国订立“修好条约”后，幕府不再沉面于开国或锁国的犹豫之中，日益明确地选择了果断的开国方针。1855 年 11 月，幕府任命积极主张开国的“兰癖”（即“兰学迷”）——佐仓藩藩主堀田正睦为首席老中，次年复命堀田为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取扱”，一如外相。在堀田主持下，迅速形成开明的官僚集团，主要成员包括勘定奉行松平近直、川路圣谟、水野忠德，大目付迹部良弼、土岐赖旨，若年寄本多忠德，目付岩濑忠震、大久保忠宽等。其中，多数为 1845 年设立的主管外交与海防的新机构“海岸防御挂”（“海防挂”）的成员。在他们主事期间，幕府的外交很快摆脱被动局面，在加强海防、建设近代洋式海军和了解外界等方面，迈出积极步伐。1855 年 3 月议创洋学所，10 月正式成立这一负责翻译、讲授西洋著作或外交文书的新机构，1857 年 2 月改称蕃书调所，招收幕臣子弟加以培训。在上述机构中，集中了各藩富有朝气的优秀洋学者，如津山藩武

上箕作阮甫和津田真道、小滨藩武士杉田成卿、萨摩藩武士寺岛宗则、津和野藩武士西周、长州藩医师大村益次郎等。这批人不仅在幕末力倡西洋近代科学，许多人还成为明治初年文明开化乃至对外交涉的佼佼者。

洋学所成立不久，1855年12月幕府又在长崎创办海军传习所，聘请“逊宾”号的军官、轮机师、水手传授近代海军技术，选拔幕臣、诸藩武士中的俊良之才，集中到海军传习所学习，培养了胜海舟、榎本武扬、五代友厚、川村纯义、佐野常民、中牟田仓之助等一批近代军事、商贸人才，奠定了日本近代海军的基础。

在加快培养人才的同时，欧美式军备建设也在加紧进行。1855年1月，幕府在江户城的铁炮洲、一桥门外等处设置6所军事训练场讲武场，推广洋式操练和炮术；8月，幕府命令旗本、大名学习采用洋式枪手作战阵法，并在江户汤岛铸炮场制造洋式枪械，以满足洋枪队装备的需要。1856年5月，幕府老中堀田正睦等亲临江户驹场的校兵场，检阅江川英敏指挥的洋枪队，以示对欧美式新军的重视。1857年4月，幕府命矢田堀景藏率海军传习所传习生，乘“观光”号自长崎抵达江户湾品川，实现了日本人驾驶洋式军舰的首次远航；9月，聘请以卡廷德盖为首的第二批荷兰海军传习教官团来日本，教官团乘坐的军舰“雅班”号，为幕府在荷兰定购的军舰，后改名“咸临”号，成为第一艘横渡太平洋、远航美国的日本军舰。1859年7月，幕府发布命令，允许诸藩大名、旗本、武士等前往开放口岸购买洋式军火。

开国后，幕府还逐步修改支撑锁国体制的禁止天主教方针，竭力避免与欧美列强发生宗教冲突。1858年2月，长崎奉行奉命发布通告，宣布自次年春季起停止执行传统的甄别天主教教徒的“踏绘”；1859年，法国传教士吉拉尔以驻日总领事译员的身分进入江户，开锁国以来传教士首次步入江户城的先例，幕府对此予以接受；同年10月，美国长老会派传教士海本夫妇乘船到神奈川，顺利登陆入国；随后，美国改革派教会传教士布拉温、西门子等纷纷于11月抵达神奈川，同月传教士麦尔迈在函馆建立锁国后的第一座临时教堂。至此，禁教已形同虚设。

从1853年佩里首航日本，至1858年“安政五国条约”签订，前后不过5年。短短的5年期间，幕府安政改革的洋务之风劲吹东风，新奇事物层出不穷。在军备种类、水平以及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把握等方面，日本与欧美诸国的距离大大缩短。尽管幕府在欧美列强的武力威胁面前一再退让，然而在采西学、师洋技、造舰铸炮、练兵自强等洋务新政的实施中，阿部、堀田们却表现出相当开明的态度，颇值得赞许。为筹措筑垒、铸炮、造舰和组建洋式陆海军等的军费，幕府多次命令江户、大阪的町人捐款，并通过改铸货币增加幕府财政收入。即使如此，仍无法凑足必需的经费，许多工程、如品川的第四座炮台即因缺乏经费而半途停工。天保年以来的财政赤字有增无减，经费困难造成幕府的安政改革迟缓而乏力。

在幕府推行安政改革的同时，诸藩也在进行改革。诸藩的安政改革涉及军制、军备、财政、农政、民政等多方面，比侧重军事方面的幕府安政改革更具活力。在长州藩，继村田清风之后主政的周布政之助，顺应藩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推行调动商民积极性的各项措施；采用洋式军制、学习洋式海军技术、构筑炮台、铸造洋式枪炮、建造洋式船舰；振兴洋学、搜集有关世界形势的情报、刊印世界地理、国情和军事著作，鼓励藩士研修学习。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大胆、积极地启用人才，破除门第束缚，使那些从前在

主君面前三缄其口的下级武士们取得发言权，得以对藩政发表意见，从而为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时代风云儿的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萨摩藩，在锁国时代与琉球有密切联系，因而对欧美列强威压日本和琉球反应强烈；加之与长崎同处九州，较易从长崎摄取兰学等西洋文化。因此，当相对开明的岛津齐彬出任藩主后，萨摩藩的安政改革颇有气势。1857年7、8月间，岛津齐彬在鹿儿岛开集成馆，馆内设熔铁炉、玻璃场、陶瓷场，采甲西洋机械，有各类员工1200余人。次年，荷兰教官团首席教官卡廷德盖前来参观，对集成馆内巨大的炼铁场、制造炮身用的穿孔盘乃至仿制的电信机、洋式枪炮、美国式农具、蒸汽船等印象深刻，认为萨摩藩主具有相当旺盛的策划精力与才能，与长州相似，在推行洋务过程中，小松带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家臣武士乘启用人才的风气崭露头角，成为萨摩藩安政改革以及游说京都朝廷的活跃人物。

在土佐藩，1850年有名君称誉的山内丰信出任藩主，排斥藩内保守的门阀势力，重用改革派人物吉田东洋，推行以铸炮造船、采用洋式炮术。力倡洋学的藩政改革。在吉田的提携下，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一批俊秀之才涉足藩政，并由此奠定日后腾跃政坛的基础。在水户藩，以藤田东湖为首的改革派们，顶住保守的门阀重臣势力的压力，坚持以加强海防为中心的藩政改革。在这一尊王攘夷的水户学之乡设立炼铁的反射炉，建造大船，试行洋式兵制，1855年7月铸成时刁短炮。在肥前藩，藩主锅岛齐正倡导军备先行的藩政改革，一呖座炉体高大的反射炉矗立起来，而且早在1848年9月肥前藩已铸成火炮，成为诸藩建炉铸炮竞相模仿的榜样。类似的诸藩安政改革，北起宇和岛藩，南至萨摩藩，一时间，几乎遍及全国。

由幕藩领主在安政年间掀起的改革浪潮，其目的在于维护开国后日趋上崩瓦解的幕藩体制。或者说，这场由幕藩封建领主主导的日本式洋务运动是领主们自救自存的一番举动。对日本来说，起始于佩里叩关并由哈里斯缔约而加大其冲击力度的外压，表明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已汹涌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虽然幕藩领主的安政改革大体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封建统治体制行将崩塌，并将不可避免地把领主们变成匆匆的历史过客。代之而起的，是一大批锁国时代默默无闻，而在开国后瞬息万变的时代漩涡中脱颖而出的中下级武士代表人物。这批人物思想敏锐，敢作敢为，是幕末政治舞台上一颗颗闪光夺目的新星，呼唤新时代到来的筹划人、鼓号手和开路先锋。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赖三、三树三郎等，即为其中的佼佼者。

吉田松阴（1830—1859年），出身长州藩萩城的下级武士家庭。自幼聪明好学，黯熟儒学、国学和兵学。由于成长于天保年外患内忧的动荡时代，因此在研修学问过程中，逐渐形成学以致用、关注内外形势变化的经世学风。特别是1850年随藩主来到江户后，师从著名洋学者佐久间象山，初步了解了海外大势和欧美军事力量的强大，转变为开国攘夷论者。1853年佩里首次叩关时，吉田松阴闻讯连夜从江户赶往浦贺，亲眼目睹了美国舰队的坚船利炮，也为幕吏武士们的张皇失措而扼腕慨叹，萌发了超越藩意识的国家民族观念。在时文《将及私言》中，他提出“天下乃天朝之天下，即天下之天下，而非为幕府私有”的主张，既表达了尊王意识，也反映了对幕府的不满。此后他愈加勤奋地研修洋学，认为天下之忧在外患，为对付外患则应了解西洋

和欧美的军备兵事。1854 年佩里舰队第二次来日本逼迫幕府缔结修好条约时，吉田松阴在其师佐久间象山的支持下，与涩木松太郎乘夜色掩护，驾舟驶近停泊在下田的美国舰队，登上旗舰“波瓦坦”号，要求佩里将他们带回美国，以周游世界，增长海外见识。佩里强调必须经过幕府的许可，方能带吉田等出国，婉言拒绝了其请求。在日记中，佩里称赞吉田和涩木是“两位为了追求知识而不惜命，既有教养又很热情的日本人”，感叹“如果日本人都拥有这样远大的志向，这个国家的前途不知将会是何等的辉煌，这个国家的命运不知将会有何等的希望。”

吉田偷渡未果，因触犯幕府的禁令被囚押在萩城监狱。次年，吉田被遣押回家软禁。虽遭挫折，吉田尊王报国初衷未改，继续宣讲开国攘夷的主张，吸引大批有志青少年前来听讲。1856 年 9 月得藩当局许可，吉田设松下村塾，开讲《武教全书》及世界大势，门徒愈众。松下村塾一时远近闻名。吉田授业不计门第，塾风清新奔放，师生关系一如朋友，共同切磋图存救亡之道。在松下村塾，人才辈出，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号称“松门双壁”；如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等，后来均为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在这个意义上，称松下村塾为“领袖摇篮”并非过誉之辞。

作为尊王攘夷思潮的一代宗师，吉田松阴的言论影响深远。从尊攘思想出发，吉田将尊王视为复兴日本的大义，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此大义乃圣经明训，岂能不知”，要求其门生“明皇道而建国体”，重振天皇朝廷，建立一君万民体制；对外，将“航海通市”作为“振雄略”、“驭四夷”的“国家大计”，具体的构想是与美、俄两缔约国保持友好关系，“乘隙富国强兵，开拓虾夷，夺取满洲，占领朝鲜，合并南地（东南亚），然后挫美折欧，则事无丁克”，勾划出后来日本对外扩张的蓝图。在构思上述内政外交方针的过程中，吉田松阴曾最先寄希望于幕府、诸侯，不久即深感失望，认为幕府已被违敕的奸贼井伊直弼之流所把持，诸侯藩受制于人、难有作为，转而疾呼“草莽崛起”，即“独立不羁三千年之大日本，一朝受人羁缚，令血性男儿不堪忍耐。如使拿破仑起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当今无论幕府还是诸侯，如醉如痴、已无扶持之木；尚能指望者，唯崛起于草莽之人”。吉田松阴对倒幕维新运动的历史贡献在于：他培育了一大批倒幕维新运动的骨干，提供了尊王攘夷风潮的基本思想，同时，也为近代日本的世界战略预作敷设。

佐久间象山（1811—1864 年），出身信浓国松代藩的下级武士家庭。早慧，有文才，少年时代即闻名藩内。1833 年赴江户求学，师从硕儒佐藤一斋，潜心研究格物穷理、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同时也以穷理精神钻研西洋军事，向洋式炮术专家江川英龙学习炮术知识，苦学荷兰语，成为著名洋学者。1839 年在江户神田开设象山书院，招徒授业，门生胜海舟、吉田松阴、坂本龙马等深受其开国论的影响，成长为具有世界眼光的活动家、在幕末的政治斗争中推波助澜。

1841 年，松代藩藩主真田幸贯出任幕府老中。佐久间象山追随藩主参与

〔日〕加藤祐三：《日本开国小史》，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133 页。

《吉田松阴全集》，第 1 卷，岩波书店 1940 年版，第 298、325 页。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 1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0 页。

〔日〕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阴》，岩波书店 1993 年版，第 162 页。

海防事务，设法搜集有关欧美的军事、科学、文物制度的情报，着力研究海外动向。1842年，他向真田幸贯提出《海防八策》，主张筑炮台、铸大炮、造军舰、兴教育、重人才、明赏罚；1853年，他又向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上《急务十条》，强调当务之急在于打造巨舰、训练海军、组织炮队、修筑海防要塞、选用将才、振奋士气、改革军制、诸藩联防等。1854年，他支持吉田松阴偷渡海外，到欧美国家实地考察。事败后，师徒二人均遭捕押。在狱中，佐久间象山矢志不渝，著《省愆录》以自励省人，认为“一门知礼仪”、“讲明圣学”和“生乎西人启理窟之后”等为“君子五乐”。其第五乐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精细不遗，表里兼该。因以泽民物，报国恩”。

在这里，佐久间最早提出日本近代化的基本模式，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在此基础上，日本朝野又在明治维新的改革风潮中，提出“和魂洋才”、“士魂高才”等近代化新模式，迅速找到传统文化与欧美异质文明相互协调、组合的近代化道路，赢得了确定近代化方针的时间，从而有利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历史时机。佐久间象山的贡献显而易见。其之所以作出这一贡献的原因主要在于：佐久间继承了江户中后期经世学派的优秀传统，将儒学和洋学从单纯的道德说教和学术探讨中解放出来，在经世致用化中，将儒学和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他志士，如越前藩的武士桥本左内（1834—1859年），师从绪方洪庵、杉田成卿等学习兰学，得到藩主松平庆永的信任，在1857年越前藩的安政改革中，与中根雪江、由利公正等藩士合作，一展身手。桥本主张通过幕政改革实现国家统一，倡导引进欧美技术、对俄开展合作，形成颇有见解的国家改革设想。同期活跃在越前藩的熊本藩武士横井小楠（1809—1869年）提出重商主义的富国强兵主张，领导藩政改革，闻名远近。还有安艺藩的赖三树三郎（1825—1859年）继承其父赖山阳（1780—1832年）的尊攘学说，与若狭小滨藩武士梅田云滨（1815—1859年）等组成强有力的尊王攘夷志士集团，在安政年间的政治风云中奔走呼号，并与长州藩的吉田松阴、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水户藩的藤田东湖等互通声气、遥相呼应，在将军继嗣、条约敕许、开国与锁国等重大问题上议论横生，指责幕政，孕育成位卑的处士、即草莽志士们痛论时弊的风潮——“处士横议”，对幕府当局形成强大的压力，孕育着开国后更大的政治风暴。

第 3 章

尊王攘夷

刺杀井伊

1858 年（安政 5 年）夏秋之间，日本政坛的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幕府、朝廷、雄藩之间的较量在升级，矛盾尖锐、达到白热化。6 月 4 日，谱代大名、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出任大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处理条约敕许和将军继嗣等政治悬案，7 月 29 日井伊下顾孝明天皇的反对，与美国订立《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公然以“违敕”的不妥协姿态，向朝廷和一桥派雄藩大名挑战；并断然拒绝一桥（德川）庆喜、松平庆永、伊达宗城等人的请求，于 8 月 4 日召集诸大名入将军居城，当众宣布确定纪伊藩藩主德川庆福（家茂）为继任将军。

井伊的专横引起一桥派雄藩大名的强烈不满，追随大名的武士们更是群情激愤。井伊态度强硬，8 月 13 日下令处分一桥派大名，命尾张藩藩主德川庆胜和越前藩藩主松平庆永闭上嘴巴、关门反省，责命德川齐昭闭户不出，禁止水户藩藩主德川庆笃和一桥庆喜等入将军居城议政，试图将一桥派的中坚大名们逐出政坛，重建幕府一言堂的独裁体制。对那些游说公卿、策动天皇降旨并严词责备幕府缔结条约和处分一桥派大名的志士，如梁川星岩、梅田云滨、西乡隆盛等，则严惩不怠。10 月 13 日下令在京都逮捕梅田云滨，接着组成由大目付、目付以寺社、町、勘定三奉行为主的侦察、审判机构“五手挂”，在京都、江户举行大搜捕，开始了血腥镇压。镇压持续到 1859 年 11 月，史称“安政大狱”。

在“安政大狱”中，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水户藩武上茅根伊予之介、鹤饲吉左卫门、幕臣家臣饭泉喜内等被斩首；水户藩家老安岛带刀被迫切腹自杀；梅田云滨、萨摩藩武士日下部伊三次等囚死狱中；梁川星岩被掘棺暴尸；德川齐昭被永久软禁藩内；藩主德川庆笃被监扛；一桥庆喜、德川庆胜、松平庆永被监押；土佐藩藩主山内丰信被软禁；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僧侣月照被追捕投海自杀，西乡幸而获救；青莲院宫尊融亲王、内大臣一条忠香被软禁；公卿前关白鹰司政通、前内大臣三条实万、左大臣近卫忠熙、右大臣鹰司辅熙等被迫辞官、剃度、闭户自省。长达 1 年有余的“安政大狱”，涉嫌株连者百余人，血雨腥风遍及山川秀丽的东流。

井伊的铁血镇压，迫使中下级武士和草莽志士们放弃坐而论道的“处士横议”，转而抡起日本刀，以暴力对抗暴力。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开始了伴随着刀光剑影的武力抗暴行动。大老井伊直弼成为志士们刺杀的第一个目标。在“安政大狱”中受迫害最重的水户藩武士，则成为初期尊王攘夷的急先锋和袭击幕府要人的突击队。

1860 年 1 月 8 日，幕府勒令水户藩交出天皇 1 年半以前下达的诏敕，在藩内引起强烈反响。郡奉行野村彝之助、金子孙二郎和水户藩吏“奥右笔头取”高桥多一郎、“郡方勤”关铁之介等激烈反对交出诏敕，要求赦免德川齐昭、庆笃，得到藩内众多神官、乡士的有力支持，愈加气势汹汹。然而，朝廷在井伊等压力下，降旨水户藩。同年 1 月 12 日藩厅采纳主张妥协的会泽安的意见，决定交出诏敕。消息传开，野村等怒不可遏，在策划以实力阻

止上交诏敕的同时，加紧密谋刺杀井伊的计划。3月22—23日，野村召集20余名志士在日本桥和品川的料理亭中聚会，杯献交错之间商定了行动方式、分工负责：决定实行刺杀井伊的日期为当年的上巳节；由关铁之介现场指挥，参加行动的人员由萨摩藩武士有村治左卫门和关铁以下17名水户藩武士组成；野村、金子、高桥等前往京都、大隈或西南诸藩联络各地志士；为向天下申明行动的意义，起草声讨井伊的檄文《斩奸趣意书》。

1860年（万延元年）3月24日是旧历3月3日。按照旧例，将军府在这个与正月初7日的人日、5月初5的端午节、7月初7日的乞巧节、9月初9日重阳节并列为5大节日的女儿节或桃花节的当日，欢宴幕府高官大吏。大老井伊职位在群吏之上，自然是出席宴会最尊贵的客人。当天清晨，井伊在60余名武士的护卫下，乘轿向江户将军居城进发。几乎在同时，关铁以下18名志士下定必死的决心，集合在江户芝的爱宕山，相互叮嘱一番后，便三五成群地分头走向井伊登城的必经之处——樱田门。作为彼此识别的标志，志士们手持大名、旗本的人名录《武鉴》，扮装成观看大名登城行列的乡下武士，先后抵达樱田门外，等待着性命交关的搏杀时刻的到来。

上巳节时值阳历3月下旬，大地回春，含苞待放的樱花花蕾已压满枝头。但万延元年上巳节的前几天，从西伯利亚涌来寒流，连日雨雪交加。护送井伊的彦根藩武士们个个身穿遮挡雨雪的桐油雨披，将刀剑放进防雨的刀套中，缩肩低头，匆匆赶路。上午9时许，井伊一行出现在樱田门外。

这时，走在最前列的卫士发现有人手持状纸，逼近过来，似乎要拦轿喊冤，直诉苦情。正待喝止，只见那人冷不防拔出利刀，直劈过来，卫士猝不及防，被当场杀死。前卫队正混乱间，突然一声枪响，震耳欲聋。轿中的井伊被击中，动弹不得。卫士们来不及甩掉雨披、抽出刀剑，就被四面八方冲上前来的志士们包围，只得边退离轿子，边抽刀迎战。混战中，发狂的志士们集中攻击井伊的乘轿，一面愤怒地咒骂，一边用利刀乱刺轿中的井伊。萨摩志士有村治左卫门怒吼一声，将奄奄待毙的井伊从轿中拖出，狠狠地割下其首级。一场恶斗过去，樱田门外洁白的雪地上，脚印狼藉，溅满鲜血，井伊大老横尸街头。彦根藩卫士8人被杀，10余人负伤。参加刺杀行动的18名志士1人战死，4人重伤自杀，8人在撤离现场后分别至尤野、熊本藩邸自首，5人逃逸。

前往尤野藩邸自首的志士斋藤监物交出《斩奸趣意书》，公开了刺杀大老井伊的动机，即击杀“天下巨贼”井伊直弼，是因为他违敕签约、迫害亲王公卿、屠杀草莽志士，必须替天行道，对其加以“天诛”；刺杀井伊是为声讨其不忠与卖国行为，“并非对幕府持有任何敌意”；强调其“至忠之愿”是“以天皇的圣意为依据，使幕府政治回归正道，申明尊王攘夷之大义，安定天下万民”。从上述“趣意书”的内容中，志士刺杀井伊的行动并非否定幕府统治本身，而是排除尊王攘夷的障碍、针对井伊个人的“清君侧”式的暴动。然而，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大老被当众刺杀，登城的旗本闻讯后四散逃跑，围观的江户市民汇集如山、拍手称快等情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幕府威信扫地、丧失人心，迫使幕府不得不改变只知杀关管的高压政策。从倒幕运动的全过程来看，刺杀井伊的“樱田门外事件”的意义在于：其一，志士们从此开始了反抗幕府暴政的实际行动；其

二，这种行动打破了诸藩之间隔绝状态，实现了不同藩之间志士们的联合；其三，反幕斗争从此走出“安政大狱”之后的沉寂时期，尊王攘夷运动跨越低谷，进入高潮迭起的新阶段。

自佩里叩关起，幕府当局始终面临着如何在外压内忧的双重夹击下，适应形势、维护幕府统治的难题。开国初期，主持幕政的阿部正行、堀田正睦，对内与朝廷、诸藩协调关系，以相对开明的姿态，上通下达、征询意见，设法维持统治集团内部的步调协同和权力构架的均衡；对外求和避战，与欧美诸国缔结条约，同时抓住机遇，引进欧美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充实国力。照此方针处理内政外交问题，幕府尚能在乱世中求生存，甚至或许通过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获得求发展的可能。刚愎自用的井伊出任大老、主持幕府后，虽然对外坚持开国，1858年7—10月先后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通商条约，1860年2月派“咸临”号舰长胜海舟、军舰奉行木村喜毅等出访美国，完成日本人靠自身力量横渡太平洋的首航，派使节新见正兴等乘美国军舰赴美，出席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批准书的仪式，创日本使节出访海外的纪录；然而，面对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却失去了阿部、堀田式的开明精神与忍耐力，动用血腥的镇压手段，加以无情镇压，结果激化了矛盾，死于非命。

继井伊之后，盘城平藩藩主、若年寄安藤信正出任首席老中，关宿藩藩主、寺社奉行久世广周出任老中，形成安藤一久世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幕府对外开国的方针不变。1860年2月接受英国公使阿礼国进驻日本，5月接受法国驻日公使贝尔克尔，8月与葡萄牙订立《日葡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1861年1月与普鲁士订立《日普友好通商条约》及《贸易章程》；1862年1月派遣以竹内保德为首的遣欧使节乘英国军舰访问欧洲各缔约国，谈判开港开市的时间等问题。

对内，幕府抛弃井伊直弼的强行镇压方针，竭力修补幕府与朝廷、雄藩的关系。1860年6月，派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与关白九条尚忠取得联系，请九条出面斡旋皇妹和宫与将军家茂的政治联姻，展开公武合体运动。公武合体的“公”，指朝廷；“武”，则指幕府或雄藩；“合体”，即幕藩领主与朝廷结为一体。公武合体思想早在国学的国体观念和水户学的尊王论中已屡有表述。开国后，幕府权力日益衰微，尤其在“樱田门外事件”中威信一落千丈，更加需要借助天皇的传统精神权威来增强其政权力量，利用“皇威”来阻止尊王攘夷派志士的反幕行动，稳定统治秩序。公武合体运动起初以幕府为中心展开，后来则以雄藩为中心进行。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其主体力量有所区别，但在抑制“犯上作乱”的尊王攘夷派志士，维护幕藩领主和上层公卿的既得利益及统治地位方面，两者并无不同，皇妹和宫下嫁将军家茂是公武合体运动的一大代表性举措。其他举措，尤其是为前一桥派大名平反昭雪影响深远。1860年10月，幕府宣布解除对德川庆胜、德川（一桥）庆喜、松平庆永、山内丰信等人的处分，随后又委以重任。这些手握权柄的大名立即成为公武合体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对抗、压制尊王攘夷派志士的干将。

总之，安藤一久世体制的建立及其对内政策的调整，宣告了井伊式强硬政策的破产，促成幕末日本政坛各种力量的再组合，斗争形势日益复杂。

尊攘狂潮

“安政五国条约”签订后，横滨、长崎，箱馆 3 港开放，外国公使进驻江户。种种变化，刺激着笃信日本国乃“神国”、道乃“神道”、天皇至尊、欧美诸国不过“夷狄”之邦等丘热民族沙文主义信条的尊王攘夷派志士，非理性的尊攘狂潮随之在日本各地奔腾激荡。尊攘狂潮的掀起，固然有思想、政治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发挥全局性作用的因素，是开国后日本社会经济构架发生剧烈震荡，各种矛盾白热化。

欧美列强以炮舰为后盾迫使日本开国，强行将日本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同时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殖民权益，迅速将日本变为欧美近代大工业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无情地摧毁日本小农经济框架，榨取日本的国家财富，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外商垄断了日本的贸易支配权。由于外商资本雄厚，熟悉国际市场行情，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又在海运、保险、汇兑等方面占尽优势，因此，在日本开港后，他们立即把持了日本的输出入渠道，垄断了日本贸易。直到明治初年，日本 90% 以上的输出、输入额仍控制在外商手中，阻滞了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展，迫使幕藩领主加重对国内的赋税征缴和搜刮，以弥补财政亏空。各阶层劳动群众因剥削加重而普遍不满，反抗斗争随之加剧。

其次，民族工业受到严重破坏。开国后，欧美大工业制品，如棉布、棉纱、砂糖、军火武器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占领了市场；另一方面，日本的生丝、蚕种、铜、煤等建立在小农业、小手工业基础上的初加工品或原料大量输出。江户时代长期形成的传统棉织业、纺纱业、制糖业，灯油业等基础薄弱，无法与洋制品抗衡而迅速衰落。丝织业则由于生丝大量出口，丝价暴涨而难以为继，开机数锐减，倒闭的织场也比比皆是。即使在洋货冲击下，一些有眼光的经营者转而采用外国机械或外国棉纱而生存下来，但由于技术、原料严重依赖进口，也只能成为从属型加工工场，运营畸型化。

第三，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开港开市后，外商利用不平等条约中关于外币可在日本自由流通、内外币同种等量交换和金银免税输出入等规定，利用日本与国际市场金银比价的不合理，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大量套购日本的黄金。幕藩领主的金库迅速告罄，财政立即陷入危机状态。为转嫁危机，幕藩领主或改铸货币，通过大幅度降低新币的含金量，补足府库；或滥印藩札，滥发不兑付的纸钞，结果造成货币急剧贬值，触发并不断刺激物价的狂涨，使下级武士和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急剧恶化。寄生于城市的下级武士受到收入减少和物价飞涨的双重打击，生活困顿不堪。在他们当中，积累着不满和愤怒。手工工场的工人因原有产业的调弊而大量失业，失去生计；即或有工作者，其实际工资收入也因物价的飞涨而连年下降，难以养家糊口。农村中，大批农民破产，农民整体上处于急剧贫困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苦不堪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群众的骚动与反抗，为下级武士掀起的尊王攘夷狂潮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与此同时，下级武士将尊王攘夷视为宣泄愤怒、阻止生活继续恶化、维护日本武士尊严的精神信条。锋利的日本刀则是他们采取暴烈行动的主要武器，斩杀外国人是尊攘派武士乐此不疲的行动方式。

1859 年 8 月发生了首起攘夷事件。同月 18 日，俄国使节穆拉维约夫率 6 艘俄国军舰驶入品川港。25 日夜 8 时许，三名俄国官兵在横滨登陆购买粮食。当时，许多店铺正在营业中，灯火通明，人声嘈杂。这热闹的情景使饱

受风浪颠簸和军旅寂寞之苦的俄国官兵变得十分兴奋，一边高声谈笑，一边毫无戒备地信步走去，全未觉察到黑暗角落里一双双闪动着仇恨之光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突然，几条黑影跳将过来，嗖嗖几声刀响，俄国官兵扑倒在地。其中一名俄国人拼命爬进一家店铺里，昏死过去。另外两名俄国人当场被杀死，并被大卸八块，砍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凶手趁黑夜掩护，早已逃得不见踪影。幕府闻讯，大惊失色，忙派专员向穆拉维约夫谢罪，又罢免了神奈川奉行，声明追捕凶手、厚葬遇害者，设法避免了俄国舰队的报复。

横滨刺杀俄国官兵事件震动了驻日欧美使馆人员，英国公使阿礼国心有余悸地惊叹：如此残忍地斩杀外国人，明显地带有政治感情，尊攘派武士闻讯，个个摩拳擦掌，愈加起劲地乱杀外国人。从 1859 年 10 月至 1861 年 1 月，发生了多起刺杀驻日使馆人员的暴力事件。1859 年 10 月，一名在横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人，因穿西服上街无端被杀；1860 年 2 月，英国公使馆资深译员、日本人传吉在公使馆附近被人用短刀刺死；同月，荷兰船长鲍斯在横滨遇害，在荷兰领事抗议下，幕府被迫赔偿了事，创日本赔偿的首例；此后，法国公使馆的意大利籍雇员又被杀伤。一时间，闹得外国驻日使馆人员人心惶惶，幕府也穷于应付，狼狈不堪。

在斩杀外国人的攘夷狂潮中，美国驻日公使馆译员修斯凯被杀事件，酿成重大外交事态。修斯凯曾随哈里斯到江户交涉订立《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在驻日外国使馆人员中颇孚人望。1860 年 9 月普鲁士使节奥列伯格赴日敦促幕府缔约时，特意聘请修斯凯担任翻译。1861 年 1 月 15 日夜晩，修斯凯从普鲁士使节驻地赤羽根返回设在麻布善福寺中的驻日美国公使馆途中，在麻布中之桥附近忽遭袭击，尽管一路上幕府派来的 3 名骑马武士尽心警卫，刺客仍冲破卫士的阻拦，用刀将修斯凯刺成重伤。修斯凯逃回使馆后不治而亡。同月，法国和英国公使以及荷兰副领事向幕府发起联合抗议，声明驻日使馆人员屡遭杀害而凶手均在事后逃逸等，是不能容忍的；为此，宣布撤离江户，前往横滨暂住，以待幕府采取相应安全保障措施，否则一切后果由幕府自负。在列强的压力下，幕府一边作出安全保证，一边向修斯凯之母赔偿洋元 1 万元，以息事宁人。

一连串斩杀外国人的事屡屡得手，使尊攘派志士们兴奋不已。1860 年 9 月 7 日，长州藩武士木户孝允、松岛刚藏和水户藩的西丸带刀等，在停泊于江户湾品川的长州藩军舰“丙辰”号上秘密聚会，订立《成破之盟》。在这份也称“丙辰号盟约”的文件中，双方约定：水户藩负责“破”，即率先破除条约、实行攘夷；长州藩则负责“成”，即策应后援，处理事态；两藩的共同目标是驱逐“夷狄”，扫除通敌的幕府奸吏。“丙辰号盟约”的订立，意味着尊攘行动将在超越藩界的横向联合中扩大规模，激烈展开。此后，驻日公使馆、特别是带头向日本施加压力的英国公使馆，成为尊攘派集中攻击的目标。

英国公使馆坐落在江户城的东禅寺。1861 年 7 月 5 日，水户藩武士有贺半弥等十几名尊攘派志士制造了袭击英国公使馆的第一次东禅寺事件。是日，有贺等志士按照事先策划的行动方案，突然挥舞日本刀冲进东禅寺，在“杀尽英国人”的狂吼声中，与幕府派来警卫东禅寺的 200 余名卫兵展开激战。英国使馆人员手执步枪、手枪，拼命射击。经过一阵混战，2 名使馆人员被杀伤，20 余名幕府士兵非死即伤，前来袭击的志士或战死，或负重

伤，或被逮捕，无一幸免。水户藩武士的凶悍勇猛之举，导源于水户学排外色彩强烈的尊攘观念，即有贺等在偷袭东禅寺的《趣意书》中所谓：“我等不能对夷狄污染神州袖手旁观，决心基于尊攘大义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将逐步奠定扫除夷狄的基础，以慰天皇圣虑和将军之心。倘能如此，则无上荣幸，万死不辞！”

继第一次东禅寺事件之后，1862年6月26日，警卫东禅寺英国公使馆的松本藩武士伊藤军兵卫与英国水兵发生冲突，在杀伤数名英国水兵后被捕，次日自杀，造成第二次东禅寺事件。1863年1月31日，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品川弥二郎、伊藤博文等十几人，乘夜潜入品川御殿山英国公使馆的建筑工地。走在最前面的伊藤用木锯锯断木栅栏，高杉、久坂等钻将过去，四处点火，将木结构的英国公使馆烧成一片废墟。这是两次东禅寺事件之后，对英国公使馆的第三次袭击。尊攘派志士对驻日使馆的攻击，在外国人当中引起一阵阵恐慌，使他们感到“日本是个令人提心吊胆、有生命危险的国度”。1862年8月赴日担当英国公使馆译员的阿耐斯特·萨托心有余悸他说：“我在赴任前还留在英国的时候，除考虑日本气候变化造成的危险外，也不得不考虑被剑术高超的武士杀死的危险，所以我购买并携带了大量的火药、子弹、雷管和连发手枪。”他哀叹道：“外国人走出居留地地界时，人人佩带手枪，而且睡觉时也经常把手枪塞在枕下。因此，在当时，大量的手枪畅销日本。”

尊王攘夷派志士采取激烈行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对国内重大问题取得发言权。然而，以幕藩领主、上层公卿为中心的公武合体派阻碍着尊攘派志士政治上的过快显达。由于传统的藩意识的制约和藩本位之下主君、家臣主从观念的束缚，尊攘派志士很难站在主君的对立面采取对抗行动。因此，幕府高官或朝廷公卿往往成为他们展开攻击的目标，在击灭“国贼”的口号下，实行所谓替天行道的“天诛”，构成尊王攘夷运动的对内行动的重要内容。

1862年2月13日（旧历正月15日），以水户藩武士平山兵介为首的6名志士刺杀老中安藤信行的“坂下门之变”，就是尊攘派志士对内实行尊王攘夷的重大举动。安藤发起的和宫下嫁政治联姻，引起志士们的不满。关于安藤派国学者塙次郎调查废除天皇事例的传闻，更是火上浇油。志士们断定安藤让和宫下嫁到江户，是企图将皇妹扣为人质，迫使天皇批准条约，若天皇拒绝则废除其帝位。因此，当1860年8月幕府罢免反对和宫下嫁的议奏德大寺公纯，10月天皇以废约攘夷为条件同意出嫁皇妹，1861年11月和宫前往江户下嫁将军家茂，即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运动热火朝天之时，在江户郊外牙塾授业的字都宫藩武士大桥讷庵也在加紧鼓动门徒反击“形同禽兽的兰学者”和“危害国脉的西洋流”，实行攘夷，痛击国贼，维持国体。与此同时，大桥与平山等水户藩脱藩武士频频联系，筹划刺杀行动。大桥因计划败露被捕，平山等6名志士遂不惜铤而走险。

1862年旧历正月15日是为上元佳节，届时旅居江户的诸藩大名循例入城谒见将军，庆贺节日。是日上午8时，将军居城西九里传出咚咚的鼓声，安藤装扮整齐，率随从离开西丸附近藩邸。一行人来到坂下门时，一名男子

手举诉状，直奔安藤的乘轿。行至近前。但见那人忽然从怀中拔出手枪，向乘轿连连射击。枪声大作之间，从道路两旁冲来5名手执日本刀的武士，怒吼着杀向乘轿。护卫安藤的50名卫士死战不退，与6名亡命徒般的刺客厮杀在一起。拼死围攻乘轿的志士尽管刺伤了安藤，但毕竟寡不敌众，被卫士全部杀死。混战中，安藤带伤赤足跳出乘轿，夺路而逃。身为老中，临阵逃跑，使幕府的威信再次受到沉重打击。5月安藤引咎辞职，6月久世广周亦被罢免。这样，前后存在不过两年的安藤一久世体制崩溃，幕府政权再度陷入迷乱之中。

“坂下门之变”的谋刺方式是“樱田门外事件”的再现，其刺激作用也十分相似。尊攘派志士在搞垮了安藤一久世政权之后，又把攻击矛头指向宫廷内部的公武合体派公卿。他们在实行“天诛”的叫嚷声中，对促成和宫下嫁的“四好二嫔”（即公卿岩仓具视、千种有文、富小路敬直、久我建通及嫔妃今城重子、堀河纪子）大加威胁。9月迫使朝廷将他们逐出宫门，蛰居在家或剃发修行。

在此前后，暗杀“安政大狱”时迫害尊攘派志士的幕吏的复仇风潮，在京都、江户等处掀起。1862年8月，撮合和宫下嫁政治联姻的关白九条尚忠家士岛田左近，因充当过井伊直弼的帮凶、热中公武合体运动，被萨摩藩武士田中新兵卫等斩杀，弃尸京都四条河原；9月，捕吏文吉被暗杀，暴尸京都三条河原；次年2月，曾奉安藤信行之命、调查废黜天皇先例的稿次郎在江户和学讲谈所中被伊藤博文等志士暗杀。暗杀之风愈刮愈烈，甚至连早已作古者竟也无法幸免。1863年4月，尊王攘夷派志士三轮田纲一郎等闯进祭祀室町幕府开创者足利尊氏的京都等持院，用刀砍下足利尊氏及足利义诠、义满的木雕头像，弃之贺茂河原。

在尊攘狂潮的裹挟之下，诸藩政治倾向急剧变化。在长州藩，1861年5月深得藩主毛利庆亲信任的直目付长井雅乐提出《航海远略策》，主张公武合体，放弃废约攘夷而采用开国进取方针，远航五大洲，弘扬日本国威，压倒全世界。毛利庆亲对长井的主张十分赏识，遂将这种以公武合体、开国进取为中心的方针，确定为藩的基本政策。6月，命长井游说于幕府与朝廷之间，借以提高长州藩的发言权，扩大在全国的影响。由于长井在《航海远略策》中提出的公武合体、废约攘夷不可取的主张与幕府政策一致，而弘扬国威、压倒世界的目标又迎合了朝廷的虚荣心，结果，长井的游说相当成功，长井本人也十分得意。

然而，长井的公武合体论和开国说引起藩内尊攘派武士的忌恨，以久坂玄瑞、寺岛忠三郎、伊藤博文等为核心的尊攘掀起弹劾长井的政潮，并在暗中策划刺杀长井的行动计划。藩内政局不稳，加之尊攘派在各地制造事端，迫使藩主毛利庆亲于1862年7月下令长井回藩闭门思过。随后，毛利庆亲宣布放弃公武合体的《航海远略策》，转而将尊王攘夷确定为举藩推行的基本方针。尊攘派立即实行攘夷的主张占了上风，长州藩成为尊王攘夷的一大据点。

在萨摩藩，1858年8月岛津齐彬病故，其弟久光的长子忠义继任藩王。久光作为忠义的监护人，执掌实权。久光是一个顽固的攘夷论者，主张举藩勤王，并以此为号召，增强萨摩藩对中央政局的发言分量。为此，他重用大久保利通等尊攘派，解除对西乡隆盛的流放，调至藩厅任用；另一方面，久光又是一个以雄藩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论者，热衷于不改变现存统治体制的前

提下，自上而下地开展幕政改革，厌恶尊攘派志士扰乱武士内部自藩主而重臣而上级武士而中下级武士的等级序列、动辄犯上作乱、杀人放火的极端行为，不惜以镇压手段来维护统治秩序。1862年5月14日，久光为敦促幕府实行雄藩大名分享政权、尊奉天皇朝廷的幕政改革，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举动，即亲率1000余名藩兵。北上京都。各地尊攘派志士闻讯雀跃不止，久留来藩水天宫神社词官真木和泉、筑前藩武士平野国臣、庄内藩武士清河八郎、长州藩武士久板玄瑞等紧急联络萨摩藩激进的尊攘派志士有马新七等人，试图乘久光率兵进京之机，举行反幕府的暴动。

实际上，久光在出发时已发出警告，训诫藩士说：“据说有人以尊王攘夷为名，发表过激言论，与各地志士交往联络，图谋不轨。本人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同时，他派遣西乡隆盛前往京阪地区，劝说志士们稍安勿动。然而，西乡却与尊攘派志士声气相通，反欲合伙举事。久光闻讯恼怒，将西乡召回，流放到德之岛，再押送至冲永良部岛。有马新七、真木和泉等有进无退，聚会于伏见的寺田屋，策划刺杀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旅居京都的久光派遣奈良原喜八郎、大山纲良等9名剑客前来劝阻，有马等不听劝说，双方由口角而拔刀乱斗。一场厮杀过后，有马新七、田中谦助、柴山爱次郎等8名志士当场被子或身受重伤。萨摩藩激进的尊攘派在这次“寺田屋骚动”中深受打击，标榜攘夷的公武合体论遂成为萨摩藩的基本方针。

在土佐藩，重臣吉田东洋在前藩主山内丰信支持下，推行尊王、佐幕、开国的温和公武合体政策。乡土武士瑞山、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等于1861年9月组成土佐勤王党，主张激进的尊王攘夷论，与吉田的公武合体论激烈对抗。1862年5月，吉田被武士等尊攘派暗杀，但落内公武合体派与尊王攘夷派、勤王党与佐幕派、上级武士与中下级武士的对立继续存在，斗争形势依旧复杂。

尊攘狂潮的喧嚣声浪，对朝廷也产生强烈影响，公武合体派公卿销声匿迹，三条实美、姊小路公知、三条西季知等少壮派尊攘公卿抬头。1863年1月朝廷设置议政官职“国事御用挂”，同年3月再增设“国事参政”、“国事寄人”，由三条等少壮派公卿专任，控制了朝政，并使朝廷日益具有国政机关的机能。

幕府已失去驾驭局面的能力，被迫与朝廷、雄藩大名进行妥协。1862年7月，将军德川家茂隆重接待在岛津久光重兵护卫下抵达江户的敕使大原重德。8月，按照天皇的旨意，任命德川庆喜为相当于候补将军的“将军后见职”，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职。10月，缓和关于大名参觐交代的規定，允许每3年轮换一次，大名妻子可回藩居住。12月，在聆听敕使三条实美、姊小路公知所传达的攘夷敕旨后，幕府决定加以遵奉。与此同时，对尊攘派志士采取高姿态。1862年9月，任命亲藩大名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为首任京都守护，加强警备。作为文久年间（1861—1864年）幕政改革的重要环节，1863年2月，设置陆军、海军两总裁和陆军、步兵、骑兵三奉行，组织洋式装备的将军护卫部队，强化军事力量。1862年11月，向荷兰派遣首批留学生。其中，内田正雄、榎本武扬、赤松则良等11人专门学习欧洲海军军事技术，津田真道、西周等专门学西洋法律，伊东玄伯、林研海等专门学习医学。在此之前，1860年2月和1862年1月，幕府曾派出赴美、赴欧使节团。福泽

谕吉、寺岛宗则、福地源一郎等随行，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人员交流渠道被开通。通过直接考察西方的文物制度，形成一大批学欧美、倡导维新变革的人才：如文明开化的启蒙教育家福泽谕吉，日本的哲学之父西周，近代海军创立者之一榎本武扬，近代外交家寺岛宗则，西学著述家津田真道等。

诸藩闻风而动。1862年6月，第一艘赴华考察贸易的幕府官船“千岁”号驶离长崎，直趋上海，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萨摩藩武士五代友厚等随船前往。经过两个月的实地观察了解，高杉等目睹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不由产生唇亡齿寒之感，进而苦思日本图存救亡之道，悟出割据自强、抗御外侮的正确策略，即大割据政策，奠定了在后来成为开国倒幕急先锋的思想基础。然而，依赖幕府官船出洋的机会毕竟少得可怜，无法满足诸藩急欲实地了解欧美的迫切要求。乘幕府衰落，诸藩竞相秘密派遣本藩人员出洋留学、考察。以长州藩为例，1863年6月即密派伊藤博文、井上馨、野村弥吉、山尾庸三、远藤谨助等5名武士前往英国留学。出国前，伊藤、井上均为狂热的尊攘派。自踏上英伦三岛、耳闻目睹了英国近代大工业的实力之后，思想迅速变化，转而成为开国进取的有识之士，断然抛掉盲目攘夷的旧装，以开国倒幕派的新面貌投入斗争。

全国大攘夷

尽管少数出洋留学的武士们在不同程度地接受欧风美丽的冲击，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但在文久年间的日本，尊攘狂潮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全国大攘夷的方向奔泻而去。将军拜见天皇、君臣神前祈祷、全国攘夷日的确定、长州藩炮击外国船舰、萨摩藩与英国舰队交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接连发生，构成全国大攘夷时期光怪陆离的历史画面。

1863年4月1日，迫于朝廷的一再催促，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在老中水野忠精、板仓胜静的陪同下，很不情愿地率3000名幕府官兵，离开江户，沿东海道向京都进发。足足走了20天，4月21日方进入京都，宿泊在二条城。自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到京都的200余年间，幕府将军首次赴京都拜见天皇。望着高大雄伟的二条城，想到将军家的威风已渺若黄鹤，家茂总觉得有些晦气。4月22日，家茂先打发候补将军德川庆喜进皇宫御所参拜孝明天皇，自己呆在二条城里等待消息。朝堂之上，孝明天皇打量着匍匐在地、连连叩首的德川庆喜，心中暗暗高兴，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在慰问了一通旅途劳顿辛苦之后，天皇表示无意收回将军的庶政统治权，仍一如既往地委任其掌管天下兵马大权，但强调将军应尽可能地尽忠节于攘夷大业。庆喜唯唯称是，退出御所，忙把天皇继续将庶政委任于幕府的旨意报告给家茂。家茂闻听，面露喜色。次日，他衣装整齐地进宫拜见天皇，礼仪周正地尽行为臣之礼。天皇照例又是一番褒奖，鼓励家茂尽征夷大将军“征夷”的职责，同时说明根据事态的变化，朝廷将向诸藩直接下达指令。

4月28日，朝廷举行规模浩大的祈祷攘夷必胜的敬神仪式。关白以下诸公卿和将军以下诸老中，簇拥着孝明天皇的凤辇，向贺茂神社进发。贺茂神社主祭火雷神“别雷命”及其母玉依姬、祖父贺茂健角身命，历来是天皇祷告风调雨顺、天下太平，显示皇恩浩荡的重要场所。然而，此次的君臣参拜贺茂神社的意义与以往不同，成为向全国展示攘夷决心和天皇尊贵的政治行动。在参拜行列的安排上，11个藩的大名率兵队前面开道，朝堂公卿扈从

天皇居中，家茂、庆喜等殿后，君臣名分明明白白，弄得家茂、庆喜等心中十分别扭。

通过参拜贺茂神社过了一把天皇瘾的孝明天皇，进而在5月28日再次行幸石清水八幡神宫。神宫主祭应神天皇、神功皇后和姬神等3神。神宫规格仅次于伊势神宫，为国家级大神社，每年的祭祀为日本二大敕祭之一。自平安末期以后，更被尊奉为清和源氏的氏神，具有强烈的军神、武神性格。要攘夷，则必须动武。因此，孝明天皇选择石清水八幡神宫作为君臣攘夷祀神的场所，并非偶然。按照预定安排，天皇还准备在神前向德川庆喜亲授攘夷的节刀“鞘卷真之御剑”，以显示将军掌管天下兵马大权的源泉所在，表明武力攘夷的决心。然而，在行将举行参拜仪式的前一天，将军家茂自称思感冒发烧，无法随御驾前往，临时指定“将军后见职”德川庆喜作为其代表出席仪式。庆喜奉命陪君前往神宫，侍行至神宫山脚下，忽然自称腹痛难忍，向天皇告假静养。预定下赐攘夷节刀的仪式只得取消。

虽然在玩弄小手法、假装患病以逃避再次陷入向皇威低头窘境方面，家茂和庆喜设法挽回了一些面子。但是，在确定全国攘夷日等重大问题上，家茂等经不住朝廷的一再催促，只得在6月6日上奏天皇，以6月25日（旧历5月10日）为全国大攘夷的行动日。6月8日，德川庆喜等奉命东归江户，着手废约锁港谈判的准备。将军家茂滞留京都，直至7月18日方允东归。6月9日，幕府发布文告，通知6月25日为攘夷日，命诸藩大名严守领内海防，若受到外国舰队的袭击，立即将其驱逐。至此，朝廷在拒绝批准“安政5国条约”以来的政争中，占据了优势，迫使幕府表态放弃缔约开港主张，转而废约锁港。尊攘派们为之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公武合体派大名沮丧失望，纷纷回藩，冷眼旁观，等待实行反击的时机。

6月25日深夜，风雨大作的下关海峡忽然响起激烈的炮声。长州藩的两艘小舰“庚申”号和“癸亥”号向抛锚避风的美国商船“佩姆布罗克”号实施炮火攻击。毫无防备的美国船见势不妙，忙升火加速，顺丰后水道夺路而逃。长州藩的小舰本想乘胜追击，无奈航速太慢，只得眼睁睁地听任“佩姆布罗克”号消失在黑夜中。

7月8日清晨，法国通讯舰“金香”号通过下关时，忽然遭到坛之浦等长州炮台的猛烈炮击。隆隆的炮声中，曾攻击过美国商船的“癸亥”号、“庚申”号破浪而来，舰上大小炮一齐开火，逼近“金香”号。法国舰长忙命放下划艇，前去质问开炮的原因。一阵炮火袭来，划艇被打得板桨横飞。舰长急令卸下炮衣应战，“金香”号穿过密集的炮火，向西方的玄海滩急驶而去。

7月11日，自长崎启航的荷兰军舰“麦德尤萨”号通过下关海峡，欲驶往横滨。舰长卡赛姆·布罗特早已听到法国军舰在下关遭炮击的消息。虽然驶近下关海峡时，“麦德尤萨”号已作好战斗准备。但舰长尚抱平安航行的一线希望，以为荷兰与其他欧美国家不同，与日本有着200余年间的友好往来，不至于遭到非礼袭击。然而，当军舰驶入下关海峡最狭窄处、即坛之浦与古城山遥遥相对的水道时，受到海岸炮台与海上“庚申”号、“癸亥”号两舰的交叉炮火轰击。“麦德尤萨”号连忙应战，但恰值逆潮，军舰无法提高航速，竟成了移动射击靶。不消片刻，荷兰军舰被30余发炮弹击中，主桅杆和烟囱被击毁，官兵4人战死、5人重伤，“麦德尤萨”号向横滨狼狈逃去。乘坐该舰的荷兰总领事波尔斯·布鲁克恨得牙根发痒，发誓要狠狠报复不讲信义的长州藩。

半个月以来，击退击伤美、法、荷兰船舰的炮战胜利，让长州藩的尊攘派们兴奋不已。捷报传到朝廷，尊攘派公卿也神采飞扬，通令嘉奖说：“天皇对攘夷壮举感到非常满意，切望更加努力，耀皇国之武威于海外！”朝廷还下令诸藩支援长州藩，以期攘夷大获全胜。捷报传到江户，幕府的反应十分冷淡，命令长州藩再勿胡乱炮击外国船，并进而指责长州藩无视攘夷文告只还击前来进攻的外国船舰的要求，轻启战端，对正在进行的锁港谈判制造障碍。然而，长州藩的尊攘派们充耳不闻，自我陶醉于侥幸取得的胜利中，只顾蛮干不止。下关海峡炮战后，长州藩借口对岸的小仓藩执行朝廷关于支援长州的命令不力，自行派兵占领了小仓藩领地田之浦，构筑炮台，两藩关系势同水火。

未容得长州尊攘派高兴多久，列强即开始采取报复行动。7月16日，美国军舰“怀俄明”号出现在下关海面，长州炮台开炮轰击。“怀俄明”号舰快炮猛，迅速冲破海岸炮台的火力网，并集中火力摧毁龟山炮台，又乘势击沉“庚申”号、“壬戌”号等两舰，击伤“癸丑”号，将下关一带的长州守备部队打得大败，士民竞相奔逃。7月20日，焦莱斯少将亲率法国远东舰队的“赛米勒米斯”号、“坦克莱德”号等两艘军舰，闯进下关海峡，开炮猛轰沿岸炮台，尽行将其摧毁。守备兵非死即伤，急忙撤离炮位。250名法国海军陆战队官兵发动登陆作战，接连占领了前田、坛之浦炮台群。法国官兵手舞足蹈，欢呼胜利。法军将长州的大炮炸毁，将炮弹抛入海中，将长州守备兵丢弃的日本刀、销甲、头盔、火绳枪全部缴获。

惨风愁云笼罩着长州，藩厅束手无策。藩主急招请长假赋闲在家的高杉晋作问计。高杉成竹在胸，侃侃而论道，“当今之时，食肉之士不堪用事。吾以为应招募身强力壮者，另组新军。”高杉所谓“身强力壮者”，即士农工商、神官僧侣中的武勇之人，换言之，既打破武士垄断军事的身分制限制，广开兵源。藩主授权高杉募兵，同时通告全藩人等演习武艺、献金纳款，防备列强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7月21日，高杉将60余名前来投军的浪士、农民、町人（商人）、僧侣组成一支新军，并相对藩正规军的“正兵”之称，将这支新军称为“奇兵”队。高杉自任“奇兵”队总督，又亲自制定了立志报国、赏罚分明、严肃军纪、军制、和洋并用等军规，在长州豪商白石正一郎的资助下，“奇兵”队迅速壮大为以农民为主的300人部队。“奇兵”队的建立，意义重大：它不仅为即将到来的武力倒幕斗争提供了一支生力军，而且也为建立四民皆兵的近代军队奠定了基础。继“奇兵”队之后，类似的武装集团，如萩野队、鹰惩队、力士队、游击队、御盾队、集义队、鸿城队、八幡队等10支队伍，在举藩本土自卫的狂热中先后建立。诸队的总督或军监主要由尊攘派的下级武士担任，长州藩割据自立、开国倒幕的大割据政策，获得了强有力的武装支持。

下关海峡的炮战结束刚满1个月，鹿儿岛湾里枪炮声响成一片，萨摩藩海岸守备队与英国舰队激烈交战。这场史称“萨英战争”的起因是1862年9月14日猝发的“生麦事件”。生麦是个小村庄，位于神奈川。1862年6月，岛津久光率大队萨摩藩兵护送敕使大原重德下江户。9月14日，久光回京都途经品川、川崎，来到生麦村。由400余家臣武士组成庞大行列，簇拥着坐

[日]小西四郎：前引书，第276页。

[日]古川熏：《高杉晋作的一生》，新人物往来社1978年版，第180页。

在乘輿中的久光，步伐整齐，好不威风。正在行进时，道路前方出现 4 名骑马的英国人，即自上海来横滨的商人理查森、来自香港的伯罗德尔夫夫人和居住在横滨的克拉克和马歇尔。他们对久光的大名行列颇感兴趣，勒马驻足围观起来。开路的武士喝令退后，理查森等正欲拨转马头让路，攘夷心切的萨摩藩士奈良原喜左卫门等数人冲出行列，挥刀便砍。理查森被当场砍下马来，克拉克和马歇尔也被刺伤，伯罗德尔夫夫人幸免，策马逃回横滨，报告同伴一死两伤的惨事。旅居横滨的外国人闻讯大怒，要求驻日公使们采取强硬行动。久光一行却不以为意，仅在事后漫不经心地报告幕府说：外国人骑马冲撞了行列，被足轻冈野新助砍伤，冈野现下落不明。这个报告以“切舍御免”的方式对待重大的外交事件，并虚拟了一个冈野新助来敷衍幕府。此时，攘夷狂潮正席卷日本，在萨摩武士看来，杀死个把外国人算不了什么。

然而，“生麦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863 年 2 月，驻日英国代理公使尼尔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向幕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赔偿 10 万英镑，并在 20 日内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一艘艘英国军舰赶来增援，组成海军司令库巴指挥下的大舰队。停泊在横滨港的 12 艘英国舰队作为尼尔展开外交攻势的后盾，摆出战斗姿态。美、法等国纷纷向横滨调集舰船助威，与英国联合起来向幕府施加军事压力。幕府接受了英国的要求，6 月 24 日支付了包括赔偿东禅寺焚烧英国公使馆在内的 11 万英镑的偿金。尼尔也向萨摩藩提出逮捕并惩办凶手、赔偿 2.5 万英镑的要求，萨摩藩不予理睬。

7 月 7 日，库巴率 7 艘军舰驶离横滨，直扑鹿儿岛，尼尔、译员萨托等公使馆员同行。7 月 12 日，英国舰队出现在鹿儿岛湾，进而深入到距市街仅 12 公里的儿岛郡七岛。次日，英舰驶近距市街不远的滨冲海面，排成单纵列战斗队形，严阵以待。双方展开关于惩办凶手和赔偿的谈判，萨摩藩代表以凶手尚未抓到、赔偿由幕府和萨摩重臣组成联合谈判团与英方交涉后解决等理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尼尔、库巴等忍无可忍，决心开始武力征服。

8 月 15 日，英国舰队突袭停泊在海面的萨摩藩轮船，将“天祐”号、“白凤”号、“青鹰”号等悉数俘获。海岸炮台守备队官兵见状，怒火中烧。一声令下，10 座炮台的 83 门大炮一齐开火。此时，风雨大作。风声、雨声与炮声混合在一起，发出令人惊心动魄的巨响。库巴立即发出战斗信号，命令烧毁俘获的船只，回击海岸炮台群。英国军舰射程 4 公里的安式大炮急速轰击，使萨摩的炮台逐个丧失战斗力。停泊在岸边的琉球贸易船被击中，燃起熊熊大火。敷设诸多近代大工业机械的集成馆也被炸坏。1/10 的鹿儿岛市街被炮火击毁，火光冲天。英国舰队也遭受巨大损失：旗舰“尤里阿斯拉”号弹痕累累，舰长约斯林战死；“伯修斯”号等 6 艘军舰均被击中，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失。虽然萨摩藩炮台大炮射程不过 1 公里，但炮手骁勇顽强，死战不退，加之英国军舰低估了对手的作战能力，或距海岸过近，或驶入萨摩藩炮手平时训练的射击区内，成了海岸炮台的靶标。一场炮战下来，英国官兵死伤 60 余名。眼见战况不利，风雨越来越猛，库巴下令退出战斗。8 月 16 日，英国舰队集中火力攻击了樱岛炮台后，撤往鹿儿岛湾湾口，紧急维修舰体。8 月 17 日，英国舰队离开鹿儿岛湾，驶往横滨。

萨英之战使萨摩藩武士认识到双方武器装备的优劣差距，痛感应停止盲目排外攘夷，结好英国，以取得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加快军备近代化的步伐。不打不相识，英国也因萨摩藩的强硬反击而不再轻视对手，进而希望化敌为友，消除立足日本的一大障碍。双方产生沟通合作的愿望，和谈出现转

机。1863年12月，萨英谈判取得重大进展，萨方采用由支藩土佐原藩藩主岛津忠宽从幕府借款的方式，赔偿英方2.5万英镑，并向英方递交了惩处凶手的保证书。英方则提交为萨摩藩充当购买军舰中间人的文件，萨英关系日益发展。

攘夷之战在长州和萨摩的连遭挫折，使尊攘运动失去狂热的势头。公武合体派乘机反扑。1863年8月初，尊攘派与公武合体派围绕天皇是否应攘夷亲征问题，展开新一轮的较量。长州藩重臣益田弹正等起劲游说朝廷公卿，策动天皇攘夷亲征。真木和泉等尊攘派志士也频繁与三条实美等来往，急欲促成攘夷亲征。以中川宫朝彦亲王为首的公武合体派公卿与松平庆永等同派雄藩大名口头上拥护攘夷，但坚决反对天皇亲征，实际上是在制造对抗、压制尊攘派的托辞。从根本上说，两派之间的攘夷亲征之争仍未脱离开国后政局纷乱的核心主题：是维护还是变革现存政治体制，即佐幕还是反幕。

孝明天皇虽然是位强硬的攘夷论者，但天皇失政多年所造成的政治软弱性，使他既无定见，也无勇气收回政治统治权，重建天皇的一统天下并果断实现王政复古。因此，孝明天皇所主张的攘夷，是敦促将军挂帅，以幕府为中心，公武合体、举国一致，共御外辱。朝廷的上层公卿与天皇的主张相同。基于上述原因，当幕府对攘夷锁港阳奉阴违、态度消极时，天皇往往利用皇威、尤其利用尊攘声势向幕府施加压力；当尊攘派超出天皇容忍的范围、竭力将攘夷引向反幕府的轨道时，天皇则宁愿暂缓乃至放弃攘夷，而与公武合体派的幕藩领主联手，共同镇压不择手段的尊攘派。天皇的这种游移不定的政治姿态，在1863年9月下旬表现得最为充分。

1863年9月25日，天皇发布行幸大和的诏书，昭告天下说：为祈愿攘夷成功，朕将行幸大和，参拜神武天皇陵、春日大社，并作短暂停留，商讨亲征军事行动。随后，任命益田弹正、本户孝允、久坂玄瑞、真木和泉、平野国臣等尊攘派骨干人物为京都学习院御用挂，商讨攘夷事宜，还命令诸藩捐献行幸经费或藩主陪驾随行。另一方面，孝明天皇又向公武合体派的核心人物中川宫朝彦亲王表态说：幕府不遵守敕旨，目前不能实行攘夷；若朕去讨伐德川氏，势必祸及将军夫人和宫，如此则骨肉相残，对不住先帝；若为皇国而仓促举行讨伐，也因武备不足而时机尚早。他进而吐露真意说：“因此，日益逼近的御驾亲征应暂缓实行，也不能讨伐幕府。希望你体会朕之真意，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对此嘱咐，中川宫心领神会，立即与前关白近卫忠熙父子、右大臣二条齐敬得策划政变计划，并联络会津、萨摩等藩，准备动用武力、将长州藩为核心的尊攘派一举逐出京都。

9月30日（旧历8月18日）凌晨1点钟，政变开始。按照预谋的行动计划，中川宫最先入宫。近卫忠熙父子、二条齐敬等公卿，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兼淀藩藩主稻叶正邦等随后赶到。接着，御所周围响起一阵阵尽量压低脚步声和马蹄声，会津、萨摩、淀藩的武士们趁夜色的掩护蜂拥而至，并迅速抢占了皇宫9座大门，荷枪实弹，严加防守。守门士兵已得到命令：未获朝廷允许入内者，不管官职高低，一律不许进宫。守卫宫门的诸藩士兵喘息方定，土佐、因州、备前、阿波、米泽诸藩藩主又奉命率兵前来增援。御所俨然兵营。

凌晨4时，一声炮声轰然震响，向公武合体派的政变者们发出宫内警备

配置已告完成的信号。内廷朝堂里，中川宫等政变首要们正在通过一项项重大决定，即推迟举行前任大和的攘夷亲征行车；严禁尊攘派公卿进宫、外出或与他人接触；立即废除“国政参事”、“国事寄人”等官职；立即解除长州藩警卫堺町门的职权，由萨摩藩取而代之，等等。每通过一项决定，在场的上层公卿和雄藩大名们均禁不住连声喝彩，借以排解胸中的积郁，发泄对尊攘派咄咄逼人的不满情绪。至此，在孝明天皇授意下，由公武合体派公卿大名策动的“八·一八政变”已大体告成。

夜色中御所四周的举动，引起尊攘派们的强烈不安。清晨时分，尊攘派公卿三条实美等急忙从宅邸赶至御所，想要看个究竟。行至宫门前，发现大门紧闭，全副武装的士兵横眉怒目，拒不放行。文官遇到武弃，有理说不情。吃了闭门羹的公卿们或转身而去，或倘佯宫门，有所期待地驻足观望。不久，大队的长州人马赶到，向早先守卫多日的堺町门挺进。会津、萨摩藩兵已在堺町门附近排出战斗队形，严阵以待。长州藩兵欲进入堺町门的哨位，会津、萨摩藩兵坚决阻止。两军士兵怒目相向。彼此把炮口、枪口瞄准对方。气氛紧张、一触即发。

御所四周的武力对峙，在京都引起极大混乱。自1467年应元之乱以来，近400年间，京都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乱，京都人过惯了太平日子，生活情调悠闲而斯文。如今大战在即，不由得心惊胆战，大街小巷里挤满了躲避战乱的人群，呼爹喊娘，乱作一团。消息传到内廷，孝明天皇对长州兵下达撤出堺町门地带的敕命。王命如山，以“尊王”为旗号的长州兵马只得奉命而行，悉数撤往京北的大佛妙法院。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泽宣嘉、东久世通禧、四条隆歌、锦小路赖德、王生基修等7名尊攘派公卿也随队前往。在大佛妙法院，尊攘派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鉴于公武政体派已控制了局势，并得到天皇的支持，以2600余兵力无法与萨摩、会津、淀、土佐、米泽等10余藩的兵马对抗。退路只有一条：撤回长州，以后卷土重来。次日上午10时，以长州藩为主力的尊攘派护卫着三条实美等7位公卿，冒着风雨，沿伏见街道南下大阪，取海路返回长州。京都完全变成公武政体派的天下。

以“八·一八政变”、长州藩兵退京都为标志，尊王攘夷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在三四十月内，尊攘运动由场面火爆的全国大攘夷而急剧地丧失在京都的政治优势、甚至被赶出京都，主要是由下列主客观因素决定的。

从主观因素来说，其一，支撑尊攘运动的理论基础过于陈腐，缺乏适应时代变迁的活力。鼓舞尊攘派舍生忘死地对外压作出激烈反应的信念，无非是妄信日本乃神国、神州，国质尊贵，无与伦比；对工业化的欧美诸国的实力与先进性，知之甚少，甚至闭目塞听，陷入唯意志论的误区，试图以武士的蛮勇和锐利的日本刀，将接踵而至的欧美列强驱逐于国门之外，而不顾军备实力对比的悬殊；又不分青红皂白，四处树敌，自招失败。其二，标榜“尊王”，一厢情愿地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天皇一人，作茧自缚，使自身的活动区域狭窄，几无回旋余地。尊王论的思想基础是大义名分论和国体观念，一方面能力尊攘志士提供登上政治舞台的依据；另一方面这种依据又不是无限制的，即天皇的好恶决定了尊攘派兴衰荣辱，一旦天皇态度发生变化，局势立即急转直下。10月8日，孝明天皇召见松平容保、稻叶正邦及在京诸藩主，宣布“八·一八政变”前的各种旨意真伪“不分明”，此后的诏敕才“真正表达了联的真实意图”。换言之，高居于尊攘志士之上的天皇可食言自肥，匍匐于皇威之下的志士丧失自主性而去留由人。其三，除长州藩的尊攘派志

士主导了全藩的政治取向，其他各藩的实权掌握在公武合体派手中，这些藩的尊攘派往往以个人身分与长州藩取得横向联系，未形成雄藩之间的联合。长州藩孤掌难鸣，在整体力量对比上，尊攘派实力较之公武合体派大为逊色。

从客观因素来说，其一，尊攘派的挑战对象是欧美列强，其应战能力足以击败尊攘派的军事行动。经过工业革命之后的欧美诸国，已非江户初期的远方来客，任由德川将军锁国排挤。时代也早已不再是 200 余年前的殖民探险，而进入将全球联为一体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时代。大势所趋，任何国家和民族已难以超脱于这一历史潮流之外，锁港攘夷不过是螳臂挡车的无谋之举。其二，开国后，幕藩体制受到严重冲击而面临崩溃，却如百尺之虫，死而不僵。旧的权力框架和旧的主从关系网络，仍保持着传统的权威地位，尚有余力自上而下地控制、压抑试图自下而上地冲破幕藩体制罗网的尊攘派志士。尊攘派志士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尊王攘夷”、“天诛”的口号下，转向倒幕，正是冲破传统权力框架压制的逻辑结果。

“八·一八政变”前后的大和、生野之变，是尊攘派志士发动的倒幕前哨战。1863 年 9 月 26 日（旧历 8 月 14 日），即孝明天皇发布行幸大和、祈愿攘诏书的第二天，土佐藩的吉村寅太郎、备中藩的藤本铁石等 30 余“天诛组”志士，推举公卿中山忠光为上将，离京都奔往大和。一行人满怀舍家忘死、报国举义的决心，自许为天皇行幸的先锋队，开始了倒幕军事行动。9 月 29 日，突然袭击设在大和五条的幕府代官所，杀死代官铃木源内，宣布年贡减半，此吸引周围农民参加暴动。“八·一八政变”后，他们引军南下，占据十津川乡，千余乡民赶来加入队伍，一时颇有声势。幕府闻讯，急令彦根、纪伊藩等诸藩出兵围剿。乡民四散，中山忠光率“天诛组”30 名志士欲转入河内国继续抵抗。11 月 6 日，“天诛组”在大和国吉野郡被彦根、纪伊藩等诸藩军马包围，双方发生激烈交战。主将中山忠光在 6 名志士的拼死护卫下，杀开一条血路，直奔长州藩设在大坂的藩邸，其余志士或被杀、被俘，大和举义失败。

11 月 22 日，平野国臣等拥举公卿泽宣嘉为主将，与长州藩志士野村和作、因州藩志士松田正人、但马国志士北垣晋太郎等 30 余名尊攘派志士袭击但马国幕府的生野代官所，并迅速加以占领，设立指挥部，广召农兵入队。生野盛产白银，属于幕府直辖的银矿区，附近的农民对幕吏的作威作福极为不满。泽宣嘉等登高一呼，立即有 2000 余农民自带竹枪、火绳枪前来投军。不久，姬路、出石、丰冈等藩奉幕府之命前来镇压，起义部队被迅速击溃。11 月 24 日，泽宣嘉等冲出重围，经四国逃回长州藩。平野国臣被捕。关押在京都六角牢狱。其他志士大半被子或自杀，前后不过 3 天，生野之变又以尊攘派志士的失败而告终。

从全国大攘夷到“八·一八政变”，以及大和、生野之变，不足两个月之间，尊攘运动大起大落，由盛转衰。公武合体派乘机反攻倒算，拼命打击尊攘势力，一时间气焰嚣张。然而，尊攘派志士在痛苦的起伏消长中，分化改组、更新观念，涌现出新一代人才，产生着除旧布新的希望，驾驭着日本之舟，破浪前进。

第 4 章

萨长携手

禁门血战

“八·一八政变”后，以长州藩为首的尊攘势力被迫退出京都，以萨摩藩为首的公武合体势力大举进京，控制了局面。长州与萨摩两藩虽均力外样大名，260 年来一直是幕府防范的对象。但在幕末的政局动荡中，由于两藩的政治取向不同，1862—1863 年之间长州标榜尊王攘夷，萨摩热衷于公武合体，两藩关系趋于紧张。更由于萨长两藩皆不甘寂寞，竞相在幕府或朝廷之间扩大本藩的影响，因而形成激烈的竞争，两藩势同水火，相互敌视对立。“八·一八政变”过程中，萨摩藩取代了长州藩在京都的地位，两藩关系愈加不可收拾。为进一步巩固萨摩藩在京都的优势地位，“八·一八政变”后，岛津久光率 12 支洋枪队和 2 支炮兵大队，号称雄兵 1.5 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京都。随后，德川庆喜和伊达宗城、山内丰信、松平庆永等公武合体派大名纷纷进京。京都城里公武合体派的兵马越集越多，孝明天皇的心里也越来越踏实。1864 年 2 月，天皇先后向前来朝拜的德川庆喜和雄藩领主松平容保、松平庆永、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及岛津久光等人授以参豫之职，准予参与朝政，对当时无官无位、仅为萨摩藩主监护人的岛津久光更是恩宠有加，特叙以从四位下、左近卫少将官职。公武合体派大名们个个兴高采烈，弹冠相庆。

消息传到江户，将军德川家茂也欢欣鼓舞。1864 年 1 月，家茂率大批扈从，乘军舰取道海路，前往京都。2 月 22 日，家茂一行进入二条城，眼前同样闪过高大的城垣、城门，但家茂的心情比一年前好得多。一年前备受尊攘派的压力，满心狐疑和委屈，如今则再也不必害怕那些穷凶极恶的尊攘派极端分子，完全可以心情舒畅地对天皇尽臣下之礼，加固公武合体体制了。对将军的到来，朝廷给予热烈的款待。孝明天皇特意写去亲笔信，称赞家茂是“朕之赤子，朕爱汝如爱吾子”，希望将军“爱朕如爱父亲”，强调天皇与将军的“亲情厚薄事关能否挽回天下局势，岂不重大”！又发布诏敕，敦促幕府充实国防，以待将来实行攘夷。攘夷还是要实行，但留待将来去做。家茂对于皇的意图心领神会，遂极其坦然地滞留京都数月，并不急于回归江户。5 月 25 日，天皇召见德川庆喜、政事总裁松平直克和请老中，郑重其事地重申将庶政委托于幕府，但也强调今后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奏报朝廷。为感谢天皇朝廷的信任与庶政委任，幕府向朝廷追加 15 万袋大米的用费，改善朝廷的待遇，允许西国大名赴江户参觐交代途中，自由旅居京都或入朝拜见天皇，朝廷与幕府之间的关系达到开国以来的最佳状态。6 月里，将军家茂愉快地东归江户城。

幕府将军借助密切朝幕关系而把持国政大权的做法，引起雄藩大名的不满。围绕横滨锁港问题，参豫会议发生分裂。为迎合孝明天皇锁港横滨的要求，作为幕府代表的德川庆喜在参豫会议上力主关闭横滨港，只开放长崎、箱馆两港。庆喜的主张遭到岛津久光、伊达宗城、松平庆永的反对。久光等

[日]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日本历史》第 19 卷），中央公论社 1966 年版，第 324 页。

主张横滨港也应像长崎、箱馆一样，继续开放。横滨港的开放与关闭之争，与幕府雄藩之间的贸易利益争夺和国政主导权的争斗搅成一团，加剧了幕藩领主的意见分歧。除此以外，在如何处罚长州藩的问题上，参豫之间同样众说纷纭。德川庆喜主张在长州藩主父子不遵从隐居的命令后，再行征伐。岛津久光和伊达宗城等主张立即发兵。围绕内政外交重大问题，参豫会议相互对立，闹得不欢而散。1864年3月下旬，土佐藩的山内丰信辞职回藩。4月，德川庆喜、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岛津久光、松平容保也先后辞职，岛津久光和伊达宗城仿效山内丰信，离开京都返回本藩。短命的参豫会议因幕藩领主间的利益冲突难以协调而破产，政局再度陷入迷乱状态。

京都政局的变化，使长州藩为首的尊攘派再图恢复的信心增强。“八·一八政变”后，尊攘势力一直在京坂地区进行秘密活动，伺机东山再起。与此同时，以剑客近藤勇为队长的幕府别动队“新撰组”横行京坂，四处查访捕捉尊攘派志士，甘作幕府京都守护的鹰犬。1864年7月初，“新撰组”探得重要情报——数十名尊攘派志士潜入京都，策划火烧御所、劫持天皇至长州并欲刺杀中川宫和京都守护松平容保等要人，遂采取突击行动，逮捕了三条木屋町兵器商榘屋喜右卫门，严刑逼供。7月8日，潜伏在京都的长州藩尊攘派骨干木户孝允、吉田稔麿、杉山松助和肥后藩的宫部鼎藏、土佐藩的北添佶摩等20余人，秘密聚会于三条河原町的旅馆池田屋，商讨喜右卫门被捕后的对策。谁知隔墙有耳，消息走漏。“新撰组”探知尊攘派志士在池田屋聚会的消息后，立即密报京都守护和京都所司代，并商定夜袭池田屋。

当天夜里10时许，近藤勇带领“新撰组”的一班剑客蹑手蹑脚地逼近池田屋，闯进旅店，逢人便杀。聚会的志士仓促应战，楼上楼下，捉对拼杀。怒吼声和刀剑撞击的铿锵声中，血肉横飞。近藤勇手持名刀“虎彻”，手刃数人，杀红了眼。20余名志士，除木户孝允、渊上郁太郎等少数人幸免于难外，多数被捕或倒在血泊中。拼杀过后，3000余名幕府兵赶到，气势汹汹地包围池田屋至京都长州藩邸一带的市街。

“池田屋之变”及长州藩志士吉田稔麿、杉山松助等被害的消息传到长州，藩内的尊攘派们怒不可遏，要求立即兵进京都。“八·一八政变”后，长州藩尊攘派志士分成两派，就如何恢复长州在中央政局的地位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久权玄瑞、来岛又兵卫等坚持尊攘派的老战术和陈旧的思维模式，依然寄希望于天皇朝廷，主张京都进发论，重建长州在京都朝廷的政治地位。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不赞成久坂、来岛等人的僵化过时主张，力主实行长州藩富国强兵、开国贸易、割据自强的大割据政策，积蓄力量，伺机倒幕。正当两派僵持不下之时，“池田屋之变”猝发，长州藩京都进发论者占了上风。从7月末至8月初，藩主毛利庆亲命令益田弹正以及福原越后、国司信浓等3位家老率军东进，真木和泉、久坂玄瑞等也随后率集义队、八幡队等6支志士队前往京坂。8月中旬，长州藩世子毛利定广与公卿三条实美等也引一支军马前来增援，近2000余名长州兵占据京都近郊的伏见、山崎、嵯峨，与幕府军及佐幕诸藩军队形成对峙。

在两军对峙的紧张关头，孝明天皇命宫禁守卫总督德川庆喜出面阻止长州兵进京。庆喜督令幕府及诸藩守军严守阵地，并再三下令长州退军，长州军置之不理。正在此时，佐久间象山被暗杀事件促成长州军动武。8月12日傍晚，身为幕府军事顾问“海陆御备向挂手付雇”的洋学大家佐久间象山与庆喜谈罢军务、归宅途中，在三条木屋町附近，被突然冲上来的3名刺客砍

下马来，气绝身亡。对佐久间实行“天诛”的尊攘派刺客留下传单，声称之所以杀死“奸贼”佐久间，是因为他屡屡指责尊攘派排外蛮干，特别是因为佐久间借口保证天皇的人身安全，主张迁都彦根藩。佐久间被杀，当然令长州军拍手称快。但佐久间试图将天皇朝廷迁往彦根藩的主张，更让真木和泉等一班人焦急愤怒。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要求进军宫阙，防止天皇被动持而功败垂成。长州军首脑人物毛利定广、益田弹正等为其所动，下令进军。

8月19日午夜零时，长州军开始向京都市内移动。关白二条齐敬和中川宫朝彦亲王等公武合体派头面人物闻讯大惊，急忙连夜入宫报告天皇。孝明天皇得知又要发生战乱，不禁内心紧张起来。君臣议论多时，拿不定主意。军情紧急，20日凌晨2时，德川庆喜夜半闯宫，要求朝廷尽快下令反击长州军。1个小时后，德川庆喜终于拿到今幕府军出阵的敕书。当他走出宫门时，已经听到从南郊鸟羽一带传来隆隆的炮声。夜深人静，闷雷般的炮声听得格外分明。两军终于交火，厮杀开来。

长州藩家老福原越后指挥的一支人马率先投入战斗。在沿着伏见街道北进途中，与大垣、彦根等藩的守军展开激战。大垣、彦根藩守军人多势大，长州军几番冲击，均未奏效。激战中，长州兵受挫，福原越后负伤，遂退回伏见，准备沿竹田街道再度北攻。人马抢渡宇治川的丹波桥，不意彦根、会津藩追兵杀到，福原指挥长州军且战且退，疾走山崎。至此，这支自伏见北进京都的长州军被击败。

以嵯峨天龙寺为前敌总部的另一支长州军，由家老国司信浓、游击队总督来岛又兵卫指挥，沿距离御所最近的东进路线，攻击前进。来岛本人是位激烈的京都进发论者，其所部游击队战斗力较强，队员抱定斩杀岛津久光、松平庆永、伊达宗城等“三奸”，表露尊王的赤心忠胆和挽回长州藩名誉的必死决心，一路浴血苦战，从中立卖、下立卖两个方面，杀向会津藩据守的皇宫禁门蛤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自1862年9月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出任京都守护以来，会津藩在镇压以长州为核心的尊攘势力中最为卖力，两藩积怨颇深，形同仇敌。长州军为报“八·一八政变”时被迫在会津藩兵的枪口前后退的耻辱，在此次攻打守卫蛤门的会津藩守军时尤其勇猛。战场上，枪弹如疾风骤雨，射向蛤门，宫门多处中弹。乘会津兵后退，长州军一路呐喊，攻进御所。正在这时，萨摩、桑名等藩人马杀到，侧援会津兵。长州军腹背受敌，仍顽强抗击。流弹如蝗，纷纷落入宫中。激战中，来岛阵亡，国司信浓引残兵败退。攻打皇宫西侧门蛤门的战斗最为激烈，故称长州兵进京都的交战事件为“禁门之变”。

以山崎为攻击出发地的长州军，由真木和泉、久坂玄瑞指挥，向堺町门疾进。途中，长州军进入前关白鹰司家宅院，与前来阻击的彦根、越前、会津藩的藩兵展开激烈的炮战。会津藩炮兵队架起口径15厘米的大炮，对准鹰司宅院狂轰。炮声震天动地，回荡在御所的殿堂上空，公卿们顾命要紧，四处躲藏。年方12岁的睦仁（即位后称明治天皇）受不住枪炮声响的惊吓，以致当场昏厥。炮战中，鹰司宅院被炸得墙倒屋塌，烈火熊熊。久坂玄瑞、入江九一等身负重伤，为免遭生俘之辱，拔刀切腹自杀。真木和泉见大势已去，只得带伤率残部向山崎方向败退。

三路长州军接连败退的消息，动摇了作为总预备队、驻守天王山的益田弹正部队的军心。益田见部下已无斗志，遂带军向西退却。不久，自伏见败退而来的福原越后追上大队，合兵一处，逃往长州。幕府与佐幕诸藩兵四处

追杀，长州军损失惨重。从京都市内逃往天王山的真木和泉一行 17 人迟到一步，未追上大队，被“新撰组”与会津、桑名藩兵马团团包围。8 月 22 日，誓死不降的真木与部下在痛饮了一通清酒、慷慨悲歌之后，点燃了战地指挥部。在火光的映照下，17 名志士集体切腹自杀。幕府军乘长州军兵败京都、仓皇西退之机，兵进大阪，围攻长州藩邸。藩邸卫兵寡不敌众，便放起一把火，烧毁藩邸，趁乱四散而逃。眼快脚疾的木户孝允扮成商贾模样逃离藩邸，潜伏在但马国出石郡，等待再崛起的时机。

“禁门之变”的炮火引燃了京都木结构的民居，大火延烧到 22 日方熄灭，2.8 万余户住宅化为灰烬。混乱中，幕府借口防止关押在六角监狱中的犯人暴动，将“生野之变”中被捕的平野国臣等 30 余名志士全部杀害。

京阪关西地区的尊攘势力被幕府扫荡殆尽，关东地区的攘夷运动也在绝望的搏击中走向衰落。1864 年 1 月，尾张藩志上楠音次郎率领由 200 余名浪士和农民组成的“真忠组”，在下总国九十九里地方举行暴动。暴动者指责开港贸易造成物价飞涨和农民的穷困，强烈要求锁港攘夷。2 月，幕府派佐仓藩兵前去镇压，迅速击溃“真忠组”。1864 年 3 月，以藤田东湖之子藤田小四郎为首的天狗党，又在水产藩领内的筑波山举行讨伐误国的奸臣，报答朝廷与幕府鸿恩，扫除横滨丑夷的攘夷暴动。暴动者袭击宇都宫、桐生等地从事外贸的豪商，横行关东地区。水户藩重臣集团与幕府军联合起来，镇压天狗党，双方展开以水户城为中心的拉锯战。11 月，家老武田耕云斋被推举为天狗党义军的首领，率千余人向京都进发，幻想取得德川庆喜和朝廷的理解与支持。西进途中，天狗党义军不断遭到幕府军的追剿，被迫于 1865 年 1 月在越前的新保驿缴械投降。2 月，武田耕三斋、藤田小四郎等 24 名骨干被杀，部下 350 余人随后被斩首，约 300 人被流放，天狗党彻底覆灭。

“禁门之变”和筑波山天狗党起义被镇压，宣告尊王攘夷运动以失败而告终。自樱田门外刺杀井伊直弼以后的四五年间，尊攘派志士在斩奸攘夷、天诛举义的口号下，演出一幕幕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悲喜剧，牺牲惨重。据田尻佐所编《赠位诸贤传》所载，仅明治维新后得到天皇赠叙官位褒奖并名列诸贤传的死难志士即达 900 余人。其中，藩士出身者 767 人、乡土或浪士 62 人，包括庄屋在内的农民出身者 109 人、工商出身者 60 人，还有一些神官、儒学者和国学者。慷慨捐躯的志士领袖人物，如久坂玄瑞、平野国臣、藤田小四郎等平均年龄为 25 岁。上述情况表明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尊王攘夷运动的主力是那些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武士。在幕末开国、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分化的时代剧变中，这些在武士阶级中地位低微的家臣们，以年轻人所特有的敏感、好冲动和自我牺牲精神登上政治舞台，一展报国雄姿。由于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弱点，尊攘派志士难酬其志而付出巨大牺牲。然而，他们毕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也无从取代的一代人。在他们牺牲的基础上，新一代的时代之子、即开国倒幕派才有可能产生、壮大，充当历史主角，演出蔚然壮观的倒幕维新活剧。1864 年 9 月，幕府与列强对长州藩发动的围攻，加快了开国倒幕派的成长步伐。

围攻长州

就在长州军兵败京都的4天后，1864年8月24日，惊魂初定的孝明天皇向禁里守卫总督德川庆喜发布进剿长州藩的敕命。天皇在敕命中痛斥长州藩藩主放纵家老福原越后等假托请愿而兵谏强诉，又“自启兵端，向禁阙开炮，罪在不赦”！责令幕府尽速调集兵马，讨伐“朝敌”长州。“朝敌”，即“天朝之敌”、“朝廷之敌”。在幕末政局动荡、天皇朝廷日益占据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情况下，谁获“朝敌”罪名，谁就在政治上成为众矢之的，处于墙倒众人推的狼狈境地。长州藩自蒙此罪名后，在全国政局中被挤到后排，待东山再起，颇费了一些时日。幕府对“朝敌”这顶政治帽子的分量一清二楚，更为政敌长州藩被勒上这道紧箍咒而幸灾乐祸。8月25日，幕府向西南日本的21个藩的大名发布出兵围剿长州的命令，开始了第一次征长之役。诸藩奉命而动，萨摩藩更是一马当先。参与征长之役的藩的数量迅速增加到35个，总兵力达15万人。在征长总督尾张藩前藩主德川庆胜和副总督越前藩藩主松平茂昭的指挥下，从各个方向展开包围战攻势，进逼长州。征长总督德川庆胜寄希望于强悍善战的萨摩藩兵，特意任命西乡隆盛为征长军总参谋，以参与谋划和协调诸藩的军事行动。战云乘着8月闷热的季节风，飞扑长州上空，长州军民的心头格外沉重。

祸不单行。正当天皇与幕府点燃的内战之火烧向长州的紧急关头，由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出面策划的征服长州的军事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863年6月下关海峡炮战后，长州藩虽然被美、法舰队击败，仍固守奉旨攘夷的立场，修复炮台，虎视海峡，使这条海上通道无法利用。1864年2月幕府在参豫会议上提出的横滨锁港主张，并为此派遣外国奉行池田长发为正使的谈判团赴巴黎交涉锁港事宜，以及加强对生丝输出的限制等行动，促使列强情不自禁地动用武力，以确保在日本的殖民权益。同年5月初，阿礼国向英国外相拉塞尔提出建议，声称：“我认为，如果攻击日本武士中最凶恶、最粗暴的家伙所据守的要塞，只实行一次打击，就足以使全体大名丧魂落魄。如果这种攻击成功并取得效果，我相信必将上使天皇、将军，下使腰佩双刀的武士、浪人乃至整个统治阶级明白攘夷计划不可能成功，而且毫无希望，从而使之在今后放弃所有的攘夷计划。”7月，英、法、美、荷兰4国公使联名向幕府提交备忘录，表示为履行条约、保证安全，将采取坚决行动。8月19日，4国代表又联合通告幕府，英、法、美、荷4国舰队将对长州藩实施惩罚性攻击。

9月4日，以英国海军中将库巴为司令官、法国海军少将杰莱斯为副司令官的4国联合舰队出现在下关海峡。舰队由17艘军舰组成，拥有各种口径的火炮288门，总兵员5000余人。其中，英国出动军舰9艘，火炮164门，官兵2850人；法国出动军舰3艘，火炮64门，官兵1159人；荷兰出动军舰4艘，火炮56门，官兵951人；美国出动军舰1艘，火炮4门，官兵58人。为防不测，在横滨尚保留英国军舰4艘、美国军舰1艘以及从香港抽调来的英国陆军官兵1300余人。4国联合舰队实力压倒长州藩的防卫力量，形成一战心胜的绝对优势。

英国国内报刊早在半年前已开始大造武力征服长州的舆论。正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从《泰晤士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焦急万分。通

芝原拓自：《开国》（《日本历史》第23卷），小学馆1975年版，第264页。

〔日〕小西四郎，《开国与攘夷》（《日本历史》第19卷），中央公论社1966年版，第294页。

过亲身感受英国工业革命的威力和欧洲的形势，伊藤等痛感盲目排外攘夷的危害，遂于 1864 年 7 月中断留学、返回横滨，拜会阿礼国，保证回藩劝说藩主停止攘夷，与列强友好往来，恳求阿礼国罢兵。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上策。阿礼国同意伊藤等回藩游说，然后视长州的反应再作决策。然而，长州藩上下正热衷于进军京都，虽然伊藤等费尽口舌，却毫无效果。20 多天过去了，阿礼国等得十分不耐烦。4 国联合舰队直趋长州，武力征服战争终于来临。

大战在即，新任下关总奉行的长州藩家老穴户备前眼见“禁门之变”后藩军元气大伤，无力对 4 国联合舰队交火，9 月 5 日，急命伊藤、井上等携带藩主保证不再阻拦通过下关海峡外国船舰的亲笔信，登舰与库巴等交涉停战事宜，要求将舰队发起攻击的时间推迟 2 小时，以说服海岸守卫部队停止抵抗。然而，据守下关的“奇兵”队等诸队鼓噪应战，劝说工作颇费时间。待“奇兵”队等诸队听从说服时，已超过推迟攻击的时限。当天下午 4 时 10 分，4 国联合舰队的旗舰“尤里阿拉斯”号发出开始攻击的信号，战斗打响。

一刹那间，炮声轰鸣不止，千百发炮弹如同骤雨，射向田之浦、串崎岬等炮台，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而起。串崎岬炮台的 3 门大炮稍事抵抗，即被打哑。紧接着，舰队的炮弹向前田炮台飞去，击中弹药库，引起连续 3 次的大爆炸。1 个小时后，长州藩的主要炮台群被舰队悉数摧毁，到处腾起烈火与浓烟。空气中充满着刺鼻的硝烟味，长州守备兵四散逃跑，阵地上不见一个活动的人影。英国和法国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呐喊着冲上海岸，占领炮台阵地，将长州守备兵遗弃的 14 门大炮全部破坏。

9 月 6 日清晨，“奇兵”队军监山县有朋召集队员潜回前田炮台，架起几门炮，向停泊在海岸近处的 4 国联合舰队突然实施炮击。炮击未造成多大的损害，却招致联合舰队的猛烈回击。2000 余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涌上滩头，攻击前进，并迅速占领炮台群。部分士兵翻过山岗，冲进下关町市街，追击“奇兵”队。余下大群士兵炸毁炮架，将散落在阵地上的炮弹、火药扔进海中，搬走缴获的大炮。下午 4 时，山县带“奇兵”队偷袭登陆的 4 国海军陆战队，队伍刚刚展开，就被陆战队的密集炮火击退。此后，长州藩彻底停止了抵抗。

9 月 7 日，舰队向西进击，占领彦岛。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将岛上的弟子村炮台等要塞炮台群逐一加以彻底的破坏。联合舰队的军事行动持续到 9 月 8 日。前后 3 天的战斗中，联合舰队以战死 8 人、负伤 30 人的轻微代价，摧毁了长州藩苦心经营多年的各海岸炮台群，缴获大炮 60 余门，取得胜利。至今，在法国巴黎的荣军博物馆仍陈列着当年从长州掳获的长州大炮。由于长州守备军除“奇兵”队进行了某些抵抗外，大部分守军一触即溃，因此，伤亡人数寥寥。据《防长回天史》统计，长州方面战死 14 人，负伤者 40 余人。

然而，长州藩毕竟战败了。9 月 8 日，藩主启用因反对进发京都、脱藩而获罪在家的高杉晋作，以穴户备前的养子字户刑马的假名，出往谈判首席代表。高杉率译员伊藤、井上，登上旗舰“尤里阿拉斯”号，与库巴为首的 4 国代表展开请和谈判。几经风雨，高杉与伊藤、井上等成为放弃攘夷、实行开国倒幕方针的志同道合者。3 人配合默契，9 月 14 日与 4 国代表缔结《停战协定》，规定长州藩以“亲切的态度”，善待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舰；向过境外外国船舰提供煤、食物、淡水及其他船上所需物资；外国船舰在下关

遭风浪袭击时，允许船员登陆避难；不再构筑新炮台，可修复旧炮台、但不再配置大炮；作为4国舰队未烧毁下关市街的报答并补偿4国出动舰队的军费，由4国公使与幕府谈判决定赔偿费，数额另行公布。

在谈判过程中，高杉、伊藤等竭力将责任推给幕府，为长州藩辩解并挑拨列强与幕府的关系。作为证据，高杉等将朝廷和幕府攘夷命令的抄本送给4国谈判代表，辩白长州藩屡屡炮击外国船舰不过是奉幕府命令的结果，长州对外国并无敌意。一席话，说得库巴等晕头转向。伊藤等又乘机指责幕府之所以强制诸藩攘夷，是为了垄断开放港口和贸易，而开放的长州愿意下关开港，与列国进行“长州四白”、即棉花、白蜡、生丝和纸张的贸易。联系幕府一再要求推迟新潟、兵库开港，派代表赴法国谈判关闭横滨港，处罚在谈判中转变立场并与法方缔结《巴黎约定》、答应保障列强的下关海峡通航权和降低进口关税的正使池田长发以下谈判代表，随后又单方面宣布废止《巴黎约定》等种种表现，库巴等相信了高杉、伊藤等对幕府的指责，认定幕府才是攘夷的祸首，进而对长州藩转变看法，奠定日后支持长州的基础。

在谈判过程中，高杉、伊藤等表现了高超的外交手腕，使长州藩转危为安。同时，高杉在交涉中也未作有损国家主权的妥协。库巴引兵占领了扼守下关海峡的彦岛后，对其战略价值印象深刻，于是提出以英国长期租借彦岛为条件，实现停战。高杉曾目睹上海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以租借彦岛有伤国家体面为理由，婉然拒绝了库巴的要求，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由于法国等其他国家代表无意英国独吞彦岛而控制下关海峡的西出海口，采取不合作态度。库巴陷入孤立，只得放弃此项要求。45年后，伊藤路过彦岛，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高杉拒租彦岛的往事，不胜感慨他说：如果彦岛被英国强行租借，势必像香港九龙一样，成为英国扩张的桥头堡，思之令人不寒而栗。伊藤为缅怀高杉的功绩，特赋诗曰：“护持掌大弹丸地，得免神州御侮疏。”

9月20日，4国联合舰队驶离下关，直奔大阪，在炫耀了一番武力后，返回横滨。在江户，4国公使与幕府举行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列强以长州藩炮击外国船舰为奉朝廷幕府命令的举动为理由，要求幕府支付赔偿。9月22日，双方协议，幕府同意取消生丝贸易的限制，支付300万日元赔款，从1865年9月幕府支付50万日元的首批赔款，至幕府灭亡，共支付全部赔款的一半。余下的150万日元的赔款，由明治政府于1875年偿还完毕。作为4国联合舰队攻击长州的一个重要成果，英法两国将1863年7月迫使幕府承认的横滨驻兵权付诸实施，分别设立兵营。其中，英国兵营用地6.6公顷，包括总督官舍、容纳1500人的兵舍、医院和火药库在内的126座建筑物，建筑面积为1.4公顷，还敷设有训练场、靶场等。法国兵营用地约1公顷，建有3座可容纳300人的士兵宿舍，总建筑面积约4公顷。英法驻兵横滨，意味着日本进一步加深半殖民地化的危机。

“八·一八政变”后，一批不顾时势、试图强化幕府权威的鹰派人物，即老中小笠原长行和酒井忠毗、大目付永井尚志、勘定奉行小栗忠顺、目付栗本鯉等执掌实权。这批人闭眼不看幕府权威衰微、雄藩大名崛起并要求中央政局发言权的事实，一味重建幕府一言堂的过时权力框架，势必造成举措失当、雄藩与幕府离心离德的局面。1864年10月初，幕府下令取消两年前缓和参觐交代制度的规定，强令诸藩大名遵从以往的旧例，每隔一年轮流

赴江户参拜将军，将大名妻子儿女重新送回江户、留作人质，使得诸藩大名怨声载道。他们还指责公武合体论大名德川庆胜等手软，怀疑居京协调幕府与朝廷、雄藩关系的德川庆喜削弱了幕权。11月23日突然将军舰奉行胜海舟召回江户，撤掉其职，取消其2000石的俸禄，另任小栗忠顺为军舰奉行，搞得幕府内部彼此猜疑，步调不一。此时正值兵围长州的用人之际，小笠原、酒井等却笨招连出，不啻自乱阵脚。加之行军作战，糜费粮饷，无疑给诸藩大名增加沉重的财政负担。大名们或者担心重新在幕藩关系中被置于弱末的位置，或者认为在外国攻击长州时加入征长之列十分不光彩，等等，结果造成幕府当局在江户竭力督战，但向长州进发的诸藩态度消极、士气不高的奇特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迟迟未到达前敌指挥部。总参谋西乡隆盛虽出于削弱竞争对手长州藩并通过与幕府合作以巩固、增强萨摩藩的发言权和威望等考虑，一度主张对长州实施速决战，削减并转封其领地，严加制裁。但他却在10月11日与胜海舟面谈中，被海舟排除专横的幕府鹰派人物、雄藩会议共定国政的主张所打动，又考虑到民心的离反等问题，转而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想法，改用不战而胜的静观方针，坐收长州内斗的成果。这样，就避免了倒幕基地长州藩被彻底拔除的危险，为高杉等开国倒幕派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谋略家的西乡隆盛，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主张的确有洞察长州藩上下分裂趋势的高明之处。自“禁门之变”、兵败京都以来，长州藩中下级武士连遭4国舰队炮轰下关、诸藩兵进国门等重大打击。以惊梨藤太为首的门阀保守势力，借口保全藩主毛利家的地位，组成由上纵武士把持的“选锋组”，主张对幕府“纯一恭顺”，乘机打击号称“正义派”的中下级武士，攻击藩厅改革派。这些以门阀上层武士为核心的保守势力，通称“俗论派”。10月下旬，力主“武备恭顺”的“正义派”与“俗论派”在决定政治方针的会议上激烈争辩。会后，“俗论派”将“正义派”骨干井上馨刺成重伤，并逼迫改革派代表人物周布政之助自杀。11月下旬，“俗论派”控制了藩厅，严令“奇兵”队等诸队解散，收缴民间武器，禁止农工商习武，又大肆攻讦革新措施，否定开国政策。形势急转直下，益田弹正等3位家老被囚禁，宍户等7位参谋被逮捕，伊藤博文被挤走，高杉晋作只得化装出逃九州。

“俗论派”控制下的长州藩厅不战而降。1864年12月2日，西乡隆盛率军开进长州支藩岩国藩，向藩主吉川经干提出一系列投降条件，即处罚“禁门之变”率兵入京的益田等3位家老、将滞居长州的三条实美等5位公卿转移他藩、拆除山口城等，否则将在12月16日对长州发起总攻击。“俗论派”对西乡的条件全部接受，并乘机加剧迫害。12月9日，益田弹正、国司信浓、福原越后等3位家老被迫切腹自杀；宍户左马之介、佐久间佐兵卫、竹内正兵卫、中村九郎等4位参谋被斩首。随后，益田等3位家老的首级被星夜送往征长军指挥部广岛，供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等验明正身，以示谢罪。庆胜当场勒令长州藩主父子提交认罪书，三条等5位公卿尽速离境，拆除山口城。长州藩为避免被攻击，藩主毛利敬亲、定广父子连忙送交认罪书，将三条等押往筑前藩的大宰府，还象征性地拆除了山口城的部分建筑。幕府征长军不战而胜，1865年1月24日，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下令撤军。2月10日，幕府布告诸藩，声称由于长州藩主父子已认罪服罪，原定将军家茂亲自出阵征长之举宣布取消，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一时间，倒幕前景黯淡，安政大狱的幽灵徘徊在日本，倒幕斗争进入决定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

萨长缔盟

将军集权与大名分权的幕藩体制政治构造，决定倒幕斗争必须走雄藩联合的道路。在开国后政治斗争的分化组合过程中，长州藩最有希望成为促成倒幕雄藩联合的第一个藩。然而，4 国联合舰队攻击下关和幕府发动的第一次征长之役背景下“俗论派”的执政，几乎使上述希望化为泡影。时势造英雄，同时也呼唤英雄冲破“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局，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化名“东行狂生”和“西海一狂生”、曾师从“二十一回猛士”吉田松阴的高杉晋作，应时势的呼唤，大踏步走向斗争的最前列。

1864 年 12 月初为躲避“俗论派”的迫害，高杉晋作在白石正一郎的协助下，渡海前往博多，隐藏在筑前藩倒幕女尼野村望东尼的平尾山庄。“俗论派”在藩内反攻倒算、摧残“正义派”人士的消息，使高杉食不甘味、焦急不安，深感与其坐待时机，不如回藩举义，死中求生。高杉深信“俗论派”的倒行逆施已失去民心、士心，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不难推倒“俗论派”的统治。12 月 24 日，高杉秘密潜回下关，联络同志。为表明舍生取义的决心，他为自己草拟墓志铭，称自己是“故‘奇兵队’建队总督高杉晋作、西海一狂生东行墓、游击将军谷梅之助也”。高杉之所以在墓志铭上大书“‘奇兵’队建队总督”，是因为他特别重视与“奇兵”队的特殊关系，将举义的希望寄托于“奇兵”队等诸队。为此，潜回下关后，高杉首先去“奇兵队”驻地鼓动起义，涕泪纵横地号召队干部与他共同崛起。然而，担任“奇兵”队队长的赤根武人等态度冷淡，不予响应。结果，高杉未得到“奇兵”队一兵一卒，仅借得一匹马。

正当高杉进退维谷之时，伊藤博文、石川小五郎各率所部力士队和游击队来投，使高杉绝处逢生。1865 年 1 月 12 日，高杉、伊藤、石川等百余人在功山寺宣布起义。13 日，高杉率义军攻占下关新地会所，打开米仓、救济百姓，派人四处宣传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农商安居乐业，扩大起义的影响。高杉还亲自到三田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癸亥”号全舰官兵加入起义行列，义军的势力大增。30 日，高杉在百姓支持下，再次率军攻占新地会所，夺得大批武器、资金，并飞檄各地，痛斥“俗论派”“名托恭顺，实存畏缩偷安之心，不顾名誉义理，献媚四境之地”，宣布“我等世浴君恩，与奸党不共戴天”，号召全藩士民起义，反抗“俗论派”控制的藩厅。“俗论派”门阀势力对高杉下关起义又惧又恨，遂一面派兵前往镇压，一面加紧对“奇兵”队等诸队的压制，强令收缴武器、遣散队员。“奇兵”队普通士兵被激怒，群起造反，态度暧昧的队长赤根武人被士兵赶走，监军山县有朋率部起义。山口、小郡等地的农民、町人踊跃投军或提供军费，义军声威大振，转入全面反攻。

2 月 1 日，起义诸队乘夜色掩护，袭击驻扎在绘堂的“俗论派”军队，攻势猛烈，打得猝不及防的“俗论派”军队丢盔弃甲，狼狈逃窜。5 日，再战大田，起义诸队人人争先，苦战一天，击溃“俗论派”军队。9 日，起义诸队乘胜追击，在大木津河口重创敌军。同日，高杉率军与诸队会师大田，

东行先生 50 年祭纪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东行遗稿》，下卷，民友社 1916 年版，第 146 页。

春亩公追颂会编：前引书，第 189 页。

起义军欢呼雀跃，士气高昂。11日，起义诸队分兵合击，将盘踞在赤村的“俗论派”军队彻底击败，随后兵进山口、萩城。沿途百姓町人箪食壶浆，欢迎诸队，纷纷争馈粮食金钱，起义军愈加斗志旺盛。14日，起义诸队占领山口城，取得决定性的重大进展。3月11日，起义诸队举行最后的胜利进军，将萩城团团包围。起义诸队兵临城下，城内一片混乱。此时，停泊在萩城附近海面的“癸亥”号又鸣炮示威，城内愈加人心惶惶。在起义诸队的军事压力下，“俗论派”政府垮台。藩主毛利敬亲接受高杉等“拔擢人才，改革兵制”以对抗幕府的要求，宣布“实行维新之政，重谋上下一和”，即建立倒幕派掌权的举藩一致体制，推行高杉历来倡导的大割据政策。4月12日，毛利敬亲决定以“正义派”的武备恭顺方针为处理内外时局的总方针，木户孝允、广泽真臣、大村益次郎等被迎入藩厅执政。倒幕派（“正义派”）新政府遵循武备恭顺的方针，表面偃旗息鼓，故作恭顺姿态，背地里招兵买舰，加紧备战。下关起义的胜利一扫积聚在长州上空的乌云，形势顿时剧变。从此，长州藩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个坚强的武力倒幕的根据地和团结全国倒幕派的凝聚点，倒幕运动也随之度过危机期而步入坦途。

倒幕派执掌藩政之初，高杉晋作与伊藤博文赴长崎，准备前往英国考察，以寻求长州未来的新发展、富国强兵的途径。在长崎，高杉听从英国商人格伦威尔和英国领事洛德的劝告，返回长州，出任处理对外联络工作的“外国接应挂”，热心发展外贸，充实长州的实力并打破幕府的封锁制裁。与此同时，他屡屡向木户孝允等提出实施藩政改革的各项具体措施：经济上，确立法规，使农工商各得其所，振兴百业，加强钱粮管理，增加财政收入，以确立富国之本，使长州成为“五大州中第一等富强之国”；政治上，启用人才担任各级官吏，严明法度，令行禁止，密切注视天下形势的变化，伺机而动；军事上，选拔英武之士担任指挥官，加强诸队军纪，购置枪炮舰船，充实长州藩的陆海军，以备非常之时的拼搏。木户采纳了高杉的意见，派遣伊藤、井上等携巨款赴长崎，经坂本龙马协助，购进步枪7000枝、汽船1艘。伊藤等人去长崎购置军火，不仅为长州藩击退幕府发动的第二次征长之役奠定了物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萨摩与长州的携手联合找到了一位最得力的中间牵线人——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1835—1867年），为土佐藩下级武士。1861年加入武市瑞山为首的尊王攘夷派团体土佐勤王党，全身心投入尊攘运动。同年，为研修剑术、结交天下豪杰志士，龙马索性脱藩，离开土佐云游四方。1862年，坂本龙马与千叶重太郎欲假借拜访“咸临”号舰长胜海舟，乘机谋刺之。不想在谈话中，听到经过太平洋风浪洗礼的胜海舟关于世界形势和创建海军、谋取富强的一番演说后，坂本龙马心悦诚服，转而拜海舟为师，抛弃攘夷论，变为开国论者，并为实现海舟的目标奔走。1863年，龙马当上兵库海军操练所的召集人“塾头”，海舟则晋升为海军奉行。师徒二人在致力近代海军创建的同时，认为欲建成全国共有的海防体制，必须实行政治改革，变幕府的寡头政治为共和政治，即采用列侯会议形式的公议政体。1864年第一次征长之役期间，经龙马从中联络，征长军总参谋西乡隆盛与胜海舟会晤。胜海舟关于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建立公议政体的主张，使西乡大为折服。从此，坂本与西乡过往甚密，相互引为知己。1865年，坂本龙马在长崎创立贸易团体

“龟山社中”，一边从事贸易，一边研修提高航海技术。“龟山社中”受到萨摩藩的保护和资助，其贸易也给萨摩带来厚利。这个以西乡与坂本友谊为纽带、以政治上的共识与经济利益为基础的贸易团体，日益成为西南诸藩横向联络的活动场所。

第一次征长之役后，萨长两藩的对立愈加不可调和。为发泄仇恨，长州人把“萨贼”二字写在木屐上，踩在脚下面，以示不共戴天。萨摩人则竭力参与打击长州的活动，为其连遭挫败而幸灾乐祸。然而，由于幕府鹰派人物执政，采取强化幕府权威、恢复参觐交代旧制、加紧贸易管制等排斥压抑诸藩大名的措施，加剧了萨摩等雄藩与幕府的矛盾。萨摩藩一方面要打长州牌，借以对抗幕府的专横，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对长州的贸易，互通有无、赚取利润。长州藩则急于摆脱沦为“朝敌”后的孤立局面，输入军火物资、以迎击幕府即将发动的第二次进攻。与此同时，自下关海峡炮战和萨英战争以来，萨长均转用开国进取方针，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改革派先后执掌藩政。这样一来，两藩在政治谋略或经济利益上的趋同性日益增强，相互化敌为友、携手合作的机运日见成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有识之上居中斡旋撮合了。

最早明确提出萨长携手合作主张的，是与坂本龙马同为土佐藩下级武士的中冈慎太郎（1838—1867年）。中冈与坂本均为土佐勤王党的骨干，1863年11月土佐藩镇压尊攘派，勤王党首领武市瑞山等被捕入狱，中冈慎太郎逃往长州，投奔流亡在那里的三条实美。作为一名脱藩志士，中冈随长州尊攘派一起行动，在“禁门之变”的战斗中负伤，经历了4国舰队的进攻、幕府第一次征长军的围剿，痛感仅靠长州一藩的孤军奋战，难以成就倒幕的大事业，只有萨长联合，方能再兴天下。1865年1月8日，中冈慎太郎前往小仓，与西乡隆盛交涉将三条实美等5位公卿转移至筑前藩大宰府等有关事宜，从此结识西乡，提供了劝说西乡与长州和解的契机。同年3月，当高杉晋作率起义诸队追击“俗论派”军队、即将夺取藩政权时，中冈慎太郎与长州、萨摩藩的志士们在白石正一郎家中聚会，分析形势，商讨萨长联合的行动计划。会后，中冈赴萨摩游说西乡。

坂本龙马对中冈关于萨长联合的主张态度积极，1865年6月前往大宰府拜会三条实美等5位公卿，力陈萨长联合之策。在三条等支持下，龙马又赶赴下关会见执掌藩政的木户孝允，说服木户捐弃前嫌，等待西乡前来会谈。经中冈劝说，西乡本欲到下关会见木户，却因收到大久保利通敦促其进京议事的通知，急赴京都而未去下关。木户深感失望和耻辱，当着龙马、慎太郎的面痛斥萨摩人轻视长州，言而无信。萨长联合的计划搁浅。龙马见状十分焦急，一面解释西乡进京是为阻止幕府再次征长之举，竭力消除误会，一面保证由萨摩出面为长州购买军火，以表明萨摩藩对两藩联合的诚意。在取得木户的谅解后，8月，龙马亲赴京都萨摩藩邸会见西乡，促成西乡同意以萨摩名义为长州购买枪炮舰船。不久，坂本的“龟山社中”船队为长州运来军火，又从长州运回萨摩急需的大批军粮。萨长联合的前景明朗起来。

经多方奔走，1866年2月坂本龙马终于促成萨摩藩邀请木户入京商谈两藩联合事宜。十几天过去了，3月6日，龙马兴冲冲地来到萨摩藩驻京都的藩邸拜访木户，却见木户一脸怒容，抱怨说虽终日美酒佳肴，却不见萨摩人谈论联合的正题，倘若再拖延下去，只得返回长州。龙马劝慰了木户一番后，急忙去拜见西乡隆盛和小松带刀，敦促他们早作决断，尽快实现两藩的联合，再拖延下去将贻误倒幕大计。西乡沉思片刻，表示赞成立即缔结萨长

同盟。3月7日（旧历1月21日），在龙马的斡旋下，萨摩代表小松、西乡与长州代表木户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经过实质性的会谈，双方正式签订萨长提携的倒幕盟约，建立了两藩联盟。为昭示信义、防止中途有变，木户还特意请坂本龙马作为盟约的保证人，签字画押。

萨长盟约共有6条，依次为：一旦发生幕府征伐长州的战争，萨摩应出兵控制京阪地区；若长州战胜幕府军，萨摩应出面斡旋朝廷，建议调停；万一长州战而不胜且面临溃败的危险时，萨摩应尽力加以援助；若幕府军不战而东归时，萨摩应乘机向朝廷展开活动，洗清长州“朝敌”的冤罪；若驻守御所的一桥、会津、桑名等佐幕诸藩把持朝廷，阻碍萨摩的斡旋时，应出兵与之决战；若朝廷赦免了长州的冤罪，萨长双方应以诚相见，共同为皇国尽心竭力、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竭尽忠诚以光耀皇威，复兴皇权。从上述条约的基本内容不难看出：第一，萨长盟约是为对付即将来临的第二次征长之役而订立的攻守同盟，较为具体地规定了应付各种事态的处理办法；第二，盟约确定了推翻幕府统治的基本手段，即武力倒幕，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第三，萨长缔盟、武九倒幕的目的是实现皇权的复归、即王政复古，以克服内外危机，光耀国威皇威；第四，盟约还表明了武力倒幕派的一个基本特点，即擅长于破坏旧体制，而对如何建立新政体语焉不详。在这个方面，较之由公武合体派演化而成的公议政体派略逊一筹。总之，萨长盟约的缔结，标志着武力倒幕派的最终形成，意味着一个以萨长携手为中心的武力倒幕新阶段的到来。在此后半多个世纪的日本近代史中，萨长轴心支配了日本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命运，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

四境战争

1865年5月，正当长州藩武力倒幕派驱逐“俗论派”、执掌藩政并全面着手富国强兵的改革时，幕府于13日任命前尾张藩藩主德川茂德为征伐长州的先锋总督，开始筹划第二次征长之役。6月9日，将军德川家茂亲率幕臣、佐幕诸藩藩主和幕府军，离开江户城，有去无回地登上征程。为显示军威、祈祝胜利，家茂披挂整齐，还特意仿照当年家康进军关原的作派，命亲兵高举金扇和银马标，带领新训练的步骑炮三军向西开拔。途经沼津、韭山、骏府和名古屋时，家茂有意招摇，举行阅兵式，鼓舞士气。直到7月22日，征长幕府军方开进京都。随后，家茂拜见孝明天皇，奏明征伐长州的理由，声称“长州藩虽一度表示认罪，但后来激进党徒卷土重来，密派家臣到外藩购置大量大炮、小銃、密谋不轨”，恭后天皇恩准讨伐。接着，率军返回大阪，等待敕许。8月14日，幕府责成安艺藩传达命令，让长州支藩德山藩藩主毛利元著等来大阪听候差遣。严令之下，长州藩竟不予服从，9月26日，毛利元著请求推迟赴大阪，令幕府碰了软钉子。

为尽快取得天皇对征长的敕许，10月里，将军家茂再次进京，朝廷公卿集议，促使天皇敕许再征长州。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反对征长的意见却不因敕许而鸦雀无声。参加过第一次征长之役的前总督德川庆胜认为，再征长州师出无名，担心此举事关天下的治与乱，应慎之又慎。其副将松平茂昭也认为，轻启兵戈将造成大名财政困难，引起百姓怨恨幕府，导致天下大

乱，危及德川家的统治。曾在第一次征长之役中出过大力西乡隆盛，对再次征长反应冷淡，称之为将军家的私斗私战，萨摩不打算参战，预言将军出阵乃自招灾祸之举，从此天下将陷入动乱，德川氏发兵之时，即其衰亡之日。其他诸雄藩如尾张、越前、纪州、肥后、筑前等纷纷表示不赞成发兵征长。诸藩或因战费加重财政负担、或因对第一次征长后幕府强化统制不满，态度消极。这样一来，就使得将军家茂虽有再创关原之战式大胜的愿望，却无法获取关原之战一样的战果。

此外，欧美列强、尤其是英法两国的介入，也增加了再次征长的难度。第一次征伐长州时取胜，实际上是4国联合舰队替幕府击败长州、幕府坐收不战而胜的成果。在此之后，特别是下关长州诸队起义之后，英国转而支持长州。1865年7月，新任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在前往横滨赴任途中，特意在下关登陆，与木户孝允、井上馨等会晤，密切与长州藩的关系。9月，在巴夏礼的允许下，长州藩自旅居长崎的英国商人格拉沃手中购得大批军火，为第二次征长之役获胜预先作好充分的准备。与此相对，1864年4月，法国前阿尔及利亚总督罗休改任驻日公使后，为维护殖民权益，与英国在日本展开激烈竞争，试图通过支持幕府以控制对日贸易的主导权，对抗已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优势的英国。在罗休的劝诱谋划下，小栗忠顺、栗本鯉等鹰派人物奉行亲法政策。1865年2月，幕府以听任法国垄断生丝贸易为交换条件，借得240万洋元的法国贷款，用来创设横须贺制铁所和造船所，制造枪炮舰船，充实幕府的武力，以镇压国内反对派。同年10月，小栗又接受了罗休的新建议，组成日法商人联络机构“组合商法”，密切两国经济关系。1866年8月，罗休甚至跑到征长前线，向坐镇小仓的老中小笠原长行面授如何采取军事行动及严惩长州的机宜，俨然幕府的最高顾问。

在展开争夺的同时，英法在获取对日本共同殖民权益时，又相互合作。为迫使兵库早日开港、天皇批准安政条约和重订税率，1865年11月4日，由巴夏礼出面联络，5艘英国军舰、3艘法国军舰和1艘荷兰军舰闯进兵库近海，以炮舰相威胁，要求朝廷幕府立即给予答复。征伐长州的大战在即，幕府生怕引起外战，首尾不能相顾，急派老中阿部正外、松前崇广与4国代表交涉，全面接受列强的要求。孝明天皇得知此事，震怒不已。兵库邻近京畿要地，一旦开港，必定将京都置于列强的武力威胁之下。11月17日，天皇责令幕府罢免并处罚未经敕许、擅自答应兵库开港的阿部、松前等。幕府出于在进攻长州前与朝廷保持和谐、借助君臣名分论为征长提供正当理由，遂奉皇命而行。11月18日，免去阿部、松前的老中职务，令其闭门思过。同日，将军家茂另派德川庆胜赴京，恳请天皇批准条约并允许兵库开港。为向朝廷施加压力，家茂向夫白二条齐敬提交了辞职的辞呈。将军声称辞职的举动，使朝廷上下惊慌不安。虽说孝明天皇欲显示皇权皇威，但他心里明白：离开将军家茂的支持，一无军队、二无钱粮的朝廷无法应付纷扰混乱的局面。家茂撂挑子的策略奏效了。11月21日，中川宫朝彦亲王、关白二条等公卿大臣与德川庆喜、松平容保等，在小御所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幕府与朝廷的紧张关系，决定双方互作让步，维护朝幕一致的局面。按照会议的决定，11月22日，孝明天皇向朝彦亲王、关白二条下达诏书，终于批准了安政条约，同时强调兵库不得过早开港。一场冲突避免了，幕府又提出新的要求。1866年3月8日，幕府奏请严惩长州、如削封10万石、藩主引退等要求，天皇立即加以批准。关于改订税率的谈判随即展开。6月25日，老中水野忠精在江

户与英、法、美、荷等4国代表签订《改税协定》，规定欧美国家对日贸易的出入关税一律为5%的从量税。这样，在丧失关税主权方面，日本与中国处于同等水平，半殖民地化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在解决条约敕许、兵库开港和改订税率等涉外问题期间，幕府不得不面临列强和朝廷的压力，周旋其间已颇感吃力。与此同时，来自萨摩藩和后方民众骚乱的双重夹击，更使征长的步伐举步维艰，从而难逃注定失败的命运。1866年3月，萨长缔盟，萨摩秘而不宣地站在长州藩一边。5月28日，大久保利通赴大阪拜访老中板仓胜静，提交萨摩拒绝出兵征长的文书，将援长倒幕的立场明朗化。无论是明是暗，萨摩拒不出兵，意味着征长军中失掉最为骁勇善战的部队。在征长之战前夕，已扭转了交战双方实力对比的格局。至于1865年7月幕府大后方来势凶猛的民众骚动，使同期将军的出征、赴京恳请天皇敕许再征长州的行动备受牵制，徒劳无益。继1865年7月江户贫民反对物价暴涨群起抗议之后，同年10月越后国农民孙右卫门等赶到京都二条城门外，向将军家茂请愿，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随后，在讃岐国多度郡、隐岐国原田、大和国宇陀郡、下总国海上郡、安艺国佐伯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抗议米价腾涨和村吏的专横霸道。1866年3月和泉国南郡、越后国高田郡农民暴动，6月大阪贫民暴动，兵库池田发生打砸骚乱，7月江户贫民暴动，接连数日骚乱不止，弄得幕府的警备力量手忙脚乱，穷于应付。至10月，民众的骚乱暴动遍及武藏、陆奥、上野、出羽、伊予、石见、信浓诸国，幕府的统治区域到处出事，后院起火，直接影响了征长幕府军的士气。

从以上内外各种情形来看，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之役的确是胸无定算、凶多吉少。然而，自1865年5月幕府下令征长，至1866年7月，已过去14个月，若忽然罢兵，等于自认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德川庆喜对肥后藩长冈良之助的一番慨叹，就道出了幕府欲罢不能的心态：“时至今日，已是骑虎难下。当然不能就止罢休，否则国内势必大乱。”

7月14日，幕府下令参战的20余藩进军长州。7月18日，幕府舰队炮击大岛、上关，第二次征长之战打响。

战争初期的态势是征长军沿大岛口、艺州口、石州口、九州等4个方向围攻长州，长州军兵分4路迎击敌军，守境卫土。因此，第二次征长之役亦称四境战争。充当长州军总指挥的是染病在身的高杉晋作。敌军压境，高杉身兼长州海军总督、海军参谋、九州口参谋等职，与负责指挥艺州口作战的井上馨、负责石州口阻敌的大村益次郎等相互配合，或指挥全局，或亲临前线，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才干。高杉不为貌似强大的敌军吓倒，冷静分析形势，认为幕府军“炮击海岸”、“焚掠民家，杀害无辜人民，暴虐之极”，已激起全藩士民的愤怒，长州人同仇敌忾，必定能“横扫四境之敌”。高杉扬长避短，充分利用长州军熟悉战场地形、士气高昂、武器装备较为先进等有利条件，大胆采用奇袭战术，集中力量突破幕府军的重点进攻，以初战的胜利鼓舞斗志，进而夺取全局的胜利。

7月19日，幕府军主力在“富士山”号等4艘军舰的掩护下，攻占大岛，企图以此为基地，直捣长州腹地山口。高杉判定大岛口战斗的胜负影响全局，21日亲率“丙寅”号驶离下关，直趋大岛前线。23日夜半，高杉指挥“丙寅”号悄悄驶入停泊着幕府舰队的久贺冲海面，一声令下，舰上大炮齐鸣，

突袭敌舰。幕府舰队来不及卸下炮衣，就被打得四散逃窜。第二“奇兵”队、浩武队和大岛守备队乘机展开登陆作战，岸边幕府守军在睡梦中被炮声惊醒，乱作一团，高杉夜袭成功。25日，高杉指挥长州军一鼓作气，攻击残敌。至27日，长州军收复大岛及周围地区，挫败幕府军对大岛口的进攻。

大岛口初战的胜利，迅速传遍长州藩，举藩鼓舞。6月25日拂晓时分，井上馨指挥游击队、御盾队及岩国支藩等长州军发动突袭，将进犯艺州口的幕府军及纪州、大垣、高田、宫津等佐幕诸藩军打得措手不及，以致全线崩溃。6月30日，井上率军渡河，攻入安艺藩大野地区，迫敌乞和。艺州口之战，长州军再胜。

在石州口，长州军与纪州、福山、滨田、津和野诸藩佐幕军对峙。大岛、艺州口的胜利，激起了长州军建功树勋的战斗豪情。7月27日，在大村益次郎指挥下，长州军发起攻击，其攻势凶猛异常，迅速攻占津和野，冲入滨田藩的益田地区，并于次日将其占领。8月14日，长州军经过休整后，发起第二次大规模攻击，兵临滨田城下。幕府命因州、备前藩紧急增援，两藩主池田庆德和池田茂政本来就反对发动征长之役，关键时刻拒不出兵，反而主张滨田藩应停战，与长州订立城下之盟。8月24日，迟迟不见援兵到来的滨田藩藩主松平氏被迫与长州议和，以为缓兵之计。8月27日，滨田藩藩主趁长州军不备，命家臣点火焚城，带领一班残兵败将，从海路逃往松江藩。长州军占领滨田藩，石州口的攻防战也以长州的胜利而告终。

在九州口，集结了小仓、熊本、久留米诸藩2万多士兵，与长州军隔海对峙。这一路佐幕军战斗力较强，其中，小仓藩藩主小笠原氏是历来负有监视长州藩责任的谱代大名，两藩素来互存戒心。1863年下关海峡攘夷炮战期间，长州借口小仓藩未奉旨支援，派兵渡海占领小仓藩领地田之浦，擅自修筑炮台，两藩关系处于公开敌对状态。因此，小仓藩在征长之役中，出兵最力。熊本、久留米藩为外样大藩，此次奉命征长，虽远不及小仓藩卖劲，但两藩士兵素以剽悍勇猛著称，一旦交手，不易对付。据守九州口的长州军不过千余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长州军难以轻易取胜。从四境战争的全局来看，九州口的敌军直接威胁长州的西南腹地，一旦有失，必将陷长州腹背受敌的困境。

高杉晋作十分重视九州口之战，认为虽敌众我寡，但有懈可击，决定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打击小仓藩，消耗其有生力量，以求各个击破。7月28日拂晓，高杉与山县有朋指挥“奇兵”队分乘5艘军舰，突袭小仓藩海岸阵地田之浦和门司，坂本龙马率龟山队乘萨摩军舰“樱岛”号前来助战。逼近海岸的长州舰队向田之浦、门司炮台实施炮火猛烈攻击，“奇兵”队等陆军士兵争先恐后地展开登陆作战，痛歼小仓藩兵并焚毁其炮台、战船。达到战术目的后，长州军乘舰撤回。此后又多次实施先攻后撤的主动出击，使小仓藩人员伤亡增加，疲惫不堪。9月6日，长州军发动总攻战，攻占门司并乘势攻入大里，小仓藩兵溃败，退守小仓城。高杉转而集中兵力进攻熊本藩兵驻守的军事重镇赤坂，双方发生激烈交战，伤亡惨重，仅“奇兵”队就战死百余人。交战中，幕府军舰“富士山”号未对熊本藩兵进行炮火支援。统兵作战的熊本藩家老长冈监物大为不满，痛责幕府老中小笠原长行临阵失信，一怒之下，率熊本军撤离战场。长州军攻克赤坂。久留米藩兵见势不妙，自行撤回本藩。乘坐在“富士山”号军舰上的幕府军指挥官小笠原长行见败局已定，借口为猝死的将军家茂奔丧，连夜乘舰溜回江户。9月9日，小仓藩

兵焚城逃散，长州军开进小仓城，四境战争结束。这次长州保卫战揭开了武装倒幕的第一幕，长州军经受了战争洗礼，愈加坚强有力，还涌现出大村、山县等军事人才，长州官兵成为后来戊辰战争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突击力量。

对幕府来说，第二次征长之役的失败成为加速走向崩溃的转折点。8月29日，年方21岁的将军家茂因幕府军连战连败而忧急交加，突患“脚气冲心”的急症，猝死于大阪城中。是夜，大阪城里悲风狂号，大小幕吏沉默不语，景象惨淡，气氛压抑。9月28日，德川庆喜继承德川氏宗家，次日发表征长休战命令。10月10日，幕府与长州达成休战协定，参战的20余佐幕诸藩陆续开始撤军。至11月末，长州四境已无征长军的一兵一卒。

1867年1月10日，德川庆喜出任征夷大将军，兼领朝廷内大臣之职。1月12日，幕府与丹麦订立《友好通商及航海条约》、《贸易章程》。至此，日本与11个欧美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的民族危机日甚一日。1月30日，孝明天皇在熬过天花症折磨、身体见好时，突然上吐下泻、七窍流血而亡，时年36岁。天皇的暴死，引起种种议论。京都城里，孝明天皇被岩仓具视毒死的传言不胫而走，政治气氛愈加沉闷怪异。1月30日，年方15岁的睦仁亲王即天皇位，是为明治天皇。同日，关白二条齐敬升任摄政，但日益受到反幕派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公卿中山忠能和复出的公卿岩仓具视、正亲町公董等人的牵制，无法像孝明天皇在位时那样恣意揽权、排斥异己和支持幕府了。

总之，四境战争期间及战后重大事件接连不断，形势对幕府越来越不利。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可谓生不逢时。然而，即使如此，在出任将军之后，德川庆喜仍不甘寂寞地开始了幕府灭亡前的最后一次改革。改革始自1867年，时值庆应三年，故称庆应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强化幕府的陆海军。法国公使罗休为改革出谋划策，分外活跃。亲法派小栗忠顺、栗本鯉等幕僚对罗休的建议言听计从，逐一照办。为购置法国制造的武器军械乃至军服军靴，幕府订立向法国借款600万洋元的契约。同年春天，以谢诺安、布留奈为首的18名法国教官赴日本，调练幕府军。至同年12月，已组成包括步兵7个联队、骑兵1队、炮兵4队在内的法式步骑炮三军，总兵力达1万多人。全军上下一律身着并不合身的法军鞋服，行动不便，队伍怪异。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在阅兵式时，从头到脚用拿破仑三世赠送的军帽、军服和军靴包装起来，俨然一个法国将军。在官制改革方面，按照罗休的建议，新设海军、陆军、国内事务、会计、外国事务等5总裁，分别由稻叶正巳、松平乘谟、稻叶正邦、松平康英、小笠原长行等老中任其职，首席老中板仓胜静位居5总裁之上，相当内阁首相。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法国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日本急剧扩张。1867年4月，以德川庆喜之弟德川昭武为首的使节团抵达马赛，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同年7月，亲法派核心人物栗本鯉等也赴法访问，以虾夷地（北海道）的开发权为担保，向法国提出借款要求。在庆应改革过程中，幕府政权日益买办化，日本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将幕府赶出历史舞台的时代课题，已提上议事日程。

第 5 章

王政复古

船中八策

1867 年，是日本封建政权统治行将结束、近代资本主义政权即将诞生的前夜。

由于德川家茂将军的暴卒，孝明天皇的神秘死亡，人民斗争的风起云涌，倒幕强藩的密切合作，英、法列强由佐幕向倒幕政策的转变，使继任将军德川庆喜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日本封建幕府统治的灭亡指日可待。

伴随旧制度的灭亡，必将带来新制度的产生。德川幕府灭亡后，制定什么样的纲领政策来指导建立新型的日本政权，这关系到日本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日本的进步和发展，也是倒幕维新的精英们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对建立日本近代政权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件，经过精英们的运筹帷幄，终于在一艘船中诞生了。

1867 年 6 月 9 日，有一艘名为“夕颜”号的藩船，由长崎港起航出发。经过几天的海上航行，于 12 日晨抵达兵庫港。船上除其他人员外，有两个人非常引人注目。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京都和大阪，劝留在京阪的藩主山内容堂提出“大政奉还建议书”。这两个人，就是力主维新。为日本建立新政权制定纲领性文件的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

坂本龙马于 1835 年 11 月 15 日（另有 10 月 15 日、11 月 10 日之说）出生于土佐藩高知城下上町（今高知县高知市本丁筋一丁目）的商人乡土家庭。别名才谷梅太郎。龙马之名，据说是因其母在怀孕时梦见云龙奔马在腹内飞腾而取。

坂本龙马少年时，曾学过剑术，从事过土木工程。1853 年，为学剑道前往江户。同年，美国海军提督佩里率“黑船”舰队到日本叩关。随后不久，欧美列强纷纷东渐日本，使 200 多年来闭关锁国的日本立刻发生巨变，国内迅速掀起“尊王攘夷”运动。幕府腐败无能，对外采取屈从政策，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内则采取强硬政策，大力镇压“尊王攘夷”运动。坂本龙马深受刺激，在攘夷志士的影响下，决心投入到攘夷运动中去。1861 年，他加入攘夷派志士们结成的“土佐勤王党”，开始正式成为攘夷派成员。之后，他不断为攘夷而奔波。

幕府末期，随着攘夷运动向倒幕运动的发展，他又积极参加倒幕运动。1866 年，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时，他曾指挥长州藩海军进行作战。为了把倒幕派团结在一起，结成强藩倒幕联盟，在他的斡旋和倡导下，1866 年，促成了萨摩藩和长州藩缔结了讨幕军事同盟密约。1867 年，在他的努力下，又促成了“萨土盟约”等。为在军事装备上支持讨幕派，他还于 1867 年把 1865 年创建的“社中”（即贸易公司。因创办于长崎龟山，故又称“龟山社中”）扩大后，改名为“海援队”，并自任队长，为讨幕派购买运送军火。在促成倒幕势力大联合后，他又集中精力致力于让幕府把大权交还朝廷的“大政奉还”运动。

1867 年 11 月 15 日夜，他与中冈慎太郎在京都遭到幕府“见回组”佐佐木唯（只）三郎等人的偷袭，与中冈慎太郎一起被暗杀，年仅 32 岁。

后藤象二郎于 1838 年 4 月 13 日，出生于土佐藩高知城的一个高级武士家庭。幼名保弥太，后称良辅，号阳谷。

后藤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开始接受西方思想，积极推动藩政改革，深受土佐藩主山内容堂的信赖。1864 年，先后任土佐藩大监察、参政之职，主持土佐藩政。明治政府成立前，他积极主张采取和平手段，让幕府将军主动把大政奉还朝廷。在促使“大政奉还”过程中，做了不少工作。明治政府成立后，曾任新政府的参与、参议、左院事务总裁、外国事务局判事等职。1873 年因“征韩论争”失败而辞职。1874 年，参加组织爱国公党，积极主张设立民选议院。1875 年任元老院议官。1881 年参与成立自由党。1887 年掀起“大同团结运动”，反对政府的“大同团结”。1889—1891 年，曾先后任山县有朋和松方正义内阁的递信大臣。1892 年任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农商务大臣。自中日甲午战争起，他积极鼓吹日本侵略中国。1897 年 8 月 4 日，因病而死，时年 59 岁。

坂本龙马与后藤象二郎虽都出身于土佐藩，但由于坂本龙马后来脱离藩籍等原因，直至 1867 年初，两人才结识。当时，坂本龙马正为推翻幕府统治、完成幕府大政奉还朝廷而感到力不从心。他认为：“较之我一人引五七百人为天下而行动，莫如搬请 24 万石之大名，使其为天下国家而行动更佳。”土佐藩是当时的强藩，后藤象二郎是该藩的实权人物之一，又是主张维新的精英。共同的志向，使他们一见如故。所以，坂本龙马邀请后藤象二郎一起前往京阪，劝说土佐藩主山内容堂支持“奉还大政”事业。

“夕颜”号起航后，虽天晴水蓝、风平浪静，但两位精英的心情却如潮涌，无法平静。

他们都有着探索西方文明的经历，受到西方文明思想的影响，深知日本幕府统治的腐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他们认识到，只有剥夺幕府的权力，建立西方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才能使日本真正强大起来。

在船中，他们围绕倒幕维新问题，纵观日本自开国以来国内外形势之变化，经过对时局的运筹帷幄和长时间的商讨之后，终于提出了改造日本的 8 条政治主张。这 8 条政治主张，后经海援队书记长冈谦吉整理成文。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船中八策》（因产生于船中而得名）。

《船中八策》不仅是“奉还大政”和讨幕运动的政治纲领，也是“奉还大政”后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的施政大纲。这“八策”是：

第一策，将天下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自朝廷出；

第二策，设立上下议政局，万机应决于“公论”；

第三策，以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为顾问；

第四策，与外国之交际应“广泛召集会议，新订至当之规约”，修改不合理的条约；

第五策，参照古来之律令，重新编定“长久实行之大典”；

第六策，扩充海军；

第七策，设置亲兵，守卫京都；

第八策，在金银与物价方面制定与外国均衡之法，等等。

《船中八策》是最早的、较全面的改造日本的施政纲领。其内容十分广

泛，涉及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它不仅在当时对扩大倒幕势力、迫使幕府将军“奉还大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日后，对坂本龙马 1867 年 11 月提出《新政府纲领八策》、直至明治新政府颁布“五条誓约”，也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大政奉还

德川庆喜在第二次征长惨败之后，面对内外交困的险恶形势。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封建统治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了，只有重整封建秩序，对旧的幕藩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才能保住和巩固封建幕府的统治地位，于是，在他继任将军后，便勾结法国，积极着手大规模的幕政改革。当时年号为庆应（1865—1868 年），故此改革史称“庆应改革”。

“庆应改革”得到了法国公使罗休的支持和指导，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各个领域。在政治方面，主张把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用封建中央集权制代替封建领主制；在经济上，主张改革税制，扩大商贸，重整财政等；在外交上，主张开国通商、扩大影响，以便扭转被动的外交困境；在军事上，把军事改革看作是整个改革的中心任务，主张扩张陆海军，建立强大的幕府军事力量。

正当德川庆喜大力改革幕政，以挽救幕府危机的同时，倒幕势力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联合和发展。

幕府发动的第二次征长战争虽然失败，但长州藩仍背着朝廷“朝贼”的罪名，为了争取朝廷免除长藩的“朝贼”罪名和对付列强日益强烈要求的兵库港开港问题，1867 年 6 月，萨摩、越前、土佐和宇和岛四藩，联合在京都举行“四侯会议”。会议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但却更坚定了参加会议的各藩实行武力讨幕的决心。如大久保利通（1830—1878 年）在会议失败后，就认识到以“和平”方式实现倒幕是没有希望的。他断言：“如不准备兵力，张起声势，显示大计已定，来为朝廷尽力，就很难打开局面。”于是，讨幕派在会后又相互进一步签订了出兵讨幕的盟约，并积极着手军事上的准备，使武装时幕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坚决主张以武力讨幕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以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推进的“奉还大政”计划也有了飞跃的发展。他们制订的《船中八策》受到土佐藩的重视和欢迎。

经过海上航行，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受到京都的土佐藩士们的欢迎。为了剥夺幕府将军的权力，实现“大政奉还”，进而征得其他强藩的支持，1867 年 7 月 23 日（旧历 6 月 27 日），土佐藩的中冈盛太郎、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等，与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举行了“三棵树旗亭会议”，并以《船中八策》为蓝本，缔结了以实现“奉还大政”为目的的“萨土盟约”。

“萨土盟约”是一个明确提出剥夺幕府将军权力、把国权归还朝廷的反幕盟约。除在总则中首先提出：“方今皇国之任务，以改革国体制度，监万国而不耻为第一义”的宗旨外，还另立了 7 条具体原则。这 7 条原则的内容如下：

〔日〕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 1 卷，中译本，第 281 页。

第一，议定天下大政之全权在于朝廷，我皇国之制度法则、一切万机，均须出自京师议事堂；

第二，建立议事院，应由诸侯贡献其经费；

第三，议事院应分上下院，必须从上自公卿下至陪臣、庶民之中，选举纯良正义之士任议事官，再者，诸侯亦因其职掌自然要充当上院议员之任；

第四，无有以将军之职务掌管天下万机之理，自今应辞去其职，归顺到诸侯之列，将政权归还朝廷，固不待言；

第五，各港外国之条约，须由新任朝廷之大臣会同诸侯之士大夫，在兵库港订立条理明白之新约，实施诚实之商法；

第六，朝廷之制度法则，呈依往昔之律例，但应参酌当今之时务，或者不当者，宜除弊革新，建立不愧于世界之国本；

第七，关于复兴皇国议事之士大夫，应去私意，基于公平，制订术策贵正实，不问以往是非曲直，以人心一和为主，决定此议论。

“萨土盟约”缔结后不久，7月27日（旧历6月26日），萨、土、艺三藩之间也缔结了类似“萨土盟约”的约定书。

“萨土盟约”虽然使更多的藩参加到倒幕联盟中来，但由于它只要求将军辞去官职，把大权还给朝廷，不废除封建制度，甚至抬出天皇来维持封建统治，因此，它引起坚决主张以武力彻底打倒幕府的倒幕派的不满。于是，萨、长两藩的武力讨幕派进行紧急接触，通过商谈，于1867年9月19日，又重新达成出兵协议，使萨摩藩又回到武力讨幕上来。9月20日，长州藩又同安艺藩达成了出兵讨幕协议。这样，终于在萨、长、艺3藩之间达成了共同举兵讨幕的约定书。

倒幕派在3藩共同举兵讨幕的约定书达成后，进一步加紧武力讨幕的准备工作。1867年11月3日（旧历10月8日），他们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部署武力讨幕的具体计划和军事准备。

他们在进行紧张的武力讨幕准备的同时，还一面秘密加强做宫廷的工作，争取得到天皇的支持。

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积极活动下，日益支持倒幕派，不仅恢复了长州藩毛利敬亲（1819—1871年）及其子的官职，还在1867年10月14日（旧历）下达的“讨幕密敕”中，明确指出：“不讨此贼（幕府将军），何以上谢先帝之神灵，下报万民之深仇耶？”

在倒幕派加紧倒幕准备的同时，主张以和平方式让将军把权力归还朝廷的公议政体势力也在积极地活动。当他们得知萨、长、艺3藩已结成出兵倒幕同盟后，认为如让将军主动把政权归还朝廷，即可实现“奉还大政”，又可将将军从灭亡中挽救出来，这是“恩义两全之策”。为了实现所谓的“恩义两全之策”，1867年10月29日（旧历10月3日），后藤象二郎在土佐藩主山内容堂的建议下，以山内容堂的名义，向幕府提出了《关于奉还大政的建议书》。

处在穷途末路的德川庆喜，正对其统治吹之欲倒而一筹莫展。接到《奉还大政建议书》后，德川庆喜认为这是一个既能使倒幕派失去讨幕理由而无法发起讨幕战争、又能保持实力实权的良机。于是，他决定采纳土佐藩的建议。1867年11月8日（旧历10月13日），德川庆喜在京都二条城召开

重臣会议，宣布接受土佐藩的《奉还大政建议书》，把政权奉还朝廷。11月9日（旧历10月14日），德川庆喜又上奏朝廷，称：“当今与外国交际日盛，政令不归一途则纲纪难立。若改从来之旧习，政权奉还朝廷，广尽天下公议，仰承圣断，齐心协力共保皇国，必可与海外万国并立。”

宫廷接到德川庆喜请求“奉还大政”奏禀后，立刻进行了讨论。宫廷原不想接受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请求，但在后藤象二郎等人的坚持和劝说下，于11月10日（旧历10月15日）凌晨1时，决定批准德川庆喜的“请求”。

11月10日，德川庆喜正式得到天皇准其“奉还大政”的敕书。通过“奉还大政”，天皇虽然在名义上掌握了政权，但实际上，天皇根本没有建立起运用权力的政权机构。所以，天皇在批准德川庆喜“奉还大政”的同一天，又向德川庆喜发出了3项指示，其内容是：天皇收回最高政权；迅即召集诸侯会议，决定一切政务；在未召开诸侯会议之前，仍由将军照旧统治领地领民。

天皇的3项指示，正中德川庆喜的下怀。德川庆喜不仅没有因“奉还大政”而失去权力，反而又明正言顺地继续掌握着内政大权。

继3项指示后不久，天皇又于11月17日（旧历10月22日）下诏：政务暂且委托给庆喜，紧急的外交问题也由幕府与通晓外交事务的“两藩”（指萨、长、上三藩）会商。至此，天皇又把掌握日本的外交大权交给了德川庆喜，为德川庆喜重新掌握日本的内政外交实权开辟了道路，“奉还大政”成了徒有虚名。

王政复古

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之事，如同热油中注入冷水，立即引起各派势力的不同反应和行动。

对德川庆喜“奉还大政”最为高兴的，是一直积极推动“奉还大政”的山内容堂和权本尤马等“公议政体派”。坂本龙马在得知德川庆喜决定“奉还大政”的消息时，激动地流着眼泪说：“我誓为此公舍命！”对其决定大加赞赏。而山内容堂则更为高兴，认为“公议政体”马上就可实现了。他在得到“奉还大政”的消息后，便专心致力于研究如何具体实施“公议政体”方案起来。

对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不满的有两派。一派是忠于幕府的势力，另一派是主张坚决武力倒幕的势力，但他们的出发点完全不同。

忠于幕府的势力，如幕府老中、官吏及亲幕府的谱代大名们，在得知德川庆喜“奉还大政”消息后，不禁大惊失色，大为不满。他们不仅四处闹事，还调集陆海军的精锐部队、企图以武力影响德川庆喜改变决定，保持幕府将军的旧有权力。

主张武力倒幕的势力，在得到德川庆喜先发制人、佯还大政的消息后，十分愤怒。特别是德川庆喜“奉还大政”后，对倒幕派立即进行大力镇压，于11月15日暗杀了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更使武力倒幕派怒不可遏，决定立即实行武力倒幕。

在德川庆喜请求“奉还大政”的当天，讨幕派们先得到了天皇下达的“讨幕密敕”。当得知“奉还大政”的消息后，讨幕派首领就立即把“讨幕密敕”紧急下达到萨、长两藩。与此同时，在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岩仓具视等人的共谋下，迅速制定了军队的部署方案和发动“王政复古”政变的计划。

1867年12月，岩仓具视秘密上奏了《王政复古议》意见书，并决定于1868年1月3日发动“王政复古”的政变。1月2日，岩仓具视召集萨摩、尾张、越前、安艺、土佐5藩的重臣，秘密传达了根据“天皇意旨”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的计划，并要求各藩积极行动。

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之日，正值京都、大阪等地爆发的“这还不好吗？”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武力倒幕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为保证政变的顺利成功，迅速进行了军事部署。

1868年1月7日，萨摩和长州藩藩主在长州藩的三田尻（今防府市）会面，盟誓“于京都举兵”，并大力集结两藩兵力。12日，萨摩藩兵3000人进入京都，使萨摩藩的军队在京都达到了1万人。13日，3000名安艺藩兵按部署东上。14日，长州藩兵1200人开始东上，倒幕派的军队不断向京都集中，摆开了和幕府决一死战的阵势。

经过一番准备后，为保证“王政复古”政变顺利成功，就在政变的早晨，即1868年1月3日（旧历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以天皇的名义发布命令，解除了幕府亲藩部队对各宫门的警卫职务后，又立即以保卫皇宫的名义，由西乡隆盛率兵，把皇宫包围起来。

1月3日上午，岩仓具视等晋谒天皇，上奏实行“王政复古”大策。下午，年仅16岁的天皇睦仁出面，召开有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参加的御前会议。在御前会议上，倒幕派断然发动宫廷政变，当众宣读事先准备好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告为“挽回国威”，万事回复“神武创业之始”，实行“王政复古”。宫廷政变没有遇到任何武力抵抗，顺利获得成功。

《王政复古大号令》指出：“原自癸丑（1853年）以来，遭蒙未曾有之国难，先帝频年为之所苦，忧虑之情当众庶所知。因此，圣意已决，实行王政复古，树立挽回国威之基。自此废除摄关、幕府等，……诸事应按神武创业之始。”《大号令》不仅宣布废除封建幕府统治，剥夺将军的内政外交大权，实行一切权力归天皇，还宣布成立设有“总裁”、“议定”、“参与”三种官职机构的新的天皇政府，并宣布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年）任新政府总裁。

为了彻底剥夺德川庆喜将军的统治大权和经济基础，就在政变的当天夜晚，新政府召开了首次三职联席会议（因在皇宫的“小御所”召开，故史称“小御所会议”）。会上，作出了命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所谓“辞官”，就是指让德川庆喜辞去得自朝廷的内大臣职务；所谓“纳地”，就是指让德川家从400万石领地中拨出200万石献给朝廷。通过“辞官纳地”，剥夺德川庆喜的权力和权力基础，让他永远退出政治舞台。

“王政复古”是日本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宫廷政变。这次政变虽然粉碎了德川庆喜企图继续掌握实权的阴谋，并宣布新成立的天皇政府是日本唯一合法的政府。但实际上，初期的新政府只不过是改良派、大名和公卿的松

散的联合，根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机构，更谈不上统一的意志，只不过是宣布天皇政府的成立。尽管如此，新政府的成立，仍标志着武力倒幕派取得了初步胜利。

“王政复古”政变后，德川庆喜仍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他根本不甘心失败。1868年1月4日，即政变的第二天，当前往尾张藩主德川庆胜和前任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前往京都的二条城、把“小御所会议”作出的命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消息告诉他后，德川庆喜以城中人心动摇为借口，拒绝接受“辞官纳地”命令。4日晚上，长州军先遣部队开进京都。德川庆喜认为在京都向倒幕派发动反扑对己不利，便决定退到关西重镇大阪后，再调集军队，进行反扑。

1月6日傍晚6时，德川庆喜徒步从二条城的后门溜出，于7日下午4时到达大阪城后，立即调动陆海军，并依仗军事实力为后盾，在8日，即到达大阪的第二天，便向英国公使巴夏礼和法国公使罗体声明，他仍是日本的代表。10日，他又依照将军的礼节正式会见英、法、荷、美、意（意大利）、普（普鲁士）6国公使，公开谴责“王政复古”是“挟持幼主，假托圣虑，以行私心”。并以自己为“正”，诬倒幕派为“奸”，要求天皇“清君侧”。德川庆喜在外国公使面前公开不承认京都政府，并仍以将军自居，使日本出现了两个政府——即京都天皇政府和江户德川幕府——并存的局面。

德川庆喜在大阪自立政府，公开造反，进一步加剧了倒幕势力的不满。大久保利通等倒幕势力领导人决定以武力彻底打垮旧幕府势力。在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等人的努力下，天皇发出了德川庆喜为“朝敌”的怒斥。于是，以萨长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决定大力讨伐德川庆喜的幕府军。而德川庆喜在逃到大阪后，为夺回失去的大权，消灭倒幕势力，也在积极策划进行反扑。

1868年1月，德川庆喜为夺回权力，以“除君侧之奸”为名，统率大军由大阪向京都进攻，从而揭开了“戊辰战争”的序幕。

第二编

明治维新 (1868—1889 年)

第 6 章

戊辰革命

岁暮风云

王政复古政变后，日本列岛上出现两个政权同时并存、三种势力互相争雄的局面。

新政府成立伊始，便向国内外宣布，惟有明治天皇政府才是合法政府，谁反对天皇政府，谁就是朝敌。但是，“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虽然实行了“大政奉还”，而幕府的全班人马却依旧未动，作为国家机器的幕府仍在缓缓地运转着，并且不承认新政府的合法性。事实上出现了两个政权同时并存、新旧对峙，胜负未走的局面。

所谓三种势力，其一是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为首的讨幕派。他们是新政府的缔造者、政权中的实力派，率领数千武器精良的藩兵，镇守宫廷，保卫新政权。其纲领是要求德川庆喜“辞官纳地”、推翻幕府、废除封建领主制、建立与“万国对峙”的近代国家；其二是以德川庆喜为首的保幕派。他们反对讨幕派的纲领，主张保留封建领主制，实行有限的机构改革，借以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封建制度；其三是以土佐藩主山内容堂为首的公议政体派。他们反对腐朽的幕府专制体制，要求建立“公议政体”体制（诸侯会议），但不主张废除领主制。三种势力三种立场，决定了戊辰革命的复杂性。

“王政复古”政变后，日本历史处在十字路口上，前面摆着两条路：一条是突破改良主义藩篱，离开老路实行革命；一条是停顿下来，“凭太政官三职公论”，等待改良。前者是举起民族民主革命大旗，向德川幕府宣战，废除封建领主制，“实行决战，死里求生”（大久保利通语）。后者只能听三职中公议政体派的“公论”，作一点一滴的改良，使“一新”徒有其名，国家命运不堪设想，很可能重蹈印度、中国的覆辙。讨幕派的下场也将是悲惨的，到那时大久保等很可能像中国维新派谭嗣同一样被杀头。在此紧要关头，大久保利通等在小御所会议上勇敢地提出了革命性口号——“辞官纳地”。所谓“辞官”，就是剥夺德川庆喜的军政大权，也叫“兵马大权”；“纳地”，就是没收征夷大将军的世袭领地、领民。世人皆知，一个封建领主被剥夺了军政大权和领地领民，封建领主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个口号提得好！击中了德川庆喜的要害；这个口号是一个词简意赅的革命纲领。因此，“辞官纳地”的口号一经提出，就标志着大久保等已经突破改良界限，转化为革命派。“辞官纳地”口号像一枚炸弹，首先炸乱了小御所会议。山内容堂坐不住了，他暴跳如雷，首先发难，攻击新政府，攻击讨幕派，攻击“王政复古”政变。讨幕派岂能容忍，大久保利通挺身而出，痛斥山内，谴责他竟敢在天皇面前出言不逊，犯了大不敬罪。一时间，小御所会议乱套了，

山内容堂害怕了，宣布收回刚才的发言。小御所会议上的论战是“辞官纳地”斗争的开端、丁卯岁暮风云的序幕。从此，三都（京都、江户、大阪）、诸藩均以是否赞同“辞官纳地”为争论焦点，卷起巨大的政治波澜，最终引发鸟羽、伏见之战。

“王政复古”政变和“辞官纳地”的消息传到了幕府所在地京都二条城，立即引起驻在这里的幕府党——德川庆喜、幕臣、会津、桑名两藩藩主和1万余藩兵——惊慌、愤怒、谩骂、混乱。1月4日，德川庆胜（尾张藩主、议定）、松平庆永（福井藩主、议定）奉命向德川庆喜传达《王政复古大号令》和“辞官纳地”两道朝命，二条城沿路幕兵皆怒目而视，骂声不止，高喊“与萨贼为伍的老家伙来了！”德川庆喜以幕兵幕臣不服为借口，拒绝朝命。德川庆胜等只好悄悄地离开二条城回宫。形势异常严峻，3000余名萨长兵和1万余名幕兵形成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两位传令使者回到宫中，怀着同情德川庆喜的心情，绘声绘色地汇报二条城的情景。大久保利通对此非常不满，谴责他们对德川庆喜过于宽大。5日，松平庆永再下二条城，仍失败而归。同日，朝廷会议上，以后藤象二郎为首的公议政体论者，公然利用幕府党的强硬态度恫吓讨幕派与朝臣，并否定“王政复古”政变。大久保当即质问后藤：“你有无扶幕之意？！”后藤词穷，不敢作正面回答。但后藤仍在背地里按照山内容堂的指示，游说在京的丹波、肥后、肥前、筑前等10藩重臣，鼓动他们连名上书，要求撤走警卫宫廷的萨长藩兵、在人事安置上要“光明正大”、采取公议等。山内容堂还亲自上书，攻击“王政复古”政变，要求早日建立议事体制（诸侯会议），迅速召集大名会议，建立三职评议规则，等等。企图利用会议上的多数压倒讨幕派，然后操纵新政府。讨幕派内外受敌，处境艰难。

6日夜里，德川庆喜率领全部幕兵偷偷地撤出京都，移驻大阪。此举表面上似乎是德川庆喜有意缓和局势，实质上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准备反扑，耍的是以退为进的谋略。大久保一眼看穿他的诡计，在给蓑田的信中写道：德川庆喜退守大阪，心怀叵测，意在进一步联络亲藩，孤立萨、长，离间五藩（萨、长、土、肥、越五藩是讨幕阵线的核心），动摇朝廷。于是，大久保和岩仓商议对策之后，决定采取将计就计的谋略，继续委托二侯（德川庆胜、松平庆永）相周旋，暂时收缩讨幕锋芒，建立举国一致体制，从而扩大讨幕阵线，孤立德川庆喜。大久保不愧为“刚毅多断”（井上馨语）的政治家。两个政权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微妙。

7、8日，连续召开三职会议（亦称朝议），讨论当前形势和对策。公议政体派认为，“辞官纳地”内谕中所用的“归还领地”字样、特别是“归还”二字言词过苛，刺激性太大，主张将“纳地”改为“向政府交付经费”。这种主张在会上获得多数人赞同。但大久保认为这种提法过于暧昧。最后，德川庆胜、松平庆永、后藤象二郎等齐集一室，挖空心思炮制出一个方案，先让德川庆喜上京向德川庆胜和松平庆永二侯面述对“辞官纳地”的意向，然后二侯将其意向上奏天皇。实际上是对德川庆喜让步，由命令“辞官纳地”退到双方谈判，由“归还”领地退到“向政府交付经费”。12日，他们派人携带此妥协案到大阪向德川庆喜征求意见。不料，在大阪城内，幕府上下群情激昂，正在搞《举正除奸表》，准备讨萨。此情此景，使者不敢去见德川庆喜，空手而归。

17、18日，朝议再开，会上两派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有两个：其一是

如果将“纳地”改为“向政府交付经费”，那么交付者是仅仅限于德川一家还是诸藩共担；其二是“归还”二字是删掉还是保留。讨幕派主张经费由德川一家交付，不能删掉“归还”二字。公议政体派主张经费由全国诸藩均摊，删掉“归还”二字。最后搞了个折中方案，包括三条：一是德川庆喜辞官，仍称原内大臣；二是政府经费由德川一家交付；三是删掉“归还”二字。

20日，松平庆永到大阪传达折中方案，但德川庆喜坚决反对由德川一家支付政府经费，拒不接受此案。事实上，谈判到此已经彻底破裂。

政情发展令人担忧。公议政体派在新政府中越来越占上风，几乎控制了朝议，大部分公卿藩主处事因循，摇摆不定；德川庆喜在大阪调兵遣将，日益猖狂。忧国忧民之士无不心情沉重，大久保更是忧心忡忡。

早在撤离京都的前一天和进入大阪的第二天，德川庆喜的侧近老中两次要求在江户的老中，速派尽可能多的步兵和军舰到大阪，解救德川家族的危急。8、10日，德川庆喜两次会见外国使节，声明幕府仍是日本的合法政府，否认京都政权的合法性。12日，起草《举正除奸表》，煽动讨萨战争。18日，老中板仓胜静向江户老中传达德川庆喜的开战决心，号召东西呼应举兵讨萨。19日，江户城内的萨藩藩邸被幕兵烧毁。京阪一带重要据点布满了幕兵。22日，德川庆喜断然拒绝京都送来的折中方案。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德川庆喜的开战决心已经下定。

讨幕派在京都也作了相应的部署，21日举行隆重的天皇阅兵式，向国内外显示新政府的实力和讨幕派的革命决心。

战云笼罩着三都上空，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人们就是这样送走了丁卯旧岁，迎来了戊辰新年。

讨幕战争

戊辰年（1868年）是日本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经过讨幕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废除了封建制度，日本帝国从此开始在世界的东方兴起！

戊辰年是在战争中开始、在战争中结束的。鸟羽伏见之战一声炮响，拉开了讨幕战争的帷幕。

1868年1月25日，戊辰初一，德川庆喜就忙于起草所谓《讨萨表》，公然宣称1月13日“王政复古”以来的事态全是萨摩奸臣们一手制造的，要求引渡“萨摩二奸”（指大久保和西乡），否则将发兵诛戮。这是一纸复辟宣言。1月26日，大年初二，德川庆喜率领幕军1.5万人，向京都进发，声称此行是奉命入京奏请“辞官纳地”。

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松平庆永等人假传圣旨，让德川庆喜入京、奏请、补议定职的。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谜、永远无法猜破的谜。

新政府方面则因内部矛盾，情况比较复杂。

26日，松平庆永急忙向岩仓具视递交一份建议书，请求准予德川庆喜入京、奏请、补职（此时幕军已经向京都进发）。岩仓说，虽然萨、长主张立即讨幕，但如果德川庆喜能上京奏请“辞官纳地”，仍希望二侯尽斡旋之劳。松平庆永等入此举是有意替德川庆喜施放和平烟幕弹，还是被和平斡旋迷住了心窍？这又是一个难解的谜。

同日，召开三职会议，专门讨论德川庆喜入京问题。大久保强烈反对允许德川庆喜入京的主张，愤怒他说：“朝廷如此迟疑，其王政复古大业，将

成画饼。”他断然主张先发制人，一扫幕府之余威。大久保后来又说，除非会、桑藩兵归藩，否则决不允许德川庆喜进京。山内容堂急忙说，即使会、桑藩兵不归藩，也要速召德川庆喜进京。这天傍晚时分，幕军先遣队已到京都的鸟羽、伏见。

27日，正月初三，朝议再开。大久保、西乡等讨幕派早就对和平斡旋厌倦了，并对松平庆永、山内容堂等产生怀疑。他们一面应付内奸外敌，一面部署军队，作好了作战准备。在此幕兵压城、千钧一发之际，大久保提出长篇建议书，严正指出“王政复古”以来朝廷重臣在决策上的错误：一在处置德川家的问题上，妄听越前、土佐二藩的“因循论”（维持现状、不求前进），且委派尾张、越前二侯相斡旋；二是默许幕府党在大阪实行割据；三是允许德川庆喜入京补议定职。并严厉批评“在京诸侯藩士均为苟且偷安之徒”，“上自议定、下至参与，无一有识之士”，“实令人愤慨”。为了挽救危局，只有依靠“勤王无二之藩”（指萨、长二藩），兴兵讨伐，除此别无他途。在大久保等坚持下否定了允许德川庆喜进京的建议，直至中午时分，朝议才总算通过了制止德川庆喜入京的命令。

恰恰在这天下午，幕军陆续到达鸟羽、伏见（入京必经的两个关口），要求通过鸟羽进京。守在这里的萨摩藩兵，以“不许前进”的命令挡住去路。两军对峙，拔刀待命。冬季天短，眼看夕阳西下，夜幕像死神一样威胁着幕军。幕军急了，下达强行通过的命令。这时，萨军一声军号长鸣，接着炮声轰隆、弹丸如雨。一颗炮弹准确无误地落到幕军炮兵阵地上，炮车被摧毁了，士兵混乱一团、向后奔跑，往淀城溃退。这就是讨幕战争的第一炮，时值戊辰元月三日薄暮时分。

伏见、鸟羽之战拉开了戊辰革命的帷幕。

28日拂晓，幕军冒浓雾向鸟羽、伏见猛攻不成，转向山城溃退，讨幕军乘胜直追，酿成山城战役。山城战役，幕军大败，企图退守淀城（曾是幕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不料，淀城藩主一反既往，断然拒绝幕军再度进城，却开城欢迎讨幕军。

淀城藩主稻叶家曾蒙德川家恩遇，藩主稻叶正邦一度居江户老中职（直属将军统辖政务的最高官职），三日前淀城还是幕军前线指挥部。三日不见，判若两人。颓败之下，恩顾谱代也难免叛离。

幕军失淀城后，妄图依靠有利地势和藉津藩兵力，扼守西国要冲——八幡一带。不料，津藩重臣藤堂元施，初则观望动摇，后在朝廷使臣开导下竟毅然归顺讨幕军。讨幕军在津兵配合下，一举攻克八幡。幕军退缩大阪，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讨幕军开进淀城，稍事休整，犒赏连日苦战的官兵，大力宣传讨幕圣旨，扩大讨幕阵线，准备进攻大阪。

鸟羽、伏见一战，震动朝野，京阪一带藩主和各阶层人士纷纷倒向新政府。例如，谱代首席彦根藩要求进京，尽守护宫廷之力，还主动集结附近诸藩派兵大津，防守京都外围要冲；三家之一纪州藩则用勤王论统一了思想，拒不参加讨萨行动，保持中立；熊本藩世子细川喜延入宫表示勤王决心；津藩和熊本藩早有默契，彼此共进退，等等。亲藩谱代况且如此，外样诸藩可

谱代大名：德川幕府时代诸侯的名称，指德川幕府创始者德川家康于1600年进行奠定霸业的关原之战之前即臣属家康的诸侯，相当于其嫡系。

想而知。讨幕阵线愈战愈大，德川庆喜越来越孤立了。

30日，德川庆喜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紧急召集老中板仓胜静、若年寄永井尚志，共商东归之计。走计已定，他召集官兵训话，装出一副立即亲自出征的架势。官兵们信以为真，各自准备随将军出征，军中又出现一丝活跃气氛。谁知道将军是在演戏。10时许，将军携同老中酒井中惇、板仓胜静、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桑名藩主松平定敬、外国奉行山口直毅、目付榎本道章等，偷偷从后门（樱门）溜走了。傻等在外面的官兵等急了，派几名军官到将军居室探询，发现将军不见了，只剩下杂乱无章的文件和器具。军官们惊呆了，相对默默无言。德川庆喜一行出了樱门，直奔天保山冲，去寻找已经安排好的幕舰“开阳”号。漆黑的天空，西北风劲吹，到哪里去找“开阳”号呢？这群败将们顾不得什么国格、人格，仓皇钻进一艘美国军舰，委屈了一宿，31日天明才转移到“开阳”号上。2月1日起锚，直奔江户（现东京），5日到达江户城，一代将军，今日如此狼狈、悲凉。

初战大捷的新政府比往日更加繁忙。1月31日夜里，召开诸侯百官小御所会议。这次会议与已往不同，不再是两派唇枪舌剑、论争不休，而是政府下达命令。首先是总裁下达《追讨德川庆喜令》，接着岩仓具视庄严宣布：朝廷素来宽仁，凡眷恋德川家之恩者，愿去大阪、或归藩、或忠诚勤王，何去何从，各随自便。敦促那些动摇不定的人们迅速表态。会议开得庄严、简短，革命气氛甚浓。

2月1日，岛津久茂、德川庆胜、松平庆永、山内容堂、伊达宗城等10余名影响最大的藩主上书表态：誓死勤王。朝廷及时予以抚慰，鼓励他们为国鞠躬尽瘁。政府的正确政策巩固扩大了讨幕阵线。

3日，新政府宣布褫夺德川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板仓胜静、永井尚志、户川安爱、大久保忠恕等数十名幕臣的官职，没收其在京的住所，驱逐其党羽。

同一天，讨幕军未费一枪一弹进驻大阪城，设立征讨指挥部，分兵四方，扫荡残敌，恢复大阪城秩序。讨幕军控制了全国经济中心。

讨幕战争第一阶段到此可以画一个句号了。

讨幕大军转战关东、直取江户，使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讨幕军的扫荡战进行得非常神速，残敌逃的逃、降的降，到2月初，京阪四国地区已经平靖，转战关东的条件已经具备。

为适应新任务，出征前对讨幕军进行了重新改组，完善了领导系统、加强了指挥力量、明确了任务和权力，组建起一支东征大军。

2月23日，朝议决定御驾亲征。25日，颁发亲征诏书。3月2日，建立东征大总督府，炽仁亲王兼任大总督，西乡隆盛、林玫太郎等任参谋。东征大总督之下设立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三个先锋总督。东海道先锋总督为公家桥本实梁，木梨精一郎（长州），海江田武次（萨藩）、伊地知正治（萨藩）等任参谋；东山道先锋总督为岩仓具经（公家），板垣退助（土佐）、河田太久马（鸟取）等任参谋；北陆道先锋总督为四条平隆（公家），山县有朋（长州）、小林柔吉（广岛）等任参谋。虽然总督由亲王公家出任，但实权掌握在讨幕派参谋手里。建立亲征体制是为了昭示讨幕战争的神圣性，粉碎朝敌散布的“私战论”（诬称讨幕战争是德川家和萨摩家的私战），提高军威、扩大讨幕阵线。

3月8日，举行誓师仪式，天皇亲授军刀一口、锦旗两面，大总督炽仁

亲王上出师表。然后，大总督在参谋西乡隆盛、林玖太郎等参谋随同下乘战马登上征途，筑前、津和野二藩藩兵紧跟其后。威武壮观的场面令目击者感慨不已，长州藩士品川弥二郎在感叹之余作歌谣一首，流传于后世。

东征大军兵分四路，所向披靡，直奔江户。东海先锋军一路无阻，最先于4月4日到达江户城外品川。东山先锋军遇敌兵甚多，边进边战，力克艰险，于4月5日到达江户城外板桥。北陆先锋军征途较长，于4月26日到达江户郊区，设本部于浅草本愿寺。大总督所率兵马沿东海之滨，经大津、名古屋、滨松，于3月28日到达骏府城。四路大军构成马蹄形包围圈，只差临海一面没有合围。

3月29日，大总督府召开各道总督参谋会议，决定4月7日总攻江户城。

此时，江户城中的幕臣分为主战派和恭顺派。主战派主要人物有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勘定奉行兼陆军奉行小栗忠顺、步兵奉行大鸟圭介等；恭顺派主要人物是陆军总裁胜海舟、会计总裁大久保忠宽等。德川庆喜本人倾向恭顺派。所以，江户城内恭顺派占上风。于是，恭顺派分三路搞起一个解救德川庆喜运动。一路是以和宫（孝明天皇之妹下嫁给前将军德川家茂）为中心，通过血缘关系致书公卿，请求宽处德川庆喜；一路是以胜海舟为首，与西乡隆盛联络，要求和平解决，避免战争，防止西方强国干预，重蹈印度、中国覆辙；一路是英、法外交官员，处于幕府与东征军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不受损失，主张和平解决。解救运动果然很有成效。4月3日、5日，西乡、胜海舟两次会面和5日木梨精一郎参谋与英国使节巴克斯（即巴夏礼）会见之后，西乡隆盛以大总督府参谋的身分通知各军，暂缓攻城。接着，恭顺派与东征军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谈判，谈判的焦点是在德川庆喜投降条件上讨价还价。

德川庆喜的处分问题，事关重大，大总督派西乡归朝请命。12日薄暮时分，西乡回到京都。连夜召开朝议，与会者有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政府要员。会议开始，意见分歧。岩仓认为，为迅速收拾时局，应对德川庆喜从宽处理；西乡、大久保主张处德川庆喜以死刑。经讨论后，西乡、大久保放弃己见，意见趋于一致，决定了德川家处分案大纲，立即奏请批准。西乡13日捧旨回营，17日向大总督复命。

4月26日，东海道先锋总督桥本实梁、大总督府参谋西乡隆盛等60余人，承大总督之命进入江户城，向旧幕府的代理人田安庆赖宣布朝旨——德川家处分大纲。其主要内容：一、念德川家200余年之功业，今予宽典，免德川庆喜一死，退居水户谨慎，听候处理；二、献城投降；三、交出全部军舰和武器；四、城内家臣退出城外谨慎；五、助德川庆喜谋叛者处以重罪。田安庆赖表示接受朝旨全部条款，听候处理。定于5月3日正式献城投降。

5月3日，东海道先锋军参谋海江田武次、木梨精一郎率萨摩、长州、尾张、熊本、备前、大村、佐土原等7藩藩兵入城。同日凌晨，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从宽永寺大慈院走出来，7日到达水户藩，进入弘道馆的一间屋子里，执行谨慎命令。据目击者记录，末代将军因长期忧郁，面色憔悴，胡须蓬生，身穿黑色木棉外褂和裙子，脚登小仓麻里草履，看上去一副可怜样，昔日的威风荡然无存。

5月13日，东征大总督炽仁亲王率各先锋总督及参谋进入江户城。260多年来将军的居城，现在改为大总督府，不久将成为日本的首都。

江户开城后，东征大总督面前有两大问题急待解决，一是处理德川庆喜

的具体方案，如应立谁为德川庆喜的继承人，封禄应定为多少，居城应定在何处？二是江户城的治理问题，城内残敌未肃清，秩序混乱，尚拿不出有效的治理方案。为此，西乡于5月26日乘汽船回京请命。27—31日连日朝议，最后决定：德川庆喜的继承人定为年方6岁的田安龟之助，封禄为70万石，居城为骏府。并派三条实美为关东监察使偕同军防事務局判事大村益次郎赴江户，代表京都政府直接处理江户善后事务。

6月14日，三条实美一行到达江户，19日宣布立田安龟之助为德川庆喜继承人的朝旨。6月4日，大村益次郎亲自指挥东征军围歼聚集在上野一带的反革命武装集团彰义队，一举解决了江户治安问题，为恢复正常秩序创造了条件。12日，大久保利通到江户，安排天皇东幸江户和改江户为首都东京事宜，并部署进军东北地区剿灭残敌的军事行动。讨幕战争的第二阶段到此告一段落，主战场逐渐向东北地区转移。

东北战争主要是以会津藩为中心展开的。会津藩是原京都守护，1月27日进犯京都的主力，故讨幕战争伊始，新政府首先宣布会津藩为朝敌之首，必讨之。当时的政策是政府暂不出兵，先由东北诸藩动手处置。首先说服处于中立的仙台、米泽、盛冈、久保田等藩，“明辨大义，恭顺朝廷”，与东征军相呼应，征讨会津藩。2月12日，命令仙台藩主伊达庆邦实行一藩单独征讨。3月19日，成立奥羽镇抚总督府，左大臣九条道孝任总督，泽为量任副总督，萨藩藩士大山格之助、长州藩士世良修藏任参谋，专门督导东北地区军政事务。但仙台、米泽藩主已陷入《讨萨表》、“私战论”泥潭中，认为新政府是萨、长手中之物、两藩挟天子令诸侯，所以对朝廷的命令阳奉阴违，表面上接受朝廷征讨命令，暗中同情德川家和会津藩。他们甚至向朝廷建议，要求停止东征，宽恕会津藩。奥羽镇抚工作进展甚微。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也在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恭顺，一面整编藩军，并与庄内藩（原江户守护）订立同盟，准备武力对抗。

新政府见东北形势微妙，于3月25日派遣奥羽镇抚总督及参谋率萨摩、长州、筑前等藩藩兵，从海路东征。4月11日在松岛登陆，指挥部设在仙台藩校养贤堂，立即命令仙台藩组织附近诸藩征讨会津藩。仙台藩主仍故意拖延，并对镇抚总督、参谋等人态度骄横、粗暴傲慢、发号施令颇为不满。仙台藩主扬言，会津并非朝敌，已有恭顺之意，应予会津以“恰当公正之罪名”，建议停止对会津征讨。仙台是东北第一大藩，影响很大，讨津战争一筹莫展，一个月的时间白白地过去了。

德川庆喜投降后，东北政情愈益复杂。一批顽固幕臣——海军总裁榎本武扬、陆军总裁小笠原长行、老中板仓胜静、若年寄永井尚志、步兵奉行大鸟圭介、反动皇族入道公现亲王（轮王寺宫）等率领军舰、幕兵逃到东北地区，四处流窜，组织反动力量，妄图东山再起，特别是会津藩一时成了反革命巢穴。例如，大鸟圭介于5月3日深夜率2000精兵逃出江户，经市川攻占宇都宫城，6月下旬进入会津藩，与会津藩兵共守藤原据点，后又窜到仙台进行煽动。如此一来，东北形势发生逆转。

首先，会津藩与另一朝敌庄内藩（原江户守护，烧毁萨摩藩在江户藩邸的主凶）暗立同盟，誓共存亡。然后，仙台藩与米泽藩共同发起解救会津运动和反东征军运动。他们一面宣扬说，会津虽参加鸟羽、伏见之战，但非朝敌，理应雪冤，求镇抚总督宽典；另一面诬蔑说，“称王师的西军（指讨幕军）实为奸贼”，“东方举起勤王旗帜，讨伐西军”。

6月1日，在仙台、米泽串连之下，于白石城召开诸藩重臣会议，共商解救会津事宜。米泽藩主上杉齐宪亲率1700名藩兵到会助阵。会上拟就“解救请愿书”，签名者共27藩。请愿书递交总督府，但被驳回。

9日深夜，奥羽镇抚总督府实权人物、参谋世良修藏被刺客枪杀，刺客是仙台藩藩士。刺客当场被擒，翌日晨被斩首。

同日，仙台藩主伊达庆邦、米泽藩主上杉齐宪共同向镇抚总督上书，宣布不参加讨律战争。随后，其他各藩纷纷从讨津军中撤兵。

6月22日，奥羽诸藩重臣再度到白石城集会。会上成立奥羽同盟，通过同盟条约，签名者共25藩。这是一个反革命联盟，史称奥羽越联盟。

8月31日，成立奥羽越公议政府。奥羽越联盟还向全国各藩和驻日外国使馆发送书简，妄图复辟封建政权。

由于敌人一时猖狂，征讨军处境困难，加之战线越来越长，兵源、弹药、食品供应均感不足，东北战争一度处于胶着状态。

7月底，西乡隆盛回京请援，并亲自回鹿儿岛求兵。9月中旬，由驻守京都的萨摩藩兵和从鹿儿岛新调来的援兵组成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乘汽船向东北战场进军。一路在东海港口平潟登陆，一路在西海港口新潟登陆。援军一到，征讨军士气大振，越后战场和奥羽战场均捷报频传，9月底开始酝酿会津攻坚战。当时军内有两个战略方案，一是先征服仙台、米泽，孤立会津，最后使之降服；一是先制服反动巢穴会津，仙台、米泽等藩不战自降。

白河口总督府参谋板垣退助、伊地知正治（原属东山先锋总督府参谋）等主张后一战略，其理由是：奥羽是严寒地带，三四十天后必降大雪。东征军以南方兵为主，在严寒季节作战非常不利。若在仙台、米泽空费时间，年内难以攻克会津，势必拖到来年春天。如此，我军必厌战，敌方防御力量将增加10倍。且夜长梦多，我内部恐生枝节。毕竟会津是根本，仙台、米泽是枝叶，根拔叶必枯，此自然之理。板垣设想被采纳，确定会津攻城、仙米攻心的策略。

从9月底开始，东征军调集主力部队3000名，组成1万余人的攻津大军，炽仁亲王兼会津征讨大总督。征讨军从四面八方进击会津藩城若松，一个一个地拔掉若松外围的据点，一天天缩小包围圈，把驻守在各据点的藩兵全部赶进若松城。到10月10日，征讨军已形成若松包围网、占据了城外制高点。12、14日，征讨军大炮齐鸣，轰得若松城内房倒屋塌，四处起火，死伤惨重，仅14日一天，死亡者达170余人。残酷的攻坚战，震撼了整个东北地区，藩主们无不胆颤心惊。

攻心战的时机也成熟了。征讨军及时地利用土佐藩和米泽藩的姻戚关系，派土佐藩士泽本盛弥携带土佐重臣的书信赶赴米泽劝降，信中说：“一旦悔悟谢罪，可永久保持祭典祖先、恢复藩祖的英名。”米泽藩主为之说动，立即派员赴总督府请降。总督府向来使讲清政策，一、即使反乱首谋亦投降不杀；二、一旦悔悟谢罪，可保领内安定无事；三、如果会津藩悔悟谢罪，亦将允许继续祭祀祖先；四、投降后仍给予一定数量领地；五、奥羽诸藩有意投降者，可派重臣来总督府请降。

攻心政策很有威力。10月13日，米泽藩主上杉齐宪请降，并派其子茂宽赴总督府要求参加讨津战斗，以反戈一击表示忠诚。在米泽影响下，10月30日仙台藩主伊达庆邦向总督府提出投降谢罪书。奥羽越同盟崩溃了。

征讨军从9月中旬至10月底发动强大攻势，猛轰若松城。城外盟藩纷纷

投降，城内屋倒阁塌，弹尽粮绝，孤立无援。藩主松平容保在走投无路之时，于11月4日，经米泽藩中介，向总督府提交投降书。板垣退助、伊地知正治两参谋向来降者提出投降条件：一、6日午前8时，城门悬挂写有投降二字的白旗；二、松平容保与其子到军门前乞降；三、交出全部武器弹药，等等。松平容保及其重臣完全接受投降条件。6日早，著松城门上挂起白旗。据说这面白旗是用碎布条拼成的，成块的布已为伤员包扎用尽。正午时分，松平容保、松平喜德父子及家老等重臣，身着麻布衣、脚登草履走进投降仪式场，在锦旗飘扬、威武堂堂的征讨军队列前乞降。继江户之后，又一个反革命巢穴被摧毁。反动派的活动阵地越来越狭小了。

米泽、仙台、会津投降后，其余小藩纷纷投降，东北战争宣告结束。

12月20日，东征大总督兼会津征讨大总督凯旋归京，向天皇交还节刀（似令箭）和锦旗。讨幕战争接近尾声。

虾夷（今北海道）地方是反动幕臣的最后一块阵地，函馆战役是讨幕战争的尾声。

会津藩投降后，以榎本武扬为首的一群顽固幕臣见大势已去，便于11月25日率8艘军舰、2000多名官兵向虾夷地方逃去，妄图藉海山险要负隅顽抗。12月3日到达虾夷，从鹫木登陆，8日占领箱馆及五稜郭要塞（坚固的洋式五角形要塞）。箱馆府知事率兵逃往青森。12月18日，叛军占领松前藩，藩主松前德广率兵逃往轻津。虾夷地方完全落入旧幕臣之手。1869年1月27日，叛军建立虾夷地方行政机构，以陆海军军官投票的方式选出主要官员——总裁榎本武扬、副总裁松本太郎、海军奉行荒本郁之助、陆军奉行大鸟圭介、箱馆奉行永井尚志等。是日，船舰上、炮台上鸣礼炮100响，以示祝贺。到夜间，街道上彩灯悬挂，看上去好不壮观！

早在1868年4月，根据《政体书》府藩县三治一体的规定，将箱馆划为箱馆府，作为政府直辖地方机构，派清水谷公考为箱馆府知事。12月8日，知府退到青森，组织附近藩兵防御残敌进犯，同时向政府报告敌情、请派援兵。政府立即派海陆军参谋山田义显率长州、德山二藩兵奔赴青森。12月22日，山田改任为青森口陆军参谋兼海军参谋。1869年1月1日，政府发布《箱馆逃军追讨令》；清水谷知事兼任青森口总督。其后陆续派长州等数藩藩兵增援青森，到5月青森总兵力达7000余人，增派黑田清隆为陆军参谋。政府还派一支包括军舰8艘、运输汽船4艘、大型帆船16只的海军开赴青森。箱馆扫荡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月中旬，北日本还是早春天气，海风袭来，令人感到阵阵寒意。5月17日，一声军号长鸣，海陆军齐发。兵分两路，一路指向松前，一路指向箱馆。征讨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残军巢穴，28日攻克松前城，6月9日攻占箱馆外围重要据点矢不耒（音lǎi），敌军被赶进五稜郭，成了瓮中之鳖。6月20日拂晓，箱馆总攻开始了。海陆相互配合，炮声隆隆，硝烟蔽空，厮杀声弥漫山野。残军的舰队完全被消灭，要塞里尸体横陈，猛将土方岁三毙命。22日，黑田清隆派人稜去五稜郭劝降，但榎本武扬仍摆出一副武士架势，拒不投降。24日，征讨军集中火力猛攻五稜郭、弁天崎、千代岱炮台，弁天崎守兵投降了（永井尚志在内）。25日强攻千代岱，守将战死，守兵投降。榎本武扬听到两炮台失守报告后，凄枪已极，拔刀欲剖腹自尽，被部下阻止，镇定之后决定到军门投降，以保全残部生命。26日晨，榎本武扬、松平太郎、大鸟圭介、荒井郁之助等向黑田参谋请降。黑田提出投降条

件：一、翌日上午6—7时，榎本等4人到军门投降；二、下午1—2时，全体部队投降；三、下午4—5时，交出武器和五稜郭要塞。榎本完全按照投降条件举行投降，征讨军收点城地和兵器。讨幕战争到此宣告胜利结束，时值1869年6月27日。

废藩置县

战争不是目的，仅仅是手段；讨幕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德川幕府、废除封建领主制度、建立近代富强国家。因此，讨幕派在兵马停惚中仍不遗余力地推行废藩政策，实行府藩县三治一体体制、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既果断又谨慎地推动革命向纵深发展。

府藩县三治一体体制是废藩置县的前奏，是因时制宜的革命政策。

如前所述，讨幕战争是“辞官纳地”的战争，战争的第一个目的是剥夺德川庆喜的领地、领民。讨幕军所到之处，首先没收幕府直辖领地（所谓“天领”），然后在当地设镇台，派总督管理。例如，讨幕战争初战告捷，便于2月14日设立大和镇台，参与久我通久为总督；15日设立大阪镇台，参与醒醐忠顺任总督；同日设立兵庫镇台，东久世通禧任总督。几天之后，将镇台改为裁判所，由军政向民政转移，以期建立地方行政建制。2月24日设长崎裁判所，3月之日设京都裁判所，30日设大津裁判所，4月11日设横滨裁判所，5月4日设新潟裁判所，16日设佐渡裁判所。其中长崎、横滨，箱馆、新潟均为对外开放港口，政府格外关注。

5月，新政府根据《政体书》确立府藩县三治一体体制。藩，凡勤王藩、中立藩照旧保留藩名称，由原藩主统治不变；凡直辖地或朝敌藩，均收归天皇管辖，分别设府或县。原则上，大都会和港口设府，一般地方则设县。例如京都、大阪、江户三都，以及长崎、横滨、箱馆、新潟港口，均以府建制；兵庫、大津、笠秋、堺、久美滨等，则建立县制。

《政体书》还强调中央集权化、地方服从中央、政出一途等。对府藩县权力加以限制，如规定“五勿”政策：勿以一地之制用于他地；勿私授爵位；勿私造货币；勿私雇外国人；勿与邻藩或外国订立盟约。目的在于“不使小权犯大权，不使政体紊乱也”。12月11日，新政府又制定《藩制职制》，进一步削弱藩的权力，强化中央集权，打破封建封闭制度，提出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藩政与家政分离，实行公议体制等。在官员设置上，各藩设执政、参政、公议人。执政奉朝命（中央政府命）辅佐藩主，执掌一藩政事和纲纪；参政参与藩政，掌管庶务；公议人代表藩论，任公议所议事员。凡此种种举措，均为强化中央集权、限制藩权，为废藩置县积累条件。

三治体制是战争时期的、因时制宜的废藩措施。因彼时的急务是团结一切反幕力量，迅速推翻德川幕府，巩固新政权，故不能实行一概打倒的废藩政策，对300名诸侯要区别对待。正因如此，讨幕阵线才没有破裂，并逐渐扩大，而朝敌的阵地日益缩小，这是讨幕派决策人的英明之处，是取胜的原因之一。

版籍奉还是三制体制的新发展；是“辞官纳地”的逻辑发展。根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训，“辞官纳地”自然包含全部诸侯。

早在讨幕战争初战告捷之时，参与兼总裁局顾问木户孝允在给三条实

美、岩仓具视的信中写道：“应从速捣其巢穴（指江户），以正天下之大典。……并以至公至正之心，一洗七百年来之积弊，使三百诸侯均交其土地和人民，不然革新之意就不知何在。”木户在这里强调两件大事：一要从速夺取江户，推翻德川幕府，剥夺德川庆喜的领地、领民，给各位诸侯看看；二要使各位诸侯均交回其土地和人民，重点在“均”字上，即三百诸侯无一例外。这是对“辞官纳地”革命纲领的新解释，使之符合“王土王臣”的古训。

当木户将自己的这一思想告诉大久保时，大久保以发自内心的共鸣表示赞同。约定各自作本藩主的游说工作，说服藩主，统一藩论。

至于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政策、在什么时候使三百诸侯均交出领地、领民，他们之间也有共识。第一，不采取夺取方式，而采取“奉还”方式，给藩主以主动，体面地交出版籍。第二，萨（摩）长（州）二藩率先垂范。第三，说服藩主统一藩论时，一讲君臣大义和王土王臣的古训；二讲全国全世界形势，表明大势所趋；三讲赎买政策，对表示忠诚者，将赐以俸禄，列为公卿；四讲利害关系，勿蹈德川庆喜之覆辙。这种“奉还”方式，确实是一个革命创造。

5月底（德川庆喜已献城投降），木户回到山口，拜见藩主毛利敬亲，陈述奉还版籍的主张。第一次陈述时藩主未加可否。但从此以后，他一有机会便反复陈述。直到10月，在木户不厌其烦的陈述下，藩主终于说话了：“好，你们妥善处理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大久保是采取自下而上的统一藩论办法，先和小松带刀、伊地知壮之诚、吉井幸辅等重臣名士商量，然后再说眼藩主岛津忠义。萨摩是藩国意识最强的藩，工作难做。大久保东奔西走，冲破种种阻力，直到年底总算统一了藩论。大久保松了一口气，感慨良深，戊辰岁暮与丁卯岁暮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1869年2月24日夜里，大久保利通、广泽真臣、板垣退助等萨、长、土三藩代表，集会于京都圆山山边野墅，讨论版籍奉还问题。结果，三藩意见完全一致。恰在此时，佐贺藩讨幕志士大隅重信与伊藤博文交换废藩意见，二人一拍即合，立刻参加版籍奉还活动。三藩会议发展成四藩联合，西南四强达成共识。

3月2日，长州藩毛利敬亲、萨摩藩岛津忠义，佐贺藩锅岛直夫、土佐藩山内容堂等四藩主联名上《版籍奉还表》，交还领地和领民。四强影响所及，一股“奉还”运动像春潮一样，从西南向东北蔓延。三百诸侯竞相效仿，纷纷上书。

4月20日，成立公议所。6月，天皇就版籍奉还咨询诸藩。7月25日（讨幕战争结束将一个月），以天皇的名义批准四藩《版籍奉还表》，接着又批准了其他262藩的奉还表。到8月2日，版籍奉还运动告一段落。形势发展之快，为倡导者始料不及。

三百诸侯上书批复后，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上面的吩咐。政府的政策很简单，概括起来有三条，一、保留藩名，改藩主为藩知事，原藩主为当然藩知事，由中央任命；二、领地领民交还天皇，但仍由藩知事代管；三、以本藩实际收入的十分之一为藩知事的俸禄，其余作藩政经费。

显而易见，版籍奉还使废藩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三百诸侯均交出领地和领民，封建领主制的基础不存在了。但是，藩主的统治权没有被废黜，大有“纳地不辞官”之势。因此，废藩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

废藩置县是废藩革命的最后一步。

版籍奉还后，新政府趁热打铁，加速中央集权化过程，但阻力甚大。例如，部分公卿、藩主谋叛，长州藩兵叛乱，农民骚乱，社会动荡不安，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各藩知事对中央政令执行不力，阳奉阴违，各行其事，改革收不到预期效果而流于形式。

严峻的政治形势，促使革命者提出废除藩知事制度，使封建制度“名实共废”，行“废藩置县”。严峻的政局又一次把四强藩志士凝聚在一起，走完废藩革命的最后一步。

1871年2月，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杉孙七郎去高知会见板垣退助、福冈孝悌，三藩巨头意气相投，订立合作盟约，立时政局出现活力，废藩置县准备工作一步一步进行。三藩巨头决定由三藩出兵，组建万人国家军队——亲兵，作为废藩置县的后盾。5月，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率兵上京，6月长州兵到京，亲兵组建一气呵成。然后，改革陆军兵制，建立军区。8月11日，免除中央政府全部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重新建立以木户、西乡、大久保、大隈、板垣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维护四强力量均衡，确立中央权威。8月17日，判央福冈藩鹰造藩币案，藩知事黑田长知被罢官，大参事立花增美等5犯处死刑。这个小插曲不能等闲视之。恐怕是大久保等巧为安排的“杀鸡做猴”的小戏，为废藩置县大戏作铺垫吧？8月24日，在木户住所，召集有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西乡从道、大山岩、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巨头秘密会议，确定废藩置县具体行动计划。会上决定，如有某藩不服从，则派亲兵讨伐，如朝议不通过，则立即实行总辞职。会后取得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岩仓具视同意。万事准备停当。

明治4年（1871年）8月29日，天皇召见萨摩藩知事岛津忠义、长州藩知事毛利元德、佐贺藩知事锅岛直夫、土佐藩知事山内容堂，先表彰其版籍奉还之功绩，然后嘉奖熊本藩知事细川护久、名古屋藩知事德川庆胜等4知事主动建议实行郡县制的行动。同日下午，天皇召见岛津忠义等在京56名藩知事，当即由三条实美宣读《废藩置县诏书》。诏书开头批评藩知事在版籍奉还后没有真正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有其名而不举其实，……朕为之慨叹！”接着说：“故今更废藩置县，除冗就简，去有名无实之弊，无政令多歧之忧。汝等群臣须体察朕意！”这是一个突然袭击，对藩主们来说，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场的藩主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出来对抗。与下发诏书同时，政府还以太政官布告将废藩置县一事公诸于世。

废藩置县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四条：废除藩制，一律改为县；罢免原藩知事，政府任命县知事，县知事不得由本藩人充任；命令原藩知事离开旧地，迁入东京，政府发给家禄；打破旧藩界线，全国共划为3府72县。

这样一来，在日本列岛上存在1000余年的封建制度，名实共灭，废藩革命在此画上句号。

官制改革

讨幕战争、废藩置县、官制改革是戊辰革命三部曲，三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

官制改革是政治体制的革命，是公议政体体制向近代官僚专制体制演变过程。因此，讲官制改革必须从公议政体体制的产生说起。

“王政复古”政变是由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为首的讨幕派组织发动的、有反幕派公卿和公议政体派藩主参加的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宫廷政变，是日本资产阶级运动的前奏。

“王政复古”政变发布了具有反幕联盟共同纲领性质的《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摄关、幕府等旧政权，建立“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处理万机”的新政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告载明，“诸事应按神武创业之始，无缙绅、武士、堂上、堂下之别，皆须发表至当之公议。”这表明新政权是“托古改制”，即托太政官制之古，建立公议政体之制。

《王政复古大号令》还给新政权的人事阵容作了规定。“三职人事阵容：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议定：仁和寺富（纯仁亲王）、山阶宫（晃亲王）、中山前大纳言（忠能）、正亲町三条前大纳言（实爱）、中御门中纳言（经之）、尾张大纳言（德川庆胜）、越前宰相（松平庆水）、安艺少将（浅野茂勋）、土佐少将（山内丰信）、萨摩少将（岛津茂久）。参与：大原宰相（重德）、万里小路右大辨宰相（博房）、长谷三位（信笃）、岩仓前中将（具视）、桥本少将（实梁）、尾张三人、越藩三人、艺藩三人、土藩三人、萨藩三人（每藩三人均属藩士）。按此规定，总裁必须由亲王担任，议定须由亲王、公卿、藩主担任，参与由公卿、藩士担任。这种权力分配的原则带有严格的封建等级界限。亲王、公卿、藩主占据高位，公议政体派占数量上的优势，讨幕派藩士数量少、地位低，但他们手握兵权，却是新政权中的实力派。

《王政复古大号令》中的改革口号是：“舆论公议”、“登用人才”、“广开言路”、“百事一新”、“一洗旧弊”、“安定四民”。

从政治体制角度而言，三职政权可以算是公议政体体制。

所谓“公议政体论”，是开国后幕府、藩主、公卿中的改革派提出的调整幕、朝、藩关系的构想，企图以朝、幕、藩联合体制代替幕府专制体制，借以维持危机深重的封建制度。文久年间提出的“公武合体”、“诸侯会议”、“上下议院论”，庆应年间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西周的《议题草案》、津田真道的《日本国总制度》等构想都与公议政体论一脉相承。安政年间公议政体论的代表人物是阿部正弘，文久年间公议政体论的代表人物是岛津久光，庆应年间公议政体论的代表人物是山内容堂。

不难看出，三职政权是各种政治势力的松散联盟，没有统一意志，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实体，只是过渡性政权的一种形式；公议政体体制也只是过渡性的政治体制，绝不是完全意义的近代政治体制。

讨幕派在战争中正确地采取反幕联合阵线政策，一面利用三职政权，一面不失时机地、逐渐地改造三职政府的性质，使公议政体体制演变成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这些政治活动就是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与讨幕战争的发展、废藩革命进程紧密配合；《政体书》的制定与实施是战争时期实行的全面的官制改革。

讨幕战争是讨幕派领导的革命战争，是资产阶级运动从改良到革命的发展。单就政治体制发展而言，讨幕战争是公议政体体制向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演变的过程。

讨幕战争的胜利发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讨幕战争胜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新政府的领导集团在兵马倥偬中仍不忘官制改革。

鸟羽、伏见之战初战告捷，新政府便在明治元年（1868年）2月10日，着手整顿三职政府的机构和人事阵容，实行三职七科改革，即在三职下设立神祇、内国、外国、海陆军、会计、刑法、制度等七科。总裁总揽万机，裁决一切事务；议定分督七科；参与分掌七科权力。

另设征士、贡士制和上下议事所。所谓征士，是从各藩和都市有才之上中遴选的议员，充任参与或下议事所议事官，任期4—8年。所谓贡士，是由各藩主指定的议员（大藩3人、中藩2人、小藩1人），充任上议所议事官，任期不限。征士和贡士类似官选议员，但不是握有决议权的议会成员，而是咨询机关的官员。上议事所和下议事所，似乎是模仿欧洲立宪政治的两院，前者是公卿藩主的会议机关、行政官府；后者是咨询机关，设立的目的是标榜“洞开言路”、体现公议政体原则，有利于调动各阶层参加讨幕战争的积极性，扩大讨幕阵线。

2月25日，又增设总裁局，中央政府成为三职八局。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后担任总裁局顾问。

军事体制改革不可忽视。3月，设立大总督，以统率东征军；各道设立总督，以统一指挥各藩军队和草莽队（民间军事组织）。讨幕军是以天皇的名义讨伐幕府的，故各级总督均由亲王或公卿担任，但实际指挥权却掌握在担任各总督府参谋的讨幕派手中，全部讨幕大军的指挥大权掌握在大总督府参谋西乡隆盛手里。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讨幕派掌握了军政大权，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但政治体制的改革仍在雏型阶段。

3月中旬，东征大军兵临江户城下；4月6日，发布《五条誓约》；5月3日，德川庆喜献城投降；6月11日，发布《政体书》，实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五条誓约》是继《王政复古大号令》之后、在新形势下制定的共同纲领；《政体书》是《五条誓约》的体制化，是官制改革的法律根据，故有人称之为组织法。

《政体书》是在木户孝允领导下，由通晓和（日本）、汉（中国）、洋（西方）制度的福冈孝悌、副岛种臣起草的。拟定前曾征求一些藩主和藩士们的意见，并参考了《令义解》、《职原抄》、《文献通考》、《云上明览》、《大武鉴》、《西洋事情》以及《联邦史略》（汉译北美合众国制度）等古今内外文献。

《政体书》的基本内容有五个：第一，强化中央集权，“天下之权力皆归大政官，使政令无出二途之患”。第二，建立制衡体制，“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第三，建立议事制度，“为实行舆论公议也”。第四，采用官吏公选办法。第五，确立府藩县三治一体体制。

根据《政体书》，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体制。即太政官（未设太政大臣，以辅相二人代）是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机构；下设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官府；立法官府下设上局、下局（模仿西方两院制）；行政官府下设神祇、会计、军务、外国等官（省）。地方官，设有府、藩、县。这套体制，可称之为“政体书体制”。

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事阵容的调整。政体书体制，中央政府的人事结构基本上未变，仍然是等级森严，辅相、认定均出自公卿、藩主，藩

士只能屈居参与，但政府讨幕派的力量加强了。

“政体书体制”改革是整个官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中央集权化起了积极作用。但这个体制在运行中仍是枝节丛生，步履维艰。“政体书体制”既采古制，又模仿西制；既强调中央集权，又保留公议政体成分，其本身矛盾重重。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品种几乎全部没有成活，“政体书体制”的生命也是短暂的。

伴随废藩革命，中央政府还实行了两次大政官制大改革。

明治2年（1869年）8月15日，公布一份叫《职员令》的政改文件，实行太政官制改革，实际上是对“政体书体制”的改革。《职员令》一反“政体书体制”模仿西方政体形式的做法，而模拟大宝古制，采取祭政一体制，废除行政官和上局会议，代之以神祇、太政二官，且神祇官位于太政官之上。太政官之下，设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6省。6省之外设立一个集议院，代替上下局，议事机关的地位大大降低了。太政官是以左右大臣各一人，大纳言、参议各三人组成的中央政府的中枢机关，直接“辅佐天皇，统理大政”，掌管6省。不难看出，这次改革的矛头直指公议体制，纯化新政府，排除公卿、藩主，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体制。9月16日，实行机构改革，加强民部、大藏两省，后两省合并为民部一省，松平庆永任省卿，大辅为大隈重信，少辅为伊藤博文。该省人才之集中、主管事务之多之重，大有凌驾太政官之上之气势。12月设立改正局，专门掌管政体改革，除大隈、伊藤参加外，又集结涩泽荣一、前岛密等开明人才，推进兴革事项，使保守分子望而生畏。

《职员令》改革后二年，明治4年（1871年）7月29日，中央政府又发布一份叫《太政官职制及章程》的政令，再次实行官制改革。这次改革的任务是健全太政官体制，实行三院制，即正院、左院、右院。正院以太政大臣为中心，设纳言若干人（后改为左右大臣）、参议若干人统称三职。太政官辅佐天皇，总揽祭祀、外交、宣战、媾和及海陆军大权；纳言职权仅次于太政大臣，大臣缺席由纳言代理；参议参与国家大政，审定国务，辅佐太政大臣和纳言，协理庶务。《太政官职制及章程》首先确立天皇亲政体制，然后确定太政官地位，三职类似内阁，正院下设藏、兵、外诸省，分掌国家政务，省卿由参议兼任。左院由议长一人、议员若干人组成，参议或一等议员兼议长，审议各项立法议案。右院由省卿、大辅组成，起草制定有关各省事务的法案，审议各省行政实施上的利弊。

另外，废除位居太政官之上的神祇官，改为神祇省，隶属太政官。还废除等级森严的官阶，定新官阶为十五等，不分门第家格，任人以才。

改革后，太政官与正院集大权于一身，总揽立法、行政、司法一切国家大权。但这不是改革的实质，改革的实质是公卿、藩主在中央政府中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从表面上看，三大臣均由公卿出任，参议由四强藩讨幕派藩士出任，省卿由参议兼任，但事实上参议是国家大政的决策人，省卿是执行人。三大臣是按照参议的决策辅弼天皇，天皇接受辅弼发布命令。这样一来，参议、省卿是真正的实权派，大臣和天皇统统被架空了。三条实美、岩仓具视是大久保利通等人一贯言听计从的合作者，这种微妙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回溯官制改革全过程，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每改革一次官制，中央政权的公议政体的色彩就淡薄一层，中央集权的色彩就加深一层；公卿、

藩主的权力就削弱一些，讨幕派的权力就加强一些；公卿、藩主在中央政权中的人数就减少一些，讨幕派的人数就增加一些。到明治 4 年（1871 年）《太政官职制及章程》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中除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之外，公卿、藩主统统不见了，萨、长、土、肥的讨幕藩派领袖占据中央政府全部要津，形成一个近代官僚群，垄断了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随之形成，公议政体体制终被淘汰。

第 7 章

求知识于世界

考察欧美

戊辰革命后，日本进入建国阶段或资本主义改革阶段。建国的任务是把旧日本建设成资本主义的新日本，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建国纲领是“求知识于世界”和“富国强兵”。建国工作以岩仓使节团考察欧美各国为开端。

戊辰革命胜利后，百废待兴，但明治政府领导集团尚无一张建国蓝图。建国大业从何着手、怎样着手，一时莫衷一是。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建议，先出使欧美考察，然后绘制蓝图。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早有出国考察的愿望，由于革命重任在身，无暇出国。所以，出使考察的意见很快在政府要员中达成共识。况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早已是五条誓约之一。

明治 4 年（1871 年）10 月，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出国考察《事由书》两份，明确规定了使节团的总任务和具体的考察任务。其总任务是：一、历访缔约国，呈递国书，修聘问之礼；二、考察各国文物制度，制定建国方略；三、举行修改条约预备谈判，表明日本的立场和希望。考察的具体任务是：一、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的理论 and 实际情况；二、考察各国的理财、会计（财政、金融）、各类产业的法规和管理状况及现状；三、考察各国教育制度、法规和现状。并分科定人专科考察。

使节团成员的人选，要经过政府要员协商确定，然后由太政大臣任命。特命全权大使是右大臣（原外务卿）岩仓具视、副使是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一等书记官是外务少丞田边太一、外务大记盐田笃信、外务六等出仕何礼之、福地源一郎，二等书记官是外务少记渡边洪基、外务七等出仕小松济治、林董三郎，三等书记官是七等外务出仕川路宽堂。山内一式，四等书记官是文部大助教池田政懋、外务大录安藤忠经，理事官是陆军少将山田显义、司法大辅佐佐木高行、侍从长东久世通禧、会计兼务户籍头田中光显、造船头肥田为良、文部大丞田中不二麿、少议官高崎丰麿等 48 人。他们都是各部门有才干的官员。三条实美、西乡隆盛、坂垣退助、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井上馨、山县有朋、大木乔任等组成留守政府。为了使两班人马互相协调，双方签订一份《约定书》12 条。约定在使节团出国期间留守政府与使节团每月通报两次，互报情况，重大兴革事项必取得共识后再办，免生龃龉。在《约定书》上签名的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隈重信、坂垣退助、议长后藤象二郎、神祇大辅福羽美静、外务卿副岛种臣、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大藏大辅井上馨、兵部大辅山县有朋、文部卿大木乔任、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司法大辅佐佐木高行、司法大辅穴户玑、宫内卿德大寺实则、开拓次官黑田清隆等 12 人。

一切准备停当，明治 4 年（1871 年）12 月 23 日 11 时，岩仓使节团一行登上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亚美利加”号，下午在礼炮声中离开横滨赴美。是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船渐渐地远去了。船上人员回头眺望，耸立在箱根、足柄山脉之间的覆盖皑皑白雪的富士山峰，在夕阳映照下分外美丽。

使节团于翌年（1872 年）2 月 29 日抵达华盛顿，拜见美国总统后，立即

与国务卿会谈有关修改条约问题。因美国态度强硬，修改条约工作一筹莫展，只好专心考察。8月6日，使节团又登上英国轮船，经过10天航程，到达英国。英国政府对修改条约态度更加强硬。从此，使节团索性放弃修改条约工作，专心致志地进行考察。

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使节团每到一国，首先接触国家首脑、政府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考察政府组织机构、议会的功能及运作、法院的权力、三权分立的机制，等等。对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以及福利设施等，亦都进行仔细的考察。

岩仓使节团组织规模之大，访问国家之多，考察项目之全之细，历时之久，耗资之多，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使节团的收获是巨大的。首先是明治政府领导人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学到了治理近代国家的理论和方法，为制定建国蓝图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当他们从“始惊、次醉、终狂”中冷静下来之后，便开始思索如何实现建国大业，如何追赶先进国家实现与“万国对峙”的夙愿。

使节团学到的东西是具体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各国的宪法和政治体制。他们把几种宪法和政治体制进行对比，看看哪种体制最适合日本国情。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回国后，立即提出制定宪法的建议书。

使节团被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迷住了，进行了仔细考察。特别是对“世界工厂”的英国，更是着了迷，足足用了4个月时间，考察了伦敦、朴茨茅斯、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纽卡斯尔、谢菲尔德、伯明翰、伍斯特等25个城市。“每到一地，黑烟蔽空，工厂林立”，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富强之道。

使节团对各国教育制度和现状给予极大的注意，特别是对美国的教育发生了兴趣。他们发现美国教育普及程度很高，并认为是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木户孝允认为日本人“与今日之美欧诸州之人决无不同，只在于学与不学而已……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

大久保回国后提出制定宪法建议书、殖产兴业建议书、振兴国外贸易建议书，三大建议书为建国事业绘制了蓝图。

使节团成员对所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和体验，使他们成为具有近代意识的官僚、推动日本全面近代化的带头人。

教育改革

伊藤博文曾经说过：“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把兴革教育列为建国工作之先，并定兴革教育原则两条，一是“破除旧时之陋习”，一是“求知识于世界”，颇具革命开放精神。因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是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为开端的。

另一位革命家大隈重信在总结维新后教育发展时说：“教育于维新之前，局限于武士40万之间，至维新之后，则普及于全民。”因此，在讲维新后教育改革时，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江户幕府时期的教育方针和状况。

德川幕府的教育方针，是以贵族教育为王，教育对象是武士，教育内容

则以儒学为主，所谓“武士之家盛行儒教”。教育机构严格按照封建等级制度，设有昌平坂学问所、藩校、寺子屋、乡校、私塾等。

昌平坂学问所的前身是昌平黉，校址在昌平坂，1790年幕府将昌平黉收为官学，改名为昌平坂学问所。此校任务是以儒学教育幕臣，学员主要来自旧旗本，同时兼收诸藩的优秀武士，学习科目为经（四书、五经、三礼）、史（左传、史记、两汉书、通鉴纲要）、国史（本朝通鉴、六国史、德川实录）、律令（唐律、明律、津律、本邦律令）、诗文等五科。后来拟增天文、地理、算术、物理等科，但因幕末政治形势多变，未能实行。维新后昌平坂学问所改为昌平学校，1869年与开成学校、医学校合并成“大学校”，1870年被勒令停课，翌年被废除。

各藩设立的教育机构称藩校，通称学馆，如会津藩的日新馆、米泽藩的兴让馆、长州藩的明伦馆、水户藩的弘道馆、熊本藩的时习馆、鹿儿岛的造士馆。藩校的组织形式和课程内容，全部效仿昌平坂学问所。宽政以后，藩校数量增多，学科也逐年增加。到幕末，医学、算术、天文、兵学等均为藩校采纳，在某些藩里还设立医学校、洋学校、国学校，并附设出版机构，藩校成为传授新知识、新技术的基地。不过，藩校学员均来自藩士，不收农、工、商“三民”。据统计，江户时代共有藩校280所左右。废藩置县后，藩校被废除，有的改为中学校。

江户中期，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自发地设立起来许多平民学校，其学员有“三民”，武士不进入。这类学校多设在寺院里，儿童七八岁时入学，跪于师前，结师弟之契，学童敬师如敬亲，师爱生如子，故名寺子屋。学习内容，以实用为主，因职而异，一般设有习字、诵读、作文、珠算、礼仪等。多以《三字经》为课本，还有“商业往来”。办学处，城市以官员、商人、医生居多；乡村以村长、神官、僧侣为主，也有武士。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平民学校已相当普及。幕末，全国寺子屋达1万余所。

私塾是江户时代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形式。私塾多是各学派（包括兰学家）的鸿儒学者创办的教育和学术传授场所。名人学者无不通过名门私塾修业而成名，所以私塾对政治影响非常大。例如，京都大儒伊藤仁斋创办的“古义堂”，就是著名町人学者山片蟠桃受教育的地方；国学家本居宣长创立的“铃屋”（于松板），平田笃胤创办的“气吹屋”（于江户），都名盛一时；洋学家绪方洪庵创立“适塾”于大阪，前后门生达3000余人，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等英才，均出于绪方门下；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于萩），培养出维新领袖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多人。

除上述各类学校外，幕府末期，幕府还创建了为数不多的专门为幕臣和武士传授洋学的教育机构，如医学所、开成所等。

上述各类学校，都是属于封建性质的教育机构，对维新后的新日本已经不适应了。于是，明治政府采取“求知识于世界”的政策，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改革，借以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建设资本主义精神文明。

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着手整顿教育机构。1868年4月，恢复了公卿学习机构“学习院”；12月13日，分别建立“皇学所”和“汉学所”，由一批宫廷御用文人把持，提倡“汉土西洋共为皇学之羽翼”，玉松操、平田钦胤、矢野玄道为其中心人物。1869年迁都后，此机构被撤销。另外，1868

年8月17日，东征大总督府接收了昌平坂学问所，改名昌平学校。8月14日，把幕府创立的医学所改为医学校，将洋学渊藪开成所改为开成学校。1869年又将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合并，名为“大学校”。“大学校”是过渡性的教育管理机构兼教育机关（学校）。该学校在教学上，以国学为中心，兼授汉学和洋学。1871年成立文部省，废除昌平学校。1872年，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合并为包括文、法、理、医四个学部（系）的东京大学。此时，旧藩校也实行改组。新政府和幕府的教育政策有两点不同：一是打破身分制，允许平民入各类学校学习；二是虽以国学、汉学为主，但大量增加洋学课程。所以，人们称此时教育制度为“四民不分”时代。实际上，这是教育改革的准备时期，还不是真正意义的教育改革，真正的教育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的组成部分，开始于1871年。

废藩置县从根本上推翻了幕藩体制，为建设中央集权制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把旧日本改造成为新日本奠定了基础。随着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教育改革也开始了。1871年设文部省，掌管教育行政，大木乔任任文部卿，江藤新平任文部大辅。同年11月，派遣文部大丞田中不二麿为岩仓使团理事官，专门考察欧美各国教育制度；12月，成立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着手草拟《学制》（学校制度法令），任用大批了解西方国家教育的学者，如箕作麟祥、内田正雄、爪生寅、河津佑之等，担任《学制》调查委员。在起草过程中，正在欧美考察的森有礼、田中不二麿、新岛襄等，都提供了许多有关欧美教育制度的资料。1872年8月（阴历），以太政官布告形式颁布《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并以文部省的名义发布《撤销府县旧有学校，按照学制重新设立学校》的通知，共三份文件。这三份文件的发布和实施，标志着教育改革正式开始。

《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首先宣扬：“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产，昌其业，以遂其生者，此无他，端赖修身、开智、长其才艺也。而修身、开智、增长才艺又非学不可。”接着批判幕府时期的教育是“词章记诵”、“空理虚谈”、“士人以上之事”、“农工商以及妇女置之度外”的封建教育。然后宣布政府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从“士人教育”到“国民皆学”，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大革命。

《学制》是在《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近代学校体制的法令。这个法令是参照法美两国教育体制设计的，即将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1所；每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1所；每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1所。全国共设8个大学、256所中学、35760所小学，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统一的学校体制。

文部省的第13号通知（《撤销府县旧有学校，按照学制重新设立学校》）指令地方政府：“教育之事，今后更着力进行改革。府县旧有学校未能统一，且多不妥之处，因此一律令其撤销。应按此次所定《学制》汲取其主要旨意，重新建立学校。”于是，各级政府立即将乡校、寺子屋改成小学，并强令学龄儿童就学。到1875年，全国重新建立（改建）小学24225所，但多流于形式，实际就学率不高，约占学龄儿童30%。至于大学和中学建校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教育改革开始后，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缺乏师资。为了培养合格的师资，1872年在东京成立师范学校，从1873年起，相继在大阪、京都、宫城、爱知、广岛等地设立公立师范学校，在东京特设女子师范学校。1873年和1874

年又颁布《增补学制》，制定留学生规则、外籍教师规则、专科实业学校和僧侣学校规则等，使新的教育体制日臻完善。

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学制》，迅速地废除了封建教育制度，并为建立近代学校体制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政府有关人员急于求成和缺乏经验，而过分强调集中和划一，忽略了国家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等现状，从而招致政府内外对《学制》的反对。因此，政府被迫在 1879 年废止《学制》，代之以《教育令》。

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组成部分的教育改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艰巨任务，在改革过程中遇到许多矛盾和政策上的分歧。在政府内部存在两种分歧：即教育政策教育体制上的分歧和教育内容上的分歧。前者表现在教育法令不断修改变化方面，后者主要表现在关于德育问题的论战上面。

明治政府在实行《学制》中，因耗资过多（当时国家财力极端不足）和权力过分集中，引起社会各阶层非议，政府内部也发生分歧。田中下二磨于 1873 年归国，将美、英、法、德、俄、荷等国教育制度考察报告汇集成册，以《理事工程》为名出版。他对美国的所谓“自由主义教育”颇有倾慕之心，于是，于 1876—1877 年再度赴美考察，归国后出版《美国学校法》一书，对教育改革影响很大。政府为缓和对《学制》的非难，就采纳田中不二磨的教育思想，制定《教育令》，经伊藤博文（参议兼法制局长）亲手修改后，交元老院审议。虽然有部分保守派元老反对，但最后还是通过了。1879 年正式颁发《教育令》，撤销《学制》。

《教育令》和《学制》相比，不同之处有：废除学区制，由町、村设立小学，改变在管理上过于集中的弊端，实行地方管理；凡有私立小学的地方，不得再设小学，减轻国家负担；财政上确有困难的地方，无力设立小学时，可采取教师巡回上课方式；儿童 6—14 岁 8 年内，有 4 年上学，每年上 4 个月即可；小学课程，将诵读、习字、算术、地理、历史、修身 6 科定为必修课，另外可因地制宜增加课程，务必讲求实用；取消学区监督职，设立公选学务委员（从当地士绅中选）。很明显，《教育令》放宽了地方权力，在政策上也比较灵活，故被称之为“自由教育令”。《教育令》确实缓和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延长了就学年限，缓和了家长（主要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但又出现新的弊端，因当时地方自治体制效率很低，有些负担不起办学经费的町、村，随意废校，使儿童就学率急剧下降。这种新的弊端，加上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政治形势，使政府内外出现了要求加强德育和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呼声。以田中不二磨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教育改革政策受挫。1880 年 2 月，河野敏镰任文部卿，田中调任司法卿。河野到任后，立即着手修改《教育令》。1880 年 12 月颁布《修正教育令》，取代《教育令》。

《修正教育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了教育改革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力；强调国民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年限从 16 个月改为 3 年，不就学者须经郡长批准；课程设置，一律按照文部省颁发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即忠君爱国教育，吸收了元田永孚等保守派的主张。

《修正教育令》的颁布，表明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开始走向保守。

农民起义、自由民权运动、士族叛乱，使明治政府中的保守派越来越感

到不安，政府内部发生德育论战。1878年夏天，正当刚刚实行《教育令》的时候，以宫内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为代表的保守派，用天皇的名义撰写了《教育大旨》和《小学条例二则》，指责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是“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将来有可能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流弊很多”，等等。并预示“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竭力宣明仁义忠孝”，以儒教的道德伦理原则，纠正流弊。为了对儿童有效地灌输仁义忠孝观念，在《小学条例二则》中规定，校内要悬挂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画像。元田永孚极力主张恢复儒教，反对文明开化政策。

应当指出，元田永孚和另一个宫内省官员高崎正风，曾向天皇规谏，主张天皇亲政，改组内阁，建立一个由天皇侧近的侍从辅佐天皇左右国事的政府。伊藤博文斥责元田等主张是历史的倒退，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这种主张将导致政治上的混乱。

伊藤博文针对元田的有关教育改革意见，于1879年9月委托井上毅起草《教育议》一文，上奏天皇，申述品行风俗的败坏不在于文明开化政策，而是维新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并非像元田想象的那样肤浅和抽象。为了纠正风俗紊乱，的确需要研究“教育方法”，确立文教政策，但不应该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文明开化政策，“保护旧时的陋习”。元田对伊藤的《教育议》立即进行反驳，又写了一篇《教育议附议》。他在文章里重申“忽视仁义忠孝”是风俗紊乱的原因，恢复儒教、“读四书五经、尚廉耻、重礼让、笃伦理的教育”是矫正风俗的手段。元田、伊藤的论争是德育论战的开始。

明治天皇在德育论战中始终站在保守派一边。1882年12月地方长官会议上发布的敕谕中写道：“彝伦道德是教育之本，为我朝、中国所尊崇，虽欧美各国亦有修身之学，但我国对其采用仍不得要领，方今学科繁多，本未误置者屡见不鲜。”

德育之争公开化后，很快就发展成包括思想家、教育家参加的一场激烈论战。例如，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在1882年发表《德育如何》、《教育余文》两篇文章，从正面向儒教主义教育论实行攻击；元田永孚在1882年发表《国教论》，主张树立以孔子为中心的国教，确立以儒教作为“百科基础”的修身教育；思想家兼教育家西村茂树在1886年发表《日本道德论》，主张德育的根本是忠孝仁义，同时采纳一些西洋思想，即所谓“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道德论。1887年著名教育家杉浦重刚发表《日本教育原论》，否定以宗教作为教育原理，主张以自然（物理）的原理作为教育基础。东京大学总理加藤弘之，主张把神、佛、儒、耶稣四教全纳入修身课，统一教育论战。1890年，文部省官员能势荣发表一篇名为《教育评定论》的文章，实际上是代表文部省的意见，企图用折衷主义平息这场论战。

如此众说纷纭的论战，直接影响中小学的修身课教学，使学校的德育无所适从，从而引起地方官员的不安。于是，1899年地方长官会议向内阁提出要求文部省确立德育方针的建议以便结束论战，建立统一的教学方针和方法。

众所周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确定了日本的国家体制。为使教育更好地为巩固天皇制服务，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文部大臣芳川显正、法制局长井上毅、宫内侍讲元田永孚共同制定日本帝国教育总方针，并于1890年10月30日以《教育敕语》的形式颁布了，《教育敕语》以最高法律形式确定了教育方针，从而平息了自1878年以来的德育论战，结束了自维新以来

的教育改革。《教育敕语》是本着“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原则制定的，兹录原文如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举止恭俭，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力行公务，经常遵守国宪、遵守国法，一旦危急，则忠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则不独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显彰尔祖先之遗风。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使之通古今而不谬，施内外而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宜其德。

不难看出，这是一篇神学、儒学和近代国家主义的混合物，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和魂洋才”作为教育纲领。这一纲领在日本实行了半个世纪，影响之深不可低估。

还必须指出，《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事实上是全日本人民的行为道德规范，统治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着人们的一切行动。《教育敕语》是日本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们苦心炮制的、加在日本人民头上的桎梏。半个多世纪里，它从精神上驱使日本人民为“大日本帝国”效忠。《教育敕语》曾为加固近代天皇制、建立军国主义体制、发动侵略战争、炮制法西斯制度起过特殊的作用。

明治政府在 1884 年设立制度调查局，着手起草宪法和各项制度。1885 年建立内阁制，学校体制的建立也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久居国外考察的森有礼于 1884 年回国，任文部省负责人。1885 年正式任第一届内阁的文部大臣，担负起进一步整顿教育制度的重任。当时，正是德育论战的高潮，文部省一方面以折衷主义平息论战，一方面发布一系列《学校令》，整顿学校体制。1886 年发布《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令》、《中学令》，1889 年发布《实业学校令》，同时废除了过去的《教育令》。

森有礼主要吸取德国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他于 1887 年 10 月在直辖学校校长会议上说：“学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并非为学生个人利益……凡是涉及学术利益和国家利益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学生思想教育强调以“忠君爱国”为根本，灌输“万世一系”的“皇统”教育；为了维护国体，提倡实行军事训练，提倡学生“气质”（所谓顺良、信爱、威重）和体质。在学校管理上，“以国家办学为主”，由国家统一管理。故森有礼的教育思想被称为“国体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是和伊藤博文的立宪思想完全一致的。

《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为寻常小学 4 年、高等小学 4 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 5 年，高级中学 3 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人才，实属大学预备校，全国共设 5 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 1 校，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设 1 校（以后逐渐增多）。帝国大学分本科〔设法、医、理、文学部（系），后增设农学部（系）〕和大学院（研究生院）。《学校令》基本上完成了教育改革的任务，为确立近代学校体制奠定了基础。

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进程中，很重视派遣留学生和雇用外国学者的工作。这种做法是符合日本国情的，对建设近代文明确实收到了显著效果。但在实行过程中，也曾出现求之过急和人选不当的弊病，故有人批评说，明

治初期是“出洋万能”、“留学万能”的时代。当然，这样的批评不免也有失之片面和过分之处。

1870年，制定了《海外留学生规则》，在1871年发布的《学制》中也列有留学生条款。明文规定“留学生无尊卑之别，上至皇族，下至庶人均可”。这是在海外问题上第一次标榜四民平等原则。规定“华族留学生，由太政官选派，士族庶人留学生由府藩县厅遴选”。遴选标准是：“通晓派往国语言，禀性诚实，思想敏锐者”；年龄16岁以上、25岁以下，“但有非凡俊才者，不在此限”；留学年限，一般为5年；对留学生的纪律要求甚严，凡有“污辱国体者”、“懒惰或有不轨行为者”，一经查出，立即召还，并给予应有处分。临行前，还要对神宣誓，保证“报效国恩、不沾污国体”。私费留学者亦同。留学生任务是：熟悉各国国体、政治、风俗、人情，研究其文物制度、科学技术，即所谓“鼓舞日新之民，赞助开化之运，助国家于兴隆，期皇谟于久远”。所作规定，可以说是具体而又严密的了。1871年明治天皇敕谕华族，奖励留学。在奖励政策下，一时出现了所谓“留学万能”的出洋热。1869—1870年共派出留学生174人，1873年增至373人，所耗经费25万元，占文部省总预算的18%，比例过大。在人选上也产生弊端，例如，在留学生中有不能顺利使用外国语音，出去后不能学习，既浪费国家财力，又给国家出丑。政府为了纠正弊端，1875年召回全部公费留学生，并决定以后由开成学校（东京大学前身）严格遴选优秀学生出国。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文部省于1875年再颁布《贷费留学生规则》，即通过考试选拔学习、品行、身体好的人才，由国家贷予学费，学成归国后，20年内还清贷款。在当时国力微薄的情况下，此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为了加强国家统一管理，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于1882年制定《公费留学生规则》，由国家负担学费，由文部省指定所去国家、所学专业、学校，归国后由国家分配工作。几经修改留学生规则，使留学生素质不断提高，数量逐年增加，仅文部省自1868—1912年就派出留学生683名。从80年代起，归国留学生在各个领域逐渐取代雇用的外国专家。

留学生派往的去向，70年代以美英两国最多。从80年代开始，派往德国的数量猛增。这是因为德国统一后迅速发展成欧洲强国，引起日本政府领导者们极大兴趣。

日本政府为了加快资本主义改革的进程，在派遣留学生同时，还不惜重金雇用外国专家，作技术指导和培养科学文化人才。随着留学生学成归国和国内毕业生的增多，从70年代末开始减少外籍专家。到80年代末，留用者已为数很少了。

外聘人员在教育部门占1/3左右，其中大学最多。在东京大学创立时，全校共有教授39人，其中外籍教授27人；1881年全校共有教授49人，其中外籍教授26人。这些教授对于日本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教育改革中，文部省内聘有外籍顾问，协助教育官员规划教育改革事宜，提出不少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已经载入日本文化史册。

“理性之光”

维新前，西方启蒙思想只能随着洋学从锁国政策的缝隙一点一滴地渗入“大君之国”，在少数先进的日本人士中间秘密流传。戊辰革命，一举打倒

德川幕府，粉碎人们思想上的桎梏，加之明治政府的“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政策，使西方各国各派思想家的学说像势不可挡的潮水涌进日本列岛。

幕末成长起来的西学知识分子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者。

新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首先担当起传播“理性之光”的历史使命。

福泽谕吉（1835—1901年），出生在大阪，其父是中津藩的下级武士。福泽少年时期，在汉学先生白石常人门下通读经史，偏爱《左传》（读过11遍）。开国后，从1855年春到1858年秋，就学于绪方洪庵门下，学兰学。1858年进江户奥平藩邸，一面开兰学课，一面自修英语。1860年随幕府使节团赴美，归国后留在幕府从事翻译工作，直到幕府灭亡。在此期间，他得到三次周游欧美各国机会（1862年随遣欧使周游英、法、荷、德、俄、西、葡；1867年赴美），亲眼看到欧美各国实际情况，调查其文物制度，受近代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很深。他确信要谋求国家独立富强，必须首先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维新后，对新政府的聘请，固辞不就，专心从事教育（经营庆应义塾）和著述工作，传播自由平等之学说。他后来说，“我们洋学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开化的大门。”他在1866年冬出版（1867年发行）《西洋事情》初编、1868年出版外编、1870年初冬又出版二编。作者以亲身考察英、法、普、荷、葡等国的记录材料并参考有关书籍，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各国的议会制度，作了全面介绍和解说。此书是身居日本了解世界的好书，深受人们欢迎，起到了为进一步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开路作用。此书仅初篇就发行40万册，当时日本总人口是3500万，仅此一例，足以表明维新后日本人渴求近代文明的炽烈程度。福泽谕吉应时势的要求，从1872年起，其名著《劝学篇》连续问世。《劝学篇》全书共17编，陆续发表于1872—1876年。作者从天赋人权出发，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旧道德伦理观念，发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呼声，并强调“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一身之独立，乃学问为急务”，并力言学问不只是读书和空谈理论，而须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号召日本人舍身为国，使日本文明赶上先进国家。《劝学篇》发行总量340万册，这种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状况，反映出民主主义思潮发展的趋势。1885年，福泽谕吉又一名著《文明论概略》问世。此书和以前的译著不同，“以前的译著专以输入西洋新事物和排除我国旧弊习为目的，说起来好像把文明一节一节地切开兜售一样”，这是福泽在自传中自述的。而《文明论概略》是系统地论述文明，并号召人们向近代文明进军，不仅向一般人讲，“尤其说给儒教派的故老们听”。福泽认为文明是日本人民的理想，王政复古、废藩置县“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福泽从历史上分析比较了日本文明和西方文明，断定西方先进、日本落后，于是提出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回到野蛮？”大概这是向儒家学提出的。福泽还在书中阐述了文明的涵义，说“文明之为物，至大至重”，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他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说物质文明“易取”，精神文明“难求”，“应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本书最后一章标题是“论我国之独立”，其中写道：“兹再申前言，国家的独立是目的。”

现阶段我们的文明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今天号召日本人民“向文明进军，就是保卫我国的独立”。《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是福泽的代表作，是当时文明开化论之经典，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

中村正直（1833—1891 年）是福泽同时期的著名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维新前曾在昌平坂学问所任教，后为幕府儒官，1866 年西渡英国，1868 年回国任静冈学问所教授，并开始从事传播启蒙思想工作。1871 年翻译出版《西国立志篇》（即斯迈尔的《自助论》），1872 年出版译著《自由之理》（即穆勒的《自由论》），介绍自由主义学说，宣传民主自由思想。《自由之理》是当时出版的译著中发行数量最多的书，青年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穆勒的著作和《劝学篇》并列为教材使用。这种进步书籍对以忠孝为中心的封建思想给予无情的批判，同时给日本一代青年注入了自由主义血液。政治家、思想家加藤弘之（1836—1936 年），维新前是幕府御用知识分子，通德语，研究西方立宪政体，为幕府改革献策，曾著《邻草》一书，维新后进入明治政府供职，并从事著述，1870 年著《真政大意》，1875 年著《新国体论》，倡天赋人权学说，主张立宪政体，对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曾有过贡献（后来转向了）。思想家西周（1829—1897 年），于 1862 年被幕府派往荷兰留学，学法律、经济、哲学，归国后任开成所教授、将军顾问等职。维新后进入新政府任职，同时致力于传播欧洲近代思想和哲学，1874 年出版译著《致知启蒙》、《百一新论》，此书是日本最早的逻辑学著作。西周在学术上作为西洋哲学最初介绍者和传播者是有很大功绩的。还有大井宪太郎和箕作麟祥等翻译出版法国法典之类的书籍，从政治学和法学方面传播启蒙思想，他们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

明六社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合法地研究和传播民主主义思想的学术团体，因成立于明治六年（1873 年）而得名。明六社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也是文明开化的标志。

1873 年 5 月，大久保利通回国；7 月，木户孝允回国；9 月，岩仓具视回国；同年 7 月，驻美并务使（公使）也奉命回国，另有任用。考察团回国后，立即制定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政策，资本主义改革全面铺开。

森有礼刚刚回到日本，便倡议成立一个学术团体，把文化教育界的学者名流组织起来，为推进文化政策“商讨办法”。森的倡议，经西村茂树奔走联络，取得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麟祥、箕作秋坪、杉亨二、福泽谕吉等人的响应和支持。这 10 人全是第一流的洋学者或思想教育界的名流、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以这 10 名学者为基础，学社于同年 9 月正式成立。成立时先推福泽谕吉为社长，他固辞不就，后又推森有礼为第一任社长。1874 年 2 月制定《明六社章程》，出版机关刊物《明六杂志》。

《明六社章程》第一条规定：“集合有志之士，商讨办法，以谋我国教育之进步，并集合同志，交换意见，扩大知识。明确见识。”西村茂树在《明六杂志》第一期撰文写道：“我国成立学术文艺的结社，是从今天开始的。社申请公都是天下名士。大家都认为，卓绝奇伟之论，千古不变之说，必出于本社。希望诸位先生以其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树立天下之模范，以不负识者的期望。”这段话的第一层意思是说明明六社成立的意义在于它是日本第一个近代学术结社，其本身就是文明开化的成果；第二层意思是对本社同仁的砥砺，同时向社会申明学社的宏大抱负，“以卓识高论，唤起愚氓”，要在文明开化运动中起先导作用。明六社的历史表明，它是完全按照建社时的

宣言活动的。《明六杂志》共出版 43 期，发表论文百余篇，遍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外交、宗教、历史、教育、自然科学等方面，范围极为广泛。作者均出自名流，内容新鲜多彩，处处闪烁着“理性之光”，颇受社会欢迎，每期发行 3200 余份。另外，在 1872—1875 年间，明六社社员出版著述和译著共 20 余部，介绍民主共和思想。这些精神产品充实了日本近代化的内容。但是，这个日本近代史上人们思想最活跃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从 1874 年起，农民起义、民权运动、武士叛乱日趋激烈。明治政府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反攻和镇压措施，如 1875 年公布《新闻条例》和《谗谤律》，1878 年实行《演说取缔令》，1879 年实行《集会条例》。与此同时，政府中的保守分子恶意攻击文明开化政策，说文明开化政策是“品德恶化，风俗紊乱”的根源。于是，明治政府中的实权派，一方面和保守派论战，一方面在文教政策上趋于保守。这样一来，刚刚成立起来的明六社便首先遇到危机。森有礼在 1875 年《明六杂志》第 30 期发表一篇给明六社同仁的警告性文章：“我社所要讨论的问题，已如章程第一条规定，专限于有关教育的文学、技术、物理、事理等问题，这都是能够丰富人的才智、增进入的品德的重要事情，而且它的收效只能期于后世，这些问题即便触犯现政府嫌忌，也是出于不得已。至于有关现实的政事讨论，却不是我社创办的宗旨；这不但劳而无功，而且可能为我社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同年 9 月，明六社召开会议，讨论学社的废存问题。会上由现任社长箕作秋坪提出《明六杂志》停刊提案，森有礼却主张继续出版。对于学社前途问题，在社员之间发生分歧。但最后以多数表决通过了福泽谕吉起草的《明六杂志》停刊议案。

福泽停刊提案中写道：“本年 6 月公布的《谗谤律》及《新闻条例》，同我们学者的言论自由是不能两立的，这种律令如果真的执行起来，学者就只得立即改变思想，或搁笔停止发表言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社所能决定的只有以下两点：第一，立即改变社员本来思想，屈节以适应律令，迎合政府的意图，继续出版杂志；第二，触犯律令条例，自由发表文章，为政府罪人。……二者都不易实行。……如果既不能触犯律令，又不甘心屈节，在社会面前表示因循不果，进退不决，那是我社所不取的。”《明六杂志》便以 43 期为最后一期，宣告停刊，明六社也同时宣告解散。

如上所述，福泽谕吉对明六社的分析是正确的，它不是“一社如一身”的学术团体，而是像整个日本知识界一样，从 70 年代末开始，紧跟着政府文化政策的右转而右转。可以说，明六社解散是上述两个右转的信号。知识界的右转，在加藤弘之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在关于建立民选议院问题的论战中，一开始就站在政府一边，高喊“为期尚早”论，接着在 1879 年 11 月的讲演会上，开始对天赋人权说进行攻击，1881 年 11 月向内务卿山田显义提出一份申请书，说“因为发现了观点的错误，恐怕贻误后生”，请求把《真政大意》、《国体新论》两部书绝版。1882 年出版以批判天赋人权说为中心的新书《人权新说》。《人权新说》的出版，曾轰动一时，因为加藤在 70 年代上半期曾是一个高举天赋人权说最显赫的人物，竟摇身一变，说天赋人权论“其愚其妄，真堪发噱”，“我们的权利，其根源出于权力（强者之权力）”，公然举起了强权主义旗帜。另一个明六社创始人西村茂树，1876 年创立“修身学舍”，1884 年改称“日本讲道会”，打着振兴道德的旗帜，和元田永孚结合在一起，复活儒学，提倡忠孝、敬神、尊重皇室。这时，民权派的大部分从民权主义者转为国家主义者，形成了一股倒退逆流。曾几何

时，当年被誉为“理性之光”的传播者，现在沦为思想界的保守分子。此时，政府一方面用权力限制民主主义发展，一方面设立东京学士院（1879年成立），将老一代民主主义者拉进学士院，作为御用学者，加藤弘之任院长。

但是，群众性的民权运动，在淘汰了民主主义者老一辈的同时，还培育出民主主义者新一代，其中影响最大、著述最多者则属植木枝盛和中江兆民了。

植木枝盛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在福泽谕吉老一辈民主主义者影响下树立起来的。当老一辈趋于保守和倒退的时候，他便勇敢地参加民权运动。1875—1877年，他用多种笔名在《朝野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郵便告知新闻》等报纸上，发表了抨击明治政府的文章。1876年与板垣退助结识，1877年随板垣退助到高知参加立志社活动，直接投身到民权运动的前列，和自由党联系在一起。他一面参加政治活动，一面学习、思索，写成《开明新论》（1878年）、《民权自由论》（1879—1882年）、《赤穗四十七士论》（1879年）、《言论自由论》（1880年）、《天赋人权辨》（1883年）、《政治道德论纲》（1883年）、《一局议院论》（1884年）等著作。植木枝盛不仅在理论上超过他的前辈，更为重要的是超过了理论宣传阶段，勇敢地过问现实政治问题，如天皇与国民关系、政体问题、民主与独立问题等，直接参加立宪运动，成为民权运动的领导者、自由党的理论家。

中江兆民，原名介笃，1847年生于上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青年时代开始学习西方语言和人文科学，1871—1874年在法国留学，专心研究哲学、史学和文学，深受18世纪启蒙思想影响，打下了民主主义思想基础。回国后，开设法文学塾，讲授政治、法律、历史、哲学等课程，致力于法国学术研究和传播，前后学员达2000余人。他在1880年参加自由党，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主编《东洋自由新闻》，经常在《政理丛刊》和《东洋自由新闻》上发表评论。特别是在《政理丛刊》上连载他用汉文译述并加注释的《民约译解》（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久以单行本出版，在知识界影响甚大。中江兆民成为日本公认的自由民权运动激进的理论家，有“东洋卢梭”之称。当自由民权运动走向衰落时，他便从事哲学理论方面的著述活动，著有《理学钩玄》（即哲学概论）、《革命前法兰西二世纪事》（1886年）、《三醉人经纶问答》（1886年）、《平民党醒》（1886年）等，还译著了《非开化论》（即卢梭著《论科学与艺术》）、《维氏美学》、《理学沿革史》（即哲学史）等。所以，中江兆民不仅是日本明治时期民主主义政治活动家，而且是杰出的日本近代哲学家。

植木枝盛和中江兆民的业绩，虽然不是文明开化政策的直接产物，但他们为日本近代文化添加了光彩，是日本近代文明的精华部分。

社会改革

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对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很大的关注。70—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实行社会改革。一方面废除中世纪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搞欧化运动，作为“求知识于世界”的一部分，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建立一个适合世界潮流和日本国情的文明体系。

1871年9月23日，发布《断发脱刀令》，宣布人们有“断发”（剪短

发)、“脱刀”(摘掉武士的佩刀)的自由,并奖励效仿西方人的发式。同月,发布允许华士族与平民通婚的文告。1872年11月8日,发布采用阳历布告,即从1873年1月1日起采用阳历,废除天宝历即阴历。1872年12月,太政官布告第373号,禁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常用服装),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并提倡官员穿西装。西服、普鲁士帽、法兰西鞋算是最时髦的服装,妇女有的也穿起紧紧缠在身上的衬衣,偶尔也能看到身着时装手捧洋书的女子在大街上行走。饮食改革主要是在大城市的饭店里,维新前只在横滨、长崎才有西餐馆,专供外国人用,1871年东京驹形地带(今驹形町)出现第一家名叫“开阳亭”的西餐馆。1872年假名垣鲁文编的《西洋烹调通》(共二册)出版。第二年又有“精养轩”(文采町)、“日新亭”(筑地)、“海阳亭”(茅场町)等西餐馆先后开业。最值得一提的是,从前日本人认为是脏物的牛肉、猪肉、牛奶等开始作为上等食品出现在大城市的饭店里。东京、大阪、横滨、神户各地出现许多火锅牛肉菜馆。有些人为了标榜文明开化,追逐时髦,特意到牛肉馆用餐,像假名垣鲁文在《安愚乐锅》(诙谐文学)里描写的那样,人们在牛肉菜馆里坐下来,一边用筷子吃牛肉火锅,喝啤酒(如果喝白兰地那就显得更“文明”了),一边说着很蹩脚的英语,讽刺社会上的旧弊,显示自己才是“文明开化”的人士。《安愚乐锅》里提到的人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高级官员或社会名流,而是人力车夫、演员、艺人、学生等。

在大城市里拔地而起的欧式建筑,则是文明开化又一个成果。筑地旅馆、第一国立银行大楼、三井组大楼是欧式建筑的代表。最引人注目的是,1875年建成的东京银座大街,这是以砖瓦结构的欧式楼房和马路两侧排列匀称的瓦斯(煤气)路灯及松、樱、机各种树木组成的一派欧洲景象。银座是日本文明开化的象征,所谓“日本桥边的文明开化”。

交通工具的改革从70年代初开始,京滨铁路(东京—横滨)1872年通车,阪神铁路(大阪—神户)1874年通车。与此同时,在东京出现人力车、马车。以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作为文明开化的一部分,在大城市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明治政府为了推进文明开化政策,实行社会改革,采用了宣传教育、制定行为规范、天皇垂范等多种手段。1872—1880年,社会上发行了几十种评解文明开化政策的书籍,其中流行最广的有加藤祐一写的《文明开化》(初篇于1873年出版)和小川为治写的《开化问答》(1874—1875年出版)。前者以神道主义的基调,讲解“断发”、“易服”、“食肉”、“敬神”等道理;后者以旧平(代表保守)和开次郎(代表开化)二人问答方式,对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征兵、租税、外交、学校制度、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以及铁路、电报、政府、国民和政府的关系、警察、阳历、地券发行、货币等各种问题进行解答。二者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向广大群众(主要是旧武士、市民、农民)宣传解释政府实行的改革政策。此外,报纸、小说、诗歌、绘画等也都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宣传文明开化政策的作用。

政府除宣传工作外,还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规定人们的行为规范,使之达到文明开化的要求。例如,1872年11月,由司法省制定东京府实施的《违章诋误条例》便是,条例把生活中不文明的或妨碍他人利益的行为,定为违章,予以禁止或处罚。例如禁止贩卖春画和男女混浴,不准纹身和妇女“断发”,禁止随地便溺,不准无理参与他人争吵,等等。此条例在1876年7

月，以太政官布告第 256 号下达到各县，各县可根据本县情况加以增减，尔后实施。

值得注意还有木户孝允主办的《新闻杂志》于 1871 年 9 月特别报道天皇和宫内官员穿西式服装的消息； 1872 年 5 月，报道天皇“断发”消息。这类消息，绝非出于偶然，是想借用天皇的开化行为影响“臣民”，以利于推行文明开化政策。

第 8 章

殖产兴业

扶植、发展产业

一个富强的国家是不能植根于一片经济沙漠之中的。全力以赴发展经济，是富国强兵的根基所在。

年轻有力的明治政府领袖们，深知能否建立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实现日本独立富强的关键。

1874 年 5、6 月间，刚刚游历、考察欧美各国回国的大久保利通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将自己振兴、发展日本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状况的设想、主张合盘托出。

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为国家与人民，负其责者如能深思熟虑，举凡工业物产之利，水陆运输之便，凡属保护人民极为重要之事，均宜按各地风土习俗，人民之性情知识，制定办法，以为当前行政之基干，其既已建成者保护之，尚未就绪者诱导之。

新政府正是按照这种构想，遵循保护、诱导、扶植等原则，筹建起日本近代工业体系。

第二年，身居内务卿要职的大久保又明确提出了《关于振兴国外贸易之建议》，阐明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一国之物产，以农业赞天造之功，以工业遂人力之巧。故增加生产之顺序，在于劝农励工。但如所产物品需用者鲜，消费者少，则有何术始得劝农励工耶？而介于其间，取之于农工，分售于需要者及消费者，使产品畅通周转者，则商是也。……而劝商之方法在于扩张商业，开拓销路，使无涩滞壅塞之忧，此劝商事务之所以至急至重要也。

基于这样的认识，大久保建议新政府出资、劝导商贾直接进行海外贸易，越过旅日外商这一中间环节，将日本产品推向海外市场，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可见，明治政府的领袖们掌权伊始，就把狠抓经济建设作为建立富强新日本的总纲。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可取的。

所谓“殖产兴业”，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政策的重要支柱，也就是实行机械化大工业的移植政策。它的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来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创办国营工矿企业，保护扶植生丝、棉纺等民间工业，大力保护私人海运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聘请专家和技术人员，引进近代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输入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加速建立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到 1885 年前后“殖产兴业”和发展资本主义大体告一段落，国家除经营军事工厂、铁路、通讯等以外，其他国营企业都出让给私人，以培植产业资本家，迎接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

明治政府通过强制推行一系列的政策，获得了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原始积累和雇佣劳动者。国家利用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推进资本和劳动者同“殖产兴业”密切联系起来。

明治政府为了“殖产兴业”从1868年5月到1869年5月发行太政官纸币，达4800万两，向各藩、府县、商贾借出款额达1780万两，接着在1869年9月又发行了民部省纸币750万两，在1871年10月发行了大藏省兑换证券680万日元，在1872年1月发行了开拓使兑换证券250万日元。

为了繁荣商业和办理太政官纸币的借贷事务，在1868年5月，明治政府设立了通商司，通商司在各地设立了经营商业的通商公司和供给资金的汇兑公司。汇兑公司以特权商人的身分保证金、政府借款、发行纸币作为资金来源，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向生产和商业提供资金。明治政府就是想把他们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信用，更有效地用于“殖产兴业”上去。1873年设立的国立银行也具有同样的意图，到1879年末，这类银行达153家，它们发行政府纸币和银行纸币。尽管不断引起通货膨胀，但却更加推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对于解决“殖产兴业”的资金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货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1873年开始到1880年逐渐完成的地税改革，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杠杆完成了它的巨大作用，即由于向农民强制征收高额货币地税，促进农民的分化，迫使他们变成廉价劳动力的出卖者，榨取自他们手中的货币则充作扶植近代工矿企业、扩充近代军备等之用。

原始积累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就是高额地税。明治政府初期的财政收入中，地税约占80%。正是这笔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钱，才使政府能顺利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得以建立大量的国营企业，然后又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以地税为中心的各种赋税，是日本原始积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通过地税改革，政府得以征收高额地税，寄生地主得以保持高额佃租收入，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并转化为资本。所以说，地税改革是日本强制推行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对日本的原始积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原始积累的特殊方式是使日本寄生地主制确立的重要原因，寄生地主制的形成又使日本原始积累很不充分而带上自己的特点。寄生地主制的发展也是造成日本农村提供特殊形态的雇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农家的青少年男女只是短期到城市找活干，充当雇佣劳动力，遇有失业、婚嫁或农忙时期，即返回农村。这不但调节了城市资产阶级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减轻了其对城市失业工人救济费用的负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

另外，日本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失去了土地，却并不都离开农村，农村人口在原始积累时期虽有相当减少，基本上仅是自然增长的那一部分外出了。从明治维新到1910年，日本农村的人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日本农村起了“蓄水池”的作用。

日本封建家臣解体过程在日本原始积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869—1876年封建武士俸禄制度的改革，则使封建“武士阶级”解体，武士变成了仅仅是公债的所有者。获得高额公债的少数上层士族，把它转化为资本，而大多数士族则迅速没落，不得不出卖公债来维持衣食，最后转化为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别无生活之道的无产阶级，从而为近代企业提供了所需要的劳动力。

这些下级武士所失去的公债，通过各种渠道集中于高利贷者之手，基本上都转化成了资本。高利贷者设立很多的银行，投资兴办铁路、棉纺等近代企业，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上层士族、华族等则因为领到巨额公

债，从事设立银行和经营各种新产业，转化成了资产阶级。于是，封建武士俸禄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构成了日本资本原始积累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明治政府的税收中，仅次于土地税的是消费税。政府提高了酒税的税率，并新设了烟草税、点心税、酱油税、印花税等。这些消费税的负担，同样是落到了占居民大多数的农民身上。

因此，日本的广大农民被称作是日本资本主义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内殖民地。明治政府运用它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通过重税残酷掠夺广大农民，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积累了巨额的资金。

明治政府成立后，很快便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1874年，它对我国的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索取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接受《江华条约》，在该条约的附件贸易章程中暂定朝鲜进口日货免缴关税。日本与朝鲜贸易对日本商人的初期积累有很重要的意义。1872—1895年，日本从外国进口的黄金总值约1386万日元，其中来自朝鲜的为993.9万日元，大约占71.7%。特别是在“松方财政”时期（1885—1887年），进口朝鲜黄金空前增多，其数量相当于日本黄金产量的4倍。日本掠夺朝鲜的物资，特别是大米和黄金，的确在日本原始积累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甲午战争后，中国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朝野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这使日本的工业生产和国外贸易都有巨大的增长。银行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日本正是以中国的巨额赔款为基金，才干1897年实施了金本位制，对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作用极大。甲午战争后，平均每天使用10人以上的工厂总数，1904年比1893年增加了3倍，其中使用动力机械的工厂则激增到5.9倍。由于战争胜利而得到的“信用”膨胀，还得以输入1.9亿日元的外资。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殖民政策和勒索巨额战争赔款，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

1869年3月，任外国官副知事的大隈重信兼任会计官副知事，政府的财政经济大权开始掌握在大隈等人的手中。

大隈重新专攻兰学，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他在佐贺藩创办的“致远馆”，学习西欧先进国家的政治、法律和财政等社会科学。他研究了英国的经济状况及荷兰和美国的宪法，认为英国的富强是由于它善于经商、贸易发达的缘故。因此，大隈把发展内外贸易看作是使自己国家富强起来的先决条件和首要任务。

1869年5月14日，大隈在外国官内设立了通商司。他将中央和地方财政、劝业、贸易、土木、交通、通信等行政职能，都集中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大藏、民部两省成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心。

大隈亲自创办的通商司，是具体负责推行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它主管贸易、金融、海运和商业等方面的事务。下设半官半民性质的汇兑公司和通商公司。汇兑公司是以存款、发行银行券、贷放资金、兑换钱币等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设于东京、大阪、京都等8个城市。通商公司主要从事内外贸易，而以对外贸易为主。

1870年12月12日，大隈建议设立了工部省，由后藤象二郎和伊藤博文相继任大辅，把上述主管殖产兴业的机构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工部省主管的业务是：

1. 设立技术教育机构，培养技术人才；
2. 以适当的奖酬发展工业技术和促进工业生产的繁荣；

3. 监督和管理一切矿山；
4. 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报线和灯塔；
5. 建造和修理海军舰艇及商船；
6. 负责制炼和铸造各项企业使用的铜、铁及铅矿，并从事机器制造；
7. 实施陆地及海面的测量等等。

这样，工部省便成为全面负责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央领导机关。同时，这也表明大隈重信已将殖产兴业的重心由发展内外贸易转移到近代工业的建设方面。这是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在经济发展战略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的转变。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工部省创办的官营企业分为：铁路、矿山和工业三大部门。除铁路建设外，工部省还试图建起一个由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三个部门构成的近代化工业体系，为日本实现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

幕末时期，日本各地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近代企业，如横须贺、横滨制铁所、长崎制铁所、关口大炮制作所、石川岛造船所、佐渡金矿、生野、小坂银矿等，但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十分落后、僵化。

1873 年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退出中央政府后，大久保利通亲自担任内务卿，“成了全国警察和实业界的总头目”，伊藤博文掌管工部省，大隈重信主管大藏省，三驾马车推动日本经济的车轮向前滚动。大久保提出，殖产兴业的目標，是仿效英国，建设发达的海运和工业。因此，他颇力重视矿山开发和铁路建设，强调煤和铁是制作业的动力。在经费极度匮乏，内乱频仍的情况下，明治政府在近 10 年间投入 2.1 亿日元的巨额资金；用于有关殖产兴业方面的投资。兴建了一大批官办的“模范工厂”，改造了一批原幕府时期的工厂和矿山，高薪聘请了为数众多的欧美技术人员，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

巨额资金的流入，收获了令人满意的果实。一大批近代日本的龙头企业诞生了。如原幕府所建的模须贺制铁所，经过改建成为日本军事造船业的中心；佐渡、大葛金矿，院内银矿，阿仁铜矿，釜石铁矿，三池、高岛、幌内煤矿都被改造为国有矿山，并成为民营企业的模范。1872 年，内务省土木寮在深川兴建了深川水泥制造厂，成为日本水泥工业的先驱。同年，工部省在东京设立生丝试验所，向全日本各地推广制丝技术，各地制丝厂纷纷组建，生丝逐渐成为日本出口的大宗产品。

为了鼓励国民参与殖产兴业的积极性，1877 年，日本政府仿效欧美各国的做法，在东京举办了首届国内劝业博览会，目的在于推广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

发达的铁路交通，是欧美国家迈向近代化的手段之一。佩里叩开日本锁国大门时赠送给幕府的火车模型，引发了日本人的好奇心。日本政府对铁路建设极为热心，不惜举借外债铺设了东京至横滨的铁路。紧接着大津—神户之间、敦贺—大垣之间的铁路也相继由政府修建通车。

到 1877 年末，日本国内国营铁路的总长度已达 64 公里。1881 年日本铁路公司设立，随后阪堺、伊部、水户等铁路公司建立，官营、私营并举，铁路长度达 2000 多英里。这种敏而好学、积极引进的做法同 20 年后清王朝慈禧太后等人对火车的恐惧与排斥态度相比，可谓泾渭分明了。

电信同火车一样也是近代文明的产物。日本人在大规模殖产兴业的同时，也没有冷落它。1869 年，日本就从英国人手中购买了电报机。第二年，

日本国民就有权利用这一先进的通信设施，全国迅速普及。到 1885 年，日本全国范围内的电信干线基本形成。

海上运输，对于岛国日本而言无疑是件大事。当时日本的海运业和对外贸易基本上被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所垄断。日本“海运之工”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就是在明治政府的扶植下，登上财界大亨宝座的。1870 年，工于心计的岩崎弥太郎开创了“九十九商会”，以承担土佐藩所有债权、债务为代价，占有该藩应归国有的轮船，专营运输。1874 年，日本发动侵略台湾战争时，岩崎弥太郎走大久保、大隈的关系，独揽全部海运业务，获利甚厚。明治政府还耗资 137.68 万墨西哥元从国外购置 13 艘大轮船，无偿交付给岩崎弥太郎的三菱公司使用，使三菱商会一跃而成为日本的海运之王。此后，大久保又通过《第一号命令书》，决定在 14 年内每年补贴给三菱商会 25 万日元资助金和 1 万元海员训练费。不久，明治政府又出资 81 万日元，买下行将破产的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的船只和该公司在横滨、神户、长崎、上海的建筑物和财产等等。这样一来，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三菱商会羽翼渐丰，逐步垄断了日本海沿岸和对朝鲜、中国的航路，并将触角伸及金融、保险、工矿、建筑、造船、食品等许多种行业，成为日本最具实力的财阀控股公司。

应当指出，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国策过程中，出于富国强兵这一目的和动机，精力和财力更多地倾注到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领域。

明治政府接管政权后，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全部接管了原幕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并逐步加以改造和扩充，初步形成了日本近代化的军事工业生产体系。

东京炮兵工厂。1868 年 4 月，原幕府所有的“关口制作所”被新政权接管，并集中各藩生产武器的机器，加之从英、法等国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专门生产步枪武器。日本陆军所用的规定样式步枪——村田步枪就是该兵工厂的产品。

大阪炮兵工厂。1870 年 2 月，新政府接管幕府长崎制铁所，将部分机器设备和工人迁至大阪，创建大阪制造所，后改称大阪炮兵工厂。先后开始生产法国式山炮、野炮、钢铜炮、海岸炮和攻城炮等重型武器。

海军兵工厂。1871 年接收水户藩的“石川岛造船所”，设置兵部省造船局和兵工厂，专事生产和修理海军舰艇和武器。1874 年，又在筑地新设“武器制造所”，将原石川岛造船所的主要机器设备和萨摩藩创办的“鹿儿岛造船所”的机器设备合并过来，加以扩充建成海军兵工厂。主要负责修造海军的兵器。

横须贺海军工厂。1868 年，新政府接管了幕府的“横须贺制铁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横须贺海军工厂。该厂拥有 116 台蒸气机，动力达 180 马力。熔矿炉及其他冶炼用炉 50 个，有制钢、炼铁、铸造、制造锅炉等车间，具有当时最大的规模。造船技术从 1878 年由法国式向英国式过渡。1883 年为制造铁舰和铁甲舰而开始雇用英籍人员。该厂主要负责制造海军舰艇，先后建成炮艇“清辉”号、“天城”号和日本人自己设计完成的“盘城”号。

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日本就建成了两大陆军兵工厂（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和两大海军兵工厂（筑地海军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分别隶属陆军省和海军省。它们是近代日本军事工业的骨干企业，对于日本军队的近代化、充实和加强日本的国防、扼止西方列强的入侵，发挥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

明治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通过实践以及不断地向西方学习，终于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殖产兴业”的政策，明确提出了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日本近代工业、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指导方针。

明治政府把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并且为此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从内务、大藏、工部三省三位一体领导体制的人员配备和财政支出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这种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下，大藏省主要负责殖产兴业资金的筹措和调配，工部省继续主管铁路、矿山和机械制造业，内务省经营劝农、畜牧和农产加工。

在劝农方面，它创办了内藤新宿试验场、三田育种场和驹场农学校，研究西方的农业方法；在畜牧业方面，它创办了驹场种畜场和下总牧羊场；在农产加工业方面，它创办了千住呢绒厂、关口呢绒厂、新町纺纱所（绢丝）和爱知纺纱所等近代化工厂。内务省兴办这些事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振兴输出，防遏输入”，以扭转日本被迫开国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年年入超的不利局面，并进而为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积累外汇。其次也是为了“厚殖民产、振兴民业”，即通过国家投资，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建立所谓“模范工厂”以发挥示范作用，推动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治政府为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投入了大量的国家资金，平均约占它的正常财政支出的 1/5，而在 1883 年则高达 1/4 强，其比重之大由此可见。这笔庞大的财政支出，大体可分为三类：行政费用、官营事业费用和扶植私人资本的费用。

除了前面所讲过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外，明治政府为了更多地筹集“殖产兴业”所需的大量资金，还采取大量发行纸币的方法，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又采用提高税率和增收新税的方法，再一次大规模地掠夺人民，收回它所发行的纸币。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曾两次在国外发行公债。一次是 1870 年力修筑横滨至东京的铁路，在伦敦发行的 100 万英镑英市公债；另一次是 1873 年为给献出俸禄的武士以产业资金，在伦敦发行总额为 240 万英镑的公债。明治初年虽急需大量的资本，但却很少借用外债，同时也限制外国资本家投资于日本工矿企业，担心会重蹈土耳其和埃及的覆辙，招致外来的干涉而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1879 年以后，日本逐渐富强起来了，这时才开始较多地借用外债。

在殖产兴业的第一个阶段（1868—1880 年），明治政府主要是接管和改造幕藩经营的工矿企业，其中与军事工业有关的企业占极大的比重。明治政府在陆续接管了这些幕藩经营的工业企业之后，不断加以改造和扩充，初步形成了近代化的军事工业生产体系。这些军事工业始终控制在政府的手中，其大部分属于陆军省和海军省。

工部省接管了大部分从前属于各省的官营工矿企业，并创办了一些新企业。制定《矿山须知书》，明确一切矿藏的所有权和开采权都属于政府专有，又制定了《日本矿井法》，强调矿山由国家垄断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原料。同时，从西方国家购置近代的矿山机械，聘请大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改造。

上述这一切，为日本实现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1880 年 11 月，以处理官营企业条例的颁布为标志，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开始进入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的新阶段。

从当时国家财政经济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收入很紧张，因此，决定把经营上连年出现亏损的官营企业出售给民间。从官营企业的经营情况来看，除军事工业外，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便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从发展私人资本经营的条件来看，这些年里，由民间经营的近代工业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少数拥有一定资金、特别是经营和管理近代企业经验的新型资本家。如川崎正藏、西村胜三和古河市兵卫等等。在这种形势下，向近代工矿企业投资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就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从当时日本的政治形势来看，一般资产阶级反对政府的以官营为主的经营方针，要求“自由经营”的呼声很高。民权运动家田口卯吉指出：“若不遏止有司的干涉，便很难兴起民间事业。”1881 年自由党成立大会又公开提出了争取“营业自由”的口号。一般资产阶级的这种呼声，对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转变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884 年 7 月，政府决定出售官营矿山，规定所有的官营企业均按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

明治政府处理官营企业时，主要是出售给同它关系密切并因而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以及少数经营近代工业的新型资本家。如三井、三菱、古河市兵卫、浅野总一郎、久原庄三郎、川崎正藏和西村胜三等。这就使原来主要是从事商业和金融活动的大资本家，变成巨大的工矿企业主，从而奠定了他们后来发展成为财阀的基础。

政府在出售这些企业时，索取的价格极为低廉。这不仅表现在对这些企业的财产估价远低于政府的投资，而且表现在有些企业的出售价格又远低于它的财产估价，实际上等于无偿转让。政府按极低的价格和分期付款的办法出售官营企业，使大资本家在几乎无须支付现款的情况下就成了它的所有者，然后再用经营这些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来分期偿付给政府。而创办这些企业的资金都是政府通过地税掠夺等手段从农民身上榨取来的。

1875—1885 年间，政府又以“公司补助金”的名义给予大资本家以总额达 147.1 万多日元的补助金。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三菱公司、东京汇兑公司和日本铁道公司。三菱公司是日本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一家大航运公司。政府对三菱的保护和补助的结果，使该公司成为能够与外国汽船公司对抗的近代汽船公司。

从 1877 年起，政府又从“准备金”中提取一部分资金，在所谓“贷给银行公司人民”的名目下，贷款给银行、公司和个人，以达到“繁殖物产，防遏输入”的目的。得到贷款的银行有三井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东洋银行。得到贷款的公司是三菱公司以及全国备府县经营生丝和茶的“直输出会社”。得到贷款的个人主要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岩仓具视、由利公正等）和“政商”（如涩泽荣一、五代友厚），共 29 人。政府还在“劝业资本金”、“劝业委托金”等名目下，给予士族大批贷款，鼓励他们从事开垦，养蚕、栽桑、制丝、纺织等生产活动。

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下，从 80 年代中期起，日本出现了早期产

业革命的热潮。到 1892 年，日本的近代化棉纺厂已达到 39 家，制丝业也完全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

重工业也初步有了一些发展，私营重工业企业主要是石川岛造船所、田中机械工厂、川崎造船所、三菱造船所和釜石制铁所。这些私营企业同军部有密切的联系，并在它的积极扶植下扩大了自己的经营规模。釜石制铁所由于得到军部的支持，到 1892 年已发展成为拥有 5 个熔矿炉、雇用 1200 名工人、年产 7000 吨生铁的大企业。

采矿业在明治政府把矿山出售给民间后，主要被操纵在三井、三菱、古河等大财阀的手中。他们继续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始采用蒸汽动力的排水设备，在竖井和斜井中使用机器进行搬运以及普遍利用火药进行爆炸，等等。因此，产量显著增长。以煤产量为例，1892 年约达 300 万吨，比 1874 年增加了 15 倍。

在铁路建设方面，明治初年日本政府采取以官营力主的方针。为加快建设的速度，不久便准许民间经营，最早成立的私营铁路公司有关西铁路公司、东京铁路公司和日本铁路公司。

在海运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总吨位，1870 年只有 15498 吨，1893 年增加到 110205 吨。三菱公司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它与共同运输公司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拥有资金 1100 万日元、轮船 58 艘、吨位 62021 吨，是日本最大的航运公司。仅次于它的大阪商船公司，拥有资金 120 万日元、轮船 95 艘、吨位 13200 吨。这两家航运公司不仅在日本的沿海开辟了定期航线，而且开辟了通往朝鲜、中国和海参崴的国外航线。

从整个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自 1884 年末到 1892 年，日本的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 2392 家、10095 万日元增加到 5444 家、28933.4 万日元。其中工业公司和水陆运输公司的资金增长速度为最快，分别由 504.8 万日元和 689.2 万日元增加到 6901.6 万日元和 9474.5 万日元。拥有 10 名工人以上的工厂，由 1885 年的 661 家增加到 1893 年的 3019 家（其中使用蒸汽动力的为 675 家），工人人数则由 9995 人增加到 381390 人。

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日本的对外贸易也有了显著的发展。1884—1892 年，出口总值由 3387.1 万日元增加到 9110.3 万日元；进口总值由 2967.3 万日元增加到 7132.6 万日元。同时，贸易的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1882—1892 年，在进口商品中棉纱的比重逐年减少，而棉花的比重却不断增加，机器设备所占的比重虽无明显变化，但绝对值却增加了很多（98.9—401.8 万日元）。

以上事实说明，经过早期的产业革命热潮，日本已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当时日本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1866—1873 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为 32.2%，而英国（1851—1873 年）则为 3.3%，美国（1861—1873 年）为 5%，德国（1861—1873 年）为 3.8%；1874—1890 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2.1%，而英国则为 1.7%，美国为 5.2%，法国为 2.1%，德国 3.5%。所以列宁说过：“1871 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日本要比俄国快十来倍”，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

〔俄〕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320 页。

〔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251 页。

地税改革

将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加以变革，可以说是证实新政权具有生命力和决心的一项举措。

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治虽然一新，但经济状况依旧，日本依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874年，日本全国户数的78.7%是农户，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绝对多数。而且，来自于农业方面的地租也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但落后、低效的农业已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要求改变日本农业国的落后面貌、以商立国的呼声愈发强烈。

明治时期著名思想家神田孝平就指出：

若以商立国，其国常富，若以农立国，其国常贫。东方诸国，是以农业立国的，而西方诸国便是以商业立国的。所以东方各国常常贫困，西洋各国常常富足。……西洋诸国的地质虽不相同，不过大都是瘠土，特别如像荷兰、英吉利，因为是近寒带的国度，土地的出产是很少的。然而如像现今的强大富盛，便是赖多年间尽力经营贸易的结果。若西洋各国以农业来立国，那么其国早已自行灭亡了。东方诸国因为地质肥沃物产丰富，虽不专赖工商，也不至于自行消灭，可是有如前所述交易之利，是无限度的，农业之利是有限度的。再者有限没有胜过无限的道理，本来土地肥饶的国度，终于受着土地贫瘠的国民所侮辱。真是不堪叹息的事啊！不过，若一旦改变旧法，挟着国有的肥土，更加尽力于工商业。那么，不过数年间，便形成强大富有的国家，岂在西洋诸国之下呢！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要成为英国、荷兰那样富裕之国的愿望，以增加和稳定国家税收为目的，1873年开始实行地税改革。主要包括：废除对耕种农作物的限制，允许农民自由种植。1871年，政府已宣布：解除田园里栽种植物的限制令，允许农民自由栽培桑、格、茶、漆等；废除对土地转让的限制，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出租，土地变成私有的，成为一种商品；改革地税征收办法，先将土地按等级规定地价，以土地价格作为课税标准，按地价的3%向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征收地税，不会因年景的丰歉而增减；地税由实物改为交纳货币。通过这样的地税改革，不但使日本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剥削和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货币地租的实施也保证并增加了新政府的财政收入，推动了日本社会商品经济的孕育和发展。此后，新政府每年80%的财政收入来源于地税，殖产兴业的资金来源也进一步扩大了。

传统的日本社会中，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当然也有大麦、小麦、大豆、蔬菜和茶叶。农民也种植一些其他的农副产品，如养蚕用的桑叶、靛蓝、棉花等。农民仅仅采购少量生活必需品，如食盐、药和金属制品。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基本都是自家或本地生产。农业人口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和资金。拥有大片农田的地主虽拥有权势、资金，也大都充当肥料商人、当铺掌柜、高利贷商人。地税改革后，土地税成为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日本全国核定后的地价总额是16.4亿日元，明治政府从中所获新地税额为4955万日元。1878年，地税额为3945.1万日元，占当时国家总税额的80%。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税改革不但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农民身上的负担也有所减轻，它对日本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较为有利。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

废藩置县以来，农家的贡税，大大地减轻，接着迎接地税改革的宽典，兼之川城宿驿等的课役也被免除，修筑用道路的烦扰也取消，人民安居乐业

真可谓是空前的。现今若就贫者之贫来和富者之富比较，诚然是贫困的，不过只就一个贫者来论，不得不说生活情况大有改善了。其他姑且不论，仅看改良食物的性质，采用食米的增加，足可证明一斑了。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地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国家增加税收。日本农民通过地税改革负担减轻、地位发生变化，境遇改善等，都是事实。但比起广大人多地少的农户，地主阶级是这次地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地税改革，它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寄生地主的利益不但受到保护，而且仍然可以对佃户实行实物剥削。

治理财政、金融

国家经济的发展，民族工业的振兴，充足的资金是根本的保证。政策和动机虽好，若没有资金的投入，它仍然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

明治政权在殖产兴业方面投入了大约 2.1 亿日元的巨额资金。这笔庞大的款项对于早已入不敷出的新政权来说，无疑是道难以解开的难题。建立完善的财政、金融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血浆”，是极为重要的任务。资本积累也是国家发展工业化的先决条件。

明治政府的会计事务挂（后改称会计事务判事）由利公正，在负责新政权财经期间，以“振兴产业，发展贸易”为目的，主持发行了 4800 万两的大政官纸币，分别贷给各藩县 1233 万两，贷给民间 656 万两。

1869 年 2 月，大隈重信接管财经大权后，在同年 10 月又发行了 750 万日元的民部省纸币，后又委托三井组发行 680 万日元大藏省兑换券，1872 年初再度发行 250 万日元开拓使兑换券。由于大量滥发纸币，加上纸币印刷粗糙，易于伪造，各藩所发纸币又极不统一，使纸币价格下跌，通货膨胀状况严重，物价狂涨，民众生活水平下降。1872 年，政府接受伊藤博文的建议，陆续设立四家国立银行，继续滥发银行券。对此，80 年代初就任大藏卿的理财专家松方正义忧心忡忡他说：

当时我国的整个形势极端令人忧虑，政府的财政收入实值几乎半减，民间依靠公债利息、养老金及其他一定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都突然陷于经济困难，利息大大上涨，公债价格极度下跌，各种物价大为上涨……，商人迷惑于物价变动的剧烈，都热衷于猎取投机的暴利，毫不顾及实业。因此，需要大资本的大工业由于利息太高竟至无人计划创办。

针对这种现象，松方主张采取金融紧缩政策，整理大量不兑换纸币。松方正义在 1881 年就任大藏卿后，立即着手整理不兑换纸币，推行新财政政策，历史上称其为“松方财政”。松方藏相通过实行紧缩通货，整理纸币、创设国家银行，增加税收，向私人廉价出售官营企业、促进特权政商资本的形成，保护银行、铁路部门的旧领主阶层向货币资本家转化，振兴输出、防遏输入、保护民间资本等诸项政策，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提供了保障体系。

借资兴业

明治政府力避免重蹈埃及、土耳其的覆辙，尽量避免借用外债，以免外资控制日本。因此，主要是在国外发行公债。

1870 年为修筑东京至横滨的铁路，在英国伦敦发行 100 万英镑公债，折合日元 488 万元，利息超过正常 4—5 厘的一倍，高达 9 厘，以海关税和铁路收入作为偿还保证。

1873 年，明治政府为给武士阶级发放产业资金，再一次在伦敦发行 240 万英镑的公债，折合 1171.2 万日元。利息为 7 厘，偿还期限为 1877 年。

明治政府在国内也先后发行了各种名目的公债，以弥补自身资金的不足。如 1874 年 3 月发行了“秩禄公债”、1876 年 8 月发行了“金禄公债”，总额近 2 亿日元，这两笔公债专门用以赎买封建大名和武士阶级的特权。1878 年，政府发行 1250 万日元的“创业公债”，所得资金主要拨给工部，内务两省和开拓使以及各府县，主要充作劝业资金。工部省用此项资金进行铁路建设和矿山开发；内务省则用这笔资金修建港口和公路以及从国外引进棉纺机。1883 年，政府又发行了总额为 2000 万日元的铁路公债用以修筑中山道铁路之用。

应该指出，明治政府在资金极端缺乏的情况下，通过在国内外发行公债，“对不好货币赋予生殖能力”，筹集到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殖产兴业，对于日本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是有益的。

在筹集殖产兴业资金、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方面，改革武士阶级的家禄制匣也是重要的举措之一。

引进技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文化系统原本就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文化系统，对外来的文化尤为狂热。

当明治政府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确定为基本国策后，一切模仿和学习西方便是整个民族的头等重任。大规模学习、引进工作，可以分成两类，即智力（人才）的引进和技术设备的引进。

所谓智力引进，也就是将西方国家的专家作为培养日本近代化的“保姆”加以雇用。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曾不无夸张他说：“使现在的日本开动起来的是 2000 名外国人。”

的确，明治政府为了尽快步入富国强兵之路，在雇用外国专家方面不遗余力。在政府聘请的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中，直接涉及殖产兴业方面的人数最多，1872 年占 70%，1876 年为 50% 左右。为了使这些来自先进国度的专家、技术人员安心在日本工作，明治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极高，其薪俸一般均超过本国的高级官员。如当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月薪仅 800 日元，而一英籍专家月薪却高达 2000 日元，为太政大臣月薪的 2.5 倍。至于同普通日本公务员的薪水相比，其差距更是天地之别。因此，许多机构或单位的经费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支付外籍专家的工薪，如东京帝国大学 1877 年的经费总额为 282035 日元，而支付给外籍教师的薪俸是 98279 日元，占总经费的三分之一强。明治政府在高薪厚待这些外国专家的同时，也严格管理。一般来说，政府同受雇者要签订合同书，并规定其不许奸淫、打架、留宿外人、经商、走私等。

绝大多数受雇用的外国专家都能忠于职守，热心工作。由于这批外籍人员的协助，日本很快便步入近代化的轨道。这也可以作为日本在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的因素之一。

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工艺，拿来主义在日本殖产兴业过程中作用不小。明治维新前夕，幕府和各雄藩创办了一些新式工业，但无论从规模还是技术工艺方面都相当落后，尚处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明治政权接管这些企业后，便大规模移植西方近代产业和经济制度。

东京炮兵工厂就曾聘请德、法、比利时三国的专家进行指导，并从西欧各国进口机器设备。大阪炮兵工厂也是在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后，制造出法式山炮。矿业也大量引进外国采矿设备和技术，聘请外国矿业技师指导开采。

日本近代轻纺工业也是在大量引进西方设备和技术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如内务省创办的千住呢绒厂、新町纺纱所、富冈制丝所、爱知纺纱所和广岛纺纱所等等。由大久保亲自提议建立的千住呢绒厂，其第一任厂长井上省三曾留学德国学习毛纺和染织技术，建厂时又专门从德国进口了毛纺机、毛织机、整纺机等全套毛纺织设备，并聘请了5名德国技师予以指导。该厂成为日本近代轻纺业的龙头企业。1878年，明治政府从英国纺织业名城曼彻斯特进口全套2000锭纺机设备2套，开办了爱知纺纱所和广岛纺纱所。

1879年，内务省决定动用“创业资金”22万日元，从英国订购了10套2000锭棉纺机器，然后按10年分期摊还的条件，出售给有志于兴办棉纺业的私人资本家。这是日本从西方国家大规模移植近代机器棉纺工业的起点，1880—1885年间，日本各地陆续建立起一批拥有2000锭到9000锭的棉纺厂。在移植西方近代产业的同时，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股份有限公司（日本称“株式会社”）、银行制度、近代货币制度、近代公债制度、近代保险事业等也渐次移植到了日本，在日本生根开花，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事业。

第 9 章

强兵富国

建国目标

戊辰革命胜利后，新兴的日本进入建国时期。

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一批 40 岁左右年富力强、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政治家，成为明治政府领导集团的核心。他们主政伊始，便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项纲领性口号，而其中的“富国强兵”被确定为建国总目标。

明治政府中的后起之秀山县具有朋对“富国强兵”这一建国总目标是如此解释的。

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语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交往之对等，始可得互市之利益，而国民之劳力始可积，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早在江户幕府垮台前夕，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对来自“西洋的冲击”惊惧和羡慕心态交织下，就纷纷提出要使“东洋的大日本”同西洋的英吉利岛”并称“富强之国”的设想和方案。

藩政改革家会泽安主张应通过实行“巨舰之制”和“水操之法”，来完成“富国强兵之要务”。

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则提出：“当今之急务固属富国强兵，然而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

洋学家佐久间象山认为，日本必须“……幡然改变既往苟且之故辙，如俄罗斯之彼得大帝，广选人才派往外国，使之学彼所长诸术，并真正探索其形势时情，又广为招引外国名士，披肝沥胆予以优待，作为我国所无艺术之师，发展诸学科，变城制，禁游民，省刑罚，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本国之实力将超过英、法、美各国，希望期以时日，进行周到之处置”。

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有关富国强兵的构想林林总总，都有精妙之处。但真正能使新日本发展成为当时亚洲惟一独立富强国家的思路，是由“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后“三杰”（伊藤博文、松方正义、山县有朋）提出和付诸实践的。

富国强兵，实际上是强兵富国。山县有朋就毫不掩饰地声称：“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

日本帝国强兵富国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步骤是：改革军制，扩充军备，对外侵略以跃登军事强国地位，最终成为东亚盟主乃至争霸世界的强大的军事帝国。

改革军制

德川幕府被推翻、明治新政府建立后，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依然十分险恶。中国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对日本人而言既是一种警告，同时也是一种暗示。

幕府统治末期，鉴于日本有亡国灭种之虞，幕府也明令各藩购买、制造先进的舰船枪炮，改革落后的兵制兵法，充实海防力量。著名军事家大村益

次郎就曾在长州藩尝试性地进行过军制改革，实行全藩军队一体化。明治维新成功后，大村益次郎担任了兵部大辅，全力以赴筹建日本近代军制。

1869年8月，大村益次郎提出了《兵部省前景规划》。力主尽快结束日本军制紊乱的局面，在全国实现统一军制。遗憾的是，大村壮志未酬，旋即被长州藩的破落武士刺杀，英年早逝。与此同时，日本近代军制的另一位积极鼓吹者——山具有朋，正在欧美各国悉心研究西洋各国的兵制和兵器。幸而，山县和大村对改革军制同样热心。大村认为兵乃“治国之要器”，务必实现“兵权归一”。山县有朋也认为：“欲完成维新之大业，必须打破列藩割据之弊，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而欲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就必须建设帝国陆军，统全国兵权于中央。”1870年8月，山县有朋从欧美各国考察结束返回日本，掌管明治政府军队的大权。针对当时日本各地兵制极为混乱的现实，根据他亲身对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土耳其、荷兰、美国等国兵制的认真考察，正式决定日本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从而结束军制紊乱的局面。在戊辰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治政府于1871年发布建立近卫军的法令，由参加推翻幕府的军事行动的原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部队中选拔出大约1万人，建立起专门保护天皇的近卫部队，叫作“亲兵”。与此同时，将原属各藩的军队调整改编，作为新政府军队的核心。各藩的军队装备、军需物资也由政府征调。鉴于旧的封建军制腐败、封建武士叛乱，以及从内战中体验到有民众参加的非正规军（“奇兵队”、“农兵队”等）战斗力强等情况，明治政府决定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制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1872年11月发布征兵诏书。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正式着手建立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常备军。

明治政府建军时碰到两个头痛问题，一是封建武士因实行改革而丧失垄断军事的特权，便在各地兴风作浪，搞反政府的叛乱。明治政府一手平叛，一手起用士族担任新军队的骨干军官，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既要向民众征兵，又要建立镇压人民的武装部队。明治政府在全国设6个军区，军区的管理机构叫“镇台”。当时负责建立陆军的山县有朋扬言：“镇台就是为了镇压人心。”在有了“镇压人心”的军事机构后，明治政府才颁布《征兵令》。从1873年4月起，第一次征兵的应征者在东京镇台入伍。之后，各镇台都接连不断地征召新兵入伍。

明治政府在改革军制建立近代常备军过程中，不仅取消了封建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而且还在实行征兵以前的1872年1月颁布《枪炮取缔规则》，规定：“自华族起至平民除准许持有枪械者例外，不得私藏枪炮弹药及手枪。”1876年3月又专门颁布《废刀令》，不许军队以外的人持有日本刀。这些法令，意味着新政权及其军队垄断武器，意味着解除人民的武装和剥夺人民武装自卫的正当权利，以防止人民的反抗。

当然，日本人是讲究实用主义的，也严格遵奉“胜者王侯、败者贼寇”的古训。1878年，山县有朋根据普法战争的胜负结果，转而对胜者普鲁士颇为仰慕。将日本的军队体制由法国式改为德国式，也实行德国式的军政军令相分离的二元化军制。

在筹划兵制近代化、迎合世界潮流的同时，山具有朋等人也在着手对士兵招募方式和旧俗加以改革。维新前，日本各地是雄藩拥兵自重，藩兵主要是由世代以征战为职业的武士阶层充任，选才范围狭窄。而且，由武士组成

的各藩军队士气低落，作战能力极差。对此，山县有朋在 1864 年 8 月的长州藩攘夷战役中有切肤之感，藩兵出人意料地狼狈不堪，尚武精神荡然无存。务必取兵于民，这成为山县有朋的一个信条。

1873 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在《征兵告谕》中宣称：

国家如有灾患，人人皆须有份，是故各尽心力以防灾患，则为一己防患之基。苟有国，则有兵各，有兵各，则人人须服其役。……西洋各国以数百年余之研究实践而定兵制，故其法极为精密。然而政体地理有异，不可全部沿用之。今者应取其所长，补古昔之军制，各陆海二军。全国四民凡年满 20 岁者，皆应编入军籍，以备应急之用。

通过实施近代意义的全民义务兵役制，近代常备兵制在日本建立起来。士兵的来源不再像从前那样由武士阶级所独享。根据“士已非从前之士，民亦非从前之民。均为皇国一般之子民，报国之道本应无别”的原则，凡全国男子符合条件的人，不论出身贵贱，均有义务服兵役。根据这种新式兵制的规定，日本国内年满 20 岁的男性公民入伍服兵役，充任陆海军。近代兵制的实施，使日本军队的实力迅速发展壮大。日本军队成为明治政府同欧美列强相抗衡的主要筹码。也是近代日本欺凌亚洲弱小邻国的一柄利剑。据统计，1879 年日本陆军的编制总计达 16 个联队（团）；骑兵 1 个大队（营）1 个中队（连）；炮兵 10 个大队，工兵 3 个大队 1 个中队；辎重兵 1 个中队 2 个小队（排）。从军制角度来讲，日本军队虽然迈入近代军队的行列。但这并不是惟一的目的，将军队真正变成天皇的私兵，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军才是最终目标。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让这支军队不仅在行动上，而且要在思想意志方面绝对效忠天皇。封建的武士道被新式日本军队全盘继承下来了。

1871 年，山县有朋亲自参与制定了军人“读法”七条。要求日本军人务须做到“忠节、信义、勇武、素质、服从”等几项要求。1878 年，身居陆军卿要职的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将“忠实、勇敢、服从”三条作为“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竭力向士兵灌输武士道精神。

改进军事装备，提高军队战斗力，是明治政府极为关注的事情。明治年间，日本政府财政预算中军费支出始终占居相当大的比例。1883 年，日本陆军军费开支为 1026 万日元，占当时国库岁出总额 8046 万日元的 13%。在殖产兴业过程中军事工业也一直备受政府青睐。因此，日本军队的武器装备更新频率较快，适合日本人身材特点的村田式步枪以及各种口径的火炮，日本均能独立生产。1875 年，日本又自行设计建成第一艘大型军舰“清辉”号，仅此一点，就比当时号称亚洲第一海军强国的中国先进许多。1885 年 12 月西乡从道任海军卿后，采纳法国技术总监贝尔顿的建议，批准海军建造“严岛”、“松岛”、“桥立”3 舰，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北洋水师的“定远”和“镇远”两艘巨型战舰，3 舰排水量均为 4278 吨，各装有一门 320 毫米的巨炮。

除了自行生产外，日本还积极从欧美各国引进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直接购买新式武器。如日本军火生产基地之一的大阪炮兵工厂，为提高生产大炮的速度和质量，在炼钢方面采用了欧洲最先进的平炉生产工艺，成效显著。

当时的欧美强国，如美、英、德、法、荷兰等国，因军事科学技术非常发达，是世界军人的主要出口国。日本的武器输入主要是从这些国家进口。日本海军的大型铁甲舰基本上是从世界第一海军强国英国订购。日本陆军的

武器装备则侧重从欧洲陆上强国法、德两国采购。如 1872 年，日本从德国购人最新式的 80 毫米口径野炮 36 门。1875 年，日本海军一次向英国定购“扶桑”、“金刚”、“比睿”3 艘军舰，建造费高达 310 万日元。

适合世界列强军制发展的潮流，改革日本的军事机构，是明治政府强兵政策的主要内容。

1872 年 2 月，刚从欧美列国游历归国的山县有朋，根据欧美军事强国陆海军分立管理体制，建议政府成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废除了兵部省。山县本人亲自担任兵部大辅一职。这种机构改革有利于日本陆、海军的发展，职清责明，可以消弥原兵部省管理方面的混乱状况。陆海军分别管理之后，山县有朋对原兵部省下属机构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将原军法机关纠问司改为陆军军事法庭；秘史局改为第一局，下设六课，负责管理通讯联络和日常事务；军事局改为第二局，下设五课，负责管理步兵、骑兵方面的事务；炮兵局改为第三局，下设二课，负责管理炮兵事务等；建造局改为第四局，下设二课，负责管理工兵及建筑事务等；会计局改为第五局，下设九课，负责管理军官待遇、会计事务、军费支出等事务。

1874 年，山县有朋为效法普鲁士的成功经验，在陆军省内设置参谋局，后于 1878 年改称参谋本部，并使其从陆军省中独立出来，成为军令统辖机关。其次，还新设了监军本部，专门负责检阅和执行军令情况的工作。这样一来，近代日本就初步形成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等三大军事机构。三者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相互牵制，各有分工。陆军省长官为陆军大臣，专门负责军事政策方面的事务；参谋本部长官为参谋本部长，专门负责制定军令和作战方案等方面的工作；他可以把决定的军令事项交给陆军大臣执行；监军本部长官为监军本部长，专门负责检阅和执行军令情况的工作。1886 年，监军本部改称教育总监，专门负责军队教育和培养军事干部人才。

与此同时，根据曾赴欧美专门考察军事的理事官山田显义的军制改革意见书，明治政府设立各种军事学校，培养军事方面的人才。

1873 年，明治政府力加速培养军事人才，设立了陆军兵学寮。《兵学寮规则》指出，“本家以精学武技为目的”，规定“士官学校培养教育步、骑、炮、工兵之士官”等。1874 年，兵学寮改称陆军士官学校。紧接着，日本又设立海军兵学寮，1876 年改称为海军兵学校。校址从筑地迁到广岛县江田岛，成为培养日本海军所需人才的摇篮。1883 年，日本成立了第一所陆军大学校，专门为日本军队培养高级军事人才。此外，明治政府还开办了炮兵学校、水雷学校、通信学校、工程学校等，为日本军队的近代化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1880 年进而实行了军政分离和参谋本部的独立。此时，山县已经引进了德国军制，以推进力扩张军备而进行的军制改革。伊藤博文在主管的制定宪法工作中引进德国宪法，这就必然要在军制方面有组织地引进德国军制，把原来的法式军制全面改变为德式军制。推动引进德国军制工作的陆军少将桂太郎，获得了陆军少将川上操六和陆军大佐（上校）儿玉源太郎的协助。川上曾随大山岩与桂太郎同赴欧洲考察军制，又与乃木希典同到德国留学。儿玉源太郎 1891 年赴欧考察。他们正在成为陆军第二代的青年将领，在军制改革中起了核心作用。

在军制改革中还有一位核心人物，是作为参谋本部顾问于 1885 年 3 月到日本的德国陆军少校梅克尔。他在陆军大学讲授军事学，在参谋本部提出军

制改革建议，为确立德式军制作出了很大贡献。

军制改革有三个目标：

第一，改镇台编制为师团编制；

第二，改组作为军制上层结构的高级司令机构，负责军政的陆军省与负责军令的参谋本部并列，并建立统管教育和人事的监军部，使陆军军队训练达到统一。这三个机构的长官共同“组成天皇陛下的最高陆军参议官”，形成高级司令机构；

第三，改革形成军制基层结构的兵役制度，对原来的免役条件加以严格限制，加强对逃避征兵的取缔，彻底实行严格的全民皆兵主义和普遍服役主义。1889年1月，政府修改征兵令，2月制定并颁布陆军一年志愿兵条例。

1887—1889年的军制改革首次在日本建立了能进行近代战争的军事体制。山县又把志愿兵制度与地方自治的制度联系起来，而地方自治制度则使军事体制在国家体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军队是右大臣岩仓具视和参事院议长伊藤博文赖以对抗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后实力，它在创立引进普鲁士宪法的体制中发挥了支柱的作用。但是，尽管已发表了《军人训诫》，军队内部仍然不稳。1880年8月18日，东京镇台步兵第一团所属、岩手县盛冈平民出身的陆军步兵伍长小原弥惣八向大政大臣三条实美和陆军卿大山岩亲呈上书，要求开设国会，并在赤坂临时皇居门前剖腹自杀，经抢救未死。这次事件对军队统帅部震动很大，山县感到有必要超越以陆军卿的名义发表的《军人训诫》，再进一步用天皇名义发布训诫。不能像外国那样以宗教为基础实行对军队的教育，而是要求助于天皇的权威，用敕谕的形式加强对军人的训诫。山县通过用天皇的敕谕来约束军人的生活和思想，进一步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了天皇的绝对性。1882年1月4日，政府公布了用天皇名义发表的《军人敕谕》，表述了天皇的统帅大权在国体上的绝对性，要求士兵必须“忠君爱国”，以为“神”的天皇尽忠为荣，明确规定了“忠节”、“礼义”、“武勇”、“俭朴”、“信义”等道德标准。“忠节”被解释成“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成了绝对制君主、大元帅的天皇对军人的最高命令，从而确立了《军人敕谕》的“忠节”观念。

建立近代军队是明治政府的强兵主要目的，但日本军队的任务主要是为与欧美列强争雄、欺凌亚洲邻国。对内镇压民众反抗的责任，自然主要是由警察部队来承担的。因此，改革组建新式警察制度，也是明治政权强兵的内容之一。

在废藩置县之前的1868年初，在东京以幕府时期的封建警察机关为基础，建立了市政警察，称为“府兵”。但日本社会内尚未出现真正的近代警察制度。由武士构成的军队往往承担着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基本上是一种军警合一的混乱状态。东京地区的警察被称为“亲兵”，各地的警察则称为“县兵”或“区兵”。从1871年11月起，日本全国的警察一律统称“逻卒”（巡警兵），或称为“捕亡”。也有时为同军队相区别而称“包利斯”（英文police之音译）。

在求知识于世界、全面模仿西方过程中，日本也重视学习西洋各国的警察制度。大久保利通的心腹干将、萨摩藩的川路利良，专门赴欧洲各国考察警察制度，归国后成为日本警察制度的创始人。1873年9月，从欧洲归国的川路利良提出了一份改革警察制度的建议书。内称：

夫警察者，乃国家平素所施之治疗，犹如人平素之养生，用以保护良民，培养国内气力

者也。故自古以来，凡欲振兴帝业，扩张版图者，必先注重于此，拿破仑一世是也。今之普鲁士所以平定四方，威震世界，即赖有警察善于治理内外，经常探悉外国情形，故能终于战胜强国法兰西。由是可见，欲使国家强盛，与外国相抗衡，必先有此设施。

根据川路利良的方案，1874年1月，在内务省组建的同时，全国统一的警察制度也确立起来了。内务卿大久保成为全日本警察的领袖。首都东京设立警视厅，有警察3000余人，川路利良任大警视，直接掌管东京的警察权。全国规模的警察网逐步设立完善，平均每2.3万居民区内，就设立1个警察派出所，有数十名警察。到1890年，全国有692个警察署、774个警察分署、1400个警察派出所。大批没落武士涌入警察行列中，再次成为政府镇压、管制国民的工具。日本俨然成为一个警察国家，而这正是川路利良所孜孜以求的结果，他曾毫不掩饰地宣布“迫切希望日本被称为警察国家”。

应该说，改革警察制度是明治政府强化国家机器的重要举措。近代警察制度的确立，对新政府巩固统治平息各地武士叛乱、镇压农民起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同时，它也是日本近代政治日趋专制、黑暗的主要因素之一。

“富国强兵”是明治维新实行整个社会变革的总目标。而“富国强兵”的后果，是建立了国内军事警察统治和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以实现在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和对外的侵略扩张。

1889年2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钦定颁布后，日本军队的特殊社会地位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根据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1条）、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第12条）等等，总而言之，即天皇握有最高军事统帅权。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不是向政府（内阁）负责，而是直接隶属于天皇，“军队是天皇的私兵”。由这三者构成的军队具有上奏权，可以直接影响甚至左右日本政府的内外政策，成为日本社会当中最富侵略性的社会集团，近代日本逐步走上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正是这一集团推动完成的。

扩军备战

1873年刚开始实行征兵制时，新建的日本军队平时编制不过3.1万人，战时编制4.6万人，海军是由接收幕府和各藩的军舰逐渐扩充起来的，初建时有17艘军舰和运输舰，排水量总共不过1.38万吨。从1875年起，逐步解散士族军队，新建的军队不断扩充。

1882年1月6日，山县有朋在谈到充实常备兵的急务问题时指出，尽管征兵制度已实行了9年，但常备兵仍然只配备了4万人，没有达到定员。他明确表示，决心要在今后“即使财政上受到某些影响”，也要努力补足定员。

1882年朝鲜王午兵变的消息刚一传到日本，有人就主张立即开战，有人煽动对朝鲜和对中国的敌视心。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断定发动这次事变的“顽固党”是“文明的敌人”，说“要向世界万国宣扬我们的政略是文明改进的政略，其军队也是文明改进的军队这种主义”。在这种煽动下，有请求献军用资金的，有请求志愿当义勇兵的，还印出了许多彩色版画。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形势的是军部和政府。8月15日，参事院议长山县有朋建议扩张军备。他把清朝作为战略目标，警告说：“时至今日，若不

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把我帝国比作一大铁舰，四面扩展势力，以刚毅勇敢之精神运转之，则我所曾轻视之直接近邻外患，必将乘我之弊。”他还大声疾呼：“若坐失此机，则我帝国将复与谁同保独立，与谁同语富强乎？”

11月15日，海军卿川村纯义建议制订建舰八年计划，指出“观察支那近况，致力于军备，整備海军，实非昔日可比”，同时提出修改于前一年制订的关于20年造60艘的建舰计划，提出了8年造48艘的计划。不过，扩充军备必须实行增税，增税必然引起批评与攻击，因为自由民权派的主流以及自由党或立宪改进党都曾从优先改革内政和尊重民权的立场批判了政府的朝鲜政策。所以，为了扩充军备，首先必须公然否定内治优先的原则，然后压制自由民权派。

11月24日，天皇告谕地方官“应大张战备之益”。太政大臣三条指示必须稳定民心以便可能增税。12月25日，三条还向各省卿传达了天皇的御旨，指示“精简条件不具备之庶务”，以“整備陆海军”。12月27日，政府修订酿酒税，把去年刚从2元提高到4元的造石税，增加到6元。

山县有朋主张以充实常备军为急务，而充实常备军包括一项重要的目标，即在配齐兵员的同时，还要使武器的生产独立。他强调“即使财政方面受到若干影响”，亦不能对扩充军备有所犹豫。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军事工业开始独立进行武器生产。海军的横须贺造船所于1873年开始建造第一艘军舰“迅鲸”号（1646吨，400马力）。到1878年，陆续动工建造“清辉”号（898吨，720马力）、“天城”号（926吨，720马力）、“磐城”号（656吨，650马力）、“海门”号（1350吨，1250马力）、“天龙”号（1547吨，1250马力）等军舰。

1877年动工的“磐城”号首次把设计建造工作从幕末以来的法国技师手中转移到日本技师手中，这标志着造舰技术已经独立。炮舰“磐城”号和海防舰“海门”号、“天龙”号还是木结构。世界上的军舰已在改造成铁结构。1878年从英国进口的“扶桑”号、“金刚”号、“比睿”号都是铁结构或者铁骨木皮。1881年，横须贺造船所因舰船用木材不足，乃乘机开始建造铁骨军舰。1883—1884年，在横须贺和神户小野滨的造船所制造的“葛城”号、“大和”号、“武藏”号三舰都是吨位1502吨、1622马力的海防舰，都是铁骨木皮。

陆军的迫切任务是制造定式枪炮。当时，西欧各国正面临军用枪大换代时期，从前膛枪改为后膛枪。后膛来复枪已开始大量生产。1875年，步兵少佐（少校）村田经芳怀着改良步枪的目的到欧洲各国考察。1880年，造出了一三式村田枪。陆军立即采用村田式步枪作为军用枪。村田仍然潜心制造适合日本人体型的枪。1885年，造出了一八式村田枪。这种枪把带刺刀枪的重量减轻约10%，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携带兵器。生产步枪的东京炮兵工厂立即开始大量生产。1886年，陆军在全军配备了一八式村田枪。

火炮——野炮和山炮，在国际上也正处于更新换代期，从前膛炮发展到后膛炮，从青铜炮发展为钢铁炮，同时技术也有普遍改进。1881年制造火炮的大阪铁兵工厂的炮兵大尉大田德三郎，赴欧学习制炮技术，第二年回国后着手试制新式火炮，1883年前后即能独立生产火炮了。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已基本实现了武器生产的独立。

1891年海军大臣向内阁会议提出的9年海军扩充计划（铁甲战舰4只、

巡洋舰 6 只、通讯舰 1 只），连其中的巡洋舰和通讯舰各 1 只的预算，在第二届和第三届议会都没有得到通过。在 11 月召开的第四届议会中，出现了政党转变方向的征兆。在所谓国是问题上，即国民生活、教育、外交、国防的四点上，政党将采取“积极的手段”的方针。这意味着议会承认扩军。

1892 年 7 月，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号、“镇远”号两艘军舰航抵横滨。并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日本议员。参观者们在回东京的火车上仍然议论着，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而日本只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清朝相比，个个卷舌而惊恐不安。

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对日本来说，已成了最高命令。与此同时，议会也开始同政府妥协。伊藤和井上毅为了打开议会和内阁的对立局面，决定请天皇出面。果然，天皇召集了大臣、枢密顾问官、贵众两院议长，发出诏敕，希望政府与议会和衷共济，并声明说：“朕兹省内廷之费，六年期间每年拨下 30 万日元，并命文武官，除特殊情况者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十分之一，以资补足造舰费。”

于是，政局为之一变，开辟了妥协途径，政府答应实行行政整理和改革海军内部，而众议院则重新审议预算案，减少了削减额，通过了包括铁甲舰二只、巡洋舰和通讯舰各一只的造舰费在内的预算案。

军备的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1891 年 11 月，发明村田枪的陆军少将村田经芳，把以前的单发枪改进为连发枪。1893 年 3 月，海军技术员下濑雅允发明了高性能火药。

1893 年 3 月，转任枢密院议长的山县有朋，在 10 月起草了长篇《军备意见书》，确定了当时的战略。他指出俄国、法国和英国侵略东亚的动向，认为东洋的危机不出十年就会爆发，到那时成为日本敌人的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各国。他认为休养民力和减轻地税“只是外无患难，内有余裕时才可以说的”，主张扩充海军乃是当务之急。

初试锋芒

1870 年（清同治九年）8 月 25 日，日本政府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前来中国要求订约。日本企图仿效欧美各国，在中国攫取特权，清政府坚决拒绝。1871 年 9 月，日本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中日通商章程》。这是中日两国近代第一部条约，是一个基本平等的条约。如果能够贯彻执行，还是有利于两国睦邻友好的。但是，由于日本政府要求订约是另有所图，美、英等国当时惟恐中日联合，反对这个条约，硬说有“攻守同盟”条款，向日本施加压力。因此，条约的批准遇到障碍。

1872 年 3 月，日本再次派柳原来华要求修改条文。4 月 9 日，柳原到天津拜访代表清政府全权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李鸿章。但是，柳原不是李的对手。柳原是 1850 年出生的一个公卿出身的青年，而李是 1823 年出生的同治中兴巨头。李鸿章翻开《中日修好条规》的稿本，指着卷尾写有“为此两国钦差全权大臣先行画押盖印，用昭凭信……”的地方，大声呵斥道：

贵国今如此，是自污也。其将侮我耶？或蔑视清朝耶？何以外务卿大臣等不明道理若此之甚也。今日余若受此照会，则上读职于朝廷，下失信于万民，有何面目立于国而秉权！请速收回成命。

说毕，退还照会。

谈判持续到6月28日而破裂。可是，7月1日，李鸿章却在接见柳原时安慰他说，我国虽未应允修改条约，但如日本与欧美各国缔结修改后的条约，其结果于中日条约有妨碍时，则可在中日条约批准之后，考虑缔结别的协定。柳原唯唯而退。

到了1873年4月，日本政府忽然批准条约，派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庞大的使节团来华互换批准书。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琉球难民事件”已经发生。副岛来华“换约”是一种谋略，是为了发动侵台战争而投下一颗探路石，并借此开展战争前的外交活动。果然，条约批准后不到一年，日本就撕毁条约，发动了侵台战争。

1871年12月，由宫古岛民和八重山岛民各两艘船组成的两组进贡船，从琉球向中国进发，途中在台湾海峡遇险，宫古岛民的进贡船，于11月30日离开那霸港，遇暴风后在海上漂流，一艘宰还，另一艘则于12月18日漂泊到台湾西南海岸的牡丹族（高山族基层社会组织）居住的八遥湾。乘员共69名，其中有3名淹死，其余66名登陆上岸。但是，其中的54名被土著居民（高山族）杀害，逃出来的12名乘员在风山县受到清政府官兵的保护。

八重山岛的进贡船，于12月11日从那霸启航。由于遇上飓风，在海上漂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泊到台湾，46名乘员同样受到风山县清政府官兵的保护，其中1名病亡。两批漂流至风山的难民共57名，1872年2月，他们被护送到设在福州的琉球馆，7月返回那霸。

琉球当时是独立国，对此事并未提出异议，日本当时也不知道此事。1872年5月，事件已经平息，柳原前光使清要求修改条约未成，却从清政府府邪报中获得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并报告了日本政府。日本统治者及鹿儿岛士族乃大肆鼓噪“征台”。

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于1872年8月要求政府出兵问罪。他指出，残杀琉球藩民的“残暴恶行，刻不能客”，强调“纲良伏愿仰仗皇威，兴问罪之师，发兵征剿”，“故谨欲借军船，直指彼巢窟，灭其巨魁，上张皇威于海外，下慰岛民冤魂于九泉”。

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陆军少佐桦山资纪也日夜兼程奔赴熊本，向熊本镇台司令官桐野利秋控诉。桐野出差，不在兵营。于是，他便赶到东京直接向陆军省呼吁，向陆军少辅西乡从道建议向台湾派遣生蕃探险队。桦山还经常会见西乡隆盛，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政府认为，为了使琉球藩民的遇难事件变成日本的内政问题，应首先确立日本对琉球的管辖权。琉球在旧幕府时代对中日两国处于两属关系。10月4日，代表国王庆贺明治新政的琉球使节来到东京。16日，谒见大皇贡纳方物。天皇告诉使者，他已册封琉球国王，“升其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10月30日，政府把琉球王国与欧美各国缔结的等约和今后的外交事务转归外务省管辖。

可是，副岛外务卿却对台湾一无所知。10月24日，他向美国驻日公使德隆证询关于台湾的情报。由于德隆获得副岛抱有“进行军事远征的意图”的印象，遂把精通台湾情况的李仙德介绍给他。德隆在给本国的报告书中写道：“西欧各国的（驻日）代表的真正政策”，是“要使日本朝廷远离支那和朝鲜宫廷而与西欧各国结盟”。

李仙德于1830年生于法国，1854年与一位美国妇女结婚，随后移居美国，后加入美国籍，曾当义勇兵参加过南北战争，获得一个“将军”的诨

号。1866 年任厦门领事。由于美国商船的 14 名船员漂泊到台湾惨遭杀害的事件，他到过台湾，调查过岛上的情况，并和当地居民就保护美国的漂流民问题交换过协定。他还绘有台湾的详细地图、海图，并拍摄了详细的照片，打算与本国政府交涉，以求晋升，回国途中路经日本。他在日本滞留期间，被介绍给副岛外务卿。据当时在座的外务少丞郑永宁记述，副岛第一次和李仙德会见时，就留下了“犹恨晚见半日”的感受。他当即聘李仙德为外务省顾问，按敕任官待遇。李仙德就此长居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和一日本女子结婚。

李仙德接受副岛外务卿的请求，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1872 年 11 月—1883 年 2 月，他共草拟 5 份备忘录，从各个角度替日本政府考察了有关台湾的形势和日本所应采取的态度与政策。他敦促日本注意台湾“形势如同未垦之地，日益空旷，无论何国公民都易于移殖”。他警告说：“企图向东方殖民之各国，讨厌台湾岛民视己为敌，皆注意借词肇衅。”他劝告日本政府说：“既不欲西人在我近处殖民，故若支那政府不喜领有此地，则与其落入西人之手，毋宁由我国（日本）占领此地。”他指出，英俄两国正围绕着“东方问题”（围绕土耳其的国际关系）处于对立之中，在这种国际形势下，给日本打入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劝日本务必弄清清政府对台湾土著居民居住地区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向日本政府传授了强权政治的经验。日本的外交官僚们，通过李仙德学到了西欧的强权政治，从向西欧引进技术以对付西欧的冲击，发展到从西欧引进强权政治来与万国对峙。

1872 年 3 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偕李仙德等到中国交换《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书，兼办两项重要任务：即在对台湾、朝鲜实行军事行动之前，先到中国寻找出兵借口。

副岛等为实现其卑鄙的目的，不惜歪曲和断章取义地利用清朝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在谈判中的非正式谈话，向本国政府汇报说：关于台湾问题，清朝官吏称为“生蕃”之地，政教禁令所不及，为化外之民。

副岛已计划向台湾出兵，外务少丞郑永宁写的《副岛大使适清概略》记载了副岛为台湾事件而开展的外交活动。据该书记载，从李仙德向副岛提交备忘录时起，副岛就与陆海军军人之间过从甚密。书中说：

最近，闻海陆军之士凭空偶语，有不待朝命，自谋讨伐生蕃者，副岛忧之。乃功谕曰：壮志义气，无非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顺进行征伐，则等同寇耳，幸勿暴虎冯河。种臣谋之，有虑者有三：外国窥视台湾久矣，一也；清政府仅治其半，而自谓全有，二也；生蕃野性好胜，视死如归，乃其三也。种臣愿借外务之权除此三虑，而后专恃诸君之力，取此地为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此辈听之，过激之气始平。

副岛所忧虑的三点，多半是从李仙德那儿学来的。他决定亲赴清朝，打开解决这一事件的缺口。他上书强调：“欲使外人觊觎台湾者不敢阻我王事，使清人甘让生蕃之地，辟土地获民心，非臣力之，恐难成功。”他说：“请准余亲自赴清，借换约（批准互换《中日修好条规》）之名以入北京，游说各国公使，绝其娼疾。借与清政府讨论谒见皇帝之事（指借批准换约而建立邦交之机，谒见皇帝，面呈国书，祝贺同治皇帝完婚和亲政），告以讨伐生蕃之由，正我疆界而开拓半岛。”

11 月，政府命桦山少佐赴台湾视察，任命副岛外务卿为特命全权大使赴华。海陆军人非常高兴。郑永宁记载道：“海陆军士知之，皆踊跃而来，请随副岛入清。副岛许以发军舰，盖养其气也，士乃奋臂而去。”

当时，参议、陆军元帅西乡隆盛正在鹿儿岛休假。副岛等待西乡返京，而西乡休假时间很长。于是，副岛决定自己去鹿儿岛拜访西乡，随后从那里径直赴华。1873年3月12日，他搭乘军舰“龙骧”号从横滨启航。同时启程赴华的僚舰是“筑波”号。海军少将伊东祐磨担任舰队提督。李仙德担任大使顾问同行。与副岛同乘“龙骧”号赴华的郑永宁，描写出发时的情景说：

当天，霁雪如银，礼炮在霁雪中互答，满舰士卒，济济凛凛，大使抚髯大乐。自两舰士官乃至水手伙夫，合计600余人。盖我国派遣大使，驾本国军舰出海者，始于此。本国军舰航行海外亦始于此。况大使已奉伐蕃之旨，将起事台湾。今各国众人闻之，发兵舰，则国内外拭目。是以提督舰长等于此役，百般注意，夙夜黽勉，纪律严明，全舰昂扬，奋励踊跃之色溢于言表。大使见而喜曰：六百之心乃六军也。

3月18日，途经佐田岬时，趾高气扬的副岛赋诗展示其抱负说“保护海南建新藩”。19日，副岛在鹿儿岛上岸，会见西乡。他们研究了侵占台湾后在那里如何建藩的问题。20日，副岛受到岛津久光的款待，随后即从鹿儿岛经由长崎开往上海：31日，进抵上海港。

1873年4月19日，特命全权大使副岛种臣到达天津，开始与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会谈。李鸿章盛赞日本之开化。4月30日，双方批准互换《中日修好条规》。5月1日，副岛访问李鸿章，提出修改条约问题，李鸿章回答：“俟岩仓大臣改约一定，万事正该随时更张。”

副岛转而谈判谒见皇帝问题。西欧各国的公使团，从年初以来就在争论谒见皇帝的礼仪问题。本来，清政府要求行三跪九拜礼。副岛则主张行“三鞠躬礼”。清政府认为这有碍中华帝国的权威，态度十分强硬。谈判在无休止地进行。6月19日，副岛以回国相威胁，终于实现了他的主张。清政府仍然要求副岛与西欧公使一起谒见，而副岛主张全权大使位在公使之上，使清政府同意把他安排在西欧公使之前单独谒见。关于向皇帝手呈国书的问题，则以皇帝害怕生人表示歉意，决定不亲手呈交而放置于桌上。这样，6月29日，副岛首先谒见，接着使是英、法、荷、俄、美五国公使同时谒见。谒见时，行三鞠躬礼。这件事对神圣不可触犯的在跪拜仪式上的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给予了巨大打击。

副岛的举动，解决了自上世纪末英国使节马嘎尔尼以来西欧公使团一直要求而未能实现的礼仪问题。从朝贡体制变成条约体制，这已是华夷秩序崩溃的开始；跪拜礼仪的破坏，则更加快了它的崩溃速度。

接着，副岛又提出了朝鲜和台湾问题。关于台湾，总理衙门声明：熟蕃之地“置府县而治之”，而生蕃之地则“置于化外，甚不理事也”。副岛得出结论，认为已取得了可以在朝鲜和台湾化外之地自由行动的口头保证。他还与英、美、俄三国公使举行会谈，致力于调整日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其中甚至包括库页岛，目的在于创造有利于今后行动的条件。7月3日，副岛离开北京；26日，回抵东京。郑永宁写了一段关于日本国内迎接副岛回国时的小故事。

副岛甫归，京版豪富结社者已有400余户。传闻副岛成功，愿集其财产数百万，资助伐蕃，计可供数载之用，并愿自任其地之开拓。而有志报国之士，皆昂然奋臂听候副岛调遣。

当时，士族反政府运动开始抬头，明治政府决心把各种反政府情绪一齐引向国外，便加紧进行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不久前还高唱“内治优先”、反对西乡隆盛的大久保利通，亲自制订《处理台湾蕃地要略》。《要略》写

道：“台湾生蕃部落，为清政所不及之地。……我藩属琉球人民曾遭杀害，为之复仇，乃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1874年4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000名士兵）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李仙德为“台湾蕃地事务局二等出仕”，陆军少将谷干城和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台湾蕃地事务参军”。此外，还任命海军省聘用的美国海军少将日格塞尔和陆军省聘用的美国人华森、英国人布郎为随员。远证台湾的阵容备齐。为了远送军队，租借英国轮船“约克夏”号和美国轮船“纽约”号。

政府不顾内部的反对而强行向台湾出兵。4月9日，西乡都督率军舰“日进”号和“孟春”号从东京品川湾出发，开赴长崎。

5月2日，西乡令军舰“日进”号、“孟春”号和运输船“明光”号、“三邦”号共4艘船只起航。6月3日，在台湾西海岸登陆。日本共派遣士兵3658人。除正规军队，萨摩藩的征集队和熊本的义勇兵也加入了这一队伍，征集队是西乡隆盛为弟弟募集的，共295人，大部分是因“征韩论”而辞职的警保寅官员和巡警，由原警保助坂元纯熙指挥。义勇兵是以士族力主的51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民权论者的宫崎八郎。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极其野蛮。高山族顽强善战，加之时疫流行，日军死亡近600人（病死为主），占出兵人数的1/5。支出军费为955万日元。

日本政府见胜利无望，便另寻体面收场的途径。1874年9月初，大久保不得不亲自来华，其目的本来是不讲条件，但求体面结束战争。但来华以后，却故作姿态，利用英美居间调停，同时也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高价勒索，耍尽威风，向中国进行外交讹诈。清政府的软弱，使大久保在谈判桌上反败为胜。他要求中国承认日本攻台是“保民义举”，还要求中国赔偿军费。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还说：“念该国兵上远道艰苦，乞恩犒赏汽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勇跃归国。”

1874年10月31日，日中双方签订了台事《北京专条》，其中载明：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中国对前次遇害家属给予抚恤银10万两，中国愿把日军在台湾的建道建房留为自用，补银40万两。中国所给银两，在日军退尽之日付清。

《北京专条》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等于承认琉球人是日本臣民，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根据。

日本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的最大目的，是要切断琉球对清朝属国的关系，并确立日本对琉球的统治。大久保在1874年7月12日把琉球从外务省划归内务省管辖，为确定琉球是日本的领土埋下了重大的伏笔。12月15日，他起草了关于琉球问题的建议书，建议对琉球采取强硬的处理方针，特别是要求“一扫与清朝之关系，把镇台支营派赴那霸港内”。

日本为处理琉球问题而修筑了坚固的桥头堡，这对清帝国起到了打击中华秩序的作用。旅居中国的英国人芯吉曾说：“台湾事件的处理向全世界宣告：这里有一个富饶的帝国，它将随时自动地给你支付赔款而决不进行战斗，支那的命运的确是结束了。”在中国海关工作了30年的马士说：“比随时自动支付赔款更加重要得多的事情是，轻易地放弃了朝贡达5世纪之久的琉球——这是此后逐一丢失安南、朝鲜、缅甸，结果丢掉一切朝贡国的序幕……”

1875年7月，日本政府命令琉球国王尚泰停止对清朝献贡，禁止接受清

朝册封和撤销福州的琉球馆，强迫琉球和清朝断绝关系，命令琉球国王晋京。日本军队驻扎琉球，采用明治年号，施行日本刑法，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对此，琉球王朝不同意断绝同中国的传统关系，一再请愿，并向清政府以及英、荷、美等国公使请求援助，进行抵抗。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强硬措施。1879年3月，内务大书记官松田道之率警察160人、步兵400名进入琉球首府首里城，甚至决心用武力拘禁藩王，宣布把琉球藩划为冲绳县。琉球王朝的官吏和士族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松田以严厉的态度进行了镇压。日本以武力的强制手段强行吞并了琉球。

日本侵略台湾的战争，对于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来说，是资本积累的源泉，是个很大的机会。三菱和三井都在这场战争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他们同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等大官僚互相勾结，迅速发展成为日本的大财阀。

修改条约

明治政府成立后，1868年2月8日，明治天皇在诏敕中既公开指责幕府过去在外交上的错误，表示要“进行改革”，又表示将遵守“字内之公法”。在诏书中表露一种要求民族独立而又不敢公开对外决裂的苦闷。当时，新政府正集中力量“东征”，很害怕引起外国武装干涉，故而采取中立外国势力的政策。当时发生的“神户事件”和“堺事件”的处理，就表现了惊人的屈从和容忍。

1868年2月4日，冈山藩藩兵执行任务时与外国使馆兵士发生冲突，明治政府迫令藩兵队长切腹，幽禁冈山藩家老。这就是“神户事件”。

1868年3月8日，土佐藩藩兵执行任务时与法国水兵发生冲突，法军死11名，伤5名。明治政府迫令20名藩兵当众切腹。行刑时因法国方面要求停刑，把尚未切腹之9名流放远岛。这就是“堺事件”。

《五条誓约》和《五榜禁令》都一再宣布遵守国际公法，严禁杀伤外国人。这种不得已的屈从行动，赢得了西方国家的好感。1868年5月22日，英国率先承认新政府。半年之后，西方各国也承认了新政权。新政府的国际地位确立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明治政府对不平等条约勇敢地采取了维护民族利益的行动。1869年2月4日，明治政府即通告各国驻日公使，意图修改条约。各国的答复是，在条约规定的期限之前进行修改是困难的。

4月9日，岩仓具视向辅相三条实美提出关于《外交财政及开拓虾夷地区》的意见书，其中强调修改条约的重要性时指出：日本国和各国交际，“必须以下降低皇威、不损害国威力重点”，“如今允许外国军队在我港口登陆，侨居洋人违犯我国法律者仍由外国官员处理等情，乃皇国之奇耻大辱”，必须修改条约以“保护皇国国权”。日本也应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者，谒见其国王总统，协商修改条约事宜。

修改条约是摆在维新志士面前的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就等于“维新宏业”的一半未告完成。

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于1871年建立机构，着手起草方案。同年12月，派出了以岩仓具视为正使的大型使节团。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向岩仓右大臣面授《派遣持命全权大使事由书》。其中强调：“国与国之间权利对等，乃当然之理”，“条约亦应保持权利对等”，“应修改以往之条约，确

立独立之体制”，等等。

3月11日，岩仓、木户、大久保、伊藤、山口等正副使，会见美国国务卿菲什，提议举行修改条约谈判。菲什回答说：“因无修改条约委任状，故不能马上进行谈判。”岩仓一面派大久保、伊藤二人回国索取委任状，一面继续和美方谈判。当委任状带来时，发现美国在修约问题上态度严峻，也只好放弃修约谈判的念头。使团到达伦敦后，与英国外相格兰维尔谈判，英国的态度更为强硬。岩仓一行才认识到修改条约的艰巨性。

这次出使虽未能修改条约，却促使明治当权者改变世界观，把武士的头脑改造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头脑。使节团还专门考察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制度，这对制定扶植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欧美各国的工业、铁路、军队等等，使他们惊叹不已，俾斯麦则对他们赤裸裸地鼓吹“强权政治”。他们痛感国家贫弱之可悲，深知只有自身迅速富强、国力充实、法制完备，才能修改不平等条约，才有可能真正平等独立。弱肉强食是国际政治的法则。于是，他们带着“内治优先”的思想回到日本。

到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明治政府在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随着日本民族工业及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日本人民争取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日益强烈。日本资产阶级也迫切要求摆脱不平等地位，发展民族经济。1881年9月，横滨生丝商人反对外商垄断出口的事件，发展为全国生丝业资本家及神户等地进出口商与外商的全面对抗。在日本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历届外务卿都把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施政中心。

所谓“修改”，中心是要取消“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取消议定关税，实行关税自主。

当时，在国际上也出现了有利于日本的新形势。美国希望和居于美亚贸易通道上的日本保持良好关系；俄国意在南下，也希望讨好日本。因此，列强对日政策的步调出现紊乱，所谓对日缔约国的协同一致原则露出了破绽。这给日本修改条约增强了迫切感，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大藏卿大隈重信从国家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国工业成长着眼，提出如果全面收回国权有困难，可否先收回税权的建议。这个提议得到了俄、美、意政府的赞同，并于1878年7月25日，签订了《修订日美现行条约某些条款并为增进两国通商的约定书》。该条约承认日本收回税权，废除出口税及沿海贸易管理权。关于条约实行日期，规定为在其他缔约国也签订与此相同的条约并付诸实施之时。但英、法、德三国坚决拒绝日本的提议。

正在交涉中，发生了英国商人哈特利偷运鸦片事件（哈特利事件）。英国竟然凭借“领事裁判权”强词夺理他说鸦片属于“药用”，判决哈特利无罪。1879年7月，德国轮船“赫斯塔利亚”号在军舰保护下从霍乱流行的地区直接开进横滨港，无视日本的检疫法。这两次事件表明，要收回国权必须收回法权，单收回税权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社会上要求收回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把建立国会运动和收回国权运动结合起来，批判单独收回税权的谈判。外务卿寺岛宗则引咎辞职。

1879年，井上馨继任外务卿后强调收回法权，他认为，要使各国同意取消治外法权，必须“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只有如此，我帝国方能与泰西各国齐跻于同等地位。”在井上馨看来，只有日本欧洲化了，

欧美列强才能对日本产生好感，才能赐给日本主权。于是，日本政府为标榜欧化，讨好外国驻日官员，特建筑一幢欧式的豪华俱乐部，专门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并经常举行有首相、大臣及其夫人和小姐参加的化装舞会，彻夜狂欢，此俱乐部命名为“鹿鸣馆”，敌人们把这一段时期的日本外交叫作“鹿鸣馆外交”。在此影响下，在日本上层社会，吃西餐、穿西装，理分头、跳交际舞……风靡一时。更有甚者，有人竟提议欧日通婚，借以提高日本国地位和日本人的素质。

井上馨用了8年时间与各国多次秘密谈判。到1886年6月15日，英德两国提出最后修改条约草案。其要点是：

1. 修约两年之后，日本对外国人全面开放内地。外国人服从日本之法律；
2. 在此期间，日本应制定各种法典，用英文向外国政府公布并接受其审查；
3. 日本法院须聘用外国法官，凡涉及外国人被告案件由外国法官居多数的法庭审判。

不难看出，这一提案与“领事裁判权”相比，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加侵害日本国权。可是，井上馨竟称赞英德提案“价值一万元”。为此，天皇特意接见英德公使，授予勋章，表示感谢。

然而，在阁议过程中，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首先，法律顾问布瓦松纳德（法国籍）和农商相谷干城提出反对意见。布瓦松纳德指出：混合审判对日本是不利的，是屈辱性的审判；日本法典交外国政府“审查”，是使日本立法权受外国束缚，有害于日本国家主权，关系国家荣辱独立问题，日本内阁要慎重考虑。谷干城主张：修改条约“必须先改革现行政府之组织，实行立宪会议之新政，然后始能断然实行”，他们的意见都秘密印刷成册，散发到社会。井上馨对于如此损害日本主权的方案，竟准备同意，人民群众无比愤慨。正当此时，1886年10月24日，发生了英国商船拒不救援日本乘客的“诺曼顿”号事件。英国商船“诺曼顿”号从横滨驶向神户过程中触礁沉没，船长只营救欧美籍乘客，致使23名日籍乘客溺死。事后，英国对责任者不肯追究。经抗议后，英国领事才判处船长监禁3个月。“诺曼顿号沉没之歌”传遍全国，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井上馨修改条约的运动。首相伊藤博文本来是支持井上的修约方案的，但他鉴于反对井上运动不断高涨，决定修改条约会议暂停。接着，日本政府发出通告，宣布修改条约会议无限期延期。历时漫长的修约谈判就此中断了，政府解除了井上馨的外务卿职务。

英国一向把通向亚洲的道路置于其制海权的控制之下，千方百计限制俄国和德国在亚洲的活动，保持在亚洲的主导权；而俄国对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早已梦寐以求。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英俄在远东的斗争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建筑计划泄漏以后，英俄关系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英国为了抵制俄国南下政策，便想“把日本拉过来”。俄国为了南下，需要和新兴的邻国日本保持良好关系。而日本当时尚无力直接同英俄对抗，只好利用英俄矛盾在英俄斗争的漩涡中保卫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

大隈重信接任外相后，便利用新的国际形势，采取“强硬政略”作为修改条约的基本方针。大隈修改条约方案和井上方案相比，最明显的不同点有：

1. 把任用外国籍法官限制在大审院（日本当时最高审判机关）；
2. 在有关编制法典条款中删去“依据泰西主义”和通告各国的义务。

大隈在交涉方法上，采取与各国谈判的方式，以便利用英俄矛盾。谈判开始时，英国对大隈方案表示不满。但是，美国于 1889 年 2 月、俄国在 8 月，都先后在修改条约上签了字。于是，英国也不得不让步，在 8 月间与日本大致达成协议。但是，就在修改条约谈判将告成功的时候，社会上又掀起反对大隈修改条约谈判运动。运动主要攻击大隈方案中的保留外国籍法官的条款，说它是违背宪法精神的。10 月 18 日，大隈被暴徒炸伤，修改条约谈判再次中止。

1889 年 12 月，山县有朋任第一届内阁首相，青木周藏任外相。山县在 1890 年 3 月向内阁提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作为施政纲领，青木外相按照山县的论点，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作为外交方针。

山县在确定本届内阁的外交任务时提出：在务必完成修改条约的同时，推行向朝鲜扩张的政策，明目张胆地把修改条约和侵略邻国定为表里一体的外交政策；把修改条约谈判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放在同等地位上，齐头并进。这是因为俄国要求使用朝鲜东岸的永兴湾，英国于 1885 年 4 月占领了朝鲜南岸的巨文岛，这就使日本朝野有识之士认识到朝鲜问题已经和英俄在世界上的对立联结在一起了。只要日本的对朝鲜政策是防止俄国扩张的，就可以得到英国的支持。同时，英国为了防止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俄国大举向东方扩张，又想要利用日本，便答应同日本进行修改条约的交涉。日本利用英俄矛盾，在提出同英国修改条约的同时，推行侵略朝鲜的意图，一方面是向列强显示日本的国力，另一方面也企图参与对朝鲜的争夺，形成英俄日三角关系。

青木任外相后，立即制定一份有关修改条约的《青木备忘录》，要点有：

1. 取消大审院任用外国法官的约定；
2. 撤销有关调查、编制和公布法典的约定；
3. 不动产所有权在领事裁判权尚未废除期间，不让予外国人。

《青木备忘录》和大隈修改条约方案相比，在确立国家主权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这时，在日本国内高唱充实军备扩张国权的国民协会，批评政府软弱，并反对自由党接近政府，这就以扩张国权的强硬外交主张助长了反政府的联合活动。

1892 年，陆奥宗光任外相后，由于日本的国力增强，态度逐渐强硬，提出了完全平等的修改条约方案，分别与各国谈判，着重拉拢英国。

1893 年 12 月，政府抨击在野党的对外强硬理论是攘夷主义，并解散了众议院。对此，1894 年 3 月，东京都内的 10 家报社、杂志社的记者开会批判政府的解散是反立宪的，高喊“责任内阁、自主外交”的口号，要求对欧美列强平等地修改条约。

1894 年 5 月召开第六届议会，自由党也参加了对外强硬派，通过了抨击政府解散议会的决议案，并通过了追究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失态的责任的上奏案，进行追击。于是，政府在 6 月 2 日又解散了议会。国内政局的混乱，使统治者恐慌不安。1894 年 3 月 27 日陆奥宗光在致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写道：

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如不表明不构成败如何定要做出某种惊人耳目的事业，则无法挽回此骚扰之人心。而所谓惊人耳目之事业，又不能无缘无故掀起战争，（不久朝鲜发生的甲午农民战争，给日本带来了这种机会——编者）故唯一目的为修改条约一事（中略）。

以《青木备忘录》作为日英谈判的基础，经过 3 年多的折冲搏刦，互有让步，终于在 1894 年 7 月 16 日签订了《日英新约》，即《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日英新约》的主要内容是：废除治外法权；提高部分税率；开放内地等。把片面的最惠国条款改为相互对等，日本收回了法权和部分税权，大致摘掉了脖子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

用青木的话说，“我方要求无一不被接受”。英国政府如此慷慨，原因何在？日本另一个外交官榎本武扬一语道破：与其说是由于春木周藏的手腕，不如说是铺设西伯利亚铁路计划所造成的亚洲近况，使英国有所“深省”的结果。

陆奥宗光外相接到青木从伦敦打来的签约成功的电报，欣喜若狂。他在《蹇蹇录》中写道：“我立即斋戒沐浴，进宫觐见皇上，奏上日英条约签订完毕。”随后向青木公使发出如下电报：“天皇陛下嘉许贵公使获得成功。余代表内阁同仁向贵公使致贺。贵公使可向外交大臣就缔结新条约事对英国政府之好意表示感谢。”英国政府在向青木表示祝贺时说：“此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远比战胜中国大军更为有利。”

日本统治者说，这个条约使日本“一扫 30 年来之污辱，跃身于国际友谊伙伴之中”。其后，各国也相继与日本签订了新约。1899 年，日本取消了外国人在日本的居留地。1911 年，日本完全恢复了关税自主。

《日英新约》的签订，在日本外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说明日本已经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它既标志着基本上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又完成了发动中日战争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日英新约》签订后的第 9 天，日本就打响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

日本终于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推行“弱肉强食，强权政治”的路线，走上了侵略别国向外扩张的道路。

第 10 章

复仇的武士

沉重的金饭碗

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在幕藩体制存续的历史过程中，曾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在推翻幕府统治、创建明治新政府的社会巨变中，武士阶层的很大一部分人以藩兵的身分参加了讨幕战争，并充当主力军。

当明治新政府坐稳江山之后，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作为历史大舞台的过客，该是它告别舞台和观众的时候了。

明治初期，日本社会中每 16 个人当中就有 1 名佩刀武士，人数达 189 万 2 千人。在日本著名的萨、长、土、肥四大雄藩之中的萨摩藩，武士人数高达全藩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往的武士是以将军和大名为衣食父母，通过领取数量不等的秩禄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封建主从关系。秩禄不但成为武士阶层的生计来源，而且也被视为武士所特有的一种特权。秩禄分家禄和赏典禄两种，前者是世袭的，也叫永世禄，后者又分终身的和有年限的，故而又称终身禄、年限禄。“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后，原来的主家不再发给家禄，明治新政府接手承担了这一庞大武士阶层的衣食包袱——秩禄。

而新生的明治政府却又囊中羞涩，1871—1872 年每年岁出总额的 30 % 要作为家禄支付给武士们，而每年陆军军费的开支尚不及其一半。明治政府的副总裁岩仓具视深切地感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在 1870 年 8 月所草拟的《十五条意见书》中，郑重提出：“应变革华、士族及卒家禄之制。”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九也有同感，他认为：

今欲重得文武之真材，以建树国家，唯有以历来（士族）所领之家禄而养之。此外别无财源。……故当务之急，在裁减天下士族之旧禄以养新兵……裁无用补有用，损有余补不足。

看来，数目惊人的家禄已使新政府步履维艰，难负其荷，武士们将不得不放下这只捧了几个世纪的金饭碗，来重新筹划衣食之计了。

明治新政府的各项改革全面铺开之后，武士们才发觉自己并未在这场社会大变动中获得什么实际利益，家禄成为武士们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财产，且被政府不断削减。

素有“铁血宰相”之称的大久保利通当政后，充任内务卿，成了全国警察和实业界的总头目。他希望卸下新政府身上的沉重财政包袱。

1873 年 12 月 27 日，大久保政权开始着手剥夺武士阶层的财产。理由是，“今查有薄禄者因无资金难遂其志，故特许家禄、赏典禄不满 100 石者奉还家禄”，政府发给偿金，享有世袭禄者一次发给 6 年份禄量；享有终身禄者，一次发给 4 年份禄量。一半支付现金，一半支付家禄公债证书，公债利息为 8 分。同时，政府希望狂做的武士们放下架子，为了生计自食其力，可以去从事农业和商业。

一年以后，新政府再次宣布准许 100 石以上的华、士族奉还家禄、赏典禄，但在同一天太政官第 119 号“资金发放规则”中又规定：奉还家禄所支付的现金只限于 50 石禄量之内，其余一律支付秩禄公债。

尽管大久保等人竭力推行的家禄奉还长达一年半，但只是雷声大，雨点

小，成效甚微。遵从政府号召而奉还家禄的武士人数，仅及士族总数的三分之一，135883人而已，得到整理的家禄也不过是家禄总数的四分之一。

尤其是奉还家禄的武士，多是在一些实力软弱的小藩、弱藩，如会津藩、桑名藩等。而那些西南雄藩对新政府的号召根本就未予理睬。例如，在萨摩、佐贺、山口、熊本等强藩，响应政府奉还家禄的武士寥寥无几。整个萨摩藩也只有区区25人奉还了家禄。尽管如此，新政府发给士族的公债额也达1656万日元，发给的偿金为1932万日元，公债和偿金两者之和高达3588万多日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靠举借外债来支付的。而且，家禄奉还名义上是希望藉此使武士们能自寻生计，但客观效果并不理想。1875年3月，大久保在谈及家禄奉还的结果时，指出：

其中，虽有稍稍开始积蓄固定财产者，然十之七八，迷恋于眼前之浮利，一蹶不振，迅即陷入穷困。

家禄奉还，从表面上看是由政府发放产业资金，鼓励士族就业，但实质上是对武士家禄的一种大规模收买。政府进行这种收买的目的是用金钱来换取武士手中的财产特权。

但如此大规模的收买活动，必须有充足的财力作为保证，而明治政府本身并不具备这一能力。上面所进行的收买，使新政府囊空如洗，只得靠拆借外债来应付。

这样一来，家禄奉还就难以为继了。一方面，雄藩的武士们不愿奉还家禄，放弃祖宗传下来的财产特权；另一方面，新政府也无钱收买武士的家禄。家禄奉还之事至此似乎走入死路。

大久保足智多谋，非常善于处理棘手的问题。他在1875年9月7日以太政官138号布告的形式，隆重推出“金禄制”政策，即以货币俸禄取替禄米，停止献出家禄和赏典禄，全部废除禄米额的称呼。以1872年至1874年三年间日本各地米市行情的平均价格支付金禄。金禄制的实施成为大规模赎买家禄——发授金禄公债证书的前奏曲。

佐贺藩士出身的政治家大隈重信，是发授金禄公债证书的积极鼓吹者，他在1876年3月上书大政大臣三条实美：

经反复熟议，痛感当务之急在废除华、士族之家禄、赏典禄。今幸已废除禄米之称而改授金禄，且又对赏典禄得税，故当此之良机应断行废禄之策。即将华、士族平民之全部家禄、赏典禄皆视作政府之债务，以30年偿清，为此，应再发授金禄公债证书……。

在大隈等高官要员们的鼎力相助之下，大久保政府痛下决心于同年8月5日断然颁布《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条例规定：拥有1000日元以上的高额家禄一次发授6—7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5分；拥有100—1000日元者，发授7—10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6分；拥有20—100日元者，发授10—13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7分。以上公债证书的零头都以10分利支付现金条例规定都以公债一次性支付完毕，今后不再支給。公债的本金自发授后第6年开始抽签偿还，30年内偿清。

这次对武士家禄的大收购活动，可以说进行得非常彻底。根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领取金禄公债证书的华、士族共计313264人，几乎包容了日本社会内所有家禄持有者在内，约占士族总数的3/4，金禄公债总额高达17383万日元，此外再加上支付现金73.4万日元，合计为17456万日元。历经此次家禄大收购活动，武士阶层手中的铁饭碗被砸碎了，武士所拥有的食禄特权被取消，在日本社会中沿袭数百年之久的庞大的武士食禄阶层作为封建等级

被最终消灭了。

穷途末路的武士

明治新政府大规模收购金禄公债的举措，使原本就贫富不均的武士阶层产生更深刻的分化趋势。

发授金禄公债后，所有武士都必须怀装一纸公债证书去独自找寻谋生之路，其艰难的前景令人堪忧。武士们面对眼前这个日益陌生的社会，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必须抛弃世代所从事的职业，选择一个除武士之外的任何一个职业，或工或农，或商或吏或僧。少数武士投亲靠友，依然可以重操旧业，为新政府当御亲兵或警察等。然而，更多的武士平生以武士道自律，整日专注于刀光剑影之中，面对日益为艰的生计，手中年平均仅有 30 多日元的金禄公债利息收入，大多陷入贫困的境地。平均 500 多元的公债只能从事些小本经营，由于大多数武士不善理财，不会经营，最终导致破产成为贫民无产者。

一部分武士迫于生计，不得不屈尊给从前自己冷眼相看的富有商人当养子。当然，武士给商人做养子之举，早在德川幕府末期就已屡见不鲜，那时商人收武士为养子是为了获取武士的名义，“凡收养子一人，而予以名义上的武士地位，年收米 100 石者，取金 50 两，急收养子取 70 至 100 两。”另一部分武士则不得不去做纸、绳、络糊灯笼、削牙签等十分低贱的工作，以便养活自己和家人，还有一部分武士沦为雇佣劳动者。

在日本冈山县，无职业、无储蓄之众士族云集一处，不论土工、搬运，以力役为人雇佣。新潟县高田地区的士族境遇也大体如此，人伙 400 余名中有 70 名为高田士族。

没落的武士不但本人要出卖劳动力，其家人子女多也不得不抛头露面外出打工。官营富冈缫丝厂开工时曾从东京招收百余名缫丝女工，基本上都是原德川幕府武士的子女。1878 年，这个工厂有正式住厂女 1371 人，其中 148 人是武士家庭出身。可见，这一时期没落的武士出卖劳动力、子女外出做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失去了往日的尊严的武士们对新政府的仇恨情绪正在逐渐膨胀。

当然，武士阶层的没落、分化也成就了一批新的有产者，如金融家、企业经理、大地主。明治政府为了收购武士的家禄，先后支出近 5 亿日元巨额资金。这笔巨额资金大都集中在皇族、旧藩主、公卿和寺社领主手中。政府在政策导向上鼓励拥有高额金禄公债的华、士族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使这些人利用巨额“收购金”一跃而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企业主，向资产阶级转化。个别华、士族则另辟蹊径，用巨额公债购买大片土地，一变而为新兴的地主。

1876 年 8 月，明治政府对原国立银行条例进行修改，取消了以金银兑换银行纸币的限制，使巨额金禄公债证书转化为银行资本成为可能。而当时能拥有巨额公债的人，只能是那些人数极少的皇族、华族而已。如萨摩藩藩主岛津家、长州藩藩主毛利家、加贺藩主前田家的金禄公债都高达 100 万日元以上，仅藉此就足以成为百万富翁，而且每年公债利息也不下 5、6 万日元。500 户少数士族手中也拥有数目可观的公债，如加贺、纪伊、萨摩、尾张、肥后、长州、筑前、艺州、肥前、德川将军家等旧诸侯，原可领取 10 万日元

以上的俸禄，按 5 年份和 5 分年利计算，就可领到 50 万日元公债券，每年可获 2.5 万日元的利息。他们也有能力投资于工业、银行业和其他行业，如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在 1876 年兴办了大阪汇兑局，该局最初隶属于三菱会社的海运业，以抵押方式向贷主提供贷款，到 1880 年独立营业，称三菱汇兑店，凌驾于其他国立银行之上，全国各银行货币兑换比价皆以三菱汇兑店为基准。1877 年设立的第十五国立银行，号称拥有最雄厚的资金 1782 万日元，全部都是由金禄公债转化而来的，484 名集资者皆为华族，故而该家银行被人称之为“华族银行”。以此家华族银行建立为契机，华、上族纷纷手持巨额公债拥入金融业，一时间所谓“国立银行”层出不穷，其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如 1876 年设立了三井银行，1879 年设立安田银行，1880 年设立川崎银行等等。到 1880 年时，日本已有 163 家国立银行，资本总额为 4300 万日元，其中华族投资为 1851 万日元，占其总额的 44%，土族投资为 1341 万日元，占其总额的 31.8%，二者相加，约占其全部资本总额 75.8%。

拥有巨额公债的人，除华族和 500 家士族之外，部分富有商人高利贷者利用现金从大批破产没落的武士手中套换了数额相当可观的公债，这部分公债多也转化成为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据统计，1878—1885 年，日本大部分县士族手中的金禄公债证书减少了一半，有的甚至减少了 90% 之多。《宫崎县志》记载：“从 5000 元以上的大宗公债所有者都是伊丹、尼崎、西宫等酿酒业主和商人来推断，金禄公债从贫困士族手中流失，集中到商人和高利贷资本那里去了。”显然，金禄公债的推行，成为日本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一项重要渠道。明治政府采用发行（金禄）公债的方式来废除封建武士的俸禄，使旧封建领主阶级向近代产业部门投资，从而堵塞了他们向土地投资直接转化为地主的道路，这不失为一种高明的做法。

如果说秩禄赎买使日本武士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的后，那么征兵制的推行和《废刀令》的颁布，则使武士阶级又失去了世代相袭为业的军人职业和武士的标志。对新政府早已心存不满的武士们，便将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作为发泄怨恨的惟一手段了。

1868 年底，伊藤博文就批评新政府说，“朝廷之兵权，仅有虚名”，主张参照西洋各国兵制进行改革，以便“内制不逞，外对万国而不耻也”。尤其是刚刚遍访欧美各国兵制归来的兵部大辅山县有朋等人也随后联名建议政府“解除天下藩兵，收束天下兵器”，实施征兵制。

在伊藤、山县等人的推动下，明治新政府在 1872 年 12 月 28 日向全国颁布《征兵告偷》，称：

我朝上古之制，海内皆兵。有事之曰，天子为帅，征募堪服兵役之丁壮，以征不服。解役归里，或农或工，或为商贾，本无后世佩带双刀称作武士，以至坐食抗颜尤甚，杀人而官府不问其罪者。……然大政维新、列藩奉还版籍，至辛未之岁（1871 年），远复郡县之古，许世袭坐食之士减其禄，脱刀剑，四民渐得自由之权，是乃上下平均，人权齐一之道，使兵农合一之基地。至是，士非从前之士，民非从前之民，均系皇国一般之民，故报国之道也当本尤其别……乡长、里正当厚奉此意，依照征兵之令谕说庶民，使知保护国家之大本也。

征兵令的实施，改变了日本社会传统中只能由武士充任军人的旧体制，近代军制在日本确立了，日本仿效法国建立了陆军，仿效英国建立了近代海

军。

1876 年明治政府又根据山县有朋的建议，颁布了《废刀令》，规定禁止在穿着正式礼服以外带刀，迫使本已穷困潦倒的武士摘下自认是地位和身分象征的佩刀，不能再以此傲视社会。这使武士感到新政府的做法已愈来愈难以容忍，以刀泄恨的心态复发。

1874 年 2 月，佐贺藩下级武士出身的新政府参议江藤新平，因在征韩论争中败离京城而重返佐贺县，成为那里武士们组织的征韩党领袖，拥众 3000 余人。鉴于县内武士阶层对新政府的不满和本人宦海仕途的失意，率先彼士族推举发动了佐贺之乱。叛乱的士族抢劫了小野商会，击溃政府军，以三千之众攻占县政府。江藤新平本以为天下士族皆有反叛之心，自己登高一呼必然会有多方响应者。江藤认为：“西乡在鹿儿岛，板垣在高知、九州、四国的士族会呼应而起。这样的话，推翻政府是容易的。”但响应者寥寥无几，而明治政府却依靠刚筹建的近代陆海军，由大久保亲自挂帅坐镇福冈，陆、海军齐头并发，猛烈围攻武士占据的佐贺城。叛乱武士作鸟兽散，江藤新平难逃法网，被枭首示众。

佐贺之乱仅仅是拉开了武士叛乱的帷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1876 年 10 月，熊本县武士在太田黑伴雄的领导下，聚众 200 余人，为发泄对政府欧化政策和《废刀令》的不满，解脱贫困的生活境遇，高喊“攘夷”和“神道政治”的口号，冲入镇台府纵火行凶，熊本镇台司令长官种田政明少将和士兵多人被杀。他们还攻打熊本县府，杀害政府官员。当地政府的镇台兵起而镇压，击毙太田黑伴雄，平息了这次熊本敬神党之乱。

两天之后，秋月藩士族在秋月党的策划下，借佐贺、熊本武士叛乱之机，举兵响应。由旧藩士矶淳、宫崎车之助两人为首的 230 余名秋月武士，攻打丰津，试图煽动丰津士族起而响应，被小仓镇台兵阻击。叛乱武士被迫退入深山密林，负隅顽抗。宫崎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余者大多被官军捕获。

10 月 28 日，长州藩藩士、前政府参议前原一诚对政府颁布的《废刀令》极为不满，为呼应秋月藩的武士叛乱，也率众占领了明伦馆，企图攻打县政府，被当地镇台兵击溃。前原一诚落荒而逃，11 月 5 日在岛根被捕处死。

一连串士族叛乱事件的出现，表明封建残余势力士族阶级仍是明治政府建国大业的障碍。士族叛乱的相继失败，也证明伊藤、山县等人筹划建立起来的近代军队开始发挥作用。

“征韩论”风波

日本与朝鲜之间相隔对马海峡，自古以来，交往密切。朝鲜半岛一直充当着大陆中华文明传入岛国日本的中转站作用。

而日本国的统治者始终对朝鲜半岛抱有野心。公元 7 世纪中期曾有白村江之战，这是日本插足朝鲜半岛的一次失败性尝试。丰臣秀吉称雄日本列岛完成统一大业后，也挟余威两度入侵朝鲜半岛，最终也未得手。

日朝两国在长期相邻而处的过程中，彼此间外交关系较为紧密。

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通过对马藩主维系与朝鲜的邦交。日本发生政权巨变后，明治天皇在给朝鲜国王的国书中，违反旧例和格式，在国书中使用“皇上”、“奉敕”、“平朝臣”等字句，俨然以朝鲜的宗主国自居，朝鲜政府对此大为不满，拒收国书，并在与日本进行贸易的釜山草梁的“倭馆”

门前张贴文告说：

彼（日本）虽受制于人而不耻、变形易俗，此不可谓日本之人，不许其来往我境。所乘船只，若非日本旧样，则亦不许可入境。

从这次两国外交纠纷中，一方面表明日本有以上欺下之意，另一方面也说明朝鲜政府封闭、保守，对日本国内出现的政治大变动尚不理解。

到了1873年10月，日本国内征韩论骤然泛起。日本政府中也有人以朝鲜“无礼”、“侮日”为口实，提出征韩论。政府成员中围绕着是否征韩分裂成两个阵营。被没落的武士阶级视为精神领袖的西乡隆盛是征韩派的领袖。旧武士阶级试图利用这一机遇，迫使政府采取军事行动。这样一来，没落的武士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尚武精神和能征惯战的本领，重新恢复武士在社会中的领袖地位，同时也可以使破落的武士们摆脱目前在国内的没落处境。

西乡在征韩派中最为坚决。他提出先派遣问罪使臣赴朝，他本人愿亲自担任问罪使者，桐野利秋愿充当副使。如果使臣被朝鲜政府杀害，日本可藉此派遣远征军征讨朝鲜。副使桐野利秋的表白可以说明西乡等征韩派的真实用意，即“振兴皇国，与各国骄驰，使我独立于宇内，惟有航渡海外，战斗攻伐。为此应跋涉于中国，朝鲜，……掠而取之，以立入侵欧亚之基。”

政府成员中以证韩论为线，分成两大阵营。大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外务卿副岛种臣等人属于强硬的证韩论者；右大臣岩仓具视，参议木户孝允、大隈重信，大木乔任，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等人则是反对派。双方争执不下，各不相让。

木户强烈反对出兵征韩，他认为，“内地，本也。外属，末也。先末后本，决非上策”；素以权术见长的大久保也随声附和，反对“征韩论”，他说：“凡是经略国家，保其疆土、人民，皆不可不深谋远虑。故而，进取退守，必当见机而行……是为度其轻重，鉴其时势而有定期也。”

由于当时在日本国内，西乡等“征韩论”一派把持留守政府，岩仓具视等人正在西欧各国考察，“征韩论”占据上风。1873年8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遣西乡为赴朝问罪使，天皇已御笔批准，但须等岩仓大使回国后正式付诸实施。大久保应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之召，5月下旬由德国提前回国，但因孤掌难鸣，不得已到箱根洗温泉去了。7月间，木户孝允也应召提前回国，虽四处奔走呼号也无法扭转局势，万般无奈只好抱病回家，单等岩仓具视归国后再做打算。

正当西乡等“征韩派”认为大局已定即将驾舟出使问罪之际，9月13日，岩仓一行匆匆返回日本。

岩仓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木户孝允联手举荐大久保就任参议一职。因为不是参议，就没有出席内阁会议的资格。为了增强内阁中反西乡派的实力，为人机敏、精于权谋的大久保入阁乃是当务之急。西乡派也看出岩仓等人的用意，为抵消大久保入阁的影响，立即照葫芦画瓢在大久保入阁第二天也将“征韩派”主将外务卿副岛种臣拉入内阁，出任参议。

“征韩派”和“内治派”针锋相对的冲突，发生于10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

会议伊始，岩仓和大久保就提出先内治、后征外，理由有七条：

一、（天皇陛下）亲政以来，百度更革，士民失业者多，或误会命令，或怀疑增税，稍有变动，则不免流血。今若有可乘之隙，安能保其无变动耶？

二、政费多端，收支不能相抵，若对外战争，陷于旷日持久，自不能不加重赋敛。赋敛

加重，民怨即生，纸币即须多发。纸币增发，物价即涨，外债不能不举。外债一举，则偿还无术；

三、振兴诸官事务，以谋富强，其收效须待数年之后。今若兴兵征伐，百事势须中止，前效尽废；

四、输入超过输出，存金已见外流。今若使壮丁役于外，老弱困于内，势再不能制造物品，以贵贸易，此外又须自外国购置船舰兵擻，日益耗用财纲，以至于上下困顿；

五、外国可虞者，首推俄国，彼有南进之意，为天下所熟知，今若与朝鲜交兵，是不啻鹬蚌相争，予俄国以渔翁之利；

六、次于俄国者为英国。我国负英国之债已多，若不能偿还之，彼必以此为口实，干涉我内政，沦我而为印度之续；

七、我国与各国所订之条约，不能获得对等之地位。如英法两国悍然驻兵于我地，视我如属国，然我不以此为耻，反责朝鲜之无礼，是忍大而不忍小，察远而不察近者也。

大久保这番入情入理的慷慨陈词并没有动摇西乡等人的征韩决心。情绪激昂的西乡隆盛认为，如此国家大事，刻不容缓，坚决主张即刻出使朝鲜。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会场气氛非常紧张之时，大隈和伊藤博文因与一外国人在横滨有约会，起身想请先退席。西乡巨眼一睨，厉声斥责道：“值此商讨国家大事之时，以与区区一外国人有宴会之约而退席，何以对国家？”大隈和伊藤慑于西乡的气势，不得不悻悻然退回座位。

当天的内阁会议未能取得一致，决定次日开会再议。

10月15日上午10点，内阁会议继续召开。西乡仅提交了使韩意见书，而不出席会议，并以若主张不被通过则辞去参议之职相威胁。

大久保在会上说：“外征一起，必然加重赋税，乱发外债、纸币，国民将加重其负担，恐将发生大骚乱。所以，应暂缓征韩，振兴国内产业，整备武器和军舰。”强烈反对西乡的“征韩论”。

但与会的大多数参议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都表态支持西乡的主张。主持会议的三条实美左右为难，大久保坚持己见，并表示若不采纳他的意见也将断然辞职，说完拂袖离去。考虑再三，三条认为西乡的去与留，对政府关系重大，便接受了西乡的意见书。

17日，内阁第三次开会讨论征韩事宜。三条和西乡等“征韩派”参议与会。岩仓未参加会议，大久保、木户和大隈等人则提出辞呈。

会议完全被“征韩派”所控制，他们看来稳操胜券。西乡请求三条实美将阁议立即上奏天皇批准，但三条面对大久保等人的辞呈面露难色，请求西乡延缓一天上奏。延续这一天，对两派来说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优劣转化的一天。

当天夜晚，三条走访两派领袖岩仓和西乡，希望弥合双方的矛盾。结果，双方互不相让，三条快快而回。第二天早晨，三条称病卧床，无法将阁议上奏天皇。次日，大久保前去探病，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三条）完全是一副精神错乱的样子。”

政府内部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使许多人束手无策，而足智多谋的大久保却认为扭转败局的时机已到。他立即劝说萨摩藩出身的宫内少辅吉井友实，动员天皇去三条宅邸探望病情，然后请天皇任命岩仓具视代理太政大臣。

20日，岩仓接受任命，成为内阁领袖。这样，当22日西乡等人要求岩

仓执行三条实美未病时的阁议时，岩仓反驳说，“自己不仅仅是三条实美的代理，是代行大政大臣之责。所以，自己的意见也将一并上奏天皇，由天皇圣裁。”

第二天，岩仓具视上奏天皇说：“维新以来，才四五年，国基非坚固也，政治非完备也，虽治具似备而警虞难测，方今之时未可轻图外事也。”天皇在敕旨中称：“整理国政，培养民力，以期成功于永远。”

在岩仓发表天皇圣裁结果的内阁会议上，面对难以挽回的败局，西乡痛心疾首他说：“长袖者（指岩仓等反对派），误大事。”话毕，挥袖而去。随即，西乡的辞呈被天皇批准，仅保留陆军大将职衔。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人也先后称病辞去政府中的职务。大久保等“内治派”完全掌握了政府大权，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明治六年十月政变”。

西乡独立王国的覆灭

鹿儿岛县所在地原萨摩藩，是日本西南四大雄藩之一，也是讨幕战争的主力。其原藩主监护人岛津久光是当时旧封建诸侯的领袖，对明治新政府的废藩政策和文明开化等政策极为不满。1872年明治天皇行幸鹿儿岛时，他向天皇提出14条建议，反对教育改革和文明开化，反对军制改革，反对四民平等和相互通婚等，希望重温往昔的封建时代。他对积极筹划改革的大久保、大隈等人颇有微词，曾暗中策划罢免大久保等人的官职，复请西乡归位，未能如愿以偿，也于1875年12月隐退鹿儿岛。

岛津久光虽名为萨摩藩王监护人，但鹿儿岛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其私人顾问西乡隆盛的手中。

1873年10月23日，西乡以患病为由，提出辞呈。“目前，苦于胸痛，不能坚守职位，呈请免除我的本职和兼职，对于我的上述请求，请予批准。”25日，天皇准其辞呈。

11月，西乡离开京城回到鹿儿岛，住在武村，自称武村之吉，开始过起垂钓，游猎的隐居生活。他在吉野台地的夺山，创立了吉野开垦社，占地50町步，种植稻谷和蔬菜。开垦社的客厅内悬挂着两个条幅：“力排当代智勇”，“唤起永世英灵”。西乡的心腹爱将桐野利秋，与西乡、大久保同为萨摩藩出身，在追随西乡辞官回鹿儿岛前夕曾密访大久保，劝说大久保：“为国家考虑应杀掉反对者（指西乡）。”大久保不为所动，说：“有异议的是我大久保。如果你有此决心的话，首先斩下自己的头颅。”

随即，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人也都辞去近卫军少将之职，追随西乡回鹿儿岛。由于这时期，近卫兵当中的将校、下士官多系鹿儿岛、山口、高知三县出身，其中鹿儿岛和高知县出身的官兵都支持“征韩论”，对西乡隆盛、桐野利秋、筱原国干三人十分崇敬。其他县出身的近卫兵也都久闻西乡之名，将西乡作为英雄豪杰来仰慕。为追随西乡等人而擅自离队的官兵人数很多，陆军卿山县有朋也无法制止，不得不奏请天皇予以准行。这样一来，大约有300余名近卫兵官兵陆续返回鹿儿岛，广大鹿儿岛民众对此颇感惊讶，相互之间纷纷议论。随之，又有300余名萨摩藩出身的警察官吏也陆陆续续回到鹿儿岛，足见当时西乡隆盛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力。

重返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希望远离政治权力的纷争，过一种超然物外的田园生活，没有打算在鹿儿岛建立士族的独立王国。

不过，离开京城的东西乡隆盛自回乡之时起，就被日本各地士族视为东山再起的希望之星。各地士族领袖纷纷前来鹿儿岛，希望拜访他。而西乡对此并不以为然，懒于接见这些心怀反叛之意的武士。桐野利秋成为接待大臣，全权处理络绎不绝前来的武士。

当 1876 年 10 月太田黑伴雄在熊本率领敬神党成员 200 多人发动反政府叛乱之际，西乡隆盛正在日当山温泉洗澡。鹿儿岛警察署长野村忍介匆匆前来通报叛乱的消息。西乡的答复是：“这大概是大野铁兵卫（大田黑伴雄）之辈所为，请赶紧回去稳定人心，以免发生动摇，勿使壮士之辈附和而轻举妄动。”

但日益贫困而变得一贫如洗的没落武士们，出于对西乡“无欲望、简易、朴素、不骄傲、不小看他人”等高尚品德的崇敬，仍一直视西乡为武士阶层的精神领袖。西乡确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感。

尤其是西乡回来后在鹿儿岛的城山亲手创建的“私学校”，已经逐渐成为西乡的私人卫队。西乡深请业精干勤而荒于嬉的道理，1874 年 6 月，他将陆续返回鹿儿岛的近卫兵组织起来，建立了名为“私学校”的军事组织，着手进行军事训练。除鹿儿岛外，各地还纷纷建立私学校的分校，专门招收武士家的子弟，学生总数约有 3 万人左右。

西乡为“私学校”制定的纲领是：“道同义协，暗中集合”，“尊王悯民为学问之本质”。凡入“私学校”的学员都必须写血书，要终身效忠自己的组织和伙伴。在学校里，既讲授孙子、左传、佛学，也传授西方文明，并派遣优秀的学生去法国和俄国留学。一时间，鹿儿岛县境内人人都以入“私学校”为荣，反之为耻。西乡将自己 2000 石俸禄全部作为“私学校”的经费。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是西乡的亲信，将县政公款拿出来充作学校的费用。在短短的几年间，所谓“私学校党”便彻底占据了鹿儿岛县从县令到区长、户长、警察官等军政要职。这些人对国政啧啧抨击、抵制，使本来割据气氛就十分浓厚的鹿儿岛，俨然成为化外之国。明治政府的政令已无法施及鹿儿岛。旧的封建制度和习俗依然保留着。

京城的大久保政权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得采取姑息、忍让的政策。

1875 年，大久保政府下决心将武士阶层的家禄由米禄改为金禄，全日本各县中唯有鹿儿岛仍实行米禄。大久保有心撤换鹿儿岛县参事课长等县署官员，结果县令大山纲良顽强抵制，使一向政令如一的大久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木户孝允对此极为不满，与大久保争辩长达数小时，木户愤愤他说：“今日诸县之中，最妨碍朝政者乃鹿儿岛也。”

鹿儿岛的武士们面对各地频发的武士叛乱活动，也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私学校”的教官、学员都主张，利用目前混乱的机会推翻现政府，成立以西乡为首的武士政权，一展鸿图大业。

当时在鹿儿岛孩童中颇为流行的一首歌曲，足以反映这些武士们的真实心态。

利欲随心又随意，
流浪士族遍天底。
租税罚金何其多，
乃因政事为私利。
布告朝令夕又改，
余之去向在哪里。

吾等并非喜英名，
谴责非道乃天理。
早已忍无可再忍，
武士自应尽其职。
救出万千苦难民，
献身征程在今日。

此起彼伏发生的各地武士叛乱，不但给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增加了诸多压力和烦恼，同时也多多少少地刺激着聚集在鹿儿岛的武士们，他们开始准备大干一场，重现昨日的辉煌。

1877年1月，熊本镇台向新政府禀报了鹿儿岛、熊本两县士族反叛的迹象。内称：众多武士挎刀穿行于闹市，以猎兔为名聚合于山谷中抨击朝政。

新政府的灵魂人物大久保虽远居京城，但从未敢放松对西乡隆盛和他周围武士群体的警惕之心。不过，他仍一厢情愿地认为：“有老西（西乡隆盛）在，只要其在名义上和口头上仍侍从前主张，就决不致有暗地起事之类的行动。西乡此种气质乃余所深知，故无需格外操心也。”为此，他本人特地修书一封托人转呈西乡隆盛。从鹿儿岛方面不断传回的消息，表明那里的局势正在恶化，变得难以控制，一向处事谨慎的大久保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1876年12月下旬，他派遣东京警察官中原尚雄等20余人，以回乡探亲的名义秘密地返回鹿儿岛，监视西乡隆盛等人的活动，伺机瓦解“私学校党”，削弱西乡的势力。

数月之后，形势突变。1877年2月上旬，中原尚雄等人行迹泄露，遭“私学校党”逮捕。酷刑严拷之后，“私学校党”令中原等人承认，返乡的目的是受大久保之命谋刺西乡隆盛。随后，印有这样内容的假供状，被“私学校党”散发到鹿儿岛的街头巷尾，蒙骗不明真情的民众。

此前不久，政府为了防止鹿儿岛的武士们铤而走险，决定从速将存在鹿儿岛陆军火药库的弹药，由“赤龙”号运往大阪贮存。结果，消息泄露，武器弹药被“私学校党”徒抢劫一空，武装叛乱的征兆日益明显。

1877年2月15日，西乡隆盛在士族兄弟和“私学校”学生的鼓动下，召集了2.5万多名武士，准备北上京城“诘问政府”。西乡本人则以“新政大总督征伐大元帅西乡吉之助”的名义，兴兵攻打军事重镇熊本城，西南战争的帷幕拉开了。大久保在得知西乡隆盛率兵反叛的消息后，立即表示：“实力曲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状，击鼓而讨之，无可非议。”陆军中将山县有朋迅即电令熊本镇台司令官谷干城：“务必誓死守住熊本城。”随后，明治天皇颁布征讨诏书：“鹿儿岛县暴徒擅自携带武器闯入熊本县境，目无国法，叛迹昭然。”新政府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元帅，山县有朋任征讨参军，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发兵5.8万人出兵征讨。日本海军调遣11艘军舰迂回侧应，表明政府平叛的决心。

应该说，西乡叛乱是明治政府自建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如果以西乡为中心的鹿儿岛“私学校党”哪怕得到一时的胜利，全国的反政府分子就会同时响应。可以预料，明治政府将处于濒临瓦解的事态。

来势汹汹的鹿儿岛武士部队，很快便包围了熊本城。叛军原以为小小的熊本城指日可下，没想到熊本城成为叛军北上途中一道无法逾越的难关。

熊本城守军在谷干城的指挥下奋力抵抗，充足的粮草、昂扬的士气、新式的军队，使西乡隆盛的叛军一筹莫展，久攻不克。万般无奈，西乡分兵攻

占了熊本城北面的战略要地——田原坂。田原坂坡陡崖高，易守难攻，可谓天堑绝地。“私学校党”的骨干精英都据守于此，以防政府平叛部队的攻击。

3月4日，政府军第1、第2旅团的士兵奉命围攻田原坂，以解熊本之围。但因叛军据险死守，政府军伤亡惨重。殊死的攻守战一直持续到3月20日，天堑田原坂终于被攻克，西乡叛军的阵脚大乱，纷纷溃逃。

4月15日，围困熊本城长达50余天的西乡叛军，在政府军海陆两面夹攻下，不得不撤围退兵。

随即，政府军在熊本、大分、鹿儿岛三县境内追剿叛军。

1877年9月1日，西乡隆盛率300余名武士退回鹿儿岛，固守城山。9月6日，政府军包围了叛军据守的最后阵地——城山。山县有朋致函身陷重围的西乡隆盛，敦促他放下武器下山投降。不知什么缘故，这封书信未能送到西乡的手中。24日，政府军发起最后的进攻，急如暴雨般的炮火轰炸，使西乡隆盛的腰部、大腿均中弹负伤，无法行走。绝望中的西乡决定剖腹自杀，其部将别府晋助奉命帮助他完成这一最痛苦的自杀过程。硕大的西乡头颅被别府晋助砍下后掩埋于土中，后被政府军挖出，连同西乡尸体一并葬于一所寺院中。

这样，持续近8个月的日本武士阶级最大规模的叛乱战争，以没落武士阶级的失败而宣告结束。连绵不断的武士复仇浪潮平息了。名噪一时的维新英雄西乡隆盛，也随着武士阶级的失落而成为一名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平息武士叛乱是建国征途中的一大胜利，西南战争后经济建设得以阔步前进。

第三编

帝国崛起 (1889—1905 年)

第 11 章

帝国发初

民权运动

明治初年，由于加紧推行各项资产阶级改革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整个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极大的变动，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贫困破产，对明治政府不满。大批封建武士因改革封禄制度，丧失了旧日的特权，不断发生叛乱。新兴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对藩阀专制的政治感到不满，要求改变藩阀官僚的专制体制，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这三种反对明治政府的力量，虽然阶级成分和阶级切身利益各不相同，但其反对明治政府的藩阀官僚专制、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权利这一点，却是一致的。这样，这几股力量汇合在一起，于 19 世纪 70，80 年代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要求自由民主权利的政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

1874 年初，因提倡“征韩论”而下野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以及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组成“爱国公党”，并于 1874 年 1 月 17 日提出《建立民选议院建议书》，攻击明治政府大久保利通政权是“有司专制”，要求设立议院。《建议书》成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导火线”。

在《建议书》遭到政府拒绝后，以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著称的大井宪太郎，批驳政府的反动言论，主张给人民以自由民主的权利。由于官方学者加藤弘之带头反驳，结果引起激烈论战，从而使民主思潮迅速扩展，兴起集会结社之风。

为了缓和形势，防止板垣一派与士族暴乱及西乡隆盛合流，明治政府下达了议院法规及有关地方议会等法令，又拉拢板垣入阁复任参议（后辞职），同时公布《新闻条例》和《谗谤律》等法令，以加强控制。但是，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继续发展。各地相继成立一些新的组织，如立志社、自助社。特别是 1875 年 2 月成立的爱国社，堪称是日本第一个全国性政党。

1877 年 6 月 9 日，板垣领导的立志社再次提出《建议书》，其文稿是由自由民权派的著名活动家植木枝盛起草的，它提出了“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口号，使自由民权运动从少数士族民权主义者的建议活动发展为群众性的请愿运动。

1878 年 9 月 11 日，以立志社为中心组成的爱国社在大阪召开重建大会。1880 年 3 月 15 日，在爱国社召开的第 4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派代表向天皇提出“请愿书”，要求召开国会。一年之中，各地前来东京“请愿”者几百起，代表群众 24 万人。

1880 年下半年至 1881 年，上层自由民权运动发展到高潮，各地的民权

派召开宪法研究会，草拟了宪法草案。已查明的民间“私拟”宪法就有 23 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嚶鸣社的宪法草案，交询社的私拟宪法草案，立志社的日本宪法希望草案和植木枝盛的日本国国宪草案。植木枝盛的最为激进，它主张一院制和联邦制，非常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新宪法。另一位民权主义理论指导者中江兆民，反对君主世袭，公开鼓吹“君民共治”、“地方分权”，甚至说“自主”的“主”，就是在“王”的头上钉上一个钉子。当时的形势使明治统治者忧心忡忡。岩仓具视担心会出现类似的法国大革命，连福泽谕吉也说：“民权论已完全变为颠覆论。”

政府首脑有鉴于欧美先进国家的革命历史，对于自由民权运动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并且制定了禁止集会的条例。同时，迫于形势，亦不得不考虑开设国会。

伊藤博文说：“当前世事的变化，乃宇内大势推动所致，非一国一州之事端。”

山县有朋说，“为了消除民心不信赖政府、不服从政令，不得不考虑。”

井上馨则说，“为了摆脱政府不能威服人心的危机，必须开设国会。”

伊藤主张将以华族、士族为议官的元老院改为上院，设公选检查官，以天皇的裁断确定采取渐进主义；山县主张设立由府县会议员选拔的咨询机关特选议会；井上说，应当先制定民法，同时设立足以对抗民选议院的上议院（由华族、士族选拔）。这些人对自由民权运动的不理解和怀有敌意，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连被视为“开明派”的伊藤也不例外。

1881 年 3 月，大隈重信提出了由福泽谕吉的门生太政官书记官矢野文雄起草的意见书，主张在本年内制定宪法，1883 年初开设国会，采用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制，这和其他参议的意见大不相同。岩仓和伊藤看过大隈的这个意见甚为惊讶，认为“这是把君权抛给人民的东西”，从而怀疑大隈可能与福泽及其系统的民权派暗中有所勾通。

大隈重信如此“急进”，其目的是要掌握制宪之主导权，凌驾于萨长藩阀之上。其后台则有以福泽谕吉为中心的“交询社”及三菱财阀。大隈又指使他所控制的《邮便知新闻》揭发了“盗卖北海道官产”事件，打击萨长藩阀。报纸对政府进行激烈的攻击，甚至连“穷乡僻壤的黎民百姓”都谴责政府不公平，致使政府感到忧虑。假如民权派乘此时机以政府失政为口实主张开设国会，说不定会造成革命的形势。特别是政府内部分裂的危险，和首都居民开始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使政府首脑惊恐万状。

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岩仓、伊藤等迅速决定以君主主义普鲁士宪法为模式来制定宪法的基本方针，同民权派所依据的英法式宪法相对抗。同时，在 1881 年 10 月 11 日，天皇御前会议决定，罢免大隈重信的参议职务，被视为大隈派的河野敏谦、前岛密、北畠治房、矢野文雄等自由主义派官僚也一齐被免职。这次政局变动被称作“明治十四年政变”。同一天，明治政府决走停止出售北海道官产以逃避政敌的攻击。“政变”次日，天皇下诏，应允于 1890 年召开国会，宣布宪法由天皇“钦定”，主权属于天皇。

这个诏书既是对民权派斗争的“让步”，也是对民权派的一次进攻。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加紧进行镇压，强行制定钦定宪法。首先于 1882 年 1 月颁布对军人的敕谕，严戒军人干预政治，排除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并使其发挥“王室爪牙”的作用。

2 月，由三大臣联署上奏，明确表示实行参照各国宪法的立宪制，皇室

财产与国库分开，置于国会讨论之外；振兴将来组织上院的华族子弟的教育，对位于人民之上的士族以安抚劝导；修改了集会条例，对报纸实行严格取缔。岩仓建议三条太政大臣停开府县会，还禁止府县会议员以有关会议事项同其他府县会议员联合开会或互相通信。元田永孚向文部卿传达贯彻儒家思想教育方针的“圣谕”。东京大学总长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不允许再出版，而出版其批判天赋人权论为妄想的《人权新说》。

以这样的反动潮流为背景，伊藤博文于1882年3月为考察宪法到欧洲去了。伊藤留欧3个月便掌握了制胜自由民权派的理论和手段，他满怀信心他说：“充分确立了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至旁落的大道理。”

自由民权派没有看清政府首脑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所抱的决心和企图。在预定召开的国会期成同盟大会还没有召开的时候，仅由到京委员在1881年10月2日突然决定改开大日本自由党成立大会，月末建成了以板垣退助为总理的自由党。在自由党首脑心目中，承认钦定宪法已是既定事实，而自由党是准备接受钦定宪法的政党。

被看作是自由党别动队的有立宪政党，它声称“并不是为了议论有关政治事项而结社的”。此外，自由党系的九州改进党，只是个联络组织。

1882年4月，由大隈重信信任总理建立了立宪改进党，明确地打出了与自由党的急进主义相对立的渐进主义旗号。同以国会期成同盟为基础的自由党相比，该党从一开始组织力量就很弱小。

为了同民权系的政党相对抗，1882年3月，以政府党自命的立宪帝政党成立了。在创立过程中，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田显义等曾经给以支持，但他们并不想积极参与政党，随着他们的撒手，党势也就萎靡不振了。

对自由民权派的首次大规模镇压是福岛事件。福岛县是自由党的有力据点，福岛县知事三岛通庸曾经说出以征伐自由党为自己使命的豪言壮语。他强征民夫筑路，违者没收家财。自由党员河野广中（时任县议会议长）拒不同意此议案并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但遭到镇压。河野广中等400人被起诉，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拷问致死。福岛事件给予会津6郡的民权运动以毁灭性的打击，县会的斗争力量完全丧失。

自由党中央对于会津的斗争不仅没有给以组织上的领导和支援，而且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和常务议员后藤象二郎以考察欧美立宪政治为名出访欧洲。他们出国的旅费是由三井财阀出的，这是伊藤博文的阴谋。后藤象二郎与受伊藤指示的井上馨、福冈孝弟之间确有使板垣脱离自由民权运动的密谋。自由党内有人反对在发展党的重要时期党魁出国，国友会系干部因此退出了党。更为毒辣的是，伊藤又策动立宪改进党揭发板垣出国旅费的出处。这样就使两党相互攻讦。立宪改进党系的报纸所进行的批判，又遭到了自由党方面的报复。自由党攻击大隈和改进党接受了三菱的钱，对三菱的“暴富”声称要“治服海怪”，对改进党的“无节操”则叫嚷“消灭伪党”。正当福岛事件以后政府镇压加紧之际，自由民权运动却衰退了。声明解散的自由党系政社有13个，改进党系政社有15个。这样，上层自由民权运动被瓦解。1884年10月29日，自由党于成立3周年纪念日宣布解散。

一些平民出身的青年自由党员则逐渐与劳动群众接近。1881年6月，柴田浅五郎联合农民约3000人组成立志社，提出“救世”口号，因策谋暴动而被捕。1882年5月，樽井藤吉在佐贺县组织东洋社会党，主张“以平等为主义”，“以社会公众最大福利为目的”。成立一个多月即被解散，次年1月，

樽井被捕判刑。1882年6月，据警视总监调查：高知县一县，有自由民权团体24个、领导人58名、会员3000人。还有“力役自由党”，党员150多人。自由民权运动转入下层，其群众多为城市无产者或贫苦农民。其骨干大多是青年激进自由党员。

1884年5月，群馬县青年自由党员日比逊、汤浅理兵等集结贫苦农民约3000人，计划乘中山道铁路高崎车站通车典礼之机，逮捕政府官员，实行革命。起义群众集结于妙义山麓，被镇压。

1884年9月，青年民权主义者河野广体（河野广中之侄，曾参与福岛事件，当时15岁，因未成年而免刑）等计划乘栃木县厅落成典礼之机杀死县知事三岛通庸（时已调至栃木县）。聚集16人，据茨城县加波山起义，号召“推翻自由公敌之专制政府，建立完全的自由立宪政体”。因事机不密，被发觉，失败后7人被处死，其余被判刑。

1884年10月30日，秩父（在埼玉县）自由党员井上传藏等与“困民党”万亲人结合，组织“革命军”，于1884年11月1日武装起义，称“自由自治元年”，其口号有：借款分40年偿还，村费减半，不负担学费，修改征兵令以及要求减轻地税、开设国会等。计划先进攻当地警署兵营，再进攻东京。这是下层自由民权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斗争。起义领导人田代荣助原系“旧家”，骨干分子有当地“户长”。

1884年10月，自由党人村松爱藏等受俄国民粹派思想影响，图谋策动名古屋镇台士兵及贫民党起义，未成被捕。

1884年11月，自由党员奥宫健之等策动士兵起义未成，3人被处死，20人被判刑。

1886年7月，静岡的自由党人策谋暗杀诸大臣，被捕百余人。

以上这些下层自由民权运动，虽带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色彩，往往采取军事冒险或恐怖活动，表现了幼稚性，但却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光荣革命斗争传统和民主要求。

1887年，已经销声匿迹的“上流民权”运动忽然活跃。当年8月初，一些旧自由党员和改进党员举行游行，支持前农商务大臣谷干城（土佐藩出身），反对外务卿井上馨在“修改条约”问题上的屈辱方针。认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任用外国人法官以及制定法律要经缔约国家承认，有伤国权。外务省翻译局次长小林寿太郎联合民间的国粹主义者掀起了反对浪潮。结果1887年9月，井上辞职，修改条约的交涉中断。

自由民权派认为此时是挽回势力的好机会，批评政府的对外方针软弱，一味地诉诸国民的国家主义意识。10月，后藤象二郎召集各民权派的代表，号召把腐败已极的旧空气变成新鲜的空气，使同胞进而把独立不屈的国旗飘扬于海外。8月12日，板垣退助提出长篇意见书，要求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10月30日，已经“弃政从商”的旧自由党首领后藤象二郎也集结力量，组织“丁亥（1887）俱乐部”，号召旧自由党人和改进党实行“大同团结”，开展大同团结运动。首先团结各地“古老财产家”、“绅士”、“壮士”（指旧自由党人，多为士族），并重提“减税”、“修约”等口号。此类活动之目的显然是要在即将成立的“议会”和立宪政府中争夺席位。与此同时，民权主义者则重新要求“民权”。原国会期成同盟总代表片冈健吉提出“言论自由”、“减轻地税”、“刷新外交”等三大事件建议书，全国各地出现了“三大事件建议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又有兴起之势。自由民权派攻击政府

的内外失政，揭露了政府准备的宪法草案具有普鲁士专制内容。伊藤博文内阁最害怕反对修约变成批判钦定宪法。伊藤首相在地方长官会议上申明镇压方针时说，对宪法的钦裁提出异议，或把属于天皇大权的外交给人民公议，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于是，1887年12月，在东京部署了警察和军队之后，公布了《保安条例》，并立即在东京实行大搜捕，以“阴谋内乱”、“妨害治安”等莫须有之罪名，勒令片冈健吉、中江兆民等民间政治活动家560人离开东京，否则予以逮捕。最后，片冈健吉等15人被捕判刑。

为了分裂大同团结运动，政府起用立宪改进党的前总理大隈重信为井上的后任外相。1889年3月，后藤被任命为邮政大臣，参加了黑田清隆内阁。他们在自由民权运动中的影响也就完全丧失，大同团结运动立即四分五裂。明治初年以来的民主运动至此转入低潮，但并未绝迹。激进分子后来有的走向早期社会主义，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则在大正初年再次形成高潮。

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但它迫使日本统治者不得不宣布并终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尽管这种立宪制度对专制势力的限制力量极为有限，也仍然是日本人民和民主势力进行斗争的结果。

扩大皇权

1878年5月，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乘马车进宫，途中被刺而死。刺客是自由民权派的石川县士族岛用一郎等人。他们在《斩奸书》中列举堵塞公议、压制民权、视政治为私物、排斥慷慨忠义之士等罪状，谴责了大久保的专横和失政。这是士族民权派的典型主张，是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在野士族群众借欧美式的自由民权思想，表示了对日本政府强烈的不满情绪。

与此同时，随着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开设国会的请愿呼声日益强烈，政府首脑鉴于欧美先进国家的革命历史，对于自由民权运动感到恐惧。明治政府虽然一再拖延时间，然而，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被迫作出让步。政府的当权人物为了防范在实行立宪制后出现危及天皇制政府专制统治的危险局势，一方面排斥民间起草的宪法草案，而由当权人物亲自动手；另一方面，除在宪法的起草工作中贯彻岩仓在《大纲领》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外，还在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财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天皇制的措施，进行了一系列制定宪法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天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树立天皇的权威，政府实行了空前的一次接一次的天皇到各地巡幸。以1876年6月从东北到函馆的50天巡幸为开端，实行了诸如1877年1月到关西，1878年8月经信州到北陆、京都、东海道的70天，1880年6月到名古屋和京都的40天，1881年7月再到东北和北海道的70天的一系列大旅行。在巡幸过程中，明治天皇带领以岩仓右大臣、大隈和井上两参议等政府首脑为首的300名随员，还有400名警察。这些巡幸对于不知有天皇存在的民众来说，在使其认识天皇的权威方面有很大的效果。社会主义者木下尚江少年时在松本亲眼看见1880年的巡幸。他在其自传《忏悔》中记述了如下的情况：

……在雨中从10日里、20日里的山中，背着婴儿，扶着老人，互相招呼，出来“参拜”天皇。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的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相冲撞，互相推挤，豁出弄脏了衣服在泥中争抢起来，他们拼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的和马车溅起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他们之间普遍流

传着，“如果拿到天子走过的砂石，则家里安宁、五谷丰登”这样的信仰。

这些巡幸密切了地方官吏、户长、豪农等地方领导者同天皇之间的关系，使人民知道了天皇的存在，起到了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抗、奠定天皇制基础的作用。

天皇的地方巡幸，是以加强官僚统治的软弱体制和使天皇积极干预政治为目的。早在 1877 年 8 月，在宫内设置了辅佐天皇的侍补，由保守派的吉井友实、土方久元、元田永革等人充任。这个制度是鉴于士族叛乱和自由民权运动，为确立天皇亲政的名义，由伊藤博文和大久保利通提议而建立的。另外，将太政官移至宫中，规定内阁的机要事务由御前会议来决定。

天皇在巡视地方、视察学校的过程中，天皇的侍讲、宫廷官僚元田永孚于 1879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教学大旨》的文章，公开主张教育的根本精神以讲授仁义忠孝的道德为第一。文部省按照这一精神，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干涉。1881 年 5 月，制定了《小学校教学规则纲领》，规定“修身”课在各门课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历史课应以培养尊王爱国的精神为目的。还制定了《小学教员须知》和《学校教员品行检定规则》，对教员的思想和教育方针进行严格的控制，这两项法令在公布之前天皇均曾过目，这是天皇对教育的直接干预。

1882 年，元田永孚根据天皇之命，编写了充满忠孝仁义的《幼学纲要》，发给全国小学学习。1886 年，日本内阁制订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等 4 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法令，进一步改革了教育制度。概括这些法令的内容，就是要从小学到大学，向学生系统地灌输国家主义和天皇主义，培养为天皇制国家效力的思想。

明治天皇政府为巩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加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重申军队直属天皇，还利用孔孟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控制军队，使之誓死效忠天皇。西南战争后，设立了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从此统帅和军令便脱离一般政治而独立。1878 年“竹桥士兵骚动”后，陆军卿山县有朋发布了《军人训诫》，明确提出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德”是“忠义、勇敢、服从”，禁止士兵评论天皇、议论朝政。由于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军队中也出现了不稳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统制，在 1881 年 1 月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 年 1 月，又以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向士兵灌输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等 5 项“武士道”精神。其中写道，“朕是汝等军人的大元帅”。从此，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被称作“皇军”，参谋本部直属天皇，使天皇直接掌握军队，使议会不能左右政局。

1882 年 2 月，岩仓具视建议，为了制定宪法，首先必须确立天皇制政权的经济基础，最紧要的任务是确定“皇室的财产”。他引用英国政治家的名言——“政治权力与财产成正比”，主张“把皇室财产扩大到和全体国民财产没有多大差别的程度”，以便将来政府的预算案被国会否决时，可从皇室财产中支付官吏的薪俸和陆海军经费，以保证皇权不受国会、政党之牵制，千秋万代，永不动摇。

1872 年，皇室的土地只有 1000 町步（每町步约为 99.2 公亩），1885 年增加到 3.2 万町步，9 年后又激增至 365.4 万町步，扩大了 3653 倍。1885 年 12 月，在宫内省设置了御用局，负责管理这些皇室的土地。1889 年，政

府又将佐渡、生野两个矿山从大藏省矿山局移交给御用局。御用局又从印刷局把王子制造厂接管过来。根据《皇室财产沿革记》的记载，明治天皇从孝明天皇那里只继承了 10 万余元的遗产，1875 年增加到 51 万余元，到 1884 年增加为 192.7 万余日元。1884 年 12 月，日本政府决定把自己持有的银行股份 500 万日元编入皇室财产。1887 年，日本政府又把它在日本邮船公司的股份 260 万日元编入皇室财产。到 1887 年末，日本皇室财产激增到 788.5 万余日元。到 1889 年宪法公布时，已达到 1000 万日元。天皇依靠权力掠夺人民的财产，成了日本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财阀。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扩大并加强华族制度，明治政府于 1884 年 7 月仿效德国之贵族制度，颁布了《华族令》。除旧公卿藩主之外，又把维新功臣乃至新兴财阀等列入华族，设公、侯、伯、子、男 5 等世袭爵位，当时共有华族 509 名。原则上，旧公卿根据门第、旧大名根据领地米谷产量来确定爵位。同时，士族出身的维新功臣也被授予爵位。成为新华族，即“功勋华族”。伊藤、黑田、山县、井上馨、西乡从道、松方正义、大山岩等都成了伯爵。在名列新华族的百人中，旧萨摩出身者有 29 名，旧长州出身者有 23 名，两藩合计超过半数。

为了使华族的经济地位安定，政府于 1886 年 4 月公布了《华族世袭财产法》，华族所有的土地、公债、股票之中，凡经宫内省批准作为世袭财产者，国家给予法律保护，第三者不能取代或决定其所有权、抵押权。

1887 年 5 月，又追加了 17 名华族，其中有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和大隈重信。板垣因旧自由党员有反对意见面表达辞退之意，但政府声称不接受就是与皇室力敌，最后强使其接受了伯爵爵位。

华族是为了建立新的贵族制度而培植的特权阶层，作为贵族院的主体和“保卫皇室的屏藩”，以巩固天皇制的统治。

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以制度取调局长官的身分着手制定宪法和筹备开设国会。他认识到“今日若仅姑息应付，拖延时日，则终对制度对国家不利”，决心“坚决进行改良，力求充分巩固朝廷之基础”，必须在 1890 年开设国会以前确定坚定不移的太政官制度的改革方针。

太政官制度象征着王政复古，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太政官制度限定太政大臣和左右大臣由公卿和旧领主担任，妨碍了实力派担任此职。一直独占太政大臣职位的是三条实美，坐在左右大臣位置上的是岛津久光和岩仓具视。而三条不是一位能够以国会为对手进行讨论的人物。太政官制度的结构是，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及参议组成内阁，各省隶属于太政官，各省所管事务须经太政官批准才能实施。各部门与各大臣之间有许多矛盾，迫切需要合理解决。伊藤提出全面改革政府机构，并与井上毅、伊东已代治及金子坚太郎一同制定改革方案。

1885 年 12 月 22 日，内阁制度创立，废除了太政官制度，结束了只有亲王和公卿才能充任大臣的传统，并规定辅弼国政的责任由总理大臣和各省大臣各自单独负责，明确了宫内和府中（政府）之别。明确作为军令机关的参谋本部是内阁之外的组织，明确参谋本部是直属天皇的统帅机关。内阁由总理大臣（首相）和国务大臣组成，直接隶属于天皇。第一届内阁由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三条太政大臣改任内大臣，进入宫中。

明治政府在颁布宪法和召开议会前，抢先成立直接隶属于天皇的内阁，是为了使政府在召开议会后仍然能保持超然独立的地位，以维护天皇制政府的统治大权。

为了创立近代的、合理的官僚制度，伊藤内阁于1886年3月颁布了帝国大学令，翌年7月制定《文官任用令》，确立了通过考试任用官吏的制度。东京大学改为东京帝国大学，其职能是为国家培养官僚。1886年10月，天皇行幸东京帝国大学，由于侍讲元田永孚的影响，他看到帝国大学没有设置道德修身的学科，就批评说：“以目前之学科，欲求能够讲习政治治要之道之人才，决难获得。”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规定，要成为奏任、判任的文官，必须高等考试合格，但法科大学和文科大学毕业生可不经高等考试而获得这一资格。高等考试的应试和帝国大学的入学不限于“萨长人”，只要有能力，谁都有资格。因此，正如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成力非“萨长人”的青年登上军人（军事官僚）的龙门一样，高等考试和帝国大学成为非“萨长人”的青年登上官僚（行政官僚）的龙门。在官僚中也有“萨长人”以外的青年，这一方针更加重了教育的任务。文相森有礼把教育的集权化作为不可动摇的方针提了出来。帝国大学在培养官僚方面的压倒性特权地位，奠定了藩阀官僚向学阀官僚转变的基础。

同时，为了拢络这些官僚，使他们听命于天皇，1886年3月颁布了《高等官等薪俸令》，确立了敕任官和奏任官对下级官吏和人民的绝对优越的地位。大臣的薪俸为工人平均工资的81倍；帝大学生毕业后6年就能当上各省局长，其薪俸为工人的47倍，是突出的高薪，从而产生了“人人竞相走上宦途，而刻苦勤奋于独立自营之事业者几稀”的风气。与此同时，修改了官吏服务纪律，规定官吏首先应当对天皇和天皇的政府侍忠顺勤勉态度。

1888年4月，还设立了枢密院，审议宪法草案及附属诸法典（皇室典范、议院法、选举法、贵族院令等）。在第一任议长伊藤博文之下，任命12人为枢密顾问官，几乎都是萨、长、土、肥出身的大藩阀官吏。在宪法施行后，枢密院成为解释宪法的权威机关和供天皇咨询国务的“最高顾问之府”。

如此改变官制，既便于过渡，也为制宪后之体制奠定模型。内阁总理大臣的职权是“奏宣机务，承旨指示大政之方向，督统行政各部”。枢密院“选择元勋及练达之士”，是天皇“最高顾问之府”、“亲临咨询重要国务之所”。内阁及枢密院均由天皇直接任命组成，与议会无关。

为了更有力地统治人民，明治政府于1888年4月还制定了新的市制和町村制。其主要内容是：把町村作为行政的最小单位和基层的地方统治机构；强制合并町村，把全国以自然村为基础的7.4万多个町村，合并为1.3万多个新町村，町村数减少到原来的1/5；规定市长及町、村长由公选产生；实行所谓市、町、村的自治制度。

内阁顾问德国人毛瑟建议组成自治体是宪法颁布前应当完成的急务。根据这个建议，山县以“与国家休戚相关”、“有财产并具有知识的有力人物”充任自治体议员并以这些“老成练达的人士”组织众议院的“政略上的目的”为目标，改革了地方自治制。政府对这些新的骨干寄予希望，也要求他们承担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职责。

市会和町村会的选举，根据缴纳市町村税额多少，采用前者为二级、后

者为二级的等级选举制；郡会是由郡内町村会议员选举的议员，和拥有土地的地价在1万日元以上的大地主互选的议员来组成；府县会议员则是采用由市会、市参事会、郡会、郡参事会的成员选举的所谓复选法。总之，是对地方居民参加政治活动严加限制、保证资产者政治优越性的，是为达到山县所说的目的而周密编制的。

由于内务大臣监督府县的行政、府县知事和郡长监督町村的行政，因而确立了从内务大臣经府县知事到郡长的官僚统治体制。早在1888年11月，山县有朋就说过：建立市制町村制，及郡制府县制，是为了“坚固国家的组织，巩固立宪政体的基础”，“使具备财力智力的地方名望家备得其所，并且培养他日参与国家立法的适当人物”。

虽然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以反对修改条约草案和制定民定宪法的反政府运动，仍在逐渐扩大。1887年8月，板垣退助利甲伯爵的地位向天皇提出意见书，揭露政府的弊政，主张制定民定宪法，签订对等条约，减轻租税，休养民力等等。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意见书，秘密出版，传播全国。青年、学生和群众要求制定民定宪法、签订平等条约的运动，在东京以及其他各地发展起来。井上外相为此被迫辞职。为了镇压群众运动，伊藤首相召集地方官，发出了决不许任何人和钦定宪法唱反调、决不允许把外交问题交给地方议会处理的训令。

1887年12月26日，公布了反动的《保安条例》，由警视总监三岛通庸立即实施。从当日夜到翌日晨，动员了警察和军队，把东京置于类似戒严的状态之下。

《保安条例》的主要内容如下：

“凡秘密结社或集会概行禁止”（第1条）；

“露天集会或群众集会，不论是否经过批准，凡是警官认为必要时，即可禁止”（第2条）；

“以阴谋内乱或教唆、妨害治安为目的的印刷品等，除按刑法及出版条例处置外，且没收所用之机器”（第3条）；

“在距皇宫或行宫3里以内居住或借宿者，凡被认为有阴谋内乱或妨害治安危险者，经内务大臣批准，限定时日，动令退出，并禁止3年以内回到同一地点，……”（第4条）；

此外，第5条还规定，在内阁认定必要时，连室内集会也予以禁止，更不准携带、转运刀剑之类，同时可实施“旅行券”制度等等。

可见，这是一种严厉取缔民权运动的法令。这个条例公布后，12月26—31日，被勒令退出皇居3里以外者，多达570余人。当时，片冈健吉等人因拒绝退出，立即被捕入狱。在这种残酷的高压下，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从此便一蹶不振。

山县有朋内务大臣全力整顿警察制度和地方制度。山县聘德国人黑恩为警官练习所教官，使其培养警察干部；又根据他的建议，1888—1889年在全国设立警察分驻所，采取分散布置的方式，大量增加警察署的数目。还把从前的国事警察改称高等警察加以充实。山县通过这些措施对人民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管制。

《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89—192页。

《自由党史》，第4册，第1046页。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巩固了帝国政府，强化了集权统治，扩大了皇权。

明治宪法

1881年，日本天皇发布以1890年为期开设国会的诏书后，政府加紧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1882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宪法考察团”去欧洲考察宪法。伊藤一开始就主张帝国宪法的制定，要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宪法为样板。所以，他直赴柏林和维也纳，向柏林大学的法学者格奈斯特和维也纳大学的法学者斯泰因求教。格奈斯特告诉他应尽量缩小议会的权限，加强帝权和行政权；斯泰因则指出普遍选举法的危险以及两院制和皇室自律主义的重要性。于是，伊藤决心按照普鲁士宪法的精神，制定日本帝国的宪法，实行立宪制度。

帮助伊藤进行宪法起草工作的法制局长官井上毅，在伊藤赴欧考察期间，于国内潜心研究古典，以求确定制宪的基本观念。他同许多学者一道查阅古典，以求得立法的根据。他得出结论：“我国宪法盖非欧洲宪法之翻版，乃远祖不成文宪法在今日之发展者也。”井上毅依靠日本古典创立了构成宪法基础的“日本国家学”。

伊藤回国后，同井上、伊东已代治及金子坚太郎一起草拟宪法草案，当时在日本担任法律顾问的罗埃斯勒和毛瑟都接受咨询，帮助进行制宪工作。但在井上看来，日本的宪法不是斯泰因所讲的“欧洲宪法”的翻版。曾经支撑着王政复古的神政主义，为了国家建设已让位于启蒙主义，虽然在于皇举行的祭礼中仍可证明其存在，而现在则作为支持宪法的意识形态而重新复活。但它的旗手已不是过去的国学者，而是以井上毅这种当代最高的法制智囊为核心的近代官僚。

罗埃斯勒指出，必须在宪法及政治上重视市民之利益，要保持不受制约的国权，以公平地保护各社会的利益和权利，以世袭贵族成员为多数组织上议院，并排除超额财产的限制选举法，把参政权扩大到下等社会，以巩固君主制，牢固地坚持以财产世袭制增殖并巩固贵族的大土地，使之成为对抗市民社会的反对力量，并准备相当的反对力量对付中等的资本社会。罗埃斯勒说明了为什么参政权扩大到“下等社会”能使君主制得以巩固。应当培养一些贵族以便于辅佐王权并巩固王权；保护下等社会，使其信赖并服从君主制，使其对所受恩泽尤为感戴。这是想把近代日本国家组织成社会化的君主制国家。

罗埃斯勒的主张超出了井上的计划之外，关于普选问题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因此，伊藤和井上对“社会化君主专制”的观念不感兴趣，认为它不适用于日本，他们打算通过制定宪法而创立的国家具有“立宪君治”的特征。

伊藤博文制定宪法的目的在于实现“宪政”。他所说的“宪政”表达了通过引进立宪主义实行“立宪君治”的政治原则。他一方面说，宪政“实施之后，其结果对国家是有益呢，抑或相反，不可预测”！另一方面又强调说：“然而，既然20年前即已废除封建政治，与各国开始交往，其结果，欲谋国家进步，舍此别无其他经营良策。奈何！”他与山县有朋在草拟《军人敕谕》时的感慨一样，痛切地觉察到日本没有欧洲各国基督教那种使“人心归一”的宗教。神道“虽然基于祖宗遗训并祖述遗训，但作为宗教则缺乏使人心归向之力”。伊藤自我告诫说：“没有机轴而听任人民妄议政

治，则政治将丧失统纪，国家亦随之废亡。”在他急切地寻求日本的机轴时，他想到了皇室。

“在我国，可以成为机轴者，惟有皇室。”他强调说：“草案应该以君权力机轴，而完全不加毁损，不敢以欧洲分割主权精神为据。当然与欧洲某些国度中之君权民权共同者相比，其道理各异，此为方案之大纲。”

在伊藤看来，他以“立宪君治”彻底否定了“君民共治”、“君民同治”。如果在“君民共治”下，由于与“君权”“共议”，肯定会形成“国民”的“民权”；在“立宪君治”下，民权从与“君权”的对等关系降为上下关系——臣属关系，“国民”乃以“臣民”这种特殊姿态出现。“即君主乃君临一国邦家之上者，君主之外，皆谓臣民之义也。”宪法草案就是这样使天皇的地位绝对化，从而保障天皇的永恒统治。在他的心目中，国家的权力乃是以君主大权为其基轴，一切权利皆来源于此。

伊藤博文又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天皇的统治，与“专制”严格加以区别。对天皇总揽统治权加以限制。伊藤把“限制君主权”的意旨具体地表达在第5条“天皇帝国议会的承认行使立法权”中。

审议宪法草案的枢密院，在议长伊藤博文的主持下，从1888年6月起开始审议宪法。副议长是寺岛宗则，当伊藤在欧洲考察宪法的时候，他作为驻美公使，在美国从事宪法考察。

参加审议宪法草案的有两院议长和5位皇族、10名大臣和14名枢密院顾问官，在野势力无人参加。大隈重信虽以外相身分出席，但始终未发言。作为书记列席的，有以书记官长井上毅为首的书记官伊东已代治、金子坚太郎及津田道太郎。

以文相身分出席的森有礼对宪法第5条“天皇帝国议会的承认行使立法权”提出疑问，引起一场大争论。伊藤不同意将“承认”改为“赞襄”，后者表示主权完全在上，前者则表示主权虽然在上，其行使则需经下面人民承认的意思，伊藤指出：“不经议会承认而施行国政，即非立宪政体。”

伊藤进一步阐明“立宪政体之本义”说，“创设立宪政体，则天皇在行政方面设责任宰相，对君主行政之权亦多少加以限制，在立法方面，不经议会承认则不能制定法律。设立这两种限制，乃立宪政治之本义。缺此两点即非立宪政体。而且，宪法上对这两点巧饰伪装，亦均非立宪政体之本义。”

森有礼强调说：“倘若赋予议会如此最高权力，则将使日本传统国体发生大变化，形成所谓君民同治之势。”曾经是启蒙思想家的森有礼反对大变革，否定“君民同治”，拒绝“帝国议会的权力”。伊藤既要求“使君权确实实”，又强调“立宪政体之本义”，这是一对矛盾。伊藤虽然拒绝“君民同治”，但伊藤的主张却不免要归结为“君民同治”。森有礼的追问使伊藤的矛盾无法掩饰。他以议长的身分宣布“禁止第14号辩论”。14号是森在议会的座次号。

第5条审议的结果，是把“承认”修改为“翼赞”并进一步修改为“协赞”，结束了森和伊藤的争论。但暴露伊藤真实意图的则是关于第8条紧急敕令的讨论。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伊藤的所谓“立宪政体”，只不过是他自己那种“使君权确实实”的“真正意图”在“宪法上的巧饰伪装”。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02页。

/ZSBJ03200411_0343_0/ZSBJ> [美] 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89页。

束缚议会权力的伪装的宪法政治，把人民规定为“臣民”。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在提出宪法草案时，为了解释条款的宗旨，附上了《宪法说明》。它对“臣民”进行了说明：宪法草案说的“臣民”，是“服从大君”、并被大君当作“大宝”而受到“爱重”的人。规定所有权的第27条宣称：“日本臣民的所有权不受侵犯。”接着，又对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性加以限制，规定“为公益所必需的处理，以法律规定之”。《宪法说明》就这一条的宗旨进行说明时写道：“所有权乃不可侵犯之权，但不是无限之权。”

宪法规定，贵族及人民的参政权，也不是固有的权利，而是天皇陛下赋予的。这样，宪法就束缚了议会的权力，由臣民所构成的议会，其作用显然是很有限的。

伊藤对制定宪法草案的同僚说：“这个草案制定好，到让陛下看见以前，跟谁也不能说。”他们是在秘密中进行工作，最初在东京官邸，其后迁到神奈川县金泽的一个旅馆，最后是在横须贺海上的夏岛、伊藤的别墅里完成的。审议决定这个宪法的，不是民主的宪法议会，而是天皇的最高咨询机关——枢密院。当1888年4月向天皇提出明治宪法草案时，民间及政府内部的一部分人，主张提交给国民议会或官民共同的宪法议会上讨论，而坚持钦定宪法立场的政府对此则加以反对。从1888年6月18日起，在天皇亲临之下，秘密审议了宪法草案。经过若干修改后，定名为《大日本帝国宪法》。

1889年2月11日，天皇在宫中的贤所，对皇祖皇宗宣读制定皇室典范和宪法的文告，在文武官僚参列的宫中正殿授与内阁总理大臣，以这种形式公布了宪法和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贵族院令等附属法典。之所以定在纪元节这一天，是为了给国民以这样的印象，即虽然采用了宪法，但以神武天皇即位为国家起源的天皇制国家的国体，并没有丝毫变化。

《大日本帝国宪法》由7章76条组成。第1章为有关天皇的内容，共17条。其中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其”；“天皇统帅陆海军”等等。可见，天皇作为国家的元首，其职位根据世袭的原则可代代相传，以保证其家族的统治“万世一系”，天皇大体上仍保持着封建时代专制君主所享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集行政、立法、司法权和军事统帅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就其权限和实际的政治作用而言，他毕竟已不同于封建时代的专制君主。因为，《宪法》规定天皇必须“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统治权。《宪法》的第4章还规定：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法律敕令及其有关国务之诏敕，须经国务大臣之副署”。这就限制了天皇在政治生活中独立地发挥作用。

在行使立法权方面，天皇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宪法》规定，天皇应“在帝国议会协赞下行使立法权”。在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天皇虽“可发敕令代替法律”，但“此敕令可在下次会议期间向帝国议会提出，如议会不同意，政府可于将来宣布其失效”。《宪法》还规定，天皇为执行法律，可发布必要之命令，“但不得以命令变更法律”。因此，美国的日本学专家赖肖尔不无道理地指出：“宪法自然是以天皇及其权威为中心的，因为推翻德川的理由就是要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但是，实际上大家并不是想让天皇统治，而只是要他使大臣们的决定生效而已。”

在第2章中，关于臣民之权利与义务，共有15条。其中规定，日本臣民享有如下的权利和自由：“按法律命令所规定的资格，均得任用为文武官员，

及就任其他公职”；“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有居住及迁移的自由”；“非依法律不得予以逮捕、监禁、审问及处罚”；“不得剥夺其受法律所规定之审判官审判之权利”；“除法律规定者外，不经其同意，不得侵入及搜查其住宅”；“除法律所规定者外，不得侵犯其通信之秘密”；“不得侵犯其所有权。因公益而有必要时，应按法律规定进行”；“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不违背作为臣民之义务情况下，有信教之自由”；“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接另行之规定得以进行请愿”，等等。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宪法》一方面冠冕堂皇地宣布日本人民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又在法律上加以限制或取消。因此，它的每一条款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从而变得徒具形式、极端虚伪。即使是这样，《宪法》的制定者仍担心日本人民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利和自由，来反对天皇制国家。因此，他们又在本章中明文规定：“本章所载之条规，在战时或国家发生事变情况下，不得妨碍天皇施行大权。”即为保障天皇的统治大权，政府可以合法地一笔勾销《宪法》赋予日本臣民的各种权利和自由。

关于日本臣民的义务，《宪法》只规定了两项内容——“服兵役”和“纳税”。但在《宪法》前言中，已明文规定“朕现在及将来之臣民，对于此宪法负有永远顺从之义务”——这自然地包括对根据这部《宪法》而确立的天皇制国家及其一切法令、措施，也“负有永远顺从之义务”。

《宪法》的第4章，关于国务大臣及枢密院的规定，共2条。在国务大臣的条款中写道：“国务各大臣，辅弼天皇以任其责。凡法律敕令，及其有关国务之诏敕，须经国务大臣之副署。”其中，对内阁及总理大臣只字未提，而仅仅强调了各国务大臣均对天皇负有“辅弼”的责任，即直接对天皇负责。这就使各省（部）大臣和总理大臣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他们彼此间也不负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内阁也只能成为一个台议机关。但在进行协议时，既不能由总理大臣作出决断，也不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必须是各大臣全体一致。在形式上，这是为了使权力集中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天皇，“避免援党结盟之力逐至左右天皇大权”。而在实际上，是为了保持藩阀之间的势力平衡。这是因为明治政府成立以来，长期建立在萨、长藩阀的政治均势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哪一方因出任总理大臣而拥有极大的权势，都会引起另一方的激烈反抗。此外，这也是为了防止在万一出现政党内阁时总理大臣的权限过大，担任这一职务的政党党魁利用它来“左右天皇大权”，排斥专制主义的藩阀势力。

在国务各大臣与帝国议会的关系方面，第4章无任何明文规定。《宪法》则未赋予帝国议会以提名总理大臣的权利。在《宪法》颁布后，逐渐形成了由“元老”提名，天皇任命总理大臣的惯例。这是为了防止政党内阁的出现，而保证那些自明治政府成立以来就掌权的藩阀，有可能继续控制国家的权力。此外，《宪法》这一章还规定：国务各大臣只对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这就剥夺了议会对行政的监督权，而使内阁有可能对议会采取超然主义立场。

《宪法》第4章规定：“枢密顾问，依枢密院官制之所规定，应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国务。”根据1888年4月公布的《枢密院上谕及官制》，“枢密院可就下列事项，召开会议，上奏意见，提请敕裁”。主要内容如下：

1. 关于宪法及附属于宪法之法律之解释，以及有关预算或其它会计方面疑义之争论；
2. 关于宪法及附属宪法之法律之修改草案；

3.重要敕令；

4.新法之草案，有关现行法律之废止、修改之草案，与外国谈判之条约及行政组织之计划；

5.上列各项之外，行政或会计方面重大事项，特以敕令咨询时，或按法律命令，特别需要枢密院咨询时。

这一法令虽规定枢密院“不干预施政”，但它作为“天皇有关行政及立法事项之最高顾问”，事实上成为凌驾于议会和内阁之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这显然是为了维护天皇制国家的专制主义统治而设置的最后一道藩篱。即使议会的权力扩大了，并形成了政党内阁制，专制主义的藩阀仍可以枢密院为最后堡垒，凭借天皇的名义继续保持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政治权力。

明治宪法规定，陆海军的统帅、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与议会和内阁毫无关系，也就是说统帅权是独立的，因此，军部的权力极大。属于军部势力的还有天皇的顾问机关——元帅府和“军事参议院”。“军事参议院”是由元帅、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等组成，可将军部意见上奏天皇，掌握军部实权的军阀，控制军事大权，左右内阁，影响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内大臣及军令机构的权力越来越畸形或不受限制，形成了战前日本以天皇为代表的寡头军事专制，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帝国议会

明治宪法的第3章是关于帝国议会的规定，共22条，其中规定：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贵族院议员由皇族、华族及敕任之议员（指天皇任命的高额纳税人和特殊勋者）担任。其中，部分议员为终身的，部分议员的任期为7年。“众议院依选举法之所规定，以公选之议员组织之。”根据1890年颁布的《选举法》，年满25岁。每年缴纳直接税15日元以上的男子可享有选举权。直接税15日元以上，若按地说折算则是平均占有的2町1反以上田地的贵族所纳税额。按照这一规定，当时获得选举权的只有45万人，只占当时人口总数3900万的1.1%。有被选举权的，只限于30岁以上符合上述财产条件的男子。

选举区是小选区制，其理由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广大选区内进行选举有困难。北海道和冲绳县，都没有给予选出议员的权利，而被疏隔在帝国议会外。议员总数300人。其所以把选举资格提得相当高，据后来伊藤博文回忆说，是“周密地考虑到尽量使宪法平稳地前进”。其目的在于把议会的运营委于贵族之手，使宪法平稳地前进，其用心也是为了使议会不具有独立的权力。

选举采取公开记名的方式，议员的任期为4年。根据这一《选举法》，于1890年进行了第一届众议院选举，当选议员300人，其中地主议员为144人，约占议员总数的48%，资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议员83人，约占议员总数的27.7%，其他为政府官吏、军人以及从事其他职业或无职业者。这反映了当时地主比起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状况很快便发生了变化。1912年，在众议院的381名议员中，

资产阶级议员的人数已超过地主议员，前者为 98 名，后者为 80 名。

《宪法》的制定者害怕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可以通过众议院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危及天皇制国家的专制主义统治。因此，《宪法》规定：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而贵族院则享有不被解散的特权。贵族院的任务在于牵制众议院的“妄议”。枢密顾问官土方久元强调说：“民选议院常倡过激之论，又常采纳急进方针，往往与行政官冲突。当此之时，贵族院乃居间协调双方之重要机关也。”因此，就贵族院的组织不允许众议院发表意见，它不由法律规定，而是由以敕令形式颁布的《贵族令》规定的。因为，若由法律规定，必须“逐项经民选议院议决”，就要允许众议院发表意见。枢密院书记官长井上毅表示：“贵族院既为皇室屏藩，经常与皇室密切接触，自然不允许下院对贵族院制度发表意见。”所谓“皇室的屏藩”，首先是华族。伊藤博文指出，“我同胞人民天资忠顺”，而以“位居上流、忠于皇家之华族诸君为最”。他还强调说：“余又何须担忧我国将发生此类不祥事件（指国家大乱之不幸）乎？”可是，贵族院希望“不仅让贵胄参与立法之权”，而且应“荟萃勋劳、学识及富豪之士，使其代表国民慎重、成熟、忍耐之风，团结亲睦以共同‘形成’上流团体”。从大学者到大资产阶级，贵族院企图都把他们列为“皇室的屏藩”。于是，贵族院成了“贮藏保守分子”之所。在劳资对立尚未激化、从而还不具备条件建立“社会化君主专制”的日本，保护君主制以免遭国家动乱的角色，就是他们这些以“贵胄”为核心的“皇室屏藩”。

两院对立法及政府预算均享有议决权，但不经贵族院的同意，法律与预算不能成立。因此，由贵族、华族及敕任议员组成的保守的贵族院，显然可以对由民选代表组成的众议院起很大的牵制作用。

帝国议会作为立法机构，事实上并不享有独立的、完整的立法权。因为如前所述，《宪法》第 1 章已规定：“天皇在帝国议会之协赞下行使立法权”；“天皇批准法律、命令之公布及执行”。此外，天皇出于紧急之需要，于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可发敕令代替法律。但在本章中，毕竟也规定了“一切法律，须经帝国议会之协赞”、“两院议决政府提出之法律、并各得提出律案”；天皇在紧急情况下发出的敕令，也须“在下次会议期间向帝国议会提出，如议会不同意，政府于将来宣布其失效”，因此，立法权是由天皇和议会分享的，它们彼此间可以互相起牵制作用。

《宪法》第 67 条规定：“根据宪法上的大权而确定之既定岁出……非经政府同意，帝国议会不得废除或削减之。”所谓“根据宪法上的大权而确定之既定岁出”，是指“根据天皇大权之支出，即行政各部官制及陆军编制所需费用、文武官员之薪俸以及基于对外条约所需费用，无论宪法实施前或实施后，皆为预算提出前即已确定之经常费额”。这种“既定岁出”与第 10 条的官制大权、第 12 条的编制大权及第 13 条有关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等外交大权有关，把“既定岁出”作为“国家存在之必需费用”，是为了防止议会的削减，也是为了禁止议会借削减经费来“破坏国家的成立”。此项规定的思想基础仍然是议会“有推敲国家意志之能力，而无执行国家意志之能力”，而把这种国家意志的形成完全交给政府——官僚以及军阀——来垄断。

《宪法》第 71 条规定：“当帝国议会对预算未能成立时，政府得实施上年度之预算。”这一规定严重地制约了议会的预算议定权。议会根据预算议定权而否决预算草案，这就是走向否决租税的行动，是议会对抗政府的最强硬手段。因此，《宪法义解》警告说，否决预算草案之类，“大则使国家不能存在，小则使行政机构瘫痪”。它强调说，这类行为是“建立在民主主义之上的国家的情况”，“固非我国国体所应采纳者也”。

《宪法》第 12 条规定“天皇确定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兵员”，确定了编制大权。作为统帅机关的参谋本部——1893 年以后则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正如已独立于内阁之外一样，也独立于议会之外，超越立宪制度而成为军部的牙城（主帅所居之城）。《宪法义解》强调，确定陆海军编制，“不须议会干涉”。

颁布宪法的敕语说：“帝国议会以明治 23 年（即 1890 年）召集之，以议会开幕之时作为此宪法生效之日。”如果说宪法的目标即立宪政治，其舞台是议会，那么一手制定宪法的政府，能否也一手经营立宪政治，则取决于政府怎样对付向议会扩张的政党政派。

首相黑田清隆把政府对议会所采取的政策归结为“超然主义”四个字。宪法颁布后的第二天，黑田在鹿鸣馆召集地方官发表演说，阐述施政方针。他强调说，既有各种政治意见，则政党之产生乃“势所难免”，“然而，政府则必须常取一定之方向，超然于政党之外，立足于至公至正之道”。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也把在京的府县议会议长邀请至官邸发表演说，强调“不偏不党”，同时又告诫说：“不免将出现企图以政党组织内阁之类最危险事情。”

可是，现实状况却不允许政府超然。颁布宪法的当天，山口县土族出身的小吏西野文太郎用刀刺伤了刚刚出门前往参加宪法颁布仪式的文相森有礼。第二天，森有礼死亡。虽是偶发事件，未成为内阁的致命伤，但事件接踵而来，不断袭击着黑田内阁。

《宪法》第 73 条规定了宪法的修改手续。它规定，如需修改，应以敕令将议案交帝国议会讨论，不承认议会的提议权。《宪法义解》强调：“宪法乃我天皇亲自制定，上继祖宗，下遗后世，使全国臣民及臣民之子孙遵守其条规，以为永世不磨之大典。”虽然有时因“社会之必要”必须修改宪法，但该时议案“必须以敕令下付”，乃因“宪法乃天皇一人亲自制定者”，故“修改之权亦属天皇”。其时，天皇将修改的条款交付议会讨论，则因“一旦制定大典即与臣民共同遵守，不欲以王室之专意而变更也”。交付议会讨论时，要求有总数 2/3 以上者出席并获 2/3 以上多数通过，这是为了“培养并保持将来慎重遵守宪法之方向”。而且，严格禁止议会“对涉及议案以外之条款作出决议”。

《宪法》和《议院法》所规定的立宪制度，对议会权力作了种种严格限制。担任枢密院制宪会议议长并操纵此事的伊藤博文，把与他开展争论的文相森有礼的态度形容为“极端保守主义”。可是，在严格束缚议会权力这一点上，他的立足点也同样是保守主义的。

《宪法》第 49 条规定：“两议院得分别向天皇上奏。”枢密院的制宪会议把是否承认议会有弹劾大臣的权力作为本条相关联的问题而提出。伊藤博文坚决反对，他强调说，承认议会有弹劾大臣权是违背“旨在加强和巩固君权，并且以此旨为最重要而起草”的宪法宗旨的。他把大臣“对国君的责任”和“对国会的责任”严格加以区别，认为前者是“直接的，是政治上的责任”，

而后者则是“间接的，是道德上的责任”。任命大臣是国君的大权，国会无权直接任免大臣，所以，即使大臣对国会失去信任，国会把意见上奏，请求罢免大臣，该意见是否被采纳，乃是国君的权限；如果大臣没有失去国君的信任，则应照旧任职。于是，伊藤的结论是“国会不能弹劾大臣”。他还指出，如果赋予国会以弹劾权，则“宪法之整体和精神将全然改变”。

1890年7月，第1届众议院议员总选举，许多“平民”的“乡绅”当选为议员，他们都汇集在政党的旗帜下。已准备合并的大同俱乐部、爱国公党、自由党三派于9月15日拉拢九州同志会，成立了立宪自由党，立宪自由党拥有议员130人，立宪改进党拥有议员40名，两党总共占据了议会中300个议席的过半数席位。号称中立派的政府系的大成会为79名。自由民权运动和大同团结运动在开辟选举地盘上取得了成功。这从具有府县会议员和市议会议员经历的人占将近70%之多上可以得知。与此同时，过半数的众议院议员是地主，其中多数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贵族院议员中，占多额纳税者议员半数以上的是50町步以上的大地主。这两者是反映地主利益的有力表现。

第1届帝国议会是1890年11月25日由首相山县有朋召集的，29日举行了开院仪式。伊藤博文和中岛信行分别担任贵族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议会争论的焦点是岁出总额达8332万日元的预算案。山县首相在施政方针的报告中说，为了维持国家的独立，不仅要保卫“主权线”（国土），而且必须保卫“利益线”，其“利益线”的焦点认为在朝鲜。为此，陆军增加7个师团（8万），加上预备役、后备役，共增加到20万人，这和充实海军都是紧要的。

以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为主的民党方面则以“节约政费”和“休养民力”为口号，对这个预算案试图大加削减，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通过了削减岁出总额的16.6%（888万余日元），并把由此产生的剩余充作减轻地税和偿还高利公债之用的议案。修改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减少官吏的名额和薪俸以及旅费，目的在于对官僚制进行攻击。对此，政府表明不能同意，声称这样进行决议是和宪法第67条相抵触的。政府表示了解散议会的强硬态度，但是民党方面的方针不变。不过，政府也希望首次议会要圆满结束，立宪自由党的领袖也向山县表示，在亚洲尚属首次的议会里要显示日本人运用宪政的能力的想法。两者都把对外的考虑优先于立宪制的宗旨，这就开辟了妥协的道路。由于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和邮政大臣后藤象二郎的幕后活动，以及山县指挥陆军次官桂太郎的奔走，终于靠立宪自由党内土佐派的大江卓（预算委员长）和竹内纲、林有造等40多人退党的支持，才以从预算案中削减651万日元和约定实行行政整理为条件，通过了预算案。中江兆民在痛骂“哀求”政府同意、唯其命是从的“软派”统治下的议会为“冷血动物的展览会”后，愤然辞掉了议员。

山县在议会闭幕之后，丧失了掌握政局的自信，对伊藤的不合作也感到不满，1891年4月实行了内阁总辞职。他推举以立宪政治家自负的伊藤为后任首相，而伊藤尽管有天皇的再三敦促仍然固辞不就，结果，组阁命令落到萨摩派的松方正义身上。在松方内阁内部，陆军大臣高岛鞞之助、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和接近山县的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对议会持强硬态度，与主张对政党妥协的后藤邮政大臣、陆奥农商务大臣相对抗。

针对企图把第1届议会当作打破藩阀的序幕的民党方面的第一个打击是，废除保安条例、议论政事集会和结社法案以及减轻地税案，虽然都在众

议院通过了，却遭到贵族院的否决，或以审议未完而告终。第一届议会的闭幕会上，伊藤在演说中称赞贵族院议员为“宪法的柱石”，贵族院的确是藩阀官僚势力的“柱石”。

众议院虽有各党的强硬态度，但仍不免处于从属地位，至于希望政党内阁的出现，那只不过是各政党的一厢情愿而已。虽然如此，这届议会，对于古老的亚洲来说，是破天荒的。它撬开了东亚专制皇宫的大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

近代天皇制

松方内阁中的副岛种臣内务大臣和白根专一次官发生对立，而后者又得到了桦山海军大臣和品川弥二郎的支持。这样，刚刚成立不久的松方内阁就发生了动摇。

第3届议会后，松方表示要辞职。可是，由于伊藤、山县、黑田、松方等元老会议对于后任内阁的意见不一致，松方仍然留任了，但在改组内阁时，新任内务大臣河野敏谦对干涉选举负有责任的白根次官和福冈县知事安场保和等几名知事进行调转和免职，这些知事们跑到高岛陆军大臣和桦山海军大臣那里去诉苦，两位大臣反对河野的处置，提出了辞呈。在要求军部推荐后任人选时，代表军部的陆军大将大山岩（萨摩）、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参谋次长、长州）、海军中将仁礼景范（萨摩）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劝松方辞职。松方内阁因而于1892年7月总辞职了。

军部仰仗天皇的统帅大权干涉政治，便由此开了先例。这件事加上前此天皇对谋求压制民党的政府给以支持和鞭策，以及扮演调停众议院与贵族院对立的角色这一事实，表明了天皇制下立宪制的特点。而在下一届的伊藤内阁时，天皇又增加了扮演调停政府与议会对立的另一个角色。

由此可见，《明治宪法》所规定的日本近代天皇制，是藩阀专制的延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财阀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寡头专制。

《宪法》是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明治政府被迫让步的产物。但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无论是岩仓的《大纲领》，还是伊藤赴欧洲考察宪法期间的言论，都表明了他们所要制定的宪法，是以“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至旁落”为最高原则的。因此，这部《宪法》确定了日本的主权属于天皇，而不是属于人民。天皇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人民则作为天皇的“臣民”处于“永远顺从”的无权地位。“作为天皇制的权力机构的内阁、帝国议会、军部和枢密院，是支持天皇制的4根支柱。议会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是专制主义天皇制国家的一块遮羞布。”

由于这部《宪法》是按照普鲁士宪法的精神制定的，因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评价——“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也基本适用于依据《明治宪法》而最终确立的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

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参与编纂《宪法义解》的穗积阵重，曾于1899年在罗马召开的东方学者国际会议上发表过讲演。他在《崇拜祖先和日本法律》一书中，把日本国家的特征规定为“神政的、家长式立宪主义”，并作了如下说明：

天皇掌握着大权，并非作为其自身固有的权利，而是作为继承神祖的权利。因此，日本的政体是神政的；天皇作为日本国民这个巨大家族的最高家长统治着国家。因此，日本的政体是家长式的；天皇遵循以近代立宪主义最进步的各项原则为根据而制定的宪法行使大权。因此，日本的政体是立宪的。换言之，日本政体的根本原则是神政的、家长式的、立宪的。日本政体的这种三重性，体现着过去和现在的精心结合。

天皇凭借大权进行统治的日本国家体制——天皇制——是“神政的”。宪法条文的正式解释书《宪法义解》指出，“天皇之宝祚承之于祖宗，传之于子孙”，此乃“国家统治权之所存”。该书并且宣称：“宪法中特意揭示大权并载明于条款，并非以宪法表示而新设之义，乃表示固有之国体因宪法而更加巩固也。”它指出，天皇“统揽大权而治理国土及臣民”，日本的“固有国体”，自祖宗以迄子孙是永恒不变的。接着，它又解释“立国之大义”，强调“我日本帝国依一系之皇统而始终，古今永恒，有一无二，以示有常而无变，永昭君民关系于万世”。宪法所确定的“立国之大义”，除天皇“统揽大权而治国土及臣民”以外，不允许有其他“君民关系”，因而严峻地拒绝向君民共治过渡。而且，“承之于祖宗，传之于子孙”的“天皇宝祚”发源于称作“天祖之敕”的神政。

天皇制是“家长式的”。受文相芳川显正委托解释《教育敕语》、并著《敕语衍义》的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指出，“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强调“亦即一国乃一家之扩充，一国之君主指挥、命令巨民，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全无二致”。政治学家石田雄明确指出，井上的主张显示了家族国家观的“萌芽”。从此以后，在文部省编的修身教科书中，家族国家观作为“核心观念”而明确起来。

民法学家肌野诚一、富士子夫妇同样介绍了加藤弘之强调的日本的君臣“真正具有一家父子的关系”，并译出了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著《西洋哲学史》中饶有趣味的一节：

诸如把政治权力比作家长对子孙的权力，除日本人以外，对于现代人来说，恐怕是不可思议的。……企图把这种理论强加给欧洲的尝试失败了。这是为什么？接受这种理论，决不是人性所厌弃的。例如，除日本外，古代的埃及人以及为西班牙所征服之前的墨西哥人和秘鲁人，都尊奉过这种理论。

在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上，这种事情是很自然的。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已经跨过了这一阶段，而现在的日本，只是尚未结束这一阶段而已。

天皇制把近代立宪主义嫁接在源自古代世界的神政的、家长式的观念上了。可是，这种立宪主义是“束缚议会权力”的伪装的立宪主义。伊藤博文的“立宪君主制”是用立宪主义来伪装神政的、家长式的本质。如果说德国的“立宪君主制”没有走上向“议会政治”进化的道路，那么，日本“神政的、家长式的立宪主义”更加没有走上向“议会政治”进化的道路。

天皇制以握有作为绝对权力的大权的天皇为顶峰，由文武官僚——行政

官僚和军事官僚——以天皇名义行使统治权，以《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使臣民对天皇忠诚，由此使国家统一，天皇制就是这种靠制度和意识形态来支撑的庞大建筑。国民以“臣民”身分“服从”天皇。服从天皇的官僚，在国家等于天皇私人世袭财产的社会（家产国家）中，具有人身依附于天皇的家产官僚性质。天皇制同时又是有等级差别的体系：天皇与臣民有差别；臣民又按与天皇的亲疏顺序被授予位阶勋等，以为差别；男女有差别；贵族与平民有差别；平民与“新平民”有差别；家长与家庭成员有差别；内地人与阿依努民族有差别；大和人与琉球民族有差别。

日本历史学家德富苏峰认为，宪法发布前后的时代是日本新旧时代的转变时期。虽然日本人已告别了旧日本，却尚未到达新日本，已摆脱了专制统治，却尚未进入自由世界。他强调，这种中间地带决下是久留之地，希望日本青年成为“自由世界”的开路先锋，尤其寄希望于“乡绅”，即农村的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在农村占最重要地位的豪农，他们率先发展了资本主义农业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他们是“最敏锐、最活跃、组成一个国家的中等社会的重要因素”。他断言，从农村资产阶级在村、郡、县的势力，从他们在县议会中所具有的势力，可以推测他们将来在开设国会时所具有的势力，只有他们才是掌握政权的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日本还是“农业国”，因此，乡绅“平民”也应该是新时代的“政治世界的主人公”、并应把“士族”当“政治社会主人公”时代的“抽象政治”转变为新时代的“实际政治”。为了把平民推上政治世界主人公的地位，德富苏峰要求实现“责任宰相议院内阁”的“议会权力”，排斥普鲁士的立宪主义。他认为铁血宰相俾斯麦之“国家社会主义”的议会权力只是专制的工具罢了。

虽然日本的“这种政治体制很少有民主成分，但在当时的日本，却有其必然性。在集中权力、财力、人力以维护民族独立、建立近代工业、国防、教育等方面曾起过残暴的、但又难以代替的历史作用”。在亚洲，《明治宪法》是第一部付诸实行的宪法。“古老的亚洲，从此才有了宪法、议会、选举等等限制君权的独夫专制的法制，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日本人民和民主势力进行斗争的结果。因而《明治宪法》亦曾为当时亚洲其他封建国家的进步人士所憧憬或效法。”

《明治宪法》毕竟也包含了明治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某些让步。

首先，它的颁布的本身，就标志着日本已初步确立了立宪制的原则。天皇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虽然神圣不可侵犯，但也必须依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自己拥有的统治权。辅弼天皇行使统治权的藩阀们，自然也要受到宪法的约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明治政府成立以来它所实行的专制主义统治。

其次，《明治宪法》不但未赋予议会以国家惟一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议会所享有的立法权也是不完整的；但《宪法》既然规定了“一切法律须经帝国议会之协赞”，而议会在一定程度上又享有对政府的财政监督权，因此，议会对政府的政策和活动也就必然会具有一定的约束力。1900年的《选举法》虽然规定了较高的财产资格，但却为地主、资产阶级敞开了通向议会的大门。这就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正式代表，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影

响，使它的政策更好地适应他们的利益。因此，“《明治宪法》虽然保留了天皇制国家的某些专制主义的特点，但又使它朝着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制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明治宪法》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开辟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道路。它清除了挡在日本历史车轮前面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顽石，开动了日本帝国的列车。

第 12 章

“脱亚入欧”

“杀鳅养鹤”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相继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迫使中国清廷和日本幕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西欧国际体系在东亚取得了支配的地位。西欧国际体系包含着二重原理：作为“内部原理”，西方列强在蚕食、瓜分东方弱小民族和国家时，是相互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作为“外部原理”，欧美列强国家不承认被侵略的东亚国家享有完全的主权，它们将协定关税率、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款视为理所当然，在军事上则是毫不知耻地赤裸裸地动用武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藩阀政府将幕末志士“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的传统思想与西欧国际体系相接轨，自觉地将自己融入西欧国际体系之中。一方面，整个明治时代，日本政府都在致力于修订幕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力争成为西欧国际体系“内部”平等的一员；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样利用“外部原理”，与近邻的朝鲜、中国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1876 年）、《马关条约》（1895 年）和《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 年），强迫推行不平等条约。

与明治政府的这一做法相对应，在思想上，近代主义者福泽谕吉对西欧国际体系的“二重原理”心领神会，他抛出《脱亚论》，主张走“脱亚入欧”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又有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文人将“脱亚入欧”的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掀起了狂热鼓吹侵略亚洲近邻国家的帝国主义思潮。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他一生的著述有两大标志，一是发表于明治 8 年（1875 年）的早期著作《文明论概略》，二是明治 18 年（1885 年）发表于《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从《文明论概略》中提出的“向文明进军”，到《脱亚论》提出的“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集中反映了他脱亚意识的形成过程。

《脱亚论》的思想内容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炫耀日本已跨入西洋文明，相形之下，中国与朝鲜却抱残守缺、停滞不前。文章一开头即炫示日本在亚洲特殊的“文明”地位：“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的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接着，他笔锋一转，说：“不幸的是近邻有两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人民……罔知改进之道，在交通至便世界，虽非未闻文明之事物，但耳闻目睹却无动于衷，其迷恋古风旧俗与千百年无异，面临文明日新的活舞台……做然无自省之念。”

第二，从上述亚细亚社会停滞论观点出发，断定中国、朝鲜必将亡国：“视此两国，面临当今文明东渐的风潮，已无维持独立的道路可走，……自今不出数年，定将亡国，其国土被世界诸文明国分割，此种结局，毋庸置疑。”

第三，认定“唇齿相依、邻国相助”的道理对日本已失去意义，惟恐西洋“文明人”因“三国地利相接之故”，将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一视之”，造成日本“外交上的障碍”。因此，“为今日之谋”，与其“等待邻国之开

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文章最后宣布，“亲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因此要“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脱亚论》可视为近代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分道扬镳的“绝交书”。它浸透了对亚洲邻国极其蔑视的民族利己主义精神。了解福泽谕吉脱亚意识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弄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民族危机后迅速走上伙同西方列强侵略东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原因。

福泽谕吉出生于 1834 年。在他 20 岁时，中国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年后，日本亦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向来被日本人民尊为文明古国的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以及日本同样面临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严峻现实，促使他从青年时代起便立志“读书济世”，挽救民族存亡。在其早期著作如《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中，都表述了他对西方列强恣意欺凌东亚弱小民族的愤懑不平的感情和争取民族独立、伸张国权的决心：“我日本国当前虽不及西洋诸国富强，但就一国的权义而言，却无丝毫轻重之分”（《劝学篇》），“日本人当前的惟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文明论概略》）。但如何伸张国权？向谁伸张国权？福泽谕吉的某些提法就值得注意。如在论及伸张国权必须具备爱国精神时说，爱国精神就是“厚我薄他之心”，“和自私心是名异而实同的”。以这种被称为“自私心”的爱国精神去伸张国权时，他认为须分清“轻重缓急”，“方法手段越多越好，同时也非多不可”。在《文明论概略》一书结尾处甚至写出了一段绝妙的文字：“轻重缓急已经明确，昨天所恼火的事情，今天就变成可喜的现象，去年所喜欢的事情，今天则变成可忧的事，得意变为忧虑，乐园变为苦境，仇敌变成朋友，外人变成兄弟，共喜怒同忧乐，而走向同一目标。”福泽谕吉这种为了伸张国权可以不问是非、不择手段的观点，决定了他后来选择脱亚入欧道路的基本思想倾向。

明治 11 年（1878 年），福泽谕吉发表了《通俗国权论》。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对外武力扩张的主张。他说：“百卷国际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各国交际的道理只有两条：一是消灭别人，一是为他人所灭。”因此，在当时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与明治专制政府的对立斗争中，他力主官民调和，民权服从国权，将人心移向海外，“促使一国人心奋起、感动全体的最好方法，莫如对外一战”，“敌国外患，乃团结人心、强固立国之本的良药”。他又说：“依我之见，主张对外一战则未必是好战，不好战则不忘战争”。在这里，福泽对外扩张的主张，已酝酿着对外侵略扩张的冲动，但只是将它作为转移国内矛盾、振奋爱国心的济世良方，尚未确定具体的目标。

明治 14 年（1881 年）发表的《时事小言》，则标志着福泽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通俗国权论》只是抽象的对外战争的说教，而《时事小言》却是侵略目标直指中国的狂热鼓吹。他分析当时中国的形势是“中国人若不引进蒸汽电信之类文明利器则会亡国，而引进之则政府被颠覆，二者难免其一”，即预测中国要么是亡国（殖民地化），要么是政府被颠覆（发生革命）。他认为日本对此不能坐失良机，“当此（中国）变动之际，我日本国决不能袖手旁观”，而应当以亚洲盟主的地位进行干预。“方今东洋诸国中，处于文明中心，作为魁首与西洋诸国抗衡者，舍我日本国民则为谁耶？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日本的责任。”在《通俗国权论》中认为伸张国权，必须振奋国民的爱国心，其最好的办法是对外一战，但是与比日本武力强大的西方列强

一战则远非现实，于是，在他看来，伸张国权自然就得与侵略中国、朝鲜结合起来。他认为对中国、朝鲜必须“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使其速效我例进入近代文明。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以武力迫其进步”。在这里，侵略是目的，“文明”则是外衣。打着文明的幌子，行侵略之实，是福泽谕吉侵略理论的特点。

明治 15 年（1882 年），在福泽谕吉的主持下，《时事新报》公开发行。他几乎每期都执笔撰写社论或评论。尽管标榜该报的宗旨是本着“独立不羁”的精神办报，但从福泽谕吉为该报撰写的文章来看，其主要思想倾向是积极配合明治政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狂热鼓吹民族沙文主义，露骨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护。

1882 年 7 月，朝鲜人民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袭击了日本公使馆，史称“壬午兵变”。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连续数日发表社论，主张派遣军队，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他污蔑参加反日暴动的朝鲜人民是“文明之敌”，强调“我政略是文明改进的政略，军队亦是文明改进的军队”，为侵略寻找“文明”的依据。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福泽曾申言没有独立的文明化只是为白人服务的奴隶化，独立与文明化二者不可偏废。但此文却对朝鲜的独立只字不提，公然鼓吹侵犯朝鲜的独立，用武力强制所谓“文明改进”，反映了福泽谕吉政治思想的倒退。

那么，如何使日本人民甘当侵略的“文明之兵”呢？福泽谕吉对此煞费苦心。他极力宣扬尽忠报国的思想：“我帝室乃收揽日本人民精神的中心”，“若为我日本国民寻求道德的标准，以我之见，报国尽忠等题目最为适合”。依其说教，尽忠报国须把目光投向海外，“若使我国光辉耀于东西二洋，鸣响（与西洋）比肩独立的英名，则王政维新的功业不仅限于日本国内，而且应将其新鲜活力逞于海外”。他诱惑日本人“去中国一行”，“四百余州（指中国）何患无建业之地……大则为国权扩张，小则有助于一身荣达”。这些说教，对毒化人心、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 世纪 80 年代，欧美列强加紧侵略亚洲的步伐，尤其是英俄之间的角逐最为激烈。这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羽翼日趋丰满，明治政府在本国尚未完成修订幕末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推行“失之于欧美，补之于亚洲”的外交路线和军事路线，正式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此时，福泽谕吉一改对“官尊民卑”的批判态度，以所谓“在野”文人的身分，利用自己主持的《时事新报》的舆论阵地，与政府的大陆政策相呼应，脱亚思想渐趋成熟。

在明治 16 年（1883 年）9 月 20 日至 10 月 4 日连载的《时事新报》社论《外交论》中，福泽分析当今的国际关系是“禽兽相斗相食”的关系。食者为文明国，被食者为半开化国、野蛮国。日本的外交前景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加入吞食“不文明”国的“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共觅“良饵”；二是与数千年来萎靡不振的亚洲古国为伍，同守古风，被“文明国”人所吞食。因此，日本所应选择的道路，只能是第一种途径，即加入帝国主义阵营，成为“亚洲东睡一新的西洋国”。《外交论》发表后翌月，外务卿井上馨亦说：“化我帝国及其人民恰如欧洲诸国及其人民一样，剗切言之，亦即在东洋的地坪上造就欧化的一新帝国”。一个是在野文人，一个是在朝官僚，其言论却不谋而合。

1884 年爆发的中法战争，是欧美列强全面瓜分东亚的前兆。日本朝野的

强硬论者认为：“法国对安南的关系和日本对朝鲜的完全一样，都是要摧毁中国的宗主权。此乃日法联合起来夹击清帝国的良机。”福泽谕吉听到中国战败消息后十分高兴，说：“当今时机是紧急中最为紧急之事。”他撰写《东洋的波兰》一文，文中写道：“未来支那不止于与法国为敌，与欧洲数强国为敌的命运将迫在眉睫……难以期望庞大的东洋老大帝国他日不会陷于瓜分龟裂，为西方数国所分割。”他特意在《时事新报》上转载了当时法国宰相兼外务卿的外交照会《支那帝国分割案》。该照会对欧美列强如何分割中国各省作了具体的推测。其中关于日本的一段文字使福泽谕吉最为倾心：“惟日本之地，逼近支那，值今日欧洲诸强国幸运，十数年来，相助为理，功亦甚巨，应拟公举日本为东道主人，今拟分与日本之方便利益，当以台湾全岛，及福建半省之地，此诚当然之论也，且支那当大明时，福建浙江之沿海，日本兵曾侵掠其地，此事历史亦见事实，此次将其旧地，再悬日章之旗，日本君民，当亦心满意足矣。”不难看出，他是想借《支那帝国分割案》向日本国民提示，日本已被欧美列强接纳为瓜分中国的“食者”行列的一员，并因其地理近便之故，可以充当分割中国的尖兵。即是说，“脱亚入欧”的时机已经成熟。

《东洋的波兰》发表后约5个月，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正式出笼。《脱亚论》是他多年来脱亚意识的总结，是他亚洲观的完成形态。

从《文明论概略》发表的1875年，到《脱亚论》出笼的1885年，仅10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对福泽谕吉来说，却经历了从被压迫民族到压迫民族思想的巨变。这种变化，是在19世纪80年代西欧列强明火执杖地加紧瓜分东亚的情势下，亚洲国家经历大动荡、大分化历史的逼真反映。在明治专制政府的主导下，日本民族走的是一条通过侵略东亚邻国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从而取得自身民族独立并旋即跻身帝国主义阵营的“脱亚入欧”的道路。借用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杀鲷养鹤”一词来譬喻，即“杀”东亚邻国之“鲷”，以“养”日本之“鹤”。撰写《脱亚论》的福泽谕吉，正是日本民族选择这一历史道路的思想代言人和见证人。人们不会忘记，当《脱亚论》出笼后的第10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福泽谕吉称之为“文（明）野（蛮）之战”，并因日方的胜利而高兴得涕泪横流。当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并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时，福泽谕吉立即发表《台湾永久化的方针》一文，主张“对无知蒙昧之蛮党当尽逐放于境外，殖民地上的一切权力应掌握于日本之手，举其全土断然实行日本化之方针”。这样，福泽谕吉作为脱亚论者又表现为殖民地论者。

福泽谕吉脱亚意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主观原因。就其社会原因而言，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士族意识不仅没有得到改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恶性膨胀。如封建士族的本国优越意识和向海外扩张的军国意识，从福泽谕吉的有关脱亚言论中都可以找到它的投影。就其主观原因而言，福泽的文明观、历史观认为，人类史是按野蛮一半开化一文明的阶段渐次发展的历史。在1875年《文明论概略》发表时，福泽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半开化阶段。10年后，即《脱亚论》出笼时，他认为日本已“移向西洋文明”，进入文明阶段，而中国、朝鲜却没有“摆脱亚细亚的固陋”，仍然处于半开化阶段。于是，他认为，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人类的共有物”，国家之分，不过是为了保障生活在其国上上人民的安全之便设置的机构。世界万国本着“有无相通，长短相补”的精神，应均沾

文明开化的恩泽。如果某国固执锁国之见，将世界“共有物”“窃为私有”，那么，凭借武力逼其开国乃是“世界的正理公道”。“如果老大帝国（中国）与朝鲜锁国自守，将世界共有物据为私有，妨碍人类的幸福、文明的进步的话，为世界的正理公道计，则不得不处置之”。福泽谕吉的这些言行，其实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强盗逻辑，是地地道道的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理论。这种“文明侵略论”，是日后日本法西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侵略理论的思想原型之一。

日本主义

爆发于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向来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打败了大中华帝国。这一战争结局，不啻百万磅重型炮弹，强烈地震撼了中日两国的思想界。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爱国志士“公车上书”为标志，中国自此掀起了维新救国的热潮。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弹冠相庆。陶醉于胜利的狂喜之中。过度的民族自恋情结，使一些日本人洋洋得意，忘乎所以，吹嘘“今后四千万同胞已非深窗昏睡的日本人，而是阔步于五大洲的大日本人”，要求进一步实行“大胆的西洋主义”，变“蜃居的日本”为“世界的日本”、“膨胀的日本”。就是在这军国主义狂热鼓吹甚嚣尘上的时代氛围中，各具特色的帝国主义思潮纷纷开闸狂泻，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就是其中代表性的思潮之一。

高山樗牛（1871—1902 年），评论家，本名林次郎，山形县人。东京大学哲学科毕业。求学期间著历史小说《泷口入道》，获《读卖新闻》奖，并和友人一起创办《帝国文学》杂志。毕业后加入博文馆，成为《太阳》杂志编辑骨干。他与井上哲次郎、木村鹰太郎等人共同创立大日本协会，并发行机关杂志《日本主义》，主张以神道对抗基督教、佛教，鼓吹君民一体、忠君爱民。高山樗牛因首倡日本主义而得名，被称为“年轻的帝国主义旗手”。

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是甲午战争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产物。甲午战争的性质是日本由近代被压迫民族转变为压迫民族的、早熟的帝国主义战争。甲午战争的这一本质特点，使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不同于明治 20 年代（1888—1898 年）的国粹主义，具有早熟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都是以日本国家、日本民族为最高价值观念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明治 20 年代的国粹主义是针对全盘欧化的、媚外的“鹿鸣馆外交”而产生的要求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日本主义则不同。用高山樗牛自己的话来表述，日本主义不同于国粹主义之处在于，其一，认为明治 20 年代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争“其眼界囿于国内”，而日本主义则要求开阔视野，“考察广表世界中一国的地位”，认为国粹主义思想“集中在内争，而今后应向外”，不应满足于“保存国粹”，而应当“发挥我日本建国的远大理想，实现我民族的宏大抱负”，自觉地成为“膨胀的国民”。其二，认为国粹主义为“保存国粹”，抗拒西洋思想是一种“排外主义”，而日本主义则主张与欧美帝国主义的价值观念认同。他对日本主义的这一立场表述得十分冠冕堂皇，说：“不应固守我佛独尊的陋见，……对我邦固有的东西，倘若对国家无益有害，则毫不迟疑地予以排斥，大凡世界一切事物，名目不拘于东、西，所在不泥于彼、我，应由‘无私公平’的原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取舍、抉择。”他又说：

“谁言日本主义乃狭量的排外精神之鼓吹耶？日本主义立足于天下之公理，不排外，唯为我。”“就这一意义而言，日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主义。”

如果对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深入一步考察，就不难发现日本主义逼真地反映了整个日本民族在甲午战争后双重的心态：一方面，甲午战争助长了日本国民的自负心理，用高山樗牛的话来表述，甲午战争带有“从根本上动摇幼稚的国民思想，并给国民意识以最明白的觉醒”这一特征。这“最明白的觉醒”，就是确认日本国民具有“奉行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的“膨胀的国民”的资格。在高山樗牛看来，“日本民族历来是殖民的民族、征服的民族、航海的民族”。丰臣秀吉以来浸透武士道精神的封建军国主义，经高山樗牛的撮合，与近代帝国主义的志向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当甲午战争后高山樗牛等思想家意识到日本已成为“世界的日本”之时，在远东地区已存在着远比日本强盛的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于是，他们因甲午战争的胜利滋长蔑视东亚近邻国家心理的同时，又对“白种人”的欧美列强抱着一种畏惧感和疑惑的心情。面对欧美列强加紧瓜分远东弱小民族国家的局势，高山樗牛惊呼：“彼等今日所施于邻邦者，明日就将对准吾人。波涛裂岸，其势不已，人种竞争的最终大搏斗将转向我帝国列岛。”日本主义的特点，就是用“人种竞争”的眼光来看待帝国主义：一方面，他认为“白种人”的帝国主义“暴露了所谓道义和宗教都不过是兽欲的假面具”，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人道和世界和平为名横行不法”。于是，他在当时就不相信日英同盟的可靠性，因为这是“异人种间的同盟”的缘故。对作为“白种人”的美国侵占菲律宾的行径，亦持“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要求日本国民成为“膨胀的国民”，强调说：“没有帝国主义的征服或殖民，常会遭到失败。”因此，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出“黄种帝国主义”的倾向。

“大日本膨胀论”

德富苏峰（1863—1957年），近代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原名猪一郎，熊本县人。他的思想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在这之前，提倡平民主义，反对藩阀政治，有一定积极意义；在这之后，急速地转变立场，成为狂热地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军部势力紧密勾结，1942年担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及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1943年因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勋章。日本战败后曾被指控为战犯，解除公职。罪名撤销后从事著述，一生著书300余册。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言论界斑驳陆离的帝国主义思潮中，“膨胀”一词是常见于日本报刊、真实表现当时国民心态的时髦词语。不妨说，“膨胀”一词是体现当时日本“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上述高山樗牛就用过“膨胀的国民”这一提法，而对“膨胀”一词厚爱有加、使用频率最高的，莫过于德富苏峰。

明治政府挑起甲午战争前一周，德富苏峰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鼓吹甲午战争的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通过战争“可获得很多战利品”。这“战利品”指什么呢？他历数道：“在东洋建立国民膨胀的根据地，打通膨胀的沟渠，排除膨胀的障碍，让世界认识膨胀的日本。”这样，在国际上可“与其他膨胀的各国国民处于对等的地位，在世界的大竞

场上展开角逐”，在国内则可达到“巩固国民的统一，深化国民的情神之目的”，从而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飞跃为膨胀的日本”。“膨胀的日本”就是德富苏峰企图通过甲午战争塑造的帝国主义日本的国家形象。他的用意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现“国民形象的‘膨胀’”。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惟一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随后不停顿地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迅速建设成为东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力的上升，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民形象”，成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课题。为此，以德富苏峰为首的欧化主义文化团体“民友社”，与陆羯南、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为首的国粹主义文化团体之间，在甲午战争前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德富苏峰认为，要成为英国“大国民”那样的“伟大的国民”，就必须彻底地否定日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全盘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便取得与西方国家“大国民”同等的地位。而国粹主义文化团体则认为，全盘西化势必削弱日本国民的“自信心”，他们主张“国粹保存主义”，挖掘并利用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涵养日本“大国民”的精神素质。如志贺重昂的名著《日本风景论》，从地质学、地貌学、生物学、气象学等角度，着力表现日本环境的“潇洒、美、跌宕”，以求唤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与自尊心。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自身理论的缺陷，这两个文化团体都未能解决这一课题。就国粹主义文化团体的主张来说，正如民友社所指出的那样，日本“风景美”不能构成日本与西洋对等的充足依据，因为“我邦决非靠富士山、琵琶湖自然美可救”。那么，按欧化主义者的主张来做又怎样呢？1883年民友社机关杂志《国民之友》社论《日本国民之品格》感叹道，尽管日本采用了西方文明诸制度而增强了国力，显示了伟大的进步，但并未赢得西方国家的尊敬：“在东洋，最进步、成长最快、最开化、最有知识、兵力最强的一大国民，仍不免遭白人的轻侮。”这种杂揉着懊恼、怨恨的言辞，反映了当时日本为修改幕末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国家进行长期交涉而屡遭挫折的焦灼情绪。

精神分析学告诉人们，焦虑往往会转化为“投射”。个人会把自己令人不快的冲动归因于别人，即将内部危险外在化，而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甲午战争前日本朝野的普遍心态，是认为“白种”文明人之所以使日本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努力每每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把已经“文明开化”的日本国民与日本周围弱小民族“野蛮人”等同视之的缘故。最具代表性的言辞是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该文抱怨日本“所不幸者”是有两大“恶邻”——“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以西洋文明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因此必须“衷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德富苏峰进一步发展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主张通过时邻国的侵略战争以显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甲午战争开战后不久，他在《国民之友》上撰文写道：“吾人……站在世界的面前，决不可忘记决战。何之故？为了朝鲜的改革，为了北京城下之盟，为了几亿的赔款……倘若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便焕然冰释。我邦的真实形象，我国民的特色，亦好比雾散天晴，山色如洗之分明。”德富苏峰活像一名赌徒，他把向世界显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的“赌注”押在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上。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陆海两战日军连连得手。当旅顺陷落时，德富苏峰好像赢了满贯从赌场出来，神气活现他说：“我等面对世界，不仅不愧为日本

人亦当以日本人自夸。……日本人之大名，好比戊辰战争后萨长人之名，……好比滑铁卢大战后威灵顿之名，到处意味着名誉、光荣、勇敢、凯旋和胜利。所谓‘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此实乃当今日本国民在世界之情态也。”甲午战争对德富苏峰来说，好比“膨化器”，“膨胀”出日本“大国民”的形象来。

第二，实现日本“商权”的“膨胀”。德富苏峰是一个早熟的帝国主义者。在日本尚未在经济上具备帝国主义条件的情况下，他已看到在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中获得“商权”的重要性。当日军占领辽东半岛时，他以随军记者身分同去，发表感想说，“辽东半岛之旅行，实在令人愉快”，因为日本获得了扩展商权的“新领土”，以致在三国干涉下被迫还辽时“欲哭无泪，深觉惋惜”。他鼓吹“膨胀的日本，不独凭之以兵力，亦必须凭之以商权”，“进入19世纪后期，正如商业是一种战争，战争亦是一种商业”，并预见“此种奇妙的兵商二要素的结合”，到20世纪后将更加突出。作为思想家的德富苏峰的这些言行，揭示了甲午战争决非军事封建性的单纯扩张领土的战争，它具有为争夺市场、原料地而有意识地参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明确意向。

第三，实现帝国主义“精神”的“膨胀”。德富苏峰继承福泽谕吉文明侵略论思想，鼓吹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是“对世界上顽冥不比思想的一大打击，让野蛮社会沐浴文明的恩光”。这是站在所谓“文明”的立场，给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国家披上正当化、神圣化的外衣。从旅顺归国后，他在1895年7月撰文把日本比作古代罗马帝国，认为日本如同古罗马对地中海各国的影响那样，日本民族应对东亚各国以及南太平洋地域负有普及“文明”的义务。他解释道，在东亚诸国民中“具有政治与组织能力的，惟独我大日本国民；具有国家观念的，亦惟独我大日本国民。”他主张日本同西方列强平等竞争，实现日本民族精神“膨胀”的历史使命。

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和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都是特殊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在日本尚未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特征的历史前提下、受西方列强瓜分远东局势的刺激而“提前”产生的具有早熟性的帝国主义理论主张。二者的共同点，和福泽谕吉一样，自觉地接受西欧国际体系的“二重原理”，通过不义的甲午侵略战争，转嫁民族危机，以实现“大日本”“膨胀”的目的。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德富苏峰追求的是与西方列强帝国主义角逐的“对等性”，而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则表现为“黄种帝国主义”倾向，隐含着以黄色人种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抗乃至取代“白种”帝国主义的意味。甲午战争后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近代日本的历史道路，正如德富苏峰的思想所揭示，是“大日本”不断“膨胀”以至破灭的过程，而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鼓吹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从“白种”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亚洲黄种民族的“理论”，则不妨说是高山樗牛“黄种帝国主义”理论的承继与再版。

“东洋卢梭”的沉思

中江兆民（1847—1901年），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倡导自由民权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原名笃介，出身于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871年留学法国，潜心研究哲学、史学和文学，深受法国民主主义思

想的影响。归国后，开设法文学塾，前后受教育者达 2000 余人。1880 年参加自由党，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主编《东洋自由新闻》。他经常在《东洋自由新闻》和《政理丛谈》等报刊上发表评论，宣传自由民权思想。特别是他译述的卢梭《民约译解》（即《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梭民约论。”许多热血青年，都是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的。中江兆民也因此而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美名。

中江兆民在明治思想界的独特之处和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为当时风靡日本全国的“脱亚入欧”思潮所诱惑，能够用冷峻的眼光对本民族进行审视和展开深沉的思考。他感叹日本人缺乏“独创的哲学”，因此“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他指出：“从海外各国的角度来观察日本人，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然而他们浮躁和轻薄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这里。”（《一年有半》）福泽谕吉、高山樗牛、德富苏峰等人正是这种“浮躁和轻薄”的文人，他们很能顺应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帝国主义思潮，从本民族眼前狭隘的实利出发，不约而同地投入西欧国际体系的怀抱，而中江兆民高瞻远瞩，从日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认为，“我们日本正应该省悟自己的天职是什么，应该考虑自己百年后的命运如何”，因此，“不论我们国家是怎样的强盛，邻国是怎样的软弱，假如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到邻国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外表的事物终归是不能战胜理义的”。日本近代帝国兴衰的结局，完全证实了中江兆民的远见卓识。

发表于 1887 年的《三醉人经纶问答》，是作者对日本国家“经纶”——国家前途的正确方向进行深沉思考的国际政治思想名著。此书满含浓厚的文学兴味，它设想三醉人——民主主义者“洋学绅士君”、侵略主义者“东洋豪杰君”及自由主义者“南海先生”，把酒畅谈天下大势，展示了明治时代日本民族探索前进道路时的真实心境和政治思潮。

洋学绅士主张日本成为完全的民主国家，完全的文化、道义国家，成为“民主、平等、道德、学术的试验室”。他认为政治上必须遵循“进化的法则”，这就是由专制主义到立宪制度，再到民主政治。“啊！民主制啊！民主制！君主专制，愚昧而自身尚不知其过；立宪制虽知其过，但也仅改了一半；民主制光明磊落，胸中没有半点尘污。”“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可称为人的只有王公贵族，余者百万生灵，均为精神不健全的酒囊饭袋而已！”而在立宪制度下，人民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由于设有君主和五等爵位，所以在一国的民众当中有一种更尊贵的东西，大大有别于其他东西，这就是在平等的大义上终究不免有所欠缺。”就这一点来说，天皇制不消说也是愚昧、未开化的制度。惟有民主共和制，实现了“政事的进化”。绅士君引吭高歌民主制：“你头上只有青天，脚下只有大地，心胸开阔，意气风发。要说时间的话，那无始无终，不知前后有多少亿的永劫就是你；要说空间的话，那无内无外，不知左右有多少亿万里的太空就是你。”这就是绅士君的理想——让日本走彻底民主化的道路。

从这一彻底民主化的立论出发，绅士君产生了第二个设想，即日本必须成为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绅士君认为，“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没有其他主人时，国名只不过是地球某部分的名称而已”，“我与他人没有区域的界限，不会发生敌对的意识”。因而，可以说民主制

“把世界人类的智慧与爱情融为一个大的圆形整体”。绅士君引用康德的话说，要想得到一切国家停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好结果，除非各国都采用民主制，否则是不可能的。各国既已采用民主制，此时，人民的身体不复为君主所有，乃自己所有。假如人民归自己所有、能自己作主，岂有自相屠杀之理。作者中江兆民借绅士君的嘴对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19世纪的今天，以武威为国家的光荣，以侵略为国策，强夺别人土地，杀害别国人民，一心想当地球的主宰者的国家，真是疯狂的国家啊！”他认为日本不能、也不应加入帝国主义强盗队伍的行列，因为“疆土狭小、民众寡少的国家，如不以道义自守，则无其他可凭恃”。“诸如区区一小国的人民，如今仅仅出兵十万，遣军舰百十艘，运到遥远的国外去侵占土地，欲用以扩大本国经济的流通，那么，这不是愚蠢便是发狂。”日本的国家前途应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制度，把人身的自由归还给人们，拆除城堡，撤消军备，对他国示以无杀人之意。同时，示意相信他国也无此意。使举国上下成为道德的花园、学术的田圃”。进而“使地球上各国合而为一个大家庭”。

当绅士君谈到这里的时候，豪杰君冷不丁地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有凶暴的国家，乘我们撤除军备之机，遣兵来袭，我将如何对待呢？！”

绅士君说：“据我所知，绝无如此凶暴的国家。如万一有之，那么我们只有各自为计。但是，我所希望的是，我们不持一件兵器，不带一粒子弹，从容他说：‘我们对你们没有做过失礼的事情，幸而我們也没有受谴责的理由。我们国内实施共和制，没有争执。我们不愿你们干扰我们的国事。你们赶快回去吧！’他们仍不听，荷枪实弹对准我们时，我们大声疾呼：‘你们为何如此无礼无义！’于是饮弹而亡，别无良策。”

豪杰君听后揶揄道：“绅士君数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论世界的形势，讲政治沿革，而最后一着只不过是让举国人民拱手在敌弹下送死而已。说得太轻巧了！有名的进化之神的效验果真如此吗？”

豪杰君认为绅士君的意见不过是书生的空泛之论，在英、法、德、俄等国的百余万军队蚕食亚洲之际，“高唱区区的自由平等的大义，述说四海兄弟之情”，真是愚蠢之极。他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要求得富强，必须走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他的观点类似于福泽谕吉“杀鳅养鹤”的论调。他隐晦地暗示，像中国这样的邻国，“国土非常辽阔，资源极其丰富，但它又非常衰弱……虽有百余万军队，但杂乱无训练，一旦危急毫不顶用……这是一只极肥的上供用的大牲牛。这就是天赐给小国使其果腹的食饵。为什么不快去割取一半，或割取三分之一呢？……把该国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割取过来为我国所有，我们将成为大国！物丰人众，加之施以政治教化，可建成城垒，可铸大炮，陆地可动员百万精锐之师，海上可排出百千艘坚舰，我小国一变而为俄国、英国……夺取以自富自强，比不夺取以自灭，岂不是好得万万倍吗”！

对这些观点，南海先生说：“绅士君的民主制度和豪杰君的扩张主义，都是由于对欧洲强国的形势过虑而产生的。”他否定了这些极端观点，认为现实的良策是，“无论世界何国都要与之和好，万不得已时，也要严守防御的战略，避免远征的劳苦和费用，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对待亚洲邻国，主张“我们最好与之结为兄弟邻邦，缓急相救，各自可以自动援助。妄图大动干戈，轻率以邻为敌，使无辜民众死于枪弹之下，那是下策”。

这个南海先生可以说是作者中江兆民的化身。当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

人纷纷主张日本走“脱亚入欧”的道路、加入西欧国际政治体系时，中江兆民却针锋相对地对西欧国际体系的“内部原理”和“外部原理”展开了批判。如对中国，福泽谕吉视其为“恶友”，作者则借南海先生之口，表达了友好相处的美好愿望：“如像中国，无论从其风俗习惯来说，抑或从其文物风格及其地势来说，作为亚洲小国的我国，应该与之友好，巩固国交，绝不可以怨相嫁。到了我国特产日益增加、货物丰富的时候，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在是我们的一大市场，是取之不尽的利益源泉。不考虑这一点，而按一时发扬国威的念头，以一言不合为借口挑起争端，我看是最坏的下策。”面对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的严峻情势，南海先生主张日本及其他亚洲人民奋起自卫：“假如他……果真敢于狡猾地来侵犯的话，我们只有全国皆兵，竭力抵抗，或据守要地，或突然进击，进退出没，变化莫测。因为他是客，我是主，他不义，我是正义。因此，我国军队，不论将校兵卒，同仇敌汽，士气旺盛，有什么不能自卫的道理呢？！”“我们亚洲各国的士兵，想用他们征伐时则不足，用以防守时则有余。所以，平时要加紧训练、演习，养精蓄锐，那么，为什么要担忧不能自守呢？！为什么需要按绅士君的计策束手待毙呢？！为什么需要按照豪杰君的策略招致邻国的怨恨呢？！”

《三醉人经纶问答》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逼真地表现了日本民族在近代青春期的理想与苦恼。从对外观的角度来看，在西风东渐的形势下，是“亚洲连带”、共同抗击殖民侵略，还是通过脱亚入欧而加入西方国际体系、与西方列强共同侵略亚洲？对这一重大课题，本书着力表现了当时历史条件的严峻性和日本人民选择历史前进方向的艰难性。书中的绅士君主张将日本建成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无疑体现了作者的美好理想。但作者不得不承认，“人类进化过程决不是按几何学所规定的直线前进”，绅士君的理想只能是“尚未实现的思想上的灿烂瑞云”，而“瑞云是未来的祥瑞，只能以远眺为乐”。“绅士君，绅士君，思想是种子，大脑是田地。你真正喜欢民主思想的话，可以口述，可以笔书，把种子播撒到人们的脑髓中。这样，几百年后民主思想也可能在国内茂盛地生长起来。现在帝王贵族的花草正扎根于人们的脑髓中，只有一颗民主的种子在你脑髓中萌芽；如果想由此一下子收获民主的硕果，岂不荒谬吗？！”这段话，既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表现了作者对理想难于变成现实的无奈及苦涩的心境。书中的豪杰君是近代日本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在西方列强紧逼东亚的情势下，为了使小国日本不被吞灭，而提出小国变大国、变强国的对外征伐的政策。他的思想继承了幕末吉田松阴等武士的衣钵，以牺牲弱小的邻国以求得民族的自我拯救。作者中江兆民认为豪杰君的对外侵略主张不符合人类的“正义”，但豪杰君那种对邻国“夺取以自富自强，比不夺取以自灭，岂不是好得万万倍吗”的咄咄逼人言论，比起绅士君“我国人民不持一枪，不携一弹，希望死于敌寇之手，是为了使全国人民化为一种活的道德，成为永垂后世的模范”的迂腐之论，更具煽动国民心理的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作者通过南海先生，批判了西欧国际体系，否定了日本“脱亚入欧”的道路，这是全书进步的基调。但南海先生的见解也略显得苍白无力，以至于作者在全书的结尾安排他终日饮酒浇愁而已，这正是因为在当时“有理者无力，无理者有力”的历史大环境下，深感历史二律背反逻辑捉弄人智的威慑力。

第 13 章

大陆政策

祸心毕露

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向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和扩张。明治年间制定的日本“大陆政策”，确定了 5 个侵略步骤：第一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征服朝鲜；第三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征服中国内地；第五征服世界。

明治政府制定这样的“大陆政策”，决非偶然。从封建时代以来，日本的统治者就曾一再鼓吹过“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梦想征服世界。

这毫不奇怪，从思想根源上说，这是同掌握统治权力的、封建武士出身的人物头脑里的封建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日本封建武士统治国家时，有两大基本指导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二是，要实现“武国”观念，以武力作为立国的基础。这种“武国”的特色，就是崇尚军国主义，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的“荣耀”。

首次明确提出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亚洲狂妄计划并力图付诸实施的，当推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在初步完成日本的国家统一之后，就企图先占朝鲜，而后征服中国和印度，定日本国都于北京。1592 年，丰臣出动陆军 19 万人、水师 9000 人，自釜山登陆，逼近汉城、平壤，这就是文禄之役；1597 年，他又出兵 14 万，大举侵朝，史称“庆长之役”。但两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兴起的“海外雄飞论”及“尊皇攘夷论”中，均包含有对朝鲜、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桥本左内、岛津齐彬等人。尤其是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就提出：“为今之计……开垦虾夷（北海道），夺取满洲（中国东北）、朝鲜，吞并南方，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他强调说，“方今急修武备，一旦军舰大炮大体充实，即可开垦虾夷……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琉球……责成朝鲜纳币进贡……北则割据满洲之地，南则占有台湾、吕宋诸岛（菲律宾）”，乃至占据整个中国及“君临印度”，“使神功（皇后，日本神话中开拓疆土的先驱者）未遂者得遂，丰国（指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吉田松阴对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影响极大，出于松阴门下的被授爵、赠位者多达 37 人，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是其中最著名者。日本帝国的统治集团，就继承了丰臣秀吉、吉田松阴等人的向世界扩张的思想。明治天皇即位时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就明确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表露了向外扩张、用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

明治天皇（1862—1912 年），1867 年即位。在 1871 年后接受“刚健”的武上教育，受训掌握了剑术、马术、角斗术等，从此崇尚武功，好勇狠斗。后半生与军国主义紧密结合，是大陆政策的直接推动者，是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日本帝国的最高统帅。

明治天皇素以继承神武以来所谓“兼六合”、“掩八纮”即征服亚洲乃至世界为己任。他一年四季穿着旧式军装，骑高头军马，衔“三八”枪子弹

壳制作的烟嘴，在陆军大学毕业典礼或军事训练中出头露面；有时还亲自参加实战演习，召见士兵，到处鼓吹宣扬“国威”、扩张“国运”，为日军官兵参加侵略战争打气。

日本明治维新后，虽然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保留着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因此，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也就把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的殖民政策和军国主义，在实践上奇特地融汇起来，变成了日本近代外交、特别是对邻近国家关系的主线。

觊觎朝鲜

“征服朝鲜”，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侵略朝鲜，不仅为日益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对外经济扩张所需要，而且对日本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当时，朝鲜在政治上处于对中国清朝政府的从属地位。而朝鲜所处的地理位置离日本最近，在日本统治集团眼里，朝鲜又是侵略中国大陆的一块跳板。他们将朝鲜称为“渡满桥梁”。正因为这样，明治政府刚成立不久，其内部就有人积极主张“征韩”。

1870年8月，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在《朝鲜论稿》中讲得十分明确，他说：

皇国乃是绝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皇张国威，乃最大难事。然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接靺鞨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取万国之本。若使他国先鞭，则国事于此休矣。且近年来，各国也深知彼地之国情，频繁窥伺者不少，既如鲁西亚（俄国）者，蚕食满洲东北，其势每每欲吞朝鲜，皇国岂能有一日之轻却疏忽，况列圣垂念之地焉。

此外，同年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在征伐朝鲜的建议中，也明确地谈到，“4年前，法国攻朝鲜，取败刃，懊恨无限，必不使朝鲜长久矣。又，鲁国（俄国）窥窃其动静，墨国（美国）亦有攻伐之志，皆垂涎彼金谷云尔。皇国若失斯好机会而与之匪人，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故臣痛为皇国唱靺鞨伐也”。白茅还认为，“伐朝鲜，富国强兵之策，不可轻易以糜财蠹国之论却之”。相反，伐朝鲜不仅可以“大练我之兵制，又辉皇威于海外，岂可不神速伐之乎哉”。这就是日本明治初年之所以极力企图“征韩”的根本原因。

1868—1870年，木户孝允多次提出“征韩”的主张，最先鼓吹向外侵略扩张，受到西乡隆盛的反对。1871年，大村益次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提出“征韩”时，也受到西乡的反对。可是，1871—1873年，当木户孝允作为副使、随大使岩仓具视率领的政府使节团赴欧美考察期间，日本朝野又兴起了“征韩论”。留守政府中的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和板垣退助等想用侵朝战争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借以解决封建武士出路问题。这一主张遭到回国后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等人的反对。虽然木户孝允早在1868年就提出“征韩”的主张，但经过出国考察改变了主张，认为日本当务之急应以整顿改革“内治”为主，反对立即侵略朝鲜。围绕着“征韩”问题，明治政府官僚分成两派——“内治派”与“征韩派”，并且进行了激烈的政争。最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内治优先”派取胜。他们采用王政复古时使用过的手法，弄到一份敕旨，利用天皇权威，让岩仓具视代理三条

实美大政大臣，迫使主张征韩的西乡派下野，改组了政府。这场政争，史称“明治六年十月政变”。

西乡隆盛 10 月 23 日所提出的辞呈被批准，政府保留了西乡陆军大将的职位，而解除他的参议和近卫都督职务。板垣、后藤、江藤、副岛 4 参议也在同一天提出了辞呈。25 日，政府任命工部大辅伊藤博文为工部卿并担任参议，进而任命海军大辅胜海舟担任参议兼海军卿。

由于西乡的辞职，近卫兵发生动摇，军官一个接一个地辞职。据《明治天皇纪》记载：“诸如步兵士官，告假者已过其半”，“辞职而去者甚多，近卫士官因此几成一空”。辞职而去的官兵，多来自萨摩藩和土佐藩。巡警之中也出现了许多辞职者。数天中，西乡一直手持一杆猎枪，既未与下野参议图谋后事，也未组织辞职的近卫军官。28 日，他只身一人飘然走向鹿儿岛。

其实，日本统治集团两派之间在“征韩”问题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所谓反对“征韩派”的“内治派”，在原则上也赞成“征韩”，仅是在“征韩”的方法和时间上有所不同而已。即不同意“即征”，而主张“缓征”。

由于当时日本人民斗争高涨，反动封建士族作乱，加之政府财政困窘，“征韩论”不得不暂时收敛，“征韩”之争宣告结束。

江华炮声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朝鲜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列强都在垂涎待机夺取这块重要的战略地带。从南方北上的有英国、法国；从北方南下的是俄国；从东方横渡海洋的是美国。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依靠地理上最为近便的优越条件，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决心抢先侵占朝鲜。日本侵占朝鲜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外交、军事活动过程。

1869 年初，日本派遣樋口铁四郎为使节，前往朝鲜釜山，把日本维新的事实通知朝鲜，并要求建交。但是，日本在给朝鲜的通知文书中，改变了 1609 年朝日两国缔结的《己酉条约》所规定的文体和印章，而屡用“皇”、“敕”的字样。因为对朝鲜来说，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皇”、“敕”的字样。日本明治初年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屈从欧美，侵略朝鲜和中国。统治集团的“征韩论”，早已引起朝鲜政府对日本存有戒心。为此，朝鲜政府不仅拒绝接受文书，也不接待来使。

日本政府为了准备以后侵略朝鲜，于 1870 年初，派佐田白茅和森山茂前往朝鲜。佐田是十一贯坚持“征韩论”者，很早就被积极主张侵略朝鲜的木户孝允所赏识。1870 年春，佐田回国，向日本政府上书，叫嚣“征韩”。认为征伐朝鲜“必可不出五旬而虏其国王矣……大院（君），七纵七擒，实易……”如果清政府“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

佐田还说，征伐朝鲜的好处是：“伐朝鲜有利而无损……故伐朝鲜者，富国强兵之策也。”他还从“安内以攘外”的角度说：“今皇国实思兵之多，而不患兵之寡。诸方兵士，……颇好战斗，翘足思乱，或恐酿成私斗内乱之忧，幸有朝鲜之举，用之于斯，而泄其兵士郁勃之气。”他要“屠朝鲜”、“伐中国”。这个上书也透露了日本借助对外用兵，以防止“私斗内乱”，即“攘外以安内”的意图。

1870 年 5 月，森山茂也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建议书。这份建议书认为，

1592年丰臣秀吉征讨朝鲜的祖法是治国良策，是避免内乱的必要措施。

1873年，朝鲜政府内部也发生了一次政变。大院君执政的10年间，在对外问题上强硬地推行了斥洋和斥倭政策。但是，1873年12月14日，崔益铉向国王上疏，猛烈抨击大院君及其政策。国王高宗在闵妃的怂恿下，认为该上疏是“出于衷曲”，“极为嘉尚”，便于1873年12月24日宣布国王亲政，把自己的父亲大院君赶下台。从此，闵妃一派掌握实权。

1874年8月11日，被闵妃一派收买的新任领议政李裕元出面攻击大院君的对日政策。他颠倒黑白地上奏国王说：“我国与日本，结邻通交已300年……”建议政府对釜山前训导安东峻，进行严肃正法。闵妃一派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借口实行所谓的“开国政策”，把忠实地执行大院君对日政策、以倭学训导安东峻为首的一大批人定为“罪犯”。在“梟首警众”的借口下，把安东峻处死，首级挂在釜山倭馆门前，向日本政府献媚妥协。以安东峻处死为转机，结束了大院君强硬的对日政策。

日本政府看到闵妃一派软弱可欺，更加露骨地侵犯朝鲜的国家主权。日本政府根本不想把朝日关系置于平等的地位。1875年，森山茂要求向朝鲜政府呈递文书。闵妃一派原是要接受该项文书并接待森山茂的。但是，由闵妃一派新派去的东莱府使对森山茂的突然到来，不知所措，请求中央政府指示对策。当时，在朝鲜中央政府内部，还有些大院君派的人物，他们坚决反对闵妃一派的对日政策。大院君也从外地返回汉城，监视闵妃一派的动向，使闵妃一派充当日本代理人的意图难以实现。于是，高宗不得不召见原任和现任大臣，征求他们的意见。可是，闵妃派的大臣因受到大院君及其一派的压力，也不敢公开表明态度。结果，作出了模棱两可的答复，致使森山茂不能呈递文书，返回日本。

日本政府通过外交尝试，看中了朝鲜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虚弱。另外，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暂告解决之后，特别是经过1873年中日交换条约批准书之际，日方摸清了当时中朝所谓“宗属”关系的底细。认为此种关系“徒有虚名耳”，从而敢于从朝鲜下手。同时，日方想抢在沙俄之前，抢先占有实力地位。1875年2月，即森山茂请兵示威之前，日本驻俄国公使榎本武扬便已经在详细地考察了英俄在巴尔干的矛盾、以及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之后，向政府提出，乘俄国无力实行武装干涉之时，全力以赴地出兵朝鲜，占领“对马对岸之一岛或一地”，以确保向大陆扩张的“战略要点”。榎本的建议“对日本外交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1875年4月，驻釜山的日本外务少丞森山茂向外务卿提议，乘朝鲜“内讧”之机，“派遣一两艘军舰”，以在对马和朝鲜之间测量海路的形式进行示威活动，以军事压力迫使朝鲜对日开放。其手段与办法，可谓与当年欧美国家迫使日本开国的手段完全一样。

5月25日，日本政府派遣“云扬”号、“春日”号、“第二丁卯”号3艘军舰，驶往朝鲜近海。“云扬”号闯入釜山，并不顾朝鲜地方当局的抗议，旋即沿东海岸进行示威性的水域测量。接着，又在朝鲜西海岸进行同类活动。9月20日，“云扬”号再度驶往京城附近的汉江河口，直接构成了对朝鲜国都的威胁。“云扬”号派出小舰船，逼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朝鲜海防军立即开炮，击退入侵之敌。而日军则于当日午后占据了江华岛对岸的永宗岛，并摧毁了当地朝鲜守军的炮台。舰长井上良馨少佐，派兵登陆，纵火焚城，

劫走大炮，杀死朝鲜军民 35 人。

江华岛事件完全是日本蓄意制造的侵略朝鲜的导火线。从 1866 年的“丙寅洋扰”和 1871 年的“辛未洋扰”以来，江华海峡一直是朝鲜国防的要塞地区，事先未经许可，任何船只都不能通过。“云扬”号故意不通知朝鲜，非法驶入江华海峡。后来，日本为“云扬”号事件造理由说：“于 9 月 20 日正在通过该国江华岛附近之际，不意受岸上发来炮火所击。”

其实，“云扬”号的派遣是根据广津弘信的建议，由日本外务省和海军省决定的。正如日本史学者渡边胜美所说：“虽把受炮火所击辩解为既突然，又完全出乎意料。但受炮击并非突然或出乎意料，而是预谋盼望受炮击。所以，我认为受炮击不仅不出乎我国意料，而且是我国所盼望的。”

日本政府接到“云扬”号事件的报告后，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发表公报，叫嚷出兵朝鲜。当时，曾以反“征韩派”人物著称的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也认为，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绝好的借口”，以此“上奉天子，下酬万民”。

1876 年 12 月 9 日，日本政府决定派陆军中将、参议兼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元老院议官井上馨为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前往朝鲜处理“云扬”号事件，并与朝鲜进行修好谈判。

然而，由闵妃一派控制的朝鲜政府，在发生“云扬”号事件后的第三天，还搞不清该事件的真相。议政府启言：“异舶之溯入内洋，未知其意之何居，系何国之人，缘何来泊。”第二天，三军府也上书说：“与年前抢掠之番船一类也。”

1876 年 1 月 6 日，黑田清隆一行，率领 800 名水兵；乘坐 3 艘军舰和 3 艘轮船，从日本品川港起程前往朝鲜，准备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

日本的这一侵略行径，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赞赏。事前，日本政府曾将侵略朝鲜的计划通知驻日各国公使，并得到了支持。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在对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谈到这件事时寡廉鲜耻地说：这一举动“与贵国佩里提督来到下田时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平安将美国人泰勒所著的《佩里提督日本远征记》一书赠给井上馨副使，以壮其行，并怂恿说，只要你读好这本书，并照此行事，定能取得成功。美日之间经过一番授受之后，日本政府便模仿着西方列强向东方进行殖民侵略的手法，开始了向邻国的侵略活动。

1876 年 1 月 28 日，朝鲜政府派申橈和尹滋承为正副全权代表去江华府，同日本全权代表谈判。日本为了达到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谎说已派来 4000 名日本兵，随后还将增派 2000 名。2 月 11 日，正值日本纪元节，他们借口鸣放礼炮，实际上是以乱放舰炮进行威胁。他们还恐吓说：“谈判一旦决裂，日本将立即开战。”

朝日两国代表共进行了四次谈判。在第二次谈判时，黑田清隆向申棉递交了条约草案，其中包括 13 项条款。

直到第二次谈判后，朝鲜政府才得知日本政府提出条约草案的全部内容和黑田清隆以武力威逼的卑鄙目的。从 2 月 14 日开始，国王召见原任和现任大臣，咨询对策。金炳学说：“彼国人虽云修好而来，许多情状非修好，实构衅也。”朴珪寿也说：“日本称以修好，而带来兵船，其情状叵测矣。”

古同资译：《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上海华通书局 1931 年版，第 125 页。

[日]渡边胜美，《朝鲜开国外交史》，第 229 页。

[朝鲜]《高宗实录》，第 13 卷，丙子 13 年正月 20 日。

2月18日，软弱腐败的朝鲜政府研究和审议日本提出的《修好条规草案》后，表示在原则上同意订约。2月19日，朝鲜政府决定委任申梲可“随时裁断之”。这个《草案》所涉及的事项，本应由主权国家朝鲜自己作出决定，但在军事威胁下，朝鲜政府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接受了这个《草案》。

1876年2月26日，在江华府签订了所谓《朝日修好条规》，史称《江华条约》。1876年8月24日，日本代表宫本小一又强迫朝鲜代表赵寅熙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8月24日，宫本小一在给赵寅熙的信中写道：在条约《附录》内“当揭载紧要条件”，至于不便于公布的，应当删去，另作《别录》交付，“以相约束”，而其“权理”则不应当异于《附录》。《江华条约》，《附录》、《规则》和《别录》这些日本强加给朝鲜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 首先载明“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保有平等之权。从表面上看，好像日本为朝鲜争得了“自主”之权，其实并非如此。日本玩弄的花招是，首先否定中国和朝鲜的“藩属关系”，并使之断绝，然后再把朝鲜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2. 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等港口，自由通商。日本占据这三个港口，也就等于占据朝鲜西南三面的主要出入口。这三个港口，无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3. 规定两国自由贸易，“两国既经通好，彼此人民各自任意贸易，两国毫无干预，又不得限制禁阻”，“朝鲜国人民所买得于日本国人民货物，或其赠遗之各物，随意使用无妨”；

4. 日本有权在朝鲜京城（汉城）派驻公使，同时在各开放口岸，“随时设置管理日本国商民之官，遇有两国交涉案件，会商（由）所在地方长官办理”。这是在朝鲜通商口岸设置日本领事的规定；

5. 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刑事案件，即日本国人民在朝鲜指定港口如果犯罪，并牵涉到朝鲜人民，皆归日本官吏审理。在审理中应根据其本国法律裁决。这是照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第6条规定。对民事案件则规定：“倘有两国商民欺罔炫卖等事，两国官吏严拿逋债商民，令偿还欠债，但两国政府不能代为偿付。”这也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第6条的有关规定完全相同。这样，日本在朝鲜就取得了“领事裁判权”这一特权；

6. 条约规定：日本纸币在朝鲜流通，朝鲜铜币向日本出口。日本国人民可得（以）本国现行诸货币，与朝鲜国人民所有物品交换。于是，在朝鲜指定的各港口，两国人民不仅可以互相通用两国货币，而且日本人可以将朝鲜铜币运出口。这样，就使日本货币得以在朝鲜自由流通，并能掠夺朝鲜的铜币。在日本货币中，还包括不能兑换的纸币，从而给朝鲜货币制度带来了二无化的弊端，使朝鲜经济制度陷于混乱的局面。因为朝鲜的铜币是含金的，它的实际价值比名义价值要高5倍。日本商人利用这种比价差，从中渔利，使朝鲜铜币大量流入日本。由于开放贸易，不仅引起朝鲜铜币大量外流，还使日本纸币大量流入朝鲜，从而引起朝鲜币值下降，造成物价高涨。这是日本效仿美国哈里斯在日本采用的政治手腕。

《江华条约》不仅仿照19世纪50年代美国强迫日本所签订的《日美和好条约》和《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内容，而且有些条款比日美条约规定得更具体，更具有不平等的性质。这从以下几个条款就可以看得出来：

1. 《江华条约》第7款规定，允许日本在朝鲜沿海进行测量和绘制海图。

这不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都为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提供了方便条件；

2.《规则》第8则规定：“朝鲜国政府或其人民，除指定贸易口之外，欲运输各物件于他口岸，得雇日本国商船。”这使日本商船在朝鲜各个口岸可以作运输生意，几乎垄断了整个朝鲜的海运事业；

3.《规则》第6则规定：“嗣后于朝鲜国港口住留日本人民，粮米及杂谷得输出入。”这一项则与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的条约不同，在《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第3集中规定：“米与麦，不得作为货物运出日本国外。”可是，在朝鲜的日本人却得到从朝鲜自由运粮出口的特权，从而使朝鲜变成了日本的粮食供应地。这是造成朝鲜粮食价格高涨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在灾年更加重了朝鲜的粮荒；

4.日本还充任欧美各国在朝鲜的代理人。《附录》第10款规定，“朝鲜国未曾与海外诸国通交……嗣后诸国船舶，为风波所窘，漂流到（朝鲜）沿边地方”，漂流民希望送还本国，朝鲜政府要通知各港口的日本管理官，将其送还本国。这是日本对欧美列强讨好，取得他们的支持，使欧美列强赞同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样，日本剥夺了朝鲜的自主权，而且充当了欧美列强在朝鲜的代理人；

5.在《江华条约》、《附录》和《规则》中，根本没有货物税的条款。但在8月24日，日本的宫本小一和朝鲜的赵寅熙在交换函件中写道：“货物出入，特许数年免税也。”这是确定了货物免税的权利。赵寅熙的复函明确承认：“货物出入，特许数年免税。”从此以后，日本货和欧美货通过日本商人之手，涌入朝鲜，以便牟取暴利。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不缴纳货物入口税的规定。

从1876年缔结《江华条约》开始，一直到1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完全为日本所垄断。再加上不缴纳货物入口税的规定，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的民族经济，把朝鲜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和粮食供应基地。

本来，日本全权代表还片面要求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但是，朝鲜政府发表了如下声明：“我国本不与他国相通，而惟（有）日本则邻谊相好久矣。”至于其他国家的通好立约等事，就不必再论了。于是，就没有载入《江华条约》，因此使《条约草案》由13款减为12款。

正在受着欧美各国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日本，一面向欧美各国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一面竟以武力威胁的同样手法逼迫朝鲜开国，使朝鲜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标榜着日朝两国平等同权的《江华条约》的实质，不仅是奴役朝鲜，而且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推行大陆政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江华条约》是敲开朝鲜国门的条约，以后的侵略行径远远超出条约中的条款。日本为要占领战略要地，在1877年1月30日，强迫朝鲜签订《釜山居留地租借契约》。根据《契约》设置了“居留地”，后来外务省把釜山居留地称作“特别居留地”，其特点是：

1.它是为日本人居住和营业而设，在那里，除日本人以外，不准租借土地；

2.居留地内行政权只能由日本政府代表行使，拒绝被租借国政府或其他派有使臣的国家介入；

3.日本政府可统一施行任意决定的居留地制度，无需事先取得被租借国政府同意；

4.日本政府独占警察权，经常派驻警察；

5.在战时可用作军事基地或兵站基地。

显而易见，这种居留地和英国在日本的居留地、欧美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不完全相同，前者对被租借国主权的损害程度更为严重，几乎等于日本领土的延长，实际上是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点。继釜山之后，1880年在元山、1883年在仁川、1902年在马山先后设立了“特别居留地”，形成了殖民网点。

《江华条约》的签订，为朝鲜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开始铺平了道路，朝鲜社会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订约以前，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朝鲜政府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订约以后，朝鲜的主权开始遭受破坏。以《江华条约》为转折点，朝鲜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875年的“江华岛事件”是日本迈出侵略朝鲜的第一步，1876年的《江华条约》是日本迫使朝鲜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尔后，日本政府则开始了以夺取朝鲜为目标的、进行大陆作战的准备。这从1878年日本参谋本部内设管东局和管西局这种编制上看得十分清楚。与此同时，日本完成了将陆军改编为适合大陆作战的师团制。至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便公开而具体地提出了所谓“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

由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1868—1874年关于“征韩”之争的时期里，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即雏型阶段；1875—1890年，日本的“大陆政策”便进入第二阶段，即形成阶段。日本在江华岛的炮声中踏上了亚洲大陆。

“甲申事变”

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对朝贸易增加了十几倍，日本从朝鲜进口的重要物品大米和黄金，在日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大米从1872年以来主要向欧美出口，为了缓和由此造成的供给不足或歉收时的米价上涨，进口了廉价的朝鲜大米。此外，由于日本国内黄金产量很少，同外国的金银比价的差额和贸易的入超，硬币的外流连年增大，因此，从朝鲜进口黄金极其重要。

然而，对日本政府来说，朝鲜不仅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日本有着紧密的“政治的”和“战略的”关系，由于新疆的伊犁问题，俄国同中国的关系恶化，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对俄国向亚洲侵略的危机感都在加强。于是，朝鲜问题开始同对俄问题联在一起，使两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积极起来。日本和中国都分别邀请考察团和留学生，劝朝鲜政府开国图强，以便加强对朝鲜的“指导权”。

朝鲜政府对开国并不积极，但自从发生江华岛事件以来，正视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注意到其背后的近代化过程，感觉到为了对抗日本必须学习日本的成果。朝鲜于1876年和1880年两次派使节团到日本，尤其是后一次有金弘集、洪英植、金允植等后来成了开化派的官僚，参观了行政、军事和教育的设施。这时，金弘集得到驻东京中国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并将此报告国王。其内容是，朝鲜为对抗列强，尤其是俄国的侵略，应联合中日两国实行开化，并应与美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见解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朝野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张之洞等中国官僚的“联日反俄”论观点。

1879年，汉城近郊奉元寺的僧侣李东仁偷渡日本，得到福泽谕吉的知

遇。1881年，朝鲜政府派遣62名朝廷官员到日本观光游览，用2个多月时间详细考察了日本的各个部门，其中有12人回国后就任政府枢要官职，推进朝鲜的近代化。

日本的办理公使花房义质抓住一切机会，向朝鲜政府建议推行近代化的措施。1877年，赠呈清朝同文馆刊行的《万国公法》两部；1879年，邀请参观停泊在仁川府济物浦湾的军舰“凤翔”号；1880年，赠送日本制造的各种步枪、手枪及弹药。花房所建议的近代化全部与军事有关。

1880年3月，朝鲜仿照清朝总理事务衙门设立统理机务衙门，作为处理外交事务的机关。统理机务衙门的设置表明朝鲜外交已开始采取遵照国际法的近代方式。1881年5月，根据日本政府的劝告实行军事改革，组建新式军队，称作别技军，聘请日本陆军工兵少尉堀本礼造为教官。

可是，日本的扩张以及受日本影响的开化派的兴起，受到守旧派的反击。守旧派坚持支撑朝鲜锁国的所谓“卫正斥邪”的朱子学思想。卫正斥邪的儒生们反对开化派势力抬头，开展上疏运动。上疏运动始于1881年3月，到夏季达到最高潮。拥国王而握实权的闵妃的统治发生动摇。1873年失去摄政地位后过着冷遇生活的国王的父亲大院君，与尊华攘夷和卫正斥邪的儒生们保持着联系，于1881年6月前后开始活动。因新军的创始而感到受淘汰危险的旧式军队的士兵，由于粮饷的欠发和与此有关的贪污行为被揭露，愤怒不已。同时，由于日本商人囤积大米，米价暴涨，士兵粮饷流进黑市，发生从中取巧的贪污行为，使群众生活陷入穷困。对此，不满情绪迅速增长。7月23日，大院君等利用士兵和群众的反日情绪发动军事政变。政变中，士兵和市民数千人袭击王宫，击杀亲日的闵妃集团大臣多人，杀死日本军事教官堀本礼造。花房公使放火焚烧公使馆，然后逃到仁川，乘英国测量船“飞鱼”号于29日返回长崎。这就是“壬午事变”。

1882年7月31日，日本报纸详细报道了事变的内容。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于8月1日发表了《述朝鲜之变》的社论。8月8日又发表了《论对朝政策》的社论，作者对作为“第二个日本帝国”的朝鲜所寄予希望的，就是成为“防御强俄之屏藩”的作用。

奥宫健之是自由党的左派，但他却在8月2日发表了《征韩论》的文章，称朝鲜人民为“未开化之蛮民”。主张出动“问罪之师”“征韩”。他强调：“欲使国民焕发爱国思想，则必须让其直接接触外国之事。”他把“壬午事变”看作是发动对外战争的好机会，试图谋求“扩张国权”，“大振国威于海外”。

自由党内部意见虽有分歧，但整个论调是“外示开战之势。内图和平谈判”，以谋求事件的解决；同时，为了使朝鲜成为“防御强俄之屏藩”，应把它纳入“第二日本帝国”的方向。

还有主张立即开战的，请求献纳军用资金的，志愿当义勇兵的，还印出了许多彩色版画，来煽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仇恨。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断定发动这次事变的“顽固党”是“文明的敌人”，说“要向世界万国宣扬我们的政略是文明改进的政略，其军队也是文明改进的军队”这种主义。

政府一方面压制黑田清隆的立即开战论，另一方面决定派遣陆海军和进行外交交涉的方针。对花房公使的训令中指示：如果朝鲜政府有重大过失情况时，可以用“严厉逼迫”的谈判，予以“强使赔偿的处分”，使其割让巨

济岛或郁陵岛。除谢罪和赔偿之外，还罗列了扩大通商、获得资源的许多要求。8月9日外务卿的补充训令中提出：取得咸兴、大丘、杨花津的开放；取得公使馆员、领事馆员的内地旅行权；元山、安边的对日本人“暴行事件”的解决；关于通商条约的让步。27日又训令为了补偿赔款，掌握端川金矿的监督权，以其产金充作赔款。

8月，花房公使率领军舰4艘、运输船3艘，陆军1个大队（营，约1500人）开赴朝鲜。以武力为后盾，向国王提出了处罚凶手、抚恤受害日本人、赔偿损失、开放杨花津等地、准许公使和领事及其随员在内地旅行、驻扎保卫使馆的日本军队等各项要求，并限期3日之内作出是否接受的答案。

借这次事变机会掌握了政治实权的大院君对此确定了拒绝的方针，在着手动员军队的同时，要求驻在马山浦的中国军队代表马建忠入京，马建忠提议在日朝间进行调停，为了压制朝鲜方面的对日强硬论，将大院君绑架到天津。主张对日缓和论的闵妃派于是又掌握了政权。

闵妃政权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8月30日，日本与朝鲜双方代表在京畿道仁川海岸的济物浦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和《大日本国与大朝鲜国修好条规续约》，日本获得50万日元的赔款，并获得了驻军权，扩大了釜山、元山、仁川的旅行区域，由于安边划入了元山的旅行区，实现了安边的开市，得到了外交官及领事官到内地旅行的权利。这两个条约使1876年修好条规的遗留问题得到有利于日本的解决，而且日本还获得了在外国驻兵的权力，于是建立了向大陆扩张的强有力的桥头堡。

壬午事变更加剧了日中两国的业已紧张的关系。为了支援在济物浦与朝鲜政府谈判的公使花房义质，日本不仅向朝鲜派遣了军队，而且还向东京、熊本两镇台下达了参谋本部设立以来的首次动员令，以防日中两国关系破裂。清政府也出兵对抗日本，提督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出现在京畿道仁川湾的月尾岛附近，而且增援部队也出现在京畿道南阳府马山浦。清朝声明，如果日本因日韩《济物浦条约》而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中国就继续驻兵朝鲜。

中国想要阻止日本在朝鲜扩大势力，但同时又想避免同日本进行武装冲突。由于中国的斡旋，朝鲜和美国在这一年的5月缔结了修好通商条约。中国采取了把列强势力引进朝鲜用来牵制日本扩张的政策。另一方面，英国驻日、驻清公使巴夏礼为了确保英国在亚洲市场的安全，也为了防止俄国侵入朝鲜，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日本、中国、英国各有自己的想法，但在朝鲜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利害关系。

“壬午事变”之后，日本以“独立自主”的招牌，诳骗具有民族意识的年轻官员开化派，派顾问（牛场卓造、井上角五郎为开化党顾问）指导“独立革新”运动，培养亲日派。

清政府采取了实际上加紧统治朝鲜的政策，同日本的侵略朝鲜政策相对抗。李鸿章推荐马建常（马建忠之兄）和德国人穆麟德为朝鲜政府的外交顾问，让袁世凯训练朝鲜军队，提供近代武器，同时又驻扎了很多中国军队。中国想借欧美列强的力量阻止日本的侵略，便劝告朝鲜政府于1882—1886年同美、英、德、意、俄、法建立外交关系，使朝鲜彻底向列强开放。与此同时，在朝鲜的官僚内部，企图拥戴国王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金玉均等开化派（独立党）扩张势力，从对抗中国的压迫和反对亲清的闵妃派（事大党）的立场出发，接近日本。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外务卿井上馨

认为这是从朝鲜赶走中国势力的好机会，策划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法国方面要求和日本合作的情报，更加助长了他的企图。在这之前，金玉均来到日本，向井上、福泽和后藤象二郎等求援。福泽和后藤为金玉均奔走政治资金的借款，并派人到朝鲜援助开化派。据《自由党史》载，后藤和自由党干事小林樟雄同板垣退助一起去访问法国驻日公使，说明朝鲜的“独立”计划，请求给开化派 100 万日元的借款。对此，法国公使以个人名义表示赞成，并提出法国向朝鲜派遣舰队。这个阴谋计划由后藤泄露给伊藤博文，为井上所得知，促使他加快实施积极政策的步伐。板垣等人提出，作为借款的保证，日本愿把朝鲜的矿山开采权让给法国。由此看来，日本利用中法战争，想通过同法国合作来推行侵略朝鲜的大陆政策。

金玉均派和公使竹添进一郎、井上角五郎密谋策划武装政变。早在 11 月 12 日，竹添向伊藤和井上请示在“以煽动日本党掀起朝鲜的内乱为得策”的甲案和“不使同清国发生事端”的乙案中，决定采取哪个方案，而在收到政府决定采取乙案的训令之前，竹添就执行了甲案。在政府内部支持竹添行动的动向很强烈。这从 12 月 19 日及 27 日井上毅致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的信函可以看出来。

1884 年 12 月 4 日，在汉城庆祝新建邮局开幕的晚宴席上，日本刺客袭击了闵氏派要人。金玉均、朴泳孝等乘乱在日本守备队的支援下占据了王宫，劫持了国王，逼令以铅笔写“召日本兵入宫”，矫诏杀闵允镐等 6 位大臣。12 月 5 日，金玉均宣布建立开化党政府，发布各项改革方针，废除了同中国的宗主关系，这就是“甲申政变”。

事变发生后，驻朝清军应朝鲜方面的邀请，进入王宫，赶走了日军，开化派政权只维持了 3 天就垮台了，竹添公使同金玉均等亡命者一起逃回长崎。

在这混乱期间的汉城，日本侨民有 30 人被杀。日本政府以井上馨为全权，率 7 艘军舰开往朝鲜。1885 年 1 月 7 日，在汉城开始谈判。为了防备万一，日本动员陆海军集结于下关。由于日本在这次政变中的行动极不光彩，国际形势及国内准备也不允许挑起战争。为了先发制人，日本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先迫使朝鲜屈服“认错”，以摆脱日本在这次政变中的不光彩地位。1885 年 1 月 9 日，日本同朝鲜政府签订了《汉城条约》，朝鲜除向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外，还同意出钱给日本守备队修建宿舍。

中国鉴于正在进行中法战争，还有日法缔结了相互援助密约的传闻，便采取了对日妥协的方针。1885 年 4 月，伊藤博文亲自来华，诱迫清政府让步，并同李鸿章签订了事变善后的《中日天津条约》。其内容为日清两国以 4 个月为期由朝鲜撤兵，如果将来朝鲜的变乱严重化，日清两国或者一国派兵时，首先互相行文照会，事件平息时立即撤兵。这就是后来甲午战争的开战交涉时，陆奥宗光外相作为“表示两国对朝鲜具有平等权力的唯一明文”用来作为口实的条约。这样，日本政府又在与清政府争夺朝鲜的斗争中转败为胜，捞到了与中国同样的出兵权。

1875—1885 年的短短 10 年，日本政府同朝鲜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带有侵略性的条约（《江华条约》、《釜山租借契约》、《济物浦条约》、《汉城条约》、《天津条约》等），攫取了朝鲜的重要港口以及领事裁判权、无

[日]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 1983 年中文版，第 76 页。

税贸易权、驻兵权、出兵权等特权，把朝鲜变成了日本的半殖民地，为并吞朝鲜、进攻中国铺平了道路。

十年备战

日本政府在铺好了向大陆进军的路基后，又用 10 年时间（从《天津条约》到《日英新约》），实行全面的对中国作战准备——制定大陆政策、扩充军备、鼓吹“国权论”。

1885 年，日本陆军特意从德国聘请了梅克尔少校，将军队的编制改力德国式，并设置了预定在战争时期充当军团长的监军。另外，为了使旅团（旅）能在战时作为基本的作战单位，还制定和整顿了旅团条例，除了由战列队和补充队组成的常备军外，还设置了与战列队同样数量的后备军，可动员的兵力一下子增加到原来的二倍半。海军则在广岛吴港和佐世保两处建立军港，要求达到“专供出师之规模”，并制定以 8 艘铁甲舰为主力的扩军方案。这个方案以击破清政府北洋水师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为目标，着重建造 3 艘主力舰，分别用日本三十著名风景区命名，即“严岛”号、“松岛”号、“桥立”号，称作“三景舰”。其特点是，舰体虽下甚大，炮位则很高（各配一门重炮，口径 32 厘米，炮身長 12 米）。这种奇特的舰型，乃是日本财力不足、处心积虑备战的产物。

与此同时，政府还发行海军公债，租借朝鲜的绝影岛，设置煤炭储存所等等。进而为了适应在中国南海和黄海作战，在吴港和佐世保设置了镇守府。

19 世纪 80—90 年代，日本的近代大工业以纺织、铁路、矿业为中心建立起来，完成了产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日本是一个土地狭小、资源贫乏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工业勃兴之后，争夺国外市场和原料（包括粮食），对它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加之，帝国主义争夺远东殖民地的斗争日益集中到朝鲜；朝鲜不仅是日本争夺的对象，而且是英俄争夺的重要地区。上述两种因素有力地刺激了明治政府统治集团的黷武野心和向邻国扩张的欲望，他们决定把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进攻大陆作为对亚洲政策的总方针。

1890 年 3 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将写好的《军事意见书》和在外相井上馨陈述外文危机的意见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起草的《外交政略论》交给阁僚传阅。山县着重论述了欧美列强争夺亚洲的形势，认为 1886 年蒙特利尔—温哥华之间已经通车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建设、1891 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即将动工和巴拿马运河的开航，使欧美列强更便于侵略亚洲。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通车使得从英国经苏伊士运河到横滨的 1.375 万英里距离缩短为 9250 英里。在不久的将来，英俄在东亚必然对立。

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再次断言：

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中央亚细亚，不出数年，及其竣工，发自俄都，十余日便可饮马黑龙江。吾人须知，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在朝鲜多事之时，而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一大变动之机，而朝鲜独立之维持，有何等保障？这岂非正是对我国利益线最有激烈冲击之感者乎。

山县认识到，日本对华战争具有强烈的国际争夺背景。他以对形势的估计为根据，强调说，“为免除欧洲强国侵略朝鲜之忧”，必须把“充实军备”

作为紧急任务。他还提出一套向邻国扩张的“理论”。他先把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然后把“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为“利益线”。接着，便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否则该国“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极力主张日本应在英俄斗争的漩涡中“保卫”朝鲜。他还强调说：“外交和军备之要点，全在维护此两线之基础。”

1890年12月9日，山县在第一届议会以首相身分所作的施政演说中警告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赖于保卫主权线和防护利益线，强调“有关陆海军的经费占预算岁出额的大部分”。

青木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中，更加露骨地主张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意见书是行宪后第一届内阁提出的对邻国外交总方针（一般通称为“大陆政策”）。它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要求，以后的几届内阁都承袭了这个外交方针。

山县内阁的《施政方针》标志着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它同明治初年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针相比较，已经有了付诸实施的前提和条件。此后，日本的外交则进入了夺取朝鲜、占据殖民地、进而觊觎中国的阶段。

大陆政策确定后，充实军备就是最大的紧急任务。在首届议会上，海军方面主张必须把日本海军扩大到与清帝国舰队相匹敌的规模，要求今后20年内造舰32万吨。虽然海军方面的要求一时没有通过，但充实军备的工作仍在进行。

1892年11月29日，第4届议会召开。在前两天，即27日，伊藤首相乘人力车离官邸时与马车相撞，从车上摔下负伤。28日，井上内相任临时首相。12月1日，井上在议会会场上宣读了伊藤准备好的施政方针备忘录，作为施政方针的演说。伊藤促请注意“万国之形势”，呼吁“忠诚的诸位”“上下合作”。但是，12月19日，由河野任委员长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在审查政府预算时，在总额8375万日元中，削减884万日元。这样，议会和内阁展开了斗争，议会通过了上奏弹劾内阁的议案。1893年1月9日，伊藤上奏天皇。10日，天皇下诏，对“世界上列强发展之形势”发出警告，并要求停止“纷争”。13日，议会开会，以削减岁出262万日元与政府妥协。

天皇诏敕中所警告的“世界列强形势”，一是指俄国已经动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二是指1892年7月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号、“镇远”号两舰航抵横滨。10日，外相榎本武扬在东京小石川的后乐园举行游园会，招待清朝舰队将领。16日，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日本议员。中国舰艇装备的优势，令参观者惊恐不安。

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但议会却削减了包括建造军舰费在内的260万日元的政府预算。但是，天皇在解决纠纷的诏敕中指出：“国防之事，苟缓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1889年2月公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规定“君权”高于一切，“天皇统帅陆海军”，表明近代天皇制已确立，致使日本在贯彻其外交方针时有了特殊的保证，甚至可以使国民在自己还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有被置于卷入战争之中的危险。

军备的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1891年11月，发明村田枪的陆军少将村田经芳，把以前的单发枪改进为连发枪。1893年3月，海军技术员下濑雅允

发明了高性能火药。1892年2月11日，驻德公使馆武官陆军步兵中佐福島安正，从柏林出发，只身踏上西伯利亚的征途，从事谍报活动。1893年3月20日，海军预备役大尉郡司成忠接替福島中佐，率退伍海军下级官兵100多名，从东京隅田川出发，迁居千岛群岛的占守岛，以从事国防所需的各种实验。

战争体制的准备也在进展。1893年4月，陆军次官儿玉源太郎就任出师准备物资经办委员会委员长。5月19日，海军部门设立了与陆军参谋本部并列的海军军令部。同一天，政府用敕令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确定了战时的统帅机构。该条例第一个特征是第2条规定——“大本营中，参与帷幄机密、计划帝国陆海军之大规模作战者，乃参谋总长之责任”，决定了陆军对海军的优势地位。第二个特征是第3条规定——“幕僚由陆海军将校组成”，把战争作为纯粹的军事上的事情，排除了武官以外的所有文官（甚至首相）对战争的指导。战时大本营条例把统帅权的独立具体化，形成指导战争机构。

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了进行大陆作战，从1893年4月到6月，亲自考察朝鲜和中国。7月，法国侵略暹罗时，陆军少佐上原勇作和陆军中尉山田良园考察了暹罗、印度支那、菲律宾各地。

从经济上来看，1885年以后，日本工业的发展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到1890年前后，日本已开始变成了工业国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足以形成“大陆政策”的物质基础。

制造战争舆论和对国民的思想动员是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国权论”成为大陆政策的舆论支柱。从80年代下半期开始，“国权论”逐渐抬头，从前的“民权论”者几乎全都变成“国权论”者，鼓吹进攻大陆。资产阶级报刊成了鼓吹战争的工具。自1885年福泽谕吉公开在《时事新报》上著文宣称“脱亚入欧”以来，日本的社会思潮已经转向了。一度风靡的自由民权论，为国家主义、日本主义所代替。1886年，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杉田定一，在游历欧美期间所著述的《国是策》中，提出了倘若东方各国不能合力对抗西方的攻势，则将陷入“白色人种”的统治之下。但其结论却是：与其“尽葬于白色人种之腹，莫如我也进而取之”。福泽谕吉说，在现今的世界上，不采纳西方文明，便不能维持国家的独立，而日本已经到了不能再等待的时候了，不如脱离亚洲而与西洋国家为伍，按照西方列强对待中国和朝鲜的办法行事。1892年7月20日，他在《时事新报》上写道：“我国当前之政略，应使人心转向国外，其方向则在朝鲜。”《自由新报》在1894年5月2日以《对韩之决心》为题，煽动说：“国民养兵是干什么的？难道铸炮、炼剑和建造兵舰是为了当作国家的装饰品吗？”改进党领袖尾崎行雄也借金玉均遇刺事件，大力煽动进军朝鲜向清韩问罪。由此可见，虽然政党有时嫌军费预算过多而和政府争吵，但到此时，它们和政府在对邻国扩张问题上已达成一致。

在民间，老百姓中流传着一个故事，盛传西乡隆盛还活在西伯利亚。1891年3月，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宣布动工，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要在乌苏里第一工区举行开工仪式。他准备经海路去海参崴，中途在长崎登陆，参观日本。5月11日，尼古拉观赏了琵琶湖风景，在滋贺县大津县厅进午餐后前往京都，

乘人力车到离县厅约 500 米的市街唐崎时，被在路旁警卫的警察津田三藏用佩刀刺伤。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加深了日本国内对俄国的危机感，俄国、俄罗斯、可怕的“水獭俄国”这种词句在大街小巷到处流传。与此同时，乞求救世主的老百姓指望活在西伯利亚的西乡隆盛会与尼古拉同舰回到日本。

更有趣的是，甚至在中江兆民的脑海里，西乡仍然栩栩如生。1891 年 4 月，兆民给《自由平等经纶》杂志撰写了《平凡的豪杰与非凡的豪杰》一文。他写道，报传“西乡南洲翁将从俄国归来”，“此事岂真力事实乎？抑为人心厌倦之极，虽明知其为虚传，仍以幻想怡悦自己之幻想，姑以自慰乎”？他以这种笔法怀念西乡。

兆民把大久保利通看作“平凡的豪杰”，而认为西乡是“非凡的豪杰”。他写道：

南洲翁乃非凡之豪杰也，当年若使南洲翁得展其志，率数万精兵，进入朝鲜，再深入之，则今日亚洲形势将如何？打消南洲翁非凡之事业，使翁之八千弟子不为禹域（中国）之蛟龙（水龙）而为本上之堰蜓，扼杀我日本，使之陷于平庸，使今日之日本形成今日之势者，谁之罪欤？

1893 年 10 月，山县有朋（法相兼陆相）提出《军备意见书》，强调说，为了不久的将来对做作战，必须首先确保战略要地朝鲜；为了确保朝鲜，就必须尽快找机会对清作战。

朝鲜局势从 1894 年初开始激化。2 月 15 日，在朝鲜产粮地区全罗道古阜郡爆发的农民战争（甲午农民战争），开始向全罗道首府、国王李氏祖籍全州进军。日本政府立即抓注这个机会，施展阴谋外交，积极进行开战准备。

1894 年 3 月，金玉均暗杀事件，给日本送来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甲申政变后，金玉均逃亡日本。1891 年，朝鲜政府秘密派遣李逸植暗杀金玉均和朴泳孝等人。李逸植从大阪财界和政界获得了援助。李逸植获得资助后，开始接近为资金而焦头烂额的金玉均，并说服 1893 年来到日本的洪钟字去暗杀金玉均。1894 年 3 月，金玉均前往上海时，李逸植令洪钟字与之同行。

金玉均的改革计划受挫之后，觉得在日本重整旗鼓已经没有希望。只有去上海直接与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谈，就朝鲜改革问题和东亚三国的“三和主义”进行交谈。

3 月 27 日，金玉均到达上海。28 日，洪钟字在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东和洋行中暗示了金玉均。李鸿章用北洋水师的军舰“威远”号，把金玉均尸体和凶手洪钟字送往朝鲜。朝鲜政府在汉江的杨花镇把金玉均的尸体处以凌迟极刑，并大书“谋叛大逆不道罪人金玉均”的牌子示众。

出身寒微且备尝辛酸的日本外务次官林董，希望通过战争而得势。他高兴地看到，金玉均暗杀事件是个发动战争的好机会。他在一次茶会上向陆奥外相讲了自己的意见，陆奥当时“歪着头，良久”，最后说：“试试看吧！”

其实，林董哪里知道陆奥“试试看吧”的含义呢。陆奥已经在设想同中国的战争，他是朝着经过川上参谋次长谋划而不可避的战争方向，调整着内政与外交。

5 月，甲午农民战争的爆发，使朝鲜局势产生了危机。朝鲜政府难以镇压乃请求清朝出兵援助。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休假回国。留任的代理公使杉村濤，于 6 月 1 日把朝鲜政府请求清国派遣援军之事电告日本政府，川上和陆

奥等人欣喜若狂。

日本政府一面借助东学党的力量，一面诱使清政府出兵干涉。日本政府向清政府照会说：“ 贵国政府何不代韩勘乱，我政府别无他意。” 战争已确实不可避免了。6 月 5 日，参谋本部根据战争大本营条例迅速设置了大本营，向广岛第 5 师团下达了动员令，把日本强行纳入战时体制。

1894 年 6 月，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朝鲜，这正中日本政府诡计。早在中国出兵前，日本驻中国的领事、武官及各类人员，通过种种渠道刺探中国政府的动向，纷纷向日本政府电告，“ 此类电报，一日数至”。日本政府已做好出兵准备，当中国出兵的情报一到，日本便立刻出兵。

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了操纵舆论，把事态引向战争，接待了《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苏峰在《社会与人》文章中透露了一个秘密，前往朝鲜的“ 参谋军官” 福岛中佐和上原少佐，正是频繁策划和一味主张开战的人物。

1894 年 6 月 5 日，正在休假中的公使大鸟圭介离开日本，于 6 月 10 日回到汉城。出发时，他接到外相陆奥宗光的书面训令。上面明确写道，出兵是根据 1882 年《济物浦条约》第 5 款（日本的驻兵权）和 1885 年《天津条约》第 3 款（日本出兵时，行文知照清国）；并指示他，出兵的目的旨在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侨民。“ 如果朝鲜政府为了镇压叛乱（农民战争），乞求帝国出兵援助时，应与派往该地的帝国陆军总指挥协商后，始可答应朝鲜政府之请求。” 还批准他“ 若事机紧急，无暇请示电训时，阁下可临机处理”。据林董的《回忆录》载，陆奥还给大鸟口头训示：“ 即令事与愿违，或因公使之果断而启战端，其责任亦应由亲自身承担，故不须丝毫踌躇，盼坚决处理一切。” 林董认为，这简直等于说“ 要尽量采取开战的办法”。

6 月 6 日，大本营决定，不待混成旅团编成，先派一个大队（营）步兵，命陆军少佐一户兵卫率领出发。9 日，一户大队从广岛宇品港启航。后继部队由混成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直接率领， 11—13 日自宇品启航。到 6 月末，侵朝日军人数已达清军的 2 倍。

日本为了摆脱欧美列强的干涉，在开战前，施展一系列外交手腕，利用英俄矛盾，签订了《日英新约》（1894 年 7 月 16 日）。1894 年 7 月 25 日，日本海军向中国北洋舰队发射了第一炮，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了。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又于 1931 年发动了“ 九· 一八事变”，制造了一个“ 伪满洲国”。这一时期是日本最猖狂的时期，是日本“ 大陆政策” 的发展阶段。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以说是近代日本“ 大陆政策” 的顶点，同时，又是这一政策走向崩溃的起点。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崩溃，“ 大陆政策” 也就随着灰飞烟灭了。

第 14 章

甲午风云

蓄谋已久

经过多年精心策划、周密准备，日本悍然发动了近代第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是一场日本毒设圈套的战争。因发生在甲午年（1894 年），故称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向中国陆海军挑衅而引起的。

日本很早就把朝鲜视为侵略中国的跳板，为夺占朝鲜和发动侵华战争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早在 1875 年，日本就挑起“云扬号事件”，即“江华岛事件”。1876 年，胁迫朝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获得了种种侵略特权，开始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

1880 年 11 月，日本派花房义质任日本驻朝鲜公使常驻汉城，强迫朝鲜政府把朝鲜军队改编为武卫营和壮御营，新建别技军，派日本军事教官加以控制。

1882 年朝鲜“王午兵变”后，日本借口其使馆人员遭受损害，派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率领 1500 名日军大举进兵朝鲜，重返汉城。

清政府为阻止日本控制朝鲜，派北洋海军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军 3000 人进入朝鲜，迅速平定内乱。日本乘此机会以赔偿损失为借口，胁迫重新掌权的闵妃集团与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获得了在汉城的驻兵权。

1884 年 12 月，日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和美国驻朝公使富特，乘中法战争爆发之机，策动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甲申政变”，清军将领吴长庆和袁世凯率领 1500 名清军应朝鲜国王之邀，兵发景裕宫，镇压了叛乱。

日军赖在朝鲜不走，强迫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其后朝鲜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先相互知照，从而获得与中国对等的权利，为发动甲午战争留下了祸根。

1890 年，日本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飞速上涨，促使贫苦工人、农民不断掀起“米骚动”，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这时，日本议会与政府间的矛盾加剧。1893 年 5 月 31 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案，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

为解决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严重的政治危机，转移工农大众的视线，日本当局采取了在对外关系上制造“惊人耳目”之举的办法，企图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从而加紧了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准备。

正在这时，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和朝鲜官员金玉均在上海被刺事件，日本军国主义借此玩弄阴谋，挑起了甲午战争。

1894 年 1 月，朝鲜农民起义军领袖全琫准领导“东学道”发动武装起义，响亮地提出“辅国安民”、“尽灭权贵”、“惩办贪官”、“逐灭洋倭”等口号，其党歌也格外引人注目：“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落泪，歌声高处怨声高。”

全琫准的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 20 多万人，控制了全罗道、忠清道、庆尚道等大片国土，派去镇压的朝鲜官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朝鲜内乱很快就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注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首先开始采取行动。

川上操六，1848 年生于日本鹿儿岛的萨摩藩士之家，幼名宗之成，后改为操六，青年时代就当上了萨摩藩亲兵，靠智谋和勇武精神，从分队长（班长）升到少将，1885 年任参谋本部次长，是积极主张发动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干将，为当时日本情报机构的最高负责人。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出任大本营陆军首席参谋官兼兵站总监，参与制定甲午战争的作战计划，指挥日本陆海军作战。

川上操六密切注视着朝鲜半岛的风云变幻，他派伊地知幸介少佐到釜山，与日驻朝武官调查全琫准和东学党的情况；又命寺内正毅大佐起草出兵朝鲜的计划，他特别指示设法利用东学党浑水摸鱼，挑起战争。

金玉均是朝鲜开化党首领，他胸怀一腔爱国之志，但却长期被日本驻朝鲜公使花房义质、竹添进一郎和日本浪人利用，发动反对朝鲜国王的政变；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多年，后被诱骗到上海，1894 年 3 月 28 日被刺杀身亡。事后中国政府将其尸体运交朝鲜，被朝鲜政府戮尸示众。

日本右翼团体 5 月 24 日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为金玉均召开追悼会，近卫公爵、犬养毅、鸠山等政界要人出席，玄洋社头目的野半介胡说“日本的忠诚朋友”金玉均在上海惨遭暗杀，肯定是清国人搞的阴谋诡计，清国派军舰把金玉均的尸体运回朝鲜京城就是明证，宣称“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国耻，我们的口号是讨伐清韩暴虐政府，进行吊唁作战”！

头山满指使的野半介前往日本外务省，会见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要求及早向中国开战。

陆奥宗光，1844 年 8 月生于纪州藩和歌山城的高级藩士之家。他熟谙官场权谋术数，又有操纵政党的特殊本领，很得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赏识。为解决日趋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他和伊藤博文积极谋划发动侵华战争，已暗派日本常备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和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日本几乎全部的海军和 1 万名陆军开往朝鲜，表面上却指示日本驻外使节大造和平舆论：

日本认为，在西欧列强侵略远东的高潮中，日清相争只能予彼等以渔翁之利。为了日清善邻提携，永绝两国在韩国的纠纷，实为当前之急务。请向各国申明，日本不愿与清国发生战争，即使在临近破裂的最后时刻，仍要抱和平调整国交的愿望。务必注意不可摘伤欧美诸国的感情。

陆奥宗光明确指示日本驻外使节，在大肆制造和平舆论的同时，全力以赴制造开战借口：

目前形势表明，日清开战已不可避免，务须不择手段地制造开战之借口！

恰在此时，日本黑社会头领的野半介和内田良平求见，陆奥宗光曾与川上操六密商过派玄洋社暴徒到朝鲜混入东学党义军之中演出放火剧之事，就将的野半介请入会客室。

的野半介请求外务省批准玄洋社人员到朝鲜浑水摸鱼，陆奥宗光让他去找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接洽。

川上操六指示内田良平带一个名叫“天佑侠”的谍报团打入东学党朝鲜农民起义军内部，担负三项任务：第一是探知东学党动向并予以控制；第二是改变朝鲜人的反日情绪，增强日军的攻守力量；第三是煽风点火，在中日

之间设法挑起争端，以便出动日军，把中国军队赶出朝鲜。

川上操六特别强调指出，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说明日本对中国开战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想迅速解决时局，就需要一个点火者。一旦大火燃起，灭火就是我们的任务，大日本皇军将立刻赶赴现场，进入攻击阵位！”

川上操六给黑社会头目打气说：“为给帝国出兵朝鲜制造借口，要设法怂恿清国政府出兵朝鲜，镇压东学党之乱，巧妙地把清国政府拖入日本预设的战争陷阱之中！”

1894年5月29日，内田良平率“天佑侠”14人装扮成难民模样，渡过对马海峡，与在釜山接应的日本驻釜山副领事山座圆次郎和黑龙会暴徒吉仓汪圣、田中侍郎等会合，来到设在釜山的“大崎正吉事务所”。

内田良平获悉，东学党起义军力不给日、清两国军队提供蹂躏朝鲜的口实，加之起义军伤亡较大，已与朝鲜政府订立《全州和约》，撤出全州回到全罗道淳昌大本营去了。

内田良平马上派人与东学党起义军联系采取联合行动，全琫准在困难时期也表示同意，内田良平即率“天佑侠”赶往淳昌去见全琫准。

全琫准长得短小精悍，一双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但在困难情况下没有识破“天佑侠”的真面目。他将双方人员混合编组成大本营和7个方面军，全琫准任总督，武田范之、吉仓汪圣为军师，内田良平为游击军大将。

在“天佑侠”帮助下，全琫准率领东学党起义军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一举打败洪启薰率领的朝鲜官军，全州城一片欢腾。“天佑侠”门徒为庆祝胜利开怀畅饮，突然，两个黑龙会暴徒慌慌张张跑进酒店，说他们揭了朝鲜官府宣告金玉均罪状的文告，正被朝鲜百姓追赶。

众人正在慌乱之际，头山满派黑龙会头目的野半介及时赶到，说明“天佑侠”已在朝鲜完成了演出放火丑剧的重要使命，使东学党又发展壮大起来，朝鲜政府向清国政府提出了派兵要求，这就为日本出兵朝鲜制造了借口，为日本备战争得了时间。日本军部和黑龙会首脑对“天佑侠”为开拓日本疆土立下的汗马功劳极为欣赏，称赞他们力挑起日清战争立下“赫赫战功”，完成了一项“虎胆妙算”的使命。

的野半介又传达头山满和日本军部的命令，将纵火队改为谍报队，兵分两路活动：一路赶赴天津侦察清国北洋舰队秘密；一路人马留在朝鲜，负有三大任务：一是引诱东学党投入反清战争，二是侦察驻朝鲜的清军动向，三是暗中监视东学党，为最后镇压东学党农民起义军进而实现日韩台邦打下基础。“天佑侠”从现在起归日本驻朝鲜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指挥。

的野半介命令两个惹事的黑龙会门徒从后门溜走，赶往天津搜集中国北洋舰队的情报。内田良平建议全琫准兵发朝鲜京城，全琫准不知内田良平的阴谋，对兵发京城也表示同意。

1894年6月1日，日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将汉城的情况向日本当局报称：

朝鲜政府被东学党吓破了胆，已向清国乞援，朝鲜半岛形势岌岌可危，若默视不顾，将使已不平等之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权力，更有所轩轻。我邦此后对于朝鲜，唯有听清国任意行动而已。日韩条约之精神，将被蹂躏！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当即召集内阁会议，通过了日本向朝鲜出兵的决定；海军大臣借派“八重山”号军舰护送大鸟公使返任之机，向朝鲜迅速增派海

军，且发出该舰和海军听从大鸟公使指挥的训令；参谋本部令第5师团长派精锐兵力挺进朝鲜，暗中做好紧急出师之准备；内阁下令向邮船会社秘密征调船只，紧急运送军队和军需品。

接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向明治天皇奏请对清国开战。明治天皇随即向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下达敕语：

今朝鲜年乱蜂起，其势猖獗，为保护侨居该国的我国国民，决定派遣军队，卿等应悉心协商，妥善处理。

此谕。

日本驻汉城代理公使杉村浚接到日本政府的密令，为诱使中国尽快向朝鲜出兵，便派书记官郑永邦去见清国驻朝鲜代表袁世凯，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引诱说：

目前日本政局一片混乱。昨天，众议院要求日本内阁整顿行政，削减经费，谴责政府修改日英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毫无进展，指责政府在外交上连连失败，甚至通过了弹劾内阁上奏案，把日本内阁逼入要么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地步。

今天虽已否定了众议院的上奏案，宣布解散议会，但政府危机却日益加深，很难有所作为！

郑永邦看袁世凯对向朝鲜派兵态度已有所松动，又哄骗说：“东学党之乱日甚猖獗，对日本和清国在朝鲜的商务活动都大有影响，看来仅凭韩国的力量很难平叛。为了日清两国的利益，日本政府恳请贵国迅速出兵，日本保证没有其他意图！”

日本驻天津公使荒川也奉命会见掌管清朝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表示日本“盼华速代勘乱”，声明日本“必无他意”。

6月3日，杉村浚拜会清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花言巧语劝清国出兵朝鲜，还以其女儿嫁给袁世凯的儿子来拉拢。袁世凯上当受骗，向李鸿章报称：

顷刻，日本公署使臣杉村来晤谈，他的意思也是盼望中国迅速代为戡乱……察其语亡，只重视商民的保护，似无他意。

李鸿章就这样上了日本的圈套，6月4日奏请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赴朝，也电令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按照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将此事通知日本。

日本诱使中国出兵的计谋得逞后，于6月5日在参谋本部设立大本营，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战争体制。明治天皇亲自批准向朝鲜派一个混成旅团，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向驻广岛的第5师团下达了动员令。

同一天，日本驻华兼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带领海军陆战队420人离日赴朝。

大本营首席参谋兼兵站总监川上操六也指示大鸟圭介，在到达仁川的同时，立即率领日军由仁川进驻汉城，占据战略上最有利的地形。

6月中旬，日清两军先后到达朝鲜：叶志超率2000名清军驻屯牙山，大岛义昌率一个混成旅团4000名日军驻扎在仁川日本居留地内。

出乎日本侵略者意料，朝鲜农民起义军与李朝政府讲和撤出全州，朝鲜局势平静下来。朝鲜要求日本撤军，日本不但从朝鲜撤兵，反而源源不断地增兵。

6月11日，俄、英、美等国驻朝鲜公使，纷纷质问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

圭介，日本为什么向朝鲜出兵？大鸟无法解释，只得向日本当局发电建议：

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

目前汉城平稳，民乱状况业已发生变化，在收到下次电报之前，剩余的大队人员暂停派遣。

此时，日本当局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马上回电指示大鸟圭介：

即使在外交上稍有纷争，也要按日本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将日本军队开赴朝鲜，进驻汉城，并向朝鲜政府建议，劝其速借日本兵力弥平叛乱，是为上策！

这时，内田良平派其爪牙白水健吉带他的秘密信件去见朝鲜两湖招讨使洪启薰，约定双方勾结在鸡笼山消灭东学党起义军。岂知内田良平做事不密，白水健吉被全琫准手下人抓住并搜出密信。内奸面目暴露无遗，“天佑侠”在鸡笼山被朝鲜农民起义军击散。内田良平命令黑龙会党徒化整为零、分散杀出重围，沿途搜集中国军队、朝鲜官军和农民起义军情报，秘密绘制朝鲜地形图，在朝鲜各地制造形形色色的爆炸和暗杀事件，然后投奔各路日军，为日军充当向导和翻译，提供所获情报。

为掩护日本大举向朝鲜增兵，陆奥宗光向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出强硬命令：

难以停止大岛部下的军队在朝鲜登陆，但你必须玩弄外交权术，继续与袁世凯进行日中共同撤军的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协议，但一开始就不必准备实行之。

还要告诉你，你的不要过多增兵的建议虽非常恰当，但实难预料何时发生不测之变化。考虑到在千钧一发之际，输赢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劣，所以将按照帝国政府的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方为万全之策。

总之，帝国对朝鲜将来之政策，不得已将采取强硬处理方式。关于此点，本大臣正与伊藤伯爵商议中。日本政府为实现出兵朝鲜之宿愿，有应付一切事态之决心。

大鸟圭介遵照日本当局的明确指示，施展阴谋手段，与袁世凯进行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军的谈判，于 6 月 15 日达成如下协议：日本将驻朝鲜兵力撤回 3/4，只在朝鲜留 250 人，且不在汉城驻兵；清国撤出援朝兵力的 4/5，只留 400 人以应不时之需。等东学党起义平息后，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出全部兵力。为表示诚意，大鸟圭介甚至提议立即交换中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的公文。

日本当局见其诡计得逞，为把中国逼向战争，又于 6 月 15 日制定了新的阴谋计划。日本内阁当日通过了关于改革朝鲜内政的决议：与清政府合力尽快镇压朝鲜“乱民”；在“平定民乱”后，中日两国各派常设委员若干名驻在朝鲜，共同改革其内政。如果清国政府不赞成日本的意见，日本就单独迫使朝鲜政府实行政治改革。

6 月 16 日，日本政府把这一方案向清政府提出。当时清政府正准备请欧美诸国出面调停，促使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军，就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共同促使朝鲜政府改革内政的方案。

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地位，有意做给西方列强看的。接到中国的拒绝答复，便于第二天即 6 月 22 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发出绝文书，向朝鲜增派军队。日本蛮横地声称：

日本政府所百方筹划，以求朝鲜国安之要，业经陈明在前，日本政府不能付之默视。今而迟疑，无所施为，以旷时日，则该国变乱弥久弥大，是故若非设法办理，以期能保该国将来邦安，而图政得其宜，我政府竟不能撤兵，即我政府之不肯轻易撤兵之议者，非只遵照《天津

条约》条款之旨而然，亦系善后预防之计也。……日本政府断不能饬撤驻朝鲜之兵也……

为加速战争爆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 6 月 23 日向大鸟圭介秘密下达指示。

在目前形势下，开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在免使日本遭受非议的范围内，可采取任何手段，以造成开战的口实。

同一天，陆奥宗光又向接受他密令到汉城协助大鸟圭介制造开战口实的外务省书记官加藤高雄发出密电指示：

不必顾及清国不同意改革朝鲜内政一事，对清国要以劝告的口吻进行质问，切实做好开战准备！

6 月 26 日，大鸟圭介闯进朝鲜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其后又天天派人催逼。朝鲜和清政府向俄，英、美等国提出调停干涉的要求。

为维护列强在远东的利益，俄、英、美等国纷纷出面调解中日纠纷。日本不敢开罪于西方列强，就在东京大耍外交手腕，诡称“决不首先进攻中国”，外相陆奥宗光信誓旦旦地向俄国驻东京公使保证：

日本政府除希望确立朝鲜之独立及和平外，决无他意。将来中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举动，日本政府决不做进攻性之挑战。万一不幸此后日中两国间不得不交战时，日本亦必立于防御地位！

在外交掩盖下，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于 7 月 3 日向朝鲜国王提出更有欺骗性的朝鲜内政改革方案，共 5 条 27 项，主要是改革朝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度，强行规定在 10 天内动工铺设汉城至朝鲜各地的铁道，架设通讯电线，6 个月内完成淘汰朝鲜政府冗官等 10 项工作，两年内完成朝鲜全国土地普查和税制改革。

接着，日本向中国施加压力，故意使日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的会谈宣告决裂。陆奥宗光外务大臣接到小村寿太郎的报告，兴奋得手舞足蹈，连饮三杯酒说：“日本在将来的行动上，终于得到了自由！”

7 月 14 日，小村寿太郎又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强硬照会，指责清政府在中日之间“有意滋事”，蛮横地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时，日本对发动侵华战争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没有取得英国的支持。英国赞同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却并不希望由此根本改变中日朝关系的现状，不想改变远东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而影响英国利益。

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日本决定在砂糖和帽子交易问题上对英国做出让步，并向英国保证不把未来的日清战争引向中国的上海和长江流域，不损害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英国才在 7 月 16 日与日本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成为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日本称其为“惊人耳目”之举，扫除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国际障碍。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在日英新条约签字仪式上的祝辞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此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的大军！”

果然，在英日签订条约的第二天，即 7 月 17 日，日本大本营就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通过了作战计划，还决定使对华主战派的海军首脑人物桦山资纪由预备役恢复现役，出任海军军令部长。

桦山资纪，1837 年生于鹿儿岛，1874 年曾作为陆军军官参加侵略台湾的活动，1884 年由陆军少将转为海军少将，1890 年任海军大臣，后转

为预备役。当时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认为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相比不占优势，一旦开战没有取胜的充分把握，因而主张“日本舰队取守势运动”。桦山资纪强烈反对在战略上取守势，多次向明治天皇建议把日本海军舰只全部集中使用，组成强有力的联合舰队，向中国海军发动进攻，将其打败，夺取制海权。这些主张甚得一心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明治天皇欢心，明治天皇便亲自决定发布特旨，恢复枢密顾问官、预备役中将桦山资纪的现役，取代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作为大本营重要成员参与甲午战争的决策和指挥。

桦山资纪接受钦命的当天，立即奔赴日本军港佐世保，伙同侵华战争的倡导者和积极鼓吹者伊东祐亨，将日本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将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和所有船只集结起来，组成适应战时体制的联合舰队，将伊东祐亨由常备舰队司令官提拔为联合舰队司令官。

7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密电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授予他极大权力：“当此严重时刻，公使阁下可以采取自己认为正当的任何手段！”

挑起战端

大鸟圭介接到日本当局的紧急授权命令，立即行动起来。

大鸟圭介想到开战的第一要务是保持电讯畅通，汉城与釜山间的电话早已不能使用，陆军只得借助海军汽船进行通讯联络，极不方便。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带领公使馆官员闯入朝鲜外务衙门，向外务督办赵秉稷提出强硬无理要求：

日本帝国要求朝鲜政府，对下述4项要求，必须在7月22日以前做出答复：（1）同意日本政府自己架设汉城至釜山之间的军用电线；（2）根据《济物浦条约》，朝鲜政府立即为日军修建兵营；（3）驻牙山的中国军队师出无名，应速使其撤退；（4）废除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清韩水陆贸易章程》等一系列清韩条约。

不等赵秉稷说话，大鸟圭介就威胁说：“这些条件必须在7月22日做出答复，逾期不答，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

7月23日，日本规定的期限已过，大鸟圭介便带领日军占领朝鲜王宫，囚禁了朝鲜国王，威胁朝鲜国王下达两条御旨，一是把国政大权交给国王的父亲大院君，由其组织傀儡政府；二是授权日军代朝鲜驱逐清军。

日本情报机构获悉，为向牙山增加援军，清政府雇用“爱仁”号、“飞鲸”号、“高升”号等3艘英国商船，于7月21日由海路赴朝，另派小炮舰“操江”号载运饷银、枪械同行，只派“济远”号、“广乙”号两艘军舰护航。

日本大本营接到“匿于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侦知的上述情报，决定乘机进行袭击。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接到大本营的作战密令后，7月23日将“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等3艘快速巡洋舰组成第一游击队，先行出发到牙山湾侦察，赋予其“该湾附近如有优势的清国军舰驻泊，可由日方进行攻击”的权力。

7月23日下午，伊东祐亨亲率军舰15艘、水雷艇6艘、侦察艇1艘，从佐世保海军基地出发。桦山资纪亲自到佐世保为联合舰队送行，要求他们发扬武士道精神，“发扬帝国海军荣誉”。

7月24日下午，伊东祐亨一行到达丰岛海面。不久发现“济远”号、“广乙”号、“操江”号缓缓开来，进入日本联合舰队布设的雷区。中国船员凭借娴熟的技术，巧妙地绕过一个个黑色水雷，进入日本联合舰队的火炮射程之内。

伊东祐亨正要命令日本联合舰队开火射击，但想到日本外务省给清国最后通牒的截止日期就是今天——7月24日。大本营命令日本海军在7月26日以后才能自由行动，不超过这个期限绝对不能动手。若在今天动手，可能遭受各方面指责；而且中国官兵已做好战斗准备，立即动手不一定占到便宜，不如暂时麻痹对方，在清国官兵明天返航时，再发动突然袭击。

伊东祐亨考虑到这些情况，就改变主意，下令准备施放礼炮。司令官一声令下，“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3舰官兵列成整齐的队形，随着乐队奏起的军乐，在隆隆的炮声中，日本士兵向清朝舰队行注目礼，军官行举手礼。中国官兵也向对方举手还礼，然后全速开往牙山卸货。

接到日本军队攻占朝鲜王宫并有可能前来袭击的消息后，中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于7月25日凌晨由牙山起航回国。

中国军舰驶近丰岛海面时，只见海上朗日高照，风平浪静，波平如一面巨镜。想到当天即可返回祖国，官兵们不由得欢喜万分。

丰岛是朝鲜牙山湾外多岛海面上的一个小岛，北距仁川约26海里。丰岛海面南阔北狭，水深礁少，适于大舰通行，因而便成为日本至仁川的通航要道，也是中国至牙山航线的必经通道。

伊东祐亨看到中国海军官兵毫无警惕，舰尾上的黄龙旗高高飘扬，水兵东一群西一伙在甲板上晒太阳，便下令第一游击队立即出击。

7月25日7时许，中国军舰驶抵丰岛西北海面时，突然发现有3艘军舰向他们飞驰而来，急忙辨认，发现是“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3艘日本快速巡洋舰。

中国官兵为防万一，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全力应付日舰的可能挑衅。伊东祐亨见中国舰只正向北航行，日舰所占位置不太有利，便命日舰转舵向东行驶，抢占有利攻击阵位。

中国军舰见日舰向东开去，以为日舰不会起而挑衅，便继续前行。不料，驶至丰岛南侧的宽阔海面时，发现日舰突然转舵西驶，又掉头向北，恶狼扑食一般冲向中国舰艇。

7时52分，当双方相距3000米时，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下令“向‘济远’号猛射”。刹那间，“吉野”号、“秋津洲”号、“浪速”号立刻喷出浓烟烈火，炮弹呼啸着飞向中国舰船。中国官兵被迫自卫还击，双方发生激战。只见硝烟蔽海，只听响声震天，日清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甲午战争由此爆发。

海战一开始，伊东祐亨、坪井航三就指挥日舰利用其速度快、速射炮多的优势，向中国军舰展开猛烈攻势。

伊东祐亨知道“济远”号是重2320吨的穹面钢甲快船，为德国弗尔干造船厂建造，装有威力较大的炮塔，为清军主力战舰，便组织火力，集中轰击“济远”号。

面对日舰的猛烈攻势，“济远”号官兵勇敢开炮还击。老成持重的大副沈寿昌双手稳稳操舵，指挥士兵猛攻敌舰，一发发炮弹飞向“吉野”号。“广乙”号在管带林国祥率领下，开动火炮喷出一道道火舌。一颗炮弹在“浪速”

号周围爆炸，激起的冲天水柱打得舰长东乡平八郎浑身是水；一颗炮弹在“秋津洲”号右舷水面炸响，将船墙击穿；一颗炮弹横穿“吉野”号甲板，把一个水兵炸成两段。

伊东祐亨见日舰炮火轰击目标仍较分散，再次下令集中火力轰击“济远”号。不多时，一发炮弹恰巧击中“济远”号瞭望台，大副沈寿昌壮烈牺牲；二副柯建章立即接替大副指挥战斗，不一会儿又中炮牺牲；实习生黄建勋接替指挥，开动战舰向“吉野”号奋勇冲击，一炮将“吉野”击中。“吉野”号慌忙掉转船头，向一旁逃避。

林国祥指挥“广乙”号向“吉野”号猛冲，吓得“吉野”号向左回旋，但“广乙”号不幸被“秋津洲”号击中桅楼，官兵死伤20余人。“广乙”号官兵仍奋力冲击，终于一弹击中“浪速”号左舷。

激烈的丰岛海战进行了1小时20分钟，日舰渐占优势。“济远”号受伤多处，向旅顺方向退却，日舰“吉野”号紧追不舍。中国官兵拼命开炮御敌，终于有3发炮弹击中“吉野”号，该舰受伤后才转舵退走。

“广乙”号受伤更重，日舰“秋津洲”拼命追击，林国祥全速规避，勉强驶至朝鲜西海岸搁浅。林国祥命令官兵将“广乙”舰和火炮全部破坏，才离舰上岸。

在“济远”号北退之际，装载着枪炮和响银的中国铁甲运输船“操江”号与清朝雇用运载北塘援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由西南海面徐徐驶来，根本不知道中日双方正在激烈交战。

“济远”号立即向“操江”号发出信号，告其“我已开仗，尔须速回”，两船却以为是表示敬意，仍照旧向前行驶。

伊东祐亨见状，忙命“秋津洲”号追击“操江”号，令“浪速”号截击“高升”号。

“操江”号为900余吨的陈旧木质小船，管带王永发见“秋津洲”号越追越近，认为无法与日舰作战，就要抽刀自杀。没想到日舰速度太快，已冲将过来，只得停舰交涉，结果被掳至朝鲜群山的日本舰队停泊地，中国官兵83人被押往佐世保监狱。

东乡平八郎奉命追击“高升”号。他知道“高升”号是清朝从英国雇来的商船，毫无抵抗能力，便像扑食小羊一般冲了上来。他命炮手频频施放空炮进行武力威胁，又发出要“高升”号下锚接受检查的旗令。清军最高指挥官、仁字军邦高善继并不买帐，指挥官兵用步枪英勇还击。他慷慨激昂地鼓舞士气说：“弟兄们，吾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怕死？今日之事，莫要惊慌，要听号令！”

高善继要英国船长高惠梯告诉日本人：“我们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愿意快地打，决不投降！”

东乡平八郎在威胁清军官兵投降被拒绝后，发射鱼雷展开攻击，6门大炮也向“高升”号猛烈射击。“高升”号煤库、锅炉等处起火，燃起熊熊巨焰，涌进大量海水。俄顷，船体开始倾斜，船尾开始下沉。

中国官兵临危不惧，纷纷用步枪射击，击断了“浪速”号的信号绳，日军信号旗坠入海中。东乡平八郎恼羞成怒，指挥日军向中国官兵开炮开枪轰击。“高升”号最后沉入海中，700余人殉难，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

丰岛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哨战，也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和缩影。由于

身膺军事、外交重任的李鸿章对日本消极退让、一再妥协，又制止北洋舰队派兵接应支援，因此使清军在强敌攻击下损失惨重——“广乙”号被击毁沉没，“操江”号被俘虏，“济远”号受伤。

7月25日，日军在挑起丰岛海战的同时，也进犯驻牙山的清国守军，有计划有准备地挑起成欢之战。

朝鲜牙山三面被巍巍群山环抱，一面濒临汪洋大海，特别是东与北两个方向各有一山耸立，宛如巨人的牙齿一般，故名牙山。它虽然只是仅有150间房屋的小城，但却雄踞沔江之口，位于仁川左腋，群岛罗列，为海上通往汉城的必经之路，又地扼朝鲜忠清、庆尚、全罗三道之咽喉。

7月25日，日军大岛旅团4000多人向牙山进犯。直隶总督叶志超临阵畏缩，打算逃跑。太原总兵聂士成劝他说：“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而出。此间战事当率各营竭力防御，相机进止。”

叶志超赞成聂士成的意见，率领清军退出牙山，分驻在成欢、公州两地。

成欢镇位于忠清道平泽县东南、稷山县西北，是控制交通要道的咽喉，东有月峰山，西有银杏亭、牛歇里高山，北有波涛滚滚的安成川，周围沼泽遍地，行动困难，只有安城川上的安城渡为必经之处。

7月28日夜，天降大雨，雷鸣电闪，动人心魄。武备堂学生于光忻、周宪章等人奉令侦探敌情回来报告说，从抓住的日军士兵口中得知，日军将于夜间分道袭击。聂士成下令各营士兵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大岛义昌率领该旅团4000人从汉城南下进攻成欢，沿途烧杀抢掠，抓来的朝鲜民夫纷纷逃跑。

7月29日凌晨，大岛率领该旅团主力向月峰山清军阵地发动炮攻，两军立刻展开激烈炮战。日军在炮火占上风之后，又指挥步兵冲击。在关键时刻，聂士成带领300名生力军赶到，杀退日军。

这时，日本浪人山崎羔三郎赶到，报告了清军防守情况。大岛义昌派兵猛攻清军右翼，攻下安城渡桥，又进攻月峰山，两军展开激烈战斗。聂士成闻报，亲率400人前往增援，大岛义昌亦派日军大队长桥本世昌阻击中国援兵。聂士成指挥士兵奋勇杀敌，桥本世昌被一枪击落马下。日军死伤无数，纷纷向后败退。但日军利用炮火优势再次发动攻势，聂士成所带援军伤亡惨重，付出巨大代价才到达月峰山阵地。中国士兵见主将亲自带兵增援，士气更加高涨。

大岛义昌改变战术，命令炮兵集中轰击清军山上的堡垒，又从东西两面对成欢驿采取夹攻之势。双方战斗极为激烈，日军依靠强大火力攻破清军堡垒。清军阵地相继失守，伤亡很大。聂士成知战事已不可为，就率军突围而出，成欢被日军占领。

聂士成率部向南退奔天安，与叶志超部会合后退往平壤。

成欢之战是中日陆军的首次交锋。日军在战略上达到了将清军逐出牙山之目的；清军再次失利，所受损失虽不太大，但对部队心理影响很大。

中日宣战

当时的清政府对甲午战争缺乏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对于日本的无理进逼，步步退让，没有制定周密的计划，对日本发动丰岛突袭毫无外交反应。

在日本发动成欢之战的第二天，即 7 月 30 日，才向各国驻华公使馆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照会声明：

（日本）在牙山海面，突遣兵轮多只，先行开炮，伤我运船，击沉挂英旗英国“高升”轮船一只。此则衅由彼启，公论难容。中国虽骂怨邦交，再难曲为迁就，不得不另筹决意办法。

7 月 30 日，清朝政府下令撤回中国驻日使馆和领事署，委托美国政府代为保护中国侨民。第二天又谴责日本首先挑起战端，“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令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回国。8 月 1 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对日宣战，历数日本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罪恶事实，强调指出：

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严飭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

同一天，日本明治天皇也下达对中国正式宣战的诏书，硬说日本侵朝是“出兵备变，更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诬蔑清军“要击日舰于黄海，狂妄已极”，把发动甲午战争的责任强加给中国。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标志着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当时，光绪皇帝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一力主战”，主张赶快使劳民伤财的颐和园工程停建，将工程费用改为军费，又多次斥责李鸿章怯懦畏敌，还特别向在朝鲜的叶志超等发出御旨：

李鸿章电奏已悉，叶急起二十五、六两日又连获胜仗，毙倭贼二千余人。该提督偏师深入，以少击众，克挫凶锋，深堪嘉悦。惟倭调汉城之兵，悉往迎敌，叶军势孤可虑。卫汝贵、马玉琨、左宝贵各军，日内行抵何处，著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肤功，勿得稍涉迁延，致滋贻误，是为至要。钦此。

但慈禧太后却反对与日本作战，朝廷里存在激烈的“帝党”和“后党”之争。当时是“后党”掌权，光绪皇帝再发号施令，但叶志超等还是听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对光绪皇帝的圣旨置若罔闻。李鸿章明确命令叶志超，“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如果要进攻汉城，必须“添足 3 万人，步步稳慎，乃可图功”。

中国在朝鲜的将领虚冒战功，抗旨不遵，不去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只打算在平壤集中部分陆军，进而攻击侵朝日军；海军则以北洋舰队扼守渤海湾口，掩护陆军入朝作战。李鸿章生怕他的北洋海军有所损失，不赋予主动歼敌的任务。

为打败清军，日本向朝鲜大举增兵，派第 5、第 3 师团入朝编成第 1 军，任命枢密院议长、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第 1 军司令官，令其在联合舰队配合下，将清军驱逐出朝鲜。

与此同时，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暂定合同条约》、《大日本大朝鲜同盟条约》，紧紧地把朝鲜控制在日本手中，“使其就范，不敢他顾”，令其事实上成为日本的从属国。

日本还大力开展与英、俄、美、德、法等国的外交活动，使它们表示严守“中立”。对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这样的记述：

中日两国演此悲剧时，俄国始终隐现于舞台之一隅，为一演员而动作；英国不过在舞台外，为对于戏剧热心，下种种批评之看客而已……总之，该两国在中日交战之进行中，常窥伺何时何地是否有能达其目的之机会。

做好种种准备后，日军大本营于 9 月 12 日由东京迁往广岛。明治天皇 9

月 15 日驻蹕广岛，亲自督战，下令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击。

早在成欢战役前，日军就开始做进攻平壤的准备活动。

平壤为朝鲜旧京，沿大同江削土垒石筑城，城高 10 米，墙基厚 7 米，顶宽 2 米，南北绵亘 10 余里，为朝鲜北部水陆交通要冲，可谓“一夫堪拒万夫攀”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

1894 年 9 月 13 日，日军侵朝部队总司令、第 1 军军长山县有朋一到汉城，就立即着手进攻平壤的作战部署，命令各部日军必须在 14 日下午完成对平壤的分进合围，确定总攻在 15 日开始，企图一鼓作气，一天结束平壤战役。

14 日晚，叶志超和清军将领们仍“置酒高会”。叶志超不想尽力守城，强调兵力薄弱、弹药不足、地势不熟，打算暂退辽东。左宝贵、马玉现等人极力反对，据理争辩。

15 日，山县有朋下令，对平壤的总攻战开始。猛烈的炮火打破了平壤黎明的寂静，激烈的战斗同时在 30 个战场展开。

大岛义昌率第 9 混成旅团分左中右三路，猖狂地向大同江左岸清军阵地发动进攻，先用威力较大的柳霰弹轰击清军桥头堡，又指挥步兵冲了上来。

马玉琨命毅字军炮兵开炮还击，速射炮炸得日军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大岛义昌不顾死伤惨重，逼迫日军士兵蜂拥而上。马玉琨沉着冷静，等日军冲到距阵地二三十米时才下令开枪射击，日军成片倒地。大岛义昌仍不甘心，又兵分两路凶猛攻击，终于攻下两个堡垒。马玉琨则以炮轰反攻，再指挥清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反冲击。

两军在大同江南岸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马玉琨所部越战越勇，不仅夺回失去的两个堡垒，还歼灭敌人 290 余名，再加上盛字军首领孙显寅带一支援军赶到，中国将士士气大振，一下子把大岛旅团赶了回去。大岛又向中碑街发动突袭，也被马玉琨发现，偷袭之敌几乎全部被歼。大岛义昌身负重伤，部下官兵死伤大半，只得率残兵败将退出战场。日本人杉浦梅潭曾写诗以记大岛旅团兵败实况：

霜惨烈，风萧索。
吾军衔枚乘暗斫。
平壤壁，大同江，
古来天险称无双。
陶器店头岩栅固，
炮雷迸裂弹雨注。
蹀血登，蹈尸进，
白日黯，山河腥。
此役不克旗下死，
呜呼苦战船桥里。

与此同时，日军朔宁支队司令立见尚文率第 10 旅团主力 2400 余人，悄悄运动到平壤牡丹台东北的两个堡垒前。

立见尚文少将深知玄武门是平壤的北门锁钥，而玄武门附近的牡丹台是平壤城北的制高点，雄踞全城形胜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他侧耳细听，发现清军牡丹台堡垒里寂静无声，以为清军将士尚在南柯大梦之中，就命令炮兵突然开炮，掩护步兵冲上去。岂知清军名将左宝贵早已觉察，等日军士兵冲到 300 米处时，突然令中国士兵开枪开炮，打得日军魂飞魄散。立见尚文恼羞成怒，指挥日军拼命冲锋，仍被左宝贵指挥奉军官兵打得望风而逃。

此时，日军佐藤正大佐率领的元山支队也对牡丹台西北方的两个清军堡垒发起攻击，左宝贵平日待部下如亲兄弟一般，此时将士都愿效力，莫不以一当十，把日军打得狼狈不堪！

山县有朋听到牡丹台进攻受挫的报告，亲自前来督战。他听从日本浪人山崎羔三郎的建议，用指南针测量方位角，指挥炮兵准确射击，攻下清军两个炮台堡垒。指南针被打坏后，山崎羔三郎又请山县有朋传令全军抓虱子。不一会儿，士兵交来几十个虱子。山崎羔三郎将虱子放在手绢上，只见几十个虱子的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山崎根据虱头常指北而动的民谚计算出方位角，指挥炮兵攻下了第三个堡垒。

清军第四个堡垒发扬火力威力，压得日军抬不起头来，虱子也被炸死。山崎羔三郎又让日军士兵趴在地上找野萝卜，但不准拔下。他根据菜根北半部分纤维质密的道理判断出清军堡垒方位角，指挥日军炮兵炸塌牡丹台外面的第四个堡垒。日军潮水般攻来，清军抵挡不住，只得撤回牡丹台。

日军对牡丹台三面包抄，强攻合击。左宝贵深知牡丹台为平壤城制高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便亲自指挥战斗。中日双方展开猛烈炮战。不久，清军大炮被击毁，日军步兵乘机发起冲锋。牡丹台堡垒被攻破，清军被迫撤回玄武门。

左宝贵为表示必死决心，特意穿上御赐黄马褂，亲自点放大炮，向日军轰击。清军官兵深受鼓舞，奋勇杀敌。日军集中火力轰击穿黄马褂的将军，致使左宝贵身中数弹，成为在朝英勇牺牲的第一个中国高级军官。

日军攻占牡丹台后，集中火力轰击玄武门，很快就炸毁玄武门城楼。接着，一小队日兵用绳梯攀援而上，夺取了玄武门。

在平壤城西南大同江北战场，卫汝贵率领盛军击退了野津道贯的第5师团。

在此胜负未分之关键时刻，清军统帅叶志超被日军的凶猛进攻吓破了胆，突然决定弃城逃跑，在七星门上挂出一面白旗，又派一个朝鲜人用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的名义，致书日军要求停战。

日军元山支队司令立见尚文看了清军的要求停战书，暗想这可救了日军的命，因为日军的子弹已快打光，再打下去十分危险。此时天气骤变，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立见尚文便以此为借口约定明日再详议一切。

叶志超听到汇报，就下令清军分路而逃。立见尚文早已将伏兵埋伏在清军必经之路，突然下令开枪开炮，清兵死伤无数。

9月16日晨，日军占领平壤。

平壤攻防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的首次战役，也是中日陆军的首次大兵团作战。中国不少将士作战勇敢，战果可观，但由于固守死板战术，特别是主帅叶志超带头逃跑，使清军伤亡近2000人，日军只伤亡180人，教训极为深刻。

海陆激战

9月17日，在平壤战役后的第二天，日本又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域，挑起了世界海战史上第一场蒸汽机船的激烈大战，史称“黄海海战”或“大东沟之战”。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指挥丰岛海战取胜后，气焰更加嚣张，千

方百计要与北洋舰队决一雌雄。

9月17日上午8点，伊东祐亨接到大本营关于北洋舰队即将回航旅顺的通报，立即命令联合舰队悬挂美国星条旗，向北洋舰队驶来，驶至近处才换上日本太阳旗，以“单行鱼贯阵”猛冲过来。丁汝昌亦将北洋舰队的“犄角鱼贯阵”改为“犄角雁行阵”迎敌。

12点50分，中日舰队相距5300米时，刘步蟾率“定远”舰冲杀在前，首先向日舰开炮射击，日军锐气受挫。中国北洋舰队像锐利的钢刀插向日本联合舰队之中，将其拦腰斩为两截，使日军处于被动状态。

伊东祐亨指挥日舰集中火力攻击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丁汝昌被炸伤，令“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指挥。

刘步蟾发现日本巡洋舰“比睿”号、炮舰“赤城”号、代用巡洋舰“西京”号因速度慢而掉了队，就率领北洋舰队集中火力向此3舰发动攻击。“比睿”号中弹起火，“赤城”号的蒸汽管和前炮台及桅杆被炸断，舰长权元八太郎被击毙。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号也被击中起火。中国鱼雷快艇“福龙”号连发3颗鱼雷，虽未射中，却把桦山资纪吓出一身冷汗，命令全速逃跑。谁知“西京”号舵轮又被打坏，只得以链索代替舵轮，狼狈地逃离战场，向仁川方向遁去。

由于北洋舰队官兵士气高昂，奋勇作战，抓住有利时机发动进攻，因而烧“比睿”、遁“赤城”、重创“西京”，几乎生擒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在黄海决战的第一个回合中占了上风！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沉着分析战况，认为北洋舰队摆的是不规则的单行两翼雁行阵，实力最弱的“扬威”号和“超勇”号暴露在两侧，旋即命令坪井航三率领第一游击队进攻中国之最弱舰艇。

第一游击队是日本海军精锐，航速都在18节以上。旗舰“吉野”号航速高达23节，系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巡洋舰，装备着新式速射炮和无烟火药。中国的“扬威”、“超勇”两舰只是铁皮包装的旧式木质快船，因而在日舰进攻下很快燃起冲天大火，并迅速下沉。官兵跳入海中与日军搏斗，都拒绝救援，以身殉国。

伊东祐亨率领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艇绕到中国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集中力量轰击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定远”和“镇远”两舰。

丁汝昌负伤后，刘步蟾代其指挥。中国舰艇以熟练的航行技巧，时退时进，规避敌舰的进攻，选择有利时机，一炮击中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将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引爆，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日本人平田胜马在《黄海大海战》一书中这样生动地描述当时战况：

刹时，如百电千雷崩裂，发出凄惨绝寰宇之巨响。俄而，剧烈震荡，船体倾斜，烈火百道，焰焰烛天，白烟茫茫，笼蔽沧海，死伤达84人……死尸纷纷，或飞坠海底，或散乱甲板，骨碎血溢，异臭扑鼻，其惨淡殆不可言状。俄顷，大火蔓延全船，火灾大作，烟焰蔽天……宛如一大火海。

乘坐此舰的伊东祐亨大惊，急命日本官兵扑火。等扑灭大火，见“松岛”号已被烧得破烂不堪，丧失了联合舰队旗舰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日本官兵也被烧得焦头烂额。伊东只得下令“松岛”号全速退出战斗。

“镇远”号管带林泰曾见“定远”号被日舰包围，就冒险冲上去与日舰抗衡。不一会儿，该舰中弹起火。林泰曾临危不惧，一面指挥官兵奋勇救火，

一面命令士兵向日舰开炮轰击。

这时，“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见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的帅旗被日军打掉，“经远”、“济远”两舰又被日舰分割出去，就当机立断，命令士兵升起帅旗，担当起指挥全舰队的重任，带领部队进攻日舰“吉野”号。“致远”号的炮火频频击中“吉野”号，乘坐此舰的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吓得命令“吉野”号夺路而逃。

邓世昌见状大喜，立即率领“致远”号直追日“吉野”。就在这时，他又突然发现4艘日舰已对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构成严重威胁，就毅然下令转舵去救“定远”号，使丁汝昌乘坐的旗舰转危为安。

邓世昌见主帅脱险，就指挥“致远”号向日军主力舰猛扑过去，几炮命中“吉野”号。坪井航三再次下令“吉野”号掉头逃跑。邓世昌率“致远”号紧追不舍，用最后一发炮弹击中“吉野”号甲板，然后下令鼓轮向“吉野”号撞击。“吉野”号拼命逃避，伊东祐亨指挥日舰齐攻“致远”号，致使“致远”号中鱼雷沉没，除7人外全部牺牲。

日本海军击沉“致远”号后凶焰万丈，集中兵力攻击“定远”和“镇远”舰。林泰曾、刘步蟾互相配合，击中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毙伤日军113人，伊东祐亨不得不把军乐队拉来上阵。

伊东祐亨命令东乡平八郎率“浪速”号等4艘战舰将“经远”号重重包围，管带林永升临危不惧，带领官兵沉着应战，终因寡不敌众，“经远”舰被击沉，林永升中炮牺牲，官兵20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

这时，装甲炮塔舰“来远”号和巡洋舰“靖远”号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炮舰“镇南”、“镇中”和巡洋舰“平远”、“广丙”及“福龙”等4艘鱼雷艇也赶来参战，中国兵力大增。伊东祐亨见日舰伤亡惨重，天色已晚，便下令撤出战场；北洋舰队追击一阵后，因航速低、弹药少，只得停止追击，返回旅顺抢修舰船，以图再战。

北洋舰队将士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北洋舰队的梦想。中日双方损失都很严重（中方沉没“致远”、“经远”等5舰，牺牲邓世昌、林永升等官兵千余人；日方4舰受重创，其余各舰亦有损伤，死亡官兵300多人），北洋舰队损失比日本联合舰队要大，但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无损，其余舰只经整修后仍可作战，黄海之战仍可说是一次不分胜负的战役。

日军第1军攻占平壤后，军司令官山田有朋受命与大山岩的第2军“气脉相同”，进攻辽东。

10月23日，山县有朋在义州统军部署鸭绿江之战。24日向清军发动进攻，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下安平河口，又乘黑夜在义州上游虎山对面的江面上偷架起一座浮桥，乘清军毫无发觉之际突然发起进攻，中国守将马金叙和聂士成奋勇反击。双方鏖战一个多小时，清军孤立无援，被迫后退。

山县有朋率日军第5师团渡过鸭绿江后，开始进攻九连城。清军的鸭绿江防线在一日之间土崩瓦解。

日军乘胜向凤凰城、岫岩等地进攻，夺取了东边道诸重镇，接着兵发辽阳、奉天（沈阳），扬言要“取奉天度岁”，在“辽沈度岁歇兵”。

为打通凤凰城至奉天的唯一通道，日军第10旅团长立见尚文率部向赛马集和连山关进犯，清军马军统领永山率骑兵在日寇立脚未稳之际，旋风般冲乱日军阵脚，获得胜利。聂士成又在摩天岭下大获全胜。清军还与日军在凤

凰城、感工寨等地反复争夺。特别是摩天岭一战，聂士成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日军打通东线到奉天过年的梦想，以游击战争把日军拖在东边道寸步难行。

在山县有朋渡过鸭绿江入侵东边道的同一天，大山岩也指挥第2军发起金旅之战。

10月23日9时，日军第1师团在联合舰队支援下，从大同江口渔隐洞出发。次日凌晨，在朝雾朦胧中登陆，窜入花园口。由于清军将领怯懦畏敌，互相推诿，14天内没有派兵阻击，日军从容登陆24049人，然后又进犯“辽东半岛雄镇”金州。李鸿章等人又对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之目的判断错误，认为日军意在骚扰安东、九连城后路，而不是攻占旅大，没有积极进行防御部署，致使金州轻易陷于敌手。

对军事要地大连湾，李鸿章也授意清军将领可以放弃，“帅意旅重于湾，南关岭有险可守，倘湾不得守，须带炮队退守南关岭，以保旅顺为要”。清军将领稍触即逃，溃逃速度使日本军官都感到吃惊。日军接着攻占旅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全城被屠杀的中国人共约2万人，仅剩下36人为收尸队而免遭杀害。其后，日军进攻盖平、海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1894年12月，日本大本营鉴于辽东半岛地冻天寒不宜于冬季作战，就接受首相伊藤博文和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的建议，改变作战计划，决定进攻山东半岛。

大本营任命大山岩为山东军作战司令官，由第2、第6师团编成“山东作战军”，实施山东半岛战役。

1895年1月20日，日军第2师团1.5万人在荣成湾登陆，驻守龙须岛附近的清军发炮阻击，日本海军“八重山”号开炮掩护陆军冲击。清军兵力单薄，被迫后撤。日军开炮轰击两个小时，确信无人抵抗后才大举登陆，不战而得荣成。

当时，日军普患流行性感。大山岩命令在龙须岛和荣成县修建两个“随军医院”，凡不能冲锋陷阵的病号，一律送医院烧尸焚化。此令一下，许多病号舍命而战。

大山岩令第6、第2两个师团为左右纵队，从背后猛扑威海，又命日本联合舰队从正面进攻刘公岛，他限令10天内拿下威海卫！

当时驻守山东半岛的清军有2万多人，但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大小二李”一心想与日本和谈，并未认真研究战守之策，只命当地总兵孙万林前去迎敌。

孙万林虽是山东著名的“敢战之将”，但手下只有1200人。他在白马河沿岸设好阵地，乘日军第3旅团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发起攻击。日军旅团长山口素臣遭受突然打击，在黑暗的夜色中突然打开行军探照灯以摆脱困境。清军沉着应战，激战两小时打退日军，歼敌百余人。但在关键时刻，阎德胜、刘树德带两股部队不战而退，孙万林寡不敌众，不得不撤离战场。

日军第11旅团长大寺安纯率部进攻威海南部炮台的重要关隘摩天岭，清军营官周家恩亲自操纵行营炮开炮还击，清军官兵穷追猛打击退敌人。

大寺安纯恼羞成怒，调动该旅团所有火力猛轰，日本联合舰队也开炮轰击，日本士兵蜂拥而上。双方展开白刃格斗，周家恩和所部士兵全部牺牲。

大寺安纯得意忘形地登上摩天岭，手举太阳旗让日本记者远藤为其拍照留念，不料被丁汝昌发现。丁汝昌命令“来远”号照准摩天岭上的太阳旗连

发几炮，击中大寺安纯胸部，将其送上西天。

日军在摩天岭上架起大炮，掩护混成第12旅团向杨枫岭炮台发动进攻，副将陈万清率军与日军奋战3小时，炮台仍岿然不动。日寇改由大炮轰击半小时，致使弹药库起火猛烈爆炸，清军死伤大半，陈万清被部下拖着撤出杨枫岭炮台。

日军利用清军的畏敌怯战心理，连续攻下南北两岸炮台，形成了对北洋舰队的海陆合围，断绝了北洋舰队与外界的联系。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柏亨利用与丁汝昌的相识关系，写信给丁汝昌，劝他率北洋舰队投降。丁汝昌严辞拒绝，并把劝降书呈交李鸿章，表示忠于祖国的决心。

日本联合舰队向刘公岛全力猛攻，丁汝昌率军反击，打退日军进攻。伊东祐亨见正面进攻受挫，又利用鱼雷艇夜间偷袭，击伤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使其报废搁浅。日军还击沉清军的“来远”号和“威远”号。

1月8日，日舰从东口突入威海港内，对刘公岛和北洋海军发起最后攻击。几个怯懦的清军将领勾结北洋舰队洋员逼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服毒殉国。

美员浩威盗用丁汝昌名义起草投降书，派人向伊东祐亨乞降。1月16日，牛昶昞代表清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日军17日举行捕获式，正式占领威海卫。山东半岛战役至此宣告结束。

马关议和

日本大举侵华，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而纷纷出面干涉，同时也造成日本国内防务空虚，日本全面控制朝鲜亦遇到困难。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同意清政府的和谈要求，打算通过谈判来发展和巩固它在战场上的胜利。

1895年3月19日，清朝“头等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携带儿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及大批随员，怀着优慢惨淡的心情到达马关（下关），20日开始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举行会谈。

李鸿章首先要求在议和前休战，伊藤博文则漫天要价，提出由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上述各地清军全部缴械，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给日本管理，停火期间的一切军事费用由中国负担。

李鸿章认为这等于把中国首都置于日本监视之下，在北京的咽喉上插上一把尖刀。他借口请示清政府拒不让步。陆奥宗光外相担心引起列强出面干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1月24日，李鸿章拒绝日本的过高条件，撤回了停战要求。

24日下午4时，李鸿章谈判完后，坐轿从春帆楼沿阿弥陀寺经外滨町返回下榻的引接寺。转过外滨町拐角时，忽听“呼”的一声响，一颗子弹穿过小轿小窗，击中李鸿章左颊，金边眼镜被打得碎片四散，子弹擦着眼镜框打进左眼窝下面，顿时鲜血直流。痛得李鸿章大叫一声，用双手捂住眼睛倒在轿中的车褥之上。

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浪人小山丰太郎的行刺事件弄得日本政府狼狈不堪，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亲自前往探视慰问，他们担心由此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导致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为摆脱被动局面，陆奥宗光摆出宽大姿态说：“伯相安心养伤，幸勿焦急，和议之事，均好商量！”伊藤博文也好言相劝：“只盼伯相枪伤速愈，

和议一层，均有我两人担待。”

李鸿章发现日本和谈代表的话有松动之处，怕伤好后再有变化，便抓住他被刺伤后对清朝较为有利的时机，说：“老夫愿带伤与贵国速谈停战大计，然后议和。”

日本见各国慰问李鸿章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害怕事情更加复杂化，便在3月28日宣布“承诺一时休战”，30日与李鸿章签订停战专条，规定自当日至4月20日实行为期21天的停战，其范围只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不包括台湾与澎湖地区在内。原来，日军已于3月26日攻占台湾，为保持日本对台军事优势特意做出此项规定。

4月1日，陆奥宗光提出具体媾和条款。李鸿章瞪大右眼仔细阅看，只见日方一要承认朝鲜独立，二要割让辽东半岛南部和台湾、澎湖列岛，三要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3万万两，四要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等，限在4天之内做出回答。

李鸿章看罢伤透了脑筋，反复念叨：“不管怎么说，太苛刻了，太苛刻了！”

李鸿章本着“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的原则，以73岁的年迈带伤之身，与55岁的伊藤博文、52岁的陆奥宗光软磨硬缠，把赔款由3万万两减到2万万两，之后又进一步提出要求：“从维护两国兄弟关系考虑，再减5000两如何？”

陆奥宗光暗想：“这李鸿章不愧是当今清国官场首屈一指的人物，时而高谈阔论，讲些东方经世家的老生常谈，然后纵横谈论，引人同情，间以热骂冷评，以掩饰战败者的屈辱地位。李鸿章看似口若悬河，其实无时不在捉摸他的话产生的效果，据此寻找更有效的词句。此人的态度始终从容不迫，有时也发出无限感慨，这可能就是能几十年执掌清国大权的奥秘吧？”

李鸿章的要求被拒绝后，又似商人一般讨价还价：“减5000两不行，让2000两可乎？”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又摆出殖民主义者面孔施加军事威胁，李鸿章只好按清政府指示，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

4月17日正是甲午之日。日清战争在甲午年爆发，又在甲午日签署塔和条约，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共11条，其主要内容力：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库平银，增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4港，开辟长江及吴淞江航运线，日本人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生产产品后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纳一切内地税，承认所谓“朝鲜独立”等等。

《马关条约》使中国丧权辱国，日本获得巨额赔款，得以发展经济、扩张军备，朝鲜从此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后被日吞并。

在《马关条约》签字后的第6天，4月23日，俄国、德国、法国驻东京公使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照会。5月5日，日本被迫接受三国干涉。11月8日，中日签订《中日辽南条约》，即《归还辽东半岛条约》，由清政府偿付3000万两库平银给日本。

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后不久，俄国强租中国旅顺、大连，成了“战胜者的战胜者”。从此以后，日俄间又打上了一个“国际的结头”，直到10年后日俄开战，“才由朴茨茅斯条约解开”。

第 15 章

与俄争锋

日俄角逐

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怀恨在心，遂以“卧薪尝胆”为口号，大举扩军备战，以求卷土重来。

明治天皇安慰伊藤博文首相说：“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在朝鲜或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取也不为晚。”1896 年，伊藤内阁制定了 10 年扩军计划，计划陆军增设 6 个师团，海军建立由战斗舰和巡洋舰各 6 艘组成的“六六舰队”。由于财政紧张，帝国的报纸甚至要求人民节衣缩食，“改每日三餐为两餐”，以支持军备扩张。到 1903 年，日本陆军常备兵力达到 20 万人，另有后备兵源 20 余万人；海军舰只总吨数达到 26 万多吨。

三国干涉还辽后，沙俄也看到，势将与日本发生一场武装冲突，便以压倒日本为目标，竭力加强自己的海军力量。到日俄开战前夕，沙俄正规陆军超过 200 万，可动员兵力约 500 万，海军舰只总吨数 80 万吨。

日俄两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明争暗斗，因失去清政府作缓冲，更加表面化，双方都想控制远东的霸权。在争夺中，俄国逐渐得势，占了上风。在朝鲜，1895 年 7 月，俄国策划闵妃集团把亲日派逐出政府，建立亲俄派的统治。虽然亲日派在 10 月发动政变，血溅王宫，重建亲日政权，但到 1896 年 2 月，亲日派再次被逐出王宫。这年 5 月，俄日双方签署备忘录，日本被迫承认俄国在朝鲜的权利。在中国，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乘虚而入。1896 年 6 月，俄国利用日本的威胁，拉拢、诱骗清政府签订对日的《中俄密约》，接着又获得了修建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的权利，整个东北沦为其势力范围。

日本自然不甘心其到口的肉白白被俄国吞下，遂寻机与俄决战。机会终于来了，1900 年，八国联军出兵侵略中国，日本出动了远远多于俄国的兵力。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日俄两国的矛盾便公然激化起来了。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为了迷惑对方，争取时间，双方都制造“缓和”的气氛，展开了外交活动。1903 年 6 月，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以“到远东视察旅行”为名到达日本，其实际目的却是探听日本的虚实。双方在战争前夕还进行了和平谈判。1903 年 6 月 23 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小村寿太郎外相在会上提出对俄谈判意见书，并分析形势说，沙俄不仅继续占领中国东北，而且威胁朝鲜，如果听之任之，无疑将危及帝国的生存，因此应对俄国直接交涉，“谋韩国之安全，并将俄在满洲之行动限于条约范围内”，“保全帝国防卫与经济之利益”。8 月 12 日，日本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向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递交了日方提出的《协商基础草案》。草案一方面声称尊重中、朝两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以保证各国在当地的“机会均等”；另一方面则要求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利益”，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改革”拥有“建议及援助”（包括军事援助）的“专权”，而日本则承认沙俄在中国东北“经营铁路的特殊利益”。

沙俄当然不会接受日本的条件，决心以武力威胁来确保同日本的谈判取得以功。10 月 3 日，沙俄驻日公使罗森向小村外相递交了俄方谈判方案，其

内容只涉及朝鲜问题。它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利益”，及其在朝鲜的“民政改革”中提出“建议及援助”的权利，承认日本可向朝鲜派出军队，但必须事先“知照”俄国，并保持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它要求日本不得把朝鲜领土的任何部分用于“军事战略目的”，不得在朝鲜沿岸构筑军事设施，妨碍朝鲜海峡的自由航行，并要求把北纬 39° 以北的朝鲜领土划为“中立地带”，不得驻扎军队。对于日案中有关中国及东北各项，均只字未提，只是明确要求日本承认“满洲及其沿岸完全在日本之利益范围以外”。这样，沙俄反而关闭东北的大门，限制日本在朝鲜的手脚。

10 月 4 日，日方向罗森提出第一次修正案，并经双方谈判后，又于 10 月 30 日提出了第一次正式修正案。其中关于朝鲜部分虽然与原来基本相同，但针对俄方所提以北纬 39° 以北的朝鲜领土作为中立地带一事，日本提出以中朝边界两侧各 50 公里作为中立地带。日本虽然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以及为保护此种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并承认东北“在日本特殊利益之范围以外”，但也同时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商业活动和朝鲜“在俄国特殊利益之范围以外”。

12 月 11 日，沙俄针对日方的修正案作出答复，继续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除限制日本在朝鲜的权益外，对于东北仍只字未提，并于此前的 10 月 28 日，再次突然出兵占领了奉天（沈阳）。10 天后，日本提出第二次修正案，也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拒不接受俄方关于朝鲜领土的任何部分都不得用于“军事战略目的”及设置中立地带的要求。12 月 29 日，沙俄少将阿巴扎在上奏尼古拉二世的意见书中，再次明确提出“迅速增加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以威慑日本。同时，于 1904 年 1 月 6 日，沙俄复照日本，继续坚持原案要点，特别是不得将朝鲜领土用于“军事战略目的”和必须设置“中立地带”两项，表示在此前提下可“不妨碍”日本享有根据现有条约而在东北获得的“权利与特权”，但不得设立租界。

此时，沙俄的军事力量较前已有巨大增长，在远东的兵力更有明显增加。1903 年 10 月 20 日，地面部队增至 12.7 万人；两个月后，增至 24 万人。沙俄海军的太平洋舰队拥有 19.1 万吨，与日本海军约力 7 : 10 之比，但如将波罗的海舰队调来远东，沙俄海军则将占压倒的优势。因此，“俄国现在显然已经决心不向日本作任何让步”，“并以为打垮日本，毁灭其在远东地位之时机已经到来”。果然，沙皇尼古拉二世在 1 月 8 日给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诏书中，即命令“在远东各州进行总动员，并宣布满洲进入战时状态”，同时继续调送陆海军东来。

日本小村外相在 1 月 12 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也提出了极其强硬的方针，继续坚持原来的主张，并要求取消不得在东北设立租界的限制。他顶见到俄国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方条件，而时间的拖延对日本不利，便建议停止同俄国的谈判，宣布日本“为保卫帝国不受威胁，维护帝国既得权利及正当利益，保留采取自认为最合适的独立行动的权利”，并“立即采取必要的自卫手段”。13 日，日本公使栗野向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递交了等于最后通牒的日方方案。23 日和 26 日，又照会拉姆斯多夫，敦促其尽快作出明确答复。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海面防御令》、《铁路军用令》等一系列法令，由军队首脑组成了军事参议院，作好了临战准备。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远东的上空，然而，俄国人自视甚高。沙俄陆军大臣

库罗帕特金说，“我们可以陆军力量抵抗日本，日本在满洲大陆上愈深入接近我们，它的失败就愈具决定性。”1903年6月，库罗帕特金访问了日本后，又声称：“我们可以在13天中集结40万军队于日本边境。这是足以打败日本的兵力的3倍。”1900年以来担任沙俄驻日本陆军武官的伊万诺夫斯基，在给本国的报告中说：“日本陆军即使能与欧洲最弱的陆军相对抗，大概也还需要一个世纪。”高级官员别佐布拉佐夫更是轻狂地认为：“日本人是猴子，不堪一击。”因此，阿列克谢耶夫在1903年10月上奏沙皇的电文还相信，“日本国土狭小，兵力不足，财源匮乏，尽管这样，它们仍然虚张声势，就在于它们拉拢了英、美，特别是英国。然而，英国还没有下决心帮助日本，就是帮助亦无实力，日本自身是了解这一点的。所以，我想他们决不会采取最后手段，诉诸战争。如果我们以强硬态度坚持下去，日本必将在我们的高压下屈服。”当然，日本假如真不屈服，那么俄国人也愿打一场“小小规模的战争”，因为“现在正处于俄国革命的高潮阶段，为了扑灭人民当中燃烧着的革命火焰，即使战争只能取得一点点胜利也好，这是维护执政者威望所必需的”。

然而，俄国人打错了算盘。事实上，日本早在1903年6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就决定了对俄的强硬外交政策和准备不惜一战的决心，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战事而稍事拖延。但日本人心里亦明白，时间拖得越久，对自己就越不利，已经决心发动战争了。1904年1月30日上午，过去被认为最坚决的反战亲俄派的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也终于下了开战的决心。他到首相官邸会见了桂太郎首相，说明关于日俄问题下最后决断的时机已经来到。2月1日，大山岩参谋总长也上奏说：“在这种形势下延迟开战，只能白白落入敌人圈套。”并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其发动的时机主要取决于战略上的利害得失，因此，必须尽早作出最后决断。”

2月3日，突然收到驻守烟台的森义太郎海军中佐的急电，内称：“旅顺的俄国舰队出港，去向不明。”于是，日本立即召开元老会议，讨论局势。

1904年2月4日拂晓，伊藤博文还在床上，忽然接到“急速进宫”的圣命。于是，他立即起床，迅即进宫，被引进的地方是日本天皇日常生活的后宫。这里作为天皇的起居室，就是曾任宫内大臣兼总理大臣的伊藤议长，也还是初次到此。伊藤脱下鞋走进卧室，看到天皇依然身着白色室内便服，好像还没有洗漱，看样子是通宵未眠。两人谈了一会儿关于开战的问题，决定召开御前会议最后决定。上午，日本政府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下午，明治天皇召伊藤、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各位元老和大山岩参谋总长、桂太郎首相、山本权兵卫海相、小村寿太郎外相、寺内正毅陆相、曾祢荒助藏相等进宫，举行了战前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会议的气氛极度紧张。伊藤在会上讲了话，一再鼓励大家。最后，会议一致决议对俄开战，并决定采取如下措施：

1. 断绝日俄外交关系；
2. 日本为了自卫，决定采取自由行动；
3. 从意大利订购的“日进”号、“春日”号两战舰2日已急航至新加坡，命其立即出港迅速驶向横须贺，一俟进入日本势力圈即行开战。

俄国政府是2月6日接到断交通牒的，立即进行军事部署，以应付日军的突然袭击。2月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召集了御前特别会议，研究如何对日作战。会后，电令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说，“最好让日本人，而

不是我们，开始军事行动。”如果日本的战舰“在朝鲜的西海岸越过了北纬39°以北，那你就不要等他们放第一枪即可发动进攻”。

日本出于要争取海上的制海权，决意打响战争的第一枪。2月4日会议以后，2月5日即下达动员令。2月6日，由东乡平八郎中将指挥的联合舰队从佐世保起航出港，前去偷袭旅顺港。

海上风云

制海权之争是关系到日军能否给在中国东北的俄军以有力打击的问题。有了制海权，日军便进可攻，退可守；失去制海权，就意味着日军无力在中国东北作战。因此，日俄战争是以日军偷袭旅顺港开始，以在对马海峡消灭俄波罗的海舰队而宣告结束的。

旅顺是俄国在远东攫取的惟一的不冻港，该港分内外两港，内港较狭窄、水浅，只有一个出入口，大型战舰只能在涨潮时出入内港。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常驻该港。由于俄国在港口周围修筑了岸基炮台，使得该港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港。整个日俄战争期间，始终贯穿着双方对这一战略要地的争夺，实质上也就是争夺对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制海权。

1904年2月5日，日本同俄国断交的同时，天皇即指示开始军事行动。2月5日19时，联合舰队接到了出击的命令。命令说：

俄国的行动显示了敌对态度，帝国舰队应采取以下行动：

1.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及第3舰队司令长官应务求全歼远东的俄国舰队；
2.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要迅速率领舰队出击，首先要会歼黄海海区的俄国舰队；
3. 第3舰队司令长官要迅速占领镇海湾，对朝鲜海峡实施警戒。

2月6日凌晨1时，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将各舰指挥官召集到旗舰“三笠”号上，召开关于袭击旅顺口的作战会议。情报参谋发给每位与会的参战舰长一张“旅顺口锚地和港湾平面图”，图上详细地标明了俄国分舰队的停泊点以及每艘舰艇的位置。会议经过仔细研究后，即刻作出决定，并下达了联合舰队的第1号命令。

我联合舰队即刻由此开往黄海，以歼灭旅顺口及仁川港的敌舰队。瓜生第4战队司令官率

第4战队及“浅间”号、第9、14两舰队歼灭仁川之敌，并掩护陆军在该地登陆。第1、2、3战队及各驱逐舰直接开赴旅顺口，驱逐舰要乘暗夜首先袭击敌舰，舰队于翌日进行攻击。

此战确关系国家安危，诸君务必努力。

联合舰队从1月6日起就开始在佐世保集结，完成了作战准备。这时接到出击的命令，即刻以第3战队旗舰“千岁”号为前导，从佐世保起航。

奉命前去袭击仁川港的瓜生支队，于2月7日16时30分离开主力舰队驶向仁川海域。8日下午与从仁川港驶出的俄炮舰“朝鲜人”号遭遇，当即将它赶回仁川港，并跟着进入该港。进港后，立即向停泊在该港的俄国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出通牒，限俄国舰船于9日中午以前撤离该港，同时，要求在港的第三国舰船于9日16时之前转移到安全海域泊锚。

俄舰于8日午夜驶出仁川港，9日凌晨遭到在港外待机的瓜生舰队的伏击。两艘俄舰被击伤后，逃回仁川港。下午4点30分，“朝鲜人”号首先自爆沉没；接着，“瓦良格”号也在熊熊烈火之中自沉。

仁川港遭袭击的消息没有能够传到旅顺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而日本联合舰队在2月7日早上，经过朝鲜西南岬时，捕获一艘俄国商船“露西亚”号，

得知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在旅顺港外的确切消息，便于8日黄昏到达圆岛附近海域。东乡下令驱逐舰伪装成俄国舰艇前往实施偷袭计划。在夜色的掩护下，联合舰队的第1、2、3驱逐舰，从午夜12时起对俄舰进行了1个小时的突击，当时，停泊在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有战舰7艘、巡洋舰9艘。但是由于日本联合舰队夜战练得不熟，航行中有的舰只掉队，有的与己方舰船相撞，结果造成行动缓慢分散。再加上初次上阵，情绪急躁，盲目地发射鱼雷，效果不佳，16枚鱼雷只有3枚中的，击伤3艘俄国舰只。联合舰队的预期作战目的没有达到。

东乡平八郎曾在英国留学，作战经验丰富，行动谨慎而诡秘，指挥果断而战术刁钻。他原估计8日晚必将给俄太平洋舰队造成重大损失。因此，9日中午逼抵旅顺口，准备收拾俄军败残舰只。但是，俄舰队全部撤到港内，以岸炮反击联合舰队。联合舰队经过对港内进行一阵炮击，看看无效，就撤走了。

旅顺口偷袭，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日军在短短的时间内，仅以6名日本人生命的代价便在远东完全颠倒了日俄之间海军力量的平衡，从而赢得了海上的战术主动。

俄国政府接到旅顺被偷袭的电报后，9日对日宣战，并撤了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达尔克的职，任命马卡罗夫为舰队司令。2月10日，日本也发布了对俄宣战的诏书。战争全面正式打响。

为了对付龟缩在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日联合舰队最初展开的正式作战是堵塞战。这是第1舰队参谋有马良桔中佐提出的建议。它基于这样一种设想：若把船只沉在港口的最窄处堵死航道的话，港内的舰队便自然失去战斗力。但是，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整个作业必须在俄方岸炮的有效射程之内进行。联合舰队招募敢死队员组成堵塞队，进行了三次夜间堵塞行动。第一次行动是在2月24日，第1舰队参谋有马良桔中佐亲自指挥5艘轮船开到旅顺口，自行爆炸，沉入海中。但是，在俄舰的袭扰和岸炮的攻击下，只有两艘到达指定位置。3月27日，又采取了第二次行动，沉没轮船4艘，仍没达到预期目的，在“福井”号船上的指挥官广濑武夫中佐还中弹丧命。5月3日，又采取第三次行动。尽管沉了8艘轮船，但因风疾浪高，又有俄舰袭扰，终于失败。于是，堵塞之举只好作罢。

俄国太平洋舰队受到联合舰队的袭击后，一直士气低落，消极避战。3月8日，太平洋舰队新司令官、海军上将马卡罗夫来到旅顺。马卡罗夫身兼学者、海军战略家和发明家诸荣誉于一身，具有很高的海战理论修养和卓越的才干，在俄海军界享誉甚高。他到任后，立刻向舰队提出了任务：取得对日本海军的优势。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加强了旅顺刚队的行动。首先，他决定在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布雷，防止日军登陆并从后面威胁旅顺基地。同时改善旅顺港口的防御，加紧修复被打坏的舰艇，经常派遣舰队出海活动，加强战备训练。他还命令海参成分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袭扰日军海上交通线，以便分散日方对旅顺的压力。

马卡罗夫的这些措施果然给日军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东乡司令官为了迅速消灭俄太平洋舰队，抓住俄方想报仇雪恨的心理，想出了一条计策。4月12日夜半，东乡司令官派遣第4、5驱逐舰、第14水雷艇队趁着雨雾濛濛之际，在旅顺口外俄舰经常出没的地方布下水雷。4月13日，又派出第3战队在旅顺口外诱敌。当天，有俄驱逐舰自外活动归港、遭到日第2驱逐

舰队的围攻。马卡罗夫急遣巡洋舰“巴杨”号来救，又遭到日第3战队的攻击。马卡罗夫于是自乘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率同“波尔塔瓦”号、“佩列斯特”号战舰，以及“狄安娜”号、“阿斯柯尔德”号、“诺维克”号等巡洋舰前来救助。日第3战队赶紧后撤，并与第1战队取得无线电联系。马卡罗夫见第3战队阵势单薄，想一举歼灭，以报仇雪恨，振作士气，于是，奋起直追。马卡罗夫追赶了一段距离后，突然发现日本主力舰队出现在水平线上，急忙命令舰队回撤，反而想诱东乡舰队到岸上火炮的射程以内。老谋深算的东乡岂能轻易中计，估计日本舰队一到旅顺要塞的炮火射程以内，便即命令回驶。

但是，马卡罗夫舰队却是忙中有错，竟然撞上了日本人前一夜布置的水雷。只听得轰隆两声巨响，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全舰霎时为蒸汽所笼罩，舰身倾斜。1分半钟以后，马卡罗夫和他的参谋人员、29名海军军官、652名水兵一起与舰身隐没在浪涛下了。此后，另有一艘俄舰也触了水雷，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这一仗，俄太平洋舰队非但损失了两艘军舰，而且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一位精明强干的统帅。从此以后，俄太平洋舰队便无大的作为。

马卡罗夫死后，实际继任的是威特赫夫特少将。他不相信俄国舰队能同日本联合舰队较量，决定完全凭借旅顺要塞来保障其舰队的安全。只是由于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强烈要求，才于6月23日勉强率领舰队出港。但是，当遭到在港外待机的日舰队的打击后，便立即撤回港内。此后，旅顺港俄舰队虽然也曾多次出港，但都是小股部队，而且主要目的是支援陆上作战，一旦发现日舰队便赶紧逃跑。

8月7日，威特赫夫特少将接到沙皇诏令，要他“率领分舰队迅速突围，开往海参崴”。8月10日，威特赫夫特率16艘舰只驶出旅顺港。临出发时，他告诉各舰指挥官，此行的主要任务便是突围。

东乡舰队也接到了潜伏在旅顺港周围的情报人员的报告，说旅顺舰队出港了。于是，东乡率领舰队从圆岛附近出击。12时30分发现俄舰队编队后，立即开始接近。但是，经过一阵短短的互相射击后，又被俄舰队巧妙的战术机动甩掉了。然而，俄国舰队速度太慢，很快又被日本舰队赶了上来。17时30分，双方距离只有7000米，又再次接战。这次，日舰队集中火力攻击俄旗舰“萨泽列维奇”号。结果，俄旗舰当即中炮多发，俄军统帅威特赫夫特也中炮身亡，另一发炮弹又击毁了舰上的司令塔，舵机以及所有操纵舰身和炮火的仪器也都损坏了，旗舰开始打起转来。其余的军舰见旗舰与日舰展开激战，也都折回来。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很快陷入一片混乱，受伤的舰艇谁也顾不了谁，只好各自逃命。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日本舰队受伤也较多，特别是旗舰“三笠”号受了重伤。因此，日舰没有继续追击。

其时，俄国还有一支以3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的分舰队驻守在海参崴。日俄开战后，该舰队到朝鲜海峡、日本海，后来甚至通过津轻海峡到日本太平洋沿海活动，威胁着日本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开战之初，联合舰队全力对付旅顺，由第3舰队负责对付海参崴分舰队。3月上旬以后，则由第2舰队司令长官上村中将率领的第2战队的4艘装甲巡洋舰接替第3舰队去对付这支俄国分舰队。

但是，海参崴分舰队破坏海上交通线的活动神出鬼没，要捕捉它十分困难，4月25日，运输舰“金州”号被击沉在元山海域，日军百余名官兵丧生。

6 月间，运输船“常陆”号、“佐渡”号和“和泉”号又相继被击沉，许多陆军官兵与船同遭厄运。海参崴分舰队甚至一度出现在东京湾外面，一时东京街头人心惶惶，一些胆小的人都纷纷跑到山里去避难。负责对付俄军的第 2 舰队司令长官上村中将的住宅遭到了愤怒的国民的石块攻击，上村本人被骂成是“俄探”。

但是，海参崴分舰队为策应 8 月 10 日旅顺太平洋舰队主力的突围，冒险南下，8 月 14 日凌晨，在对马海峡待命的上村舰队，在蔚山以东 40 海里处，发现了海参崴舰队的 3 艘军舰，立即加以攻击。结果，“留里克”号被击沉，“俄罗斯”号和“格罗莫博伊”号遭重创，虽然逃回了海参崴，但是丧失了作战能力。

经过黄海海战和蔚山海战之后，无论是海参崴的俄国舰队，还是旅顺口内的俄国太平洋舰队，都噤若寒蝉，再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反攻。这就给日本联合舰队以充分的准备时间，来迎接下一步同波罗的海舰队进行较量的大海战。

第 15 章

与俄争锋

鏖战辽东

对于日本来说，海战的进行，主要是为了控制制海权，以便陆军在辽东半岛、朝鲜登陆和不受威胁地进攻在中国东北的俄军。迅速向中国东北推进，把俄国军队消灭在中国东北，使俄国不能在远东东山再起，这才是作战的最终目的。

日俄双方自有心在中国东北争夺以来，早都准备了一套作战计划，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稍作更改而已。

沙俄方面，俄国军事当局估计日军在大陆战场所能使用的兵力大约为 10 个师团、20 万人左右。战争爆发之初，日军在数量上几乎等于俄军的 2 倍，占有很大的优势。主战场将在中国东北的南部，特别是辽东半岛。因此，俄军为了争取兵力的优势，除已在中国东北的军队外，再从西伯利亚军区抽调 1 个军，从欧洲部分抽调 2 个军，从喀山军区抽调 4 个师，总计 15 个师。然后，派一个强大的兵团防守鸭绿江一带，并担负直到貔子窝的辽东半岛沿岸的警备。另外派一支部队部署在沿海州，防止日军向那里进行袭扰。俄军主力将集中在辽阳、海城一带。这一兵力部署的目的在于：

1. 在鸭绿江一带的兵团，阻击企图渡江的日军，不使其从侧翼威胁俄军主力；

2. 俄军主力集中在辽阳、海城一带，从侧后威胁进攻旅顺的日军，并积极诱使日军北上，聚而歼之。一旦日军压迫俄军，俄军将避免决战，逐步后退。在此期间，来自欧洲本土的第二线兵团，在哈尔滨附近集结，届时同日军展开一场大决战。

日本帝国军事当局也在备战的过程中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日军参谋部估计，俄国整个兵力在战时几乎为日军的 7 倍。然而，考虑到俄属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给养能力和铁路运输行程遥远，开战时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估计在 25 万人左右。俄国整个海军舰队的兵力超过日本 80% 以上，但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将不会超过总兵力的 $\frac{2}{7}$ 。因此，决定派出大体上和俄军对等的兵力。日军作战的方针是：主战场在中国东北，寻找俄军主力，迅速将其击退至北方。海军则以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为主要目标，以取得制海权。具体作战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第 1 军从朝鲜境内进发，出鸭绿江右岸以牵制俄军。乘此时机，再派第 2 军占领辽东半岛沿岸据点，建立一十根据地，便于后继部队登陆。然后，派第 3 军在辽东半岛登陆，监视旅顺口的俄军，伺机攻陷它。第 2 军把攻击旅顺的任务交给第 3 军后，策应第 1 军北上。在此期间，为了防备俄军穿插分割，再派第 4 军在第 1、第 2 两军中间或渤海东北部沿岸登陆。之后，3 个军相互策应，攻占辽阳，不使俄军从侧后威胁和阻挠日军攻打旅顺口。第二阶段：倘第一阶段的作战在春季开始，就以占领辽阳结束第一阶段。冬季尽量在辽阳以北休整，准备第 2 年春天搜索后退的俄军加以歼灭，使其不能东山再起。同时，预定在第一、第二两个阶段之间的适当时候，派出一支部队攻占库页岛。在初战部署上，还规定不必坐等海战胜利，应迅速进占朝鲜的政治和战略要冲汉城及其以北地方。如

果海战获胜，就以强大的兵力开到朝鲜西北部，牢固地占领朝鲜，从朝鲜北上进入中国东北境内。这样就能保证取得初战的大捷。

战争一爆发，双方就按各自的作战计划调兵遣将。2月11日成立的日本大本营决定：由黑木为桢大将的第1军所属第12师团在仁川登陆，按预定计划北进。2月16日，该师团在木越安纲少将指挥下，开始在仁川登陆，兵力逐渐向汉城附近集中，一部分兵力立即北上开往平壤。这时，大本营又命令第1军主力两个师团，在朝鲜大同江口的镇南浦登陆，然后进入中国东北境内。第1军的主力从广岛宇品港出发，3月11日在镇南浦登陆，会同已在平壤一带的第12师团，于4月1日以前将大部分人马开进清川江左岸地区。到1904年3月中旬，日军在朝鲜的兵力已达10万人。沙俄方面到4月，在南满的总兵力也达10万多人。

俄军由于兵力不足，在朝鲜境内基本上未布置兵力，因此，日军在朝鲜登陆后，行动迅速。4月中旬，黑木为桢率领第1军已进至鸭绿江边，准备渡江作战。

在鸭绿江右岸驻扎的是俄军东满支队的第3师和第6师近2万人，由扎苏利奇中将指挥。

黑木为桢率领的部队为第12师团、近卫师团、第2师团。为了强渡鸭绿江，早在4月26日，第2师团、近卫师团就在义州一带架桥，吸引俄军，而第12师团却于29日在鸭绿江上游水口镇架桥，企图乘俄军不备时渡江。其任务是渡江以后，迂回俄军左翼，截断俄军退路。而第2师团和近卫师团则从正面进攻。4月28日，日军在炮兵和海军舰炮的掩护下，在鸭绿江上架桥，29日夜间实行强行渡江作战。到5月1日，双方激战于九连城下。俄军以炮火和反突击抵抗日军的进攻。但是日军兵力占优势，日军火炮从隐蔽阵地上发射，压制了俄军炮火。扎苏利奇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心里发慌，害怕陷入日军包围，急忙下令向辽阳退却，日军乘势围住了俄东西伯利亚第11步兵团，使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俄军撤退匆忙，以致在撤退途中闹出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笑话。当时，黑暗的夜色中，有一队500人的残兵败将在向凤凰城撤退。忽然听见后面不远处人声嘈杂，脚步声匆促，败军将领急令占据地形狙击。后队人马也展开还击。打了半天，只见后队枪声渐稀，终至消失。俄败军大喜，急忙冲杀过去，却见到自家人的尸体。原来两队俄军都以为对方是日军。

渡江一仗，日军经过激战占领了九连城，取得了陆战的第一次胜利。更重要的是，为日军进入东北打开了大门。日第1军此后立即前出凤凰城地区，准备向辽阳方向进军。

就在第1军在朝鲜推进的同时，日本大本营于3月15日下令组成由奥保巩大将为司令官的第2军，从广岛宇品港、大阪乘船开往前线。5月5—13日，在辽东半岛的盐大澳村附近登陆，然后策应第1军向俄军进攻。大本营又在5月9日派独立第10师团开赴辽东半岛，于大孤山登陆后，配置在第1、第2两军之间，防止俄军穿插。三支部队准备占领金州、南山，截断旅顺要塞与辽阳俄军的联系。

南山，在金州之南约3000米处，东控大连湾，西临金州湾，是旅顺和大连的咽喉要地。俄军在这里凭险而守，在南山周围装上铁丝网，埋伏地雷，开凿陷阱，山上设炮台、碉堡数十处，配置大小火炮70余门，俄军驻守兵力达1个师。

日军要攻取南山要隘，必先取金州城。5月25日夜半，夺取金州城的战斗打响。日第4师团从北门进攻，俄军炮火猛烈轰炸，日军伤亡很大，战斗进行到26日凌晨4点，还未拿下。这时天色发亮，更加不利日军进攻，于是，日军乃停止进攻。当天晚上，日军第38联队（团）一个大队（营）和第9联队一个中队（连）又去攻城，仍然受到强大的阻击。最后，日军用炸药轰开城门，呐喊着冲进城去，拿下了金州城。这时已经是凌晨5点了。

进攻南山的战斗在26日早上开始。日军先用大炮猛轰要隘，然后用步兵进攻。俄军固守堡垒，机枪猛烈扫射。俄军预设的地雷、铁丝网也发挥了作用。日军第8联队第2中队在前进途中，突然踩中地雷，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日军一个分队（班）的士兵已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日军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第1师团从正面、第3师团从背后侧翼进攻，但到下午5点，俄军仍在固守，这时，日军的炮弹快要用完，天色也要暗下来了，而日军不熟悉地形，夜战将更加不利。于是，下令三军肉搏突击，务必在天黑前拿下南山。第1师团鼓勇前进到距联军200米的地方，却被铁丝网挡住，进攻顿时受阻。俄军一阵扫射，又倒下一片日军。正在这关键时刻，日军西山舰队舰炮前来增援，炮兵第4联队也协力开炮，一阵猛轰，炸哑了俄军的大炮。第4师团乘机占领了山头。第3师团及时接应，攻上南山，追击逃兵。

这一场战斗之激烈和残酷是日军从未遇到过的。有些联队几乎全部受伤或战死，有一个联队在进攻过程中伤亡太多，都来不及搬运尸体，结果海水涨潮，伤者、死者全被冲得无影无踪。整个战斗历时15个小时，日军死伤4400人。伤亡之大，连日本大本营也有些不相信，以为是前线的报告填错了，多加了一个零。而尤为紧要的是，这一仗使日军士气低落，军心不稳。

日军攻克南山后，切断了辽阳和旅顺两地俄军的联系。这时，大本营考虑俄国舰队主力躲在港内待机，一时难以歼灭。要消灭它，只有从陆上攻下旅顺口才能解决问题。因此，日军于5月30日占领大连湾后，便组成了由乃木希典中将为司令官的第3军。6月6日，第3军在辽东半岛接替第2军，对旅顺展开了攻击。

奥保巩的第2军由第3军接替后，便决定北上。为了加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作战领导，6月20日成立了“满洲军总司令部”，由大山岩任总司令官，儿玉源太郎任总参谋长。同时又任命山县有朋为本营参谋总长，长冈外史为参谋次长。6月30日，又组成了第4军，配置在第1、第2两军之间，策应作战，野津道贯大将为军司令官。三军齐头并进，进攻辽阳。

辽阳地区的俄军防御成三道阵地。第一道阵地全长75公里，位于辽阳以南和东南约30公里，第二道阵地全长22公里，距辽阳约8公里。第三道阵地靠辽阳城，全长15公里。到8月23日，俄军按计划进入阵地，右翼为南部集团扎鲁巴耶夫指挥的3个军，左翼为东部集团比尔德林格指挥的2个军。

日军从6月下旬就开始了辽阳战役的外围战。第1军于6月30日突破了俄军辽阳以东的第一道防线，占领摩天岭、石门岭一带，并在7月17日俄军的反攻下坚守住了阵地。7月25日，第2军占领大石桥、营口等地，8月1日，日军攻占了样子岭。到8月5日，日满洲军总司令部命令各军作好进攻辽阳的准备。但是，正逢天下大雨，总攻的日期一再推迟。8月25日夜，日军利用暮色掩护，偷袭辽阳以东俄军第二道防线，占领了弓长岭。至此，俄军丢掉了辽阳以东的头两道防线，退到了辽阳外围的太子河一线。

8月28日，日军向辽阳发起了总攻击。日军第2军向首山堡方向进攻，

第4军向早饭屯方向进攻。俄军在这一线部署了3个军10余万人，并凭借着坚固的工事，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连续派敢死队轮番冲击，仍然不能奏效，并且因为伤亡过重和弹药不足逐渐丧失进攻能力。日军第1军从辽阳的东面发起攻击，进展也很迟缓。俄军这一线有2个军的优势兵力，大山岩司令眼看着各路进攻久战不克，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硬攻的战术，而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方法。31日拂晓，日军第1军以突然袭击的动作，从俄军左翼进行迂回，偷渡太子河，使俄军腹背受敌。俄军被这一突然动作吓慌了，俄军统帅担心俄军会被四面包围，慌忙把防守辽阳南面的兵力撤出，集中对付日军第1军。结果给日军第4军造成可乘之机，该军趁势占领首山堡和早饭屯。但日军第1军在绝对优势的俄军进攻下，处境也十分险恶。正在这时，俄军突然全军撤退，放弃辽阳。原来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听说日军一个旅在俄军后面出现，害怕重新被包围，切断他和沈阳的铁路联系。这样，日军在9月4日占领了辽阳，但是无力追击撤退的俄军。

8天战斗，日军死伤2万多人，但是日军在劣势的情况下，达到了把俄军赶出辽阳、解除俄军对进攻旅顺的日军的威胁的原定目的。

辽阳会战后，日军疲惫不堪，无力追击。而库罗帕特金退守沈阳以后，也受到了沙皇的严厉训斥，令其迅速反击，夺回失去的阵地。这时的日俄兵力，俄军达21万人、758门炮、32挺机枪。而沙河地区日军约12万人、488门炮。俄军仍占据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大山岩司令命令三军转入防御，等待第3军北上增援。

库罗帕特金在沙皇政府的催促下，匆忙制订了一个进攻计划，对浑河与太子河间的日军实施攻击，并占领太子河右岸，把日军赶过太子河。俄军把兵力分成左右两翼，左翼3个军，由施塔克尔堡指挥，向本溪湖方向实施主攻；右翼2个军，由比尔德林格指挥，向沙河方向前进，把主攻方向的敌人吸引过来。

日军谍报人员早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大山岩司令官。大山岩司令决定将计就计，首先利用对俄军不利的山地地形，以防御战消耗、疲惫俄军，然后投入新锐力量，转入进攻，猛攻俄军中央和右翼，一举歼灭东北俄军主力。

1904年10月5日，俄军开始进攻。左翼主攻力量虽受到梅泽少将指挥的近卫后备步兵旅8个营的抵抗，仍然很快进到本溪湖地区，可以攻击日军第1军翼侧，但是，库罗帕特金生性谨慎，生怕中了日军的埋伏，于10月10日命令暂停进攻，“以便察明情况”，修改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大山岩利用这个间隙，集中主力，发动进攻，力图迂回俄军右翼，实现其原定作战计划。日俄两军由此展开了一系列遭遇战，不仅白天进行，晚上也常发生。夜战中，双方都不用炮兵，部队以密集队形投入攻击，士兵胳膊挨着胳膊。大多数夜战，都以刺刀白刃战宣告结束。激烈的遭遇战持续到10月15日，日军取得一些胜利，但是进展不大，被迫又转入防守。在15日的夜战中，日军以奇袭攻占了俄军左翼制高点万宝山，构成了突破俄军防御中心的威胁。因此，16、17两日，两军又围绕这一制高点展开激烈争夺，俄军最终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夺回高地。于是，双方各自巩固既得阵地，加修工事，互相对峙，偶尔出动侦察兵或进行炮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5年1月。

整个会战，俄方损失4万余人，日方损失2万余人。但日军以劣势兵力挡住了俄军的进攻，为日军攻取旅顺这个坚固的堡垒赢得了时间。

旅顺是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最大根据地，有一套比较完整、坚固的防御

工事。清朝北洋舰队修建这个军港时，就已经建筑了各种永备炮台 29 座，配备大炮 150 多门。沙俄侵占后，又增修了各种防御堡垒 40 余座、炮台 70 余座，配备各种大炮 600 多门。日俄战争开始时，驻守旅顺兵力达 3.5 万人，另有非战斗的军职人员 7000 人。斯提塞尔中将任要塞司令。俄国政府吹嘘旅顺是攻不破的堡垒。

旅顺要塞严重影响着日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只要旅顺继续掌握在俄国手中，它的舰队就随时威胁着在辽东半岛登陆的日军的海上交通线。不占领旅顺，日军就无法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日本大本营意识到旅顺的重要性，早在 6 月 6 日，就组成由乃木希典统率的第 3 军，在辽东半岛的盐大澳附近登陆，接替第 2 军专攻旅顺。

乃木希典是一个战争老手，在甲午战争时参加过攻打金州和旅顺的战斗，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再加上本人又是一个战争狂，出征前夕，竟然自备了三口棺材，准备与两个儿子一道战死疆场，报效天皇。因此，日本国内十分乐观，以为只要乃木发起进攻，一二日内定可拿下旅顺。各新闻社也拟好祝捷稿件，随时候发。大本营也急电乃木：“第 3 军速攻击旅顺要塞，然后北上参加辽阳战斗。”但是，乃木这一回碰到的是一块货真价实的难啃的“硬骨头”。

乃木的第 3 军，从 6 月 26 日占领辽东半岛的最高点剑山、小平岛一带后，到 7 月底占领凤凰山一带高地，将俄军完全压缩到旅顺口要塞内，完成了对要塞包围的作战部署。8 月 19 日黎明时分，终于发起第一次总攻击。在近 300 门大炮的支援下，日军以第 1 师团为右翼，向 203 高地发起进攻；以第 9 师团为正面，扑向松树山、望台一带；第 11 师团为左翼，猛攻东鸡冠山。俄军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刹时，炮声隆隆、枪声大作，战场上硝烟弥漫。日军虽以 5 万以上的兵力投入进攻，面对强大的俄军火力，照样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代价。乃木见久攻不下，急忙命令各师团组织敢死队进行突击，然而也只是多送几具尸体而已。激烈的战斗持续到 24 日下午，日军尸骨累累，血流成河，被迫停止前进，修筑工事以保住现有的阵地。6 天激战，死伤 15800 多人，换来了两个小小的堡垒。

乃木鉴于第一次进攻的失败，感到旅顺要塞不能轻易攻克，于是改用挖掘坑道堑壕，逼近俄军前沿阵地。俄军发现了日军的意图，也掘坑道反击。经 20 多天的准备，9 月 19 日，乃木命令各师团各自选择攻击目标，对北高地要塞群、水师营南面高地、203 高地发射榴弹 3.2 万发、榴霰弹 1 万发、小炮弹 90 万发，然后发起冲锋。俄军把军舰的大炮卸下来安装在陆军阵地上，水兵也投入战斗。经过 4 天的争夺，日军死伤 4800 多人，只占领了库罗帕特金炮台和水师营南 6 个堡垒、3 个高地，关键的 203 高地仍在俄军手中。日军因弹药不足，乃木不得不下令延期攻击。但大本营严令：“速攻下旅顺要塞。”乃木急得一筹莫展。

9 月下旬，大本营给第 3 军补充了 28 寸榴弹炮 18 门，又增援 1 个师团的兵力和 3 个工兵中队（连），继续挖坑道。乃木在大本营的严令下，又于 10 月 26 日发动 3 次攻击，目标为东鸡冠山、松树山、二龙山堡垒群。经过 4 天炮击，主力又展开肉搏战。俄军在堡垒周围拉上铁丝网，通上电流，以 48 门大炮构成压倒性火力网。4 万日军的进攻，在伤亡 3800 人后，再次以失败告终。

乃木眼看旅顺久攻不下而日军伤亡惨重，又气又急竟病倒了。日本天皇

和大山岩总司令又是慰问，又是打气，才使他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旅顺再次攻击失败引起大本营、满洲军总司令部、第3军司令部之间的意见对立。大本营为促使攻击中心目标改为203高地的作战，11月14日召开特别的御前会议，要求总司令部督促攻陷旅顺。但是，乃木自以为是，坚持正面作战。

11月26日开始，又发起了对旅顺要塞的第三次进攻。这次，乃木从各师团抽调了3000多人，分成6个大队（营），组成敢死队，实行夜间突袭。临出发时，各敢死队员每人斜挎两条白带子，列队站立，乃木希典亲来送行。这次目标为松树山炮垒。夜色苍茫中，3000名敢死队员以密集队形，不打枪，秘密靠近炮台。然而，俄军早已严密戒备，突然用探照灯光罩住敢死队员，火力随之而来，日军只好退却。几次进攻，几次退却，使乃木意识到正面攻击的失败。27日，他下令停止正面进攻，改为夺取203高地。当晚，日军集中全部力量进攻203高地，到28日夜，一度夺取了高地，但后援没跟上，数小时后，又被俄军夺回。

当时，第3军司令部和预备队离前线较远，不能随时了解和增援前线。满洲军总司令部对第3军的这种状态非常恼火。12月1日，大山岩司令派遣儿玉源太郎来到了旅顺，会见了乃木希典，并转交了大山岩的训令：

1. 关于203高地的战况所以下明，大部分应归于统一指挥不得其宜；
2. 高级司令部和预备队位置过远，因此，对敌人的反攻丧失了救援时机；
3. 明早攻击时，各司令级司令部应亲自到达适当位置，必须亲自观察地形与时机，不放过成功机会，以期巩固占领。为了以总司令官的名义指挥第3军作战，特差遣儿玉参谋长。

于是，儿玉使乃木暂时让出指挥权，亲自指挥全军。到12月5日，日军最终以伤亡1.7万多人的代价，攻下了203高地。乃木希典感慨万千，写下了描述这次总攻的艰苦的诗句：“尔灵山巅岂险攀，男儿功名期克艰。铁血覆山山形改，万人同仰尔灵山。”

203高地是旅顺防卫体系中的制高点，占领这个高地，也就控制了整个旅顺市区和港口。日军在占领这个高地后，集结待命的28厘米火炮部队，立即在这里设立观测所，瞄准港内的俄舰射击。经过黄海海战后逃回来的俄国舰队，至此几乎全部丧失战斗力。日军总攻发起时，各师团进行的爆破作业仍在继续进行，乃木决心逐个夺取堡垒。12月18日，日军占领东鸡冠山北堡。至此，俄军凭恃旅顺口天险构筑的难以攻破的53个堡垒一一被拔除。28日，占领二龙山堡垒。31日，又占领了松树山炮台。被俄国人称为旅顺俄军防御“灵魂”的康得拉钦科少将也于12月15日被炸死。俄军士气迅速瓦解。

这时，在旅顺城内的要塞司令斯提塞尔将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身边虽有官兵1.5万人、火炮610门、炮弹20.3万发，但终不免战死或被俘。况且城中伤病人员太多，疫病流行，久拖下去终是无力防守。可是，12月29日召开的要塞防御会议上，偏有许多官兵仍然主战。不过，他是决心已定，只要日军一发动攻势，他就投降。

1905年1月1日，日军一部占领望台附近高地、即将大举进攻时，斯提塞尔派出军使，手持白旗，请求投降。消息传来，俄军将士痛哭不已，他们愤怒地毁坏工事和弹药，爆炸声和大火继续了整整一夜。2日，乃木同斯提塞尔在水师营会见，签署俄军投降书，之后俄军献城投降。

俄军的投降总算使乃木彻底地解脱了。他原来估计至少还需半个月才能攻克旅顺。俄军意外的投降，成了新年的最好礼物。然而再想想整个战役之

艰苦、人员遭受的巨大损失（总投入兵力 13 万人，伤亡 6 万人），乃木惊喜的心情转化为深深的伤感和愧疚。他在后来的诗中写道：“皇师百万征骄虏，野战攻城尸成山。愧我何颜见父老，凯旋今日几人还！”

旅顺要塞俄军的投降，使得第 3 军得以解脱，迅速北上增援满洲军与俄军的主力会战。

库罗帕特金在 1904 年 10 月 26 日被任命为俄国远东陆海军总司令官，指挥俄军在中国东北的作战行动。正当旅顺在乃木第 3 军奋力进攻下告急的时候，他曾计划在 12 月中旬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以救援旅顺。但他丧失了战机，使疲惫不堪的日本满洲军一直在沙河一线成功地阻击了日益扩大优势的俄军到第二年。1905 年 1 月 19 日，库罗帕特金决定在乃木第 3 军北上之前，击溃在沙河一线的日军主力，遂以格里帕别尔格大将指挥的第 2 军和米舒钦柯中将指挥的骑兵团为主力，于 1 月 25 日向日军西翼黑沟台方面发起包围合击。于是，双方在奉天西南的黑沟台激战，俄军最终力有未逮而后撤。

大山岩司令官决定利用第 3 军北上和新编鸭绿江军（第 5 军）参战的有利时机，赶在解冻以前，竭尽全力攻打奉天附近的俄军，力争全歼俄军，胜利结束战争。而库罗帕特金在沙皇的一再催促下，也制定了一个坚决进攻计划，准备 2 月初在奉天和日军进行战略决战。

到 1905 年 2 月中旬，奉天地区日军在长达 100 公里的战线上集结了 5 个军、25 万人、1082 门炮、200 挺机枪。大山的计划是：以新到的第 3 军、第 5 军分别为左、右两翼，迂回进攻俄军两翼，对俄军实施包围；第 1、2、4 三个军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于沙河地区，并保障第 3、5 两军的迂回运动。主攻指向俄军右翼，由第 3 军担任。大山岩曾在德国留学，深深钦佩德国将军毛奇的才能，一直梦想打一场色当式的战役，一举消灭俄军。因此，临战前，他一再告诫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决战。

此时在沙河一线集结的俄军有 3 个独立的野战集团军：右翼为第 2 集团军，中央为第 3 集团军，左翼为第 1 集团军。暴露的翼侧由独立部队掩护。俄军总兵力达 33 万人、炮 1226 门、机枪 56 挺，在兵力和火炮上都占优势。库罗帕特金计划以第 2 集团军担任突击任务，其他两翼佯动策应。保留 5 万人作为预备队。

大山岩司令官力争战术上的主动权，先于俄军发动了进攻。由于日军主攻方向是俄军右翼，它要诱使俄军把预备队调到左翼。2 月 23 日，日军右翼第 5 军从太子河上游地区北进，并在第 1 军支援下，开始迂回俄军第 1 集团军左翼。这一下打乱了俄军的原定计划。库罗帕特金忙命俄军防守，并判定日军主攻方向在自己的左翼，把预备队调了过去，正好中了计。

2 月 27 日，日第 2、3 两军又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实施主要突击，俄军受不了日军的压力，被迫收缩阵地，乃木第 3 军顺利迂回北上。2 月 28 日下午 10 点半，满洲军总司令部向全军发出命令：自 3 月 1 日起发起对奉天的总攻击。并且命令第 1 军扩大包围圈，完成对俄军左翼的威胁，以支援第 5 军。第 4 军攻击万宝山的俄军，第 2 军攻击二台子，长滩之间的俄军，第 3 军攻击四方台附近的俄军。

3 月 1 日，日军发起总攻，遭到俄军顽强抵抗，日军陷于苦战，第 1 军的境况最苦。3 日，俄军组织三次大反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但是，俄军临时编组的反突击部队没有挡住乃木的突击，第 3 军继续向奉天以北迂回，威胁着俄军背后。3 月 7 日，俄军左翼两个集团军放弃沙河阵地，退守

浑河以北，企图缩短战线，抽出兵力增强右翼。但是，临阵筑城，反为日军所趁。3月9日，日第1军突破俄军防线，从左翼迂回奉天，第3军从右翼迂回到俄第2集团军的后方。俄军处于被包围中。当晚，俄军趁日军包围圈尚未收口，急忙向铁岭撤退。3月11日，日第1、3两军在浑河地区会师，但俄军主力已逃脱包围，退至四平街固守。

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参战双方兵力几达60万，整个战线长达200公里。会战中，俄军伤亡约6万人，被俘2.2万人；日军死伤约7万人。

会战后，俄军集结在中国东北北部，等待国内增援和波罗的海舰队东来歼灭日本海军舰队。日本因实力空虚，也无法继续北上作战，除了海军加紧准备迎击波罗的海舰队外，满洲军总司令部已开始向大本营建议：军事作战适可而止，着手进行外交解决。

对马决胜

日海军在远东给予俄国太平洋舰队一系列沉重打击，使沙皇政府感到十分震惊。为此，沙俄政府决定组建第2太平洋舰队，尽快开赴亚洲，解救被日海军围困在旅顺口的太平洋舰队，并任命原海军参谋长齐诺维·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上将为舰队司令官，全权负责舰队的组建和指挥事宜。经过这位性格孤僻、固执但颇讲究效益的将军的几个月的努力，舰队终于建成。1904年9月26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登上了停泊在塔林港的舰队旗舰“苏沃洛夫”号战列舰，检阅了舰队。在沙皇的祝福声中，这支由7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其他后勤辅助船组成的舰队离开芬兰湾，驶向遥远的亚洲水域。然而，整个舰队1.2万余名俄国海军官兵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踏上的不仅是一段长达1.8万余海里的漫长而艰苦的征程，也是一条通向毁灭和死亡的道路。

秋吉正孝和镰村建藏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俩来彼得堡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在俄国人看来，他们是东方人，但是他们完全按照俄国人的生活习惯生活，在公司中职位低微却勤奋肯干，为人又随和，因此得到俄国人的好感，都愿意跟他俩交往。可是，就在镰村与一位俄国姑娘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和秋吉却被俄国保安人员一道抓走了。

原来，秋吉和镰村都是日本海军军令部派来的间谍。他们到彼得堡后，以轮船公司职员的身分作掩护，从事情报活动。在战争爆发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搞到了大量有关俄国海军几个舰队的情报，其中包括第2太平洋舰队的组建、使命、起航时间、航线等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秋吉和镰村不过是派往波罗的海沿岸的情报人员中的2名而已。有许多海军谍报人员身着便衣，化装成度假的游客，在波罗的海沿岸游荡，亲自观察并写报告；或者在当地谋取一个职业，进行情报活动。

关于第2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就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日本海军军令部，为他们分析敌情提供了依据。

沙俄海军第2太平洋舰队从欧洲起航后，日本海军军令部第3班综合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其活动企图作出了以下判断：一是开往俄国远东滨海地区的海参崴，依托该基地对日海军作战；二是驶入南中国海，破坏中国的中立，逐步将日本舰队驱逐出南中国海和黄海；三是在台湾附近或日本南部岛

屿夺取泊锚点，建立基地，开始训练，为以后争夺远东地区制海权作好准备。

同时，日海军军令部的第 3 班一直密切注视着这支庞大舰队的东调航迹。有关其动向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日海军军令部长的办公桌上和联合舰队的指挥室里：

1904 年 10 月 3 日，舰队抵达丹吉尔并重新编队；

11 月中旬，舰队绕过好望角；

1905 年 1 月 9 日，抵达马达加斯加的贝岛进行休整；

3 月 16 日驶出贝岛，3 月 30 日出现在印度洋；

4 月 8 日，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在越南金兰湾休整并与第 3 太平洋舰队汇合。

就这样，日本海军眼看着俄国海军第 2 太平洋舰队以极大的决心笨拙地驶向目的地。无论是缺乏燃料的严重威胁，还是它刚刚绕过好望角就得知旅顺口要塞已被日军攻占和远东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的噩耗；无论是舰上官兵日趋衰竭的体力和斗志，还是由于舰身长满海藻和藤壶而降低了 30% 的航速等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其继续东进。

而这时的日本联合舰队早已在 1904 年 12 月撤除对旅顺港的封锁，陆续返回国内进行维修和补给，然后进入朝鲜半岛东南部的镇海湾，以全歼俄舰为目标日以继夜地进行训练。1905 年 2 月 21 日，东乡司令官在镇海湾的旗舰上升起了帅旗，随时待命出动。

按照东乡的设想，俄海军第 2 太平洋舰队必定是要排除一切困难，首先进入海参威，以便取得给养，然后对日作战。然而，驶向海参威的可能通道有三条：对马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日本舰队如果将兵力一分为三，便有可能因兵力分散而被突破；如果只集中兵力于一个海峡，又会出现敌人从其他海峡溜掉的可能。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如果缩回内海，将会使东京遭到敌舰袭击，局面也难收拾。东乡思考再三，判定：“敌舰将竭尽全力通过对马海峡，直驶海参威。”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俄国舰队离开金兰湾以前，又派出舰艇前出至东海和南海，在俄国舰队可能采用的航线附近海区预先占领侦察阵位，进行先期侦察。俄国舰队从金兰湾起航后，联合舰队又派出若干艘舰艇到对马海峡担负侦察监视任务，重点沿济州岛至五岛列岛一线巡逻，严密监视沙俄舰队北上的动向。

5 月 14 日，俄国舰队从金兰湾起航后，一路北上，向朝鲜海峡驶来。当时联合舰队未获得这一情报。按编队平均航速 10 节计算，俄舰队应在 5 月 20 日到达对马海峡。但是这一天却无任何情报，使联合舰队司令部十分焦虑。5 月 24 日，东乡召开了作战会议，会上有人提议，联合舰队应向北移动，防止俄舰队取道津轻海峡。然而，东乡决心已定。此后几天，关于俄舰的动向一直议论纷纷。

1905 年 5 月 27 日凌晨 2 时 28 分，在对马海峡南口五岛列岛以西海区担负侦察监视任务的日海军侦察船“信浓”号，透过暗夜和海雾首先发现了缓缓北上的俄国舰队的灯光。“信浓”号一面对其监视，一面立即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了预先定好的“今天天气晴朗，但是浪高”的密码电报，意即“发现敌舰队”。接到“信浓”号的报告后，联合舰队司令部在 5 时 5 分命令全军出击，同时发出一份电报：“联合舰队接到发现敌舰的报告，立即出动予以消灭；今日天气晴朗，但是浪高。”

东乡司令乘坐旗舰“三笠”号，从镇海湾起航，在加德水道与第 1、第 2

舰队会合。然后南下，准备在冲岛附近与敌遭遇。1905年5月27日13时39分，发现了北上的俄舰队后，便进入接敌机动。13时55分，日旗舰桅顶升起之字旗，发出了“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努力奋斗”的信号。

27日早上，俄舰队也发现了日本的哨舰。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下令舰队成战斗队形，过了一会儿，又命令改变队形，又过一会儿，命令恢复行军队形。俄舰由于航速不一，造成巨大的混乱。

下午2点5分，日本舰队在敌前来了个大转向，即所谓的“敌前大转向”。这是东乡吸取黄海海战让俄舰逃脱的教训后，采取的一个大胆的冒险行动。其整个过程就是：首先让舰队前出到敌正前方，以防敌舰队规避逃跑；接着，以反航向迅速接敌，转瞬间进行大角度转向，使刚队在敌前划出一个U字形，抢占T字横头态势。T字横头态势是当时被认为最有利于持续进行炮战的态势。但是这一行动的冒险性也很大，那就是在转向过程中，本身处在敌舰队的火力威胁之下，而且相当一部分舰艇由于视线和射界被己方舰艇遮蔽而无法回击。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意识到这是个天赐良机，下令开炮。但由于舰队混乱，加上距离较远，不能给日舰以有力的打击，丧失了战机。日本舰队完成转弯后，首先集中人力猛袭俄国舰队旗舰。不久，俄舰队的“奥斯拉比亚”号、“苏沃洛夫”号和“亚历山大三世”号相继起火，并先后沉没。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受重伤。俄国舰队失去指挥，陷入一片混乱。有些想逃跑的舰只，由于航速慢而不能摆脱日舰。下午4点，海上起雾，东乡舰队一度与俄舰队脱离接触，但很快又重新找到。晚上7点，东乡命令主力编队停止战斗，昼战结束。

晚上，东乡又出动37艘鱼雷艇和21艘驱逐舰，对残余的俄国舰队实施鱼雷攻击。

5月28日5时，东乡按预定计划将舰队集结到郁陵岛附近。对溃逃的俄舰队布下了天罗地网。5时20分，发现了俄舰队残余的5艘舰只。经过短促的交战，残余俄舰在涅博加托夫的命令下投降，只有“绿宝石”号例外脱逃。

至此，一场酝酿良久的海战结束，日军取得全胜。在此战役中，日军击沉俄舰19艘、俘获5艘，总计吨位达27万吨；打死俄军4830人，俘获5917人，连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也未能幸免。日方在此次战斗中只损失鱼雷艇3艘，阵亡117人，伤587人而已。俄国输掉最后的赌注，不得不走向谈判桌。

君临远东

战争能够毁灭一切，却不能解决一切。1905年8月9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开始谈判。9月5日，经双方的讨价还价，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绝对利益；俄国自中国东北撤兵，除辽东半岛外，东北的一切地方均交还中国；俄国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南满铁路及有关特权均无偿转让给日本；以北纬50度为界，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皆转让与日本；俄国允许日本渔民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峡的俄国沿岸一带捕鱼。

日俄战争是当时世界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的一环，战争的受害者是中国和朝鲜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陷于枪林弹雨之

中，死于炮火雷阵之下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倾家荡产，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妻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睹。”

日俄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震动了整个世界。落后的亚洲，纷纷赴日本学习，掀起了富国强兵、维新变革的高潮。日本经此一战，则一跃而为远东的霸主，加入了世界帝国主义俱乐部。日本经济受到剧烈刺激，完成了自甲午战争后开始的工业革命，步入现代国家之列。日本打开了吞并朝鲜、独霸中国东北的道路，使远东国际格局面临重大转折。日本帝国的崛起，不久达到鼎盛。

